



以文学之名

鳥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七 2023.03

与最好的书店交谈：这一年的书，这一年的事

伊险峰《富裕一代》 | 田野中国
杜强《城市的异物》 | 非虚构图书馆
玛丽·拉文《幸福》 | 故事群岛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05 铜魂 金特
第二回 | P09 岳指导 高桑
故事群岛 | P19 白兔·第七匹马 莉奥诺拉·卡林顿
P25 幸福 玛丽·拉文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33 城市的异物 杜强
P39 卧底、小偷和赌鬼 | 废物俱乐部 杜强
P49 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杜强
田野中国 | P59 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 伊险峰
生活亲历者 | P69 四个离开俄罗斯的年轻人 蒋莉、刘天

档 案

发现经典 | P77 斯大林之死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P81 斯大林想和我谈谈 伊利亚·爱伦堡
P91 人为的辩证法 以赛亚·伯林
小鸟年度专辑 | P101 与最好的书店聊天：这一年的书，这一年的事 刘苏里 伊险峰
Newsletter | P139 又一个新学年开启了，阿富汗女性还是无法回到学校 Snufkin
P145 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由 AI 生成的世界？张依依

专 栏

驾驶我的车 | P151 安远路的火山学家 沈非
接力访问 | P157 020 唐冠华：那个著名的生活计划进行了 15 年之后，它的倡导者怎么样了？ /
P43 161 灵子：成都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更乐观了一些 /
P47 165 程意：17 岁，“在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路上努力着” /
P169 023 苏东威：“我来中国是想改变这里一点点，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
P173 024 Aaron：计划过 20 年的生活，4 年之后就得换场 /
P177 025 李博：“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样的” /
P181 026 张颖：40 岁以后，我变成了一个“非典型律师” /
P185 027 李颖怡：为了降低精神内耗，她“拆解”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
P189 028 胖丁：你需要跨出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整个世界相连 杨樱



题图为电影《晨光正好》(2022)剧照

小鸟问答 Vol.27

小鸟 | 小鸟问答

春天就要来了。

i

接力访问有一点点微调。

又说到接力访问。这个微调你看不出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把规则划得更具体一点。

这个栏目是从“找有意思的人聊天”开始的，最开始的接线头当然是我们认识的、我们认为的有意思的人。原本没啥既定之规，接力嘛，一个接一个，我们自由放任，只要推荐就严格走过去，尽力去理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有趣之处。

不过有一天它有点卡住。卡住的原因是我们遇到了有点有趣但是说不出哪里不一样的一个对象。就有点犹豫并为此挣扎了好几天。挣扎完了很好，一个更具体的接力访问的标准浮现出来：我们希望了解的“不一样的生活”，需要有一点公共性。这是这个栏目区别于其他谈论“生活方式”、“创造力”的根本所在。公共性这玩意表现多种多样，但总的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意义里不仅仅有自己，还有更大、更开阔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粗暴的判断，我们可以说说之前和别人讨论这件事时的一个发现，“在咱们这儿，生活在底层的人身上天然是有公共性的，即便 ta 毕生致力于摆脱这些；但是中产阶级就不同，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让自己不关心、不牵扯到公共事件和议题，也致力于这么做，如果 ta 的生活中有公共性，一定是 ta 意识到了什么”。

有点复杂。作为读者还是看看有意思的人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碎碎念。

ii

致力于隔绝公共性的人说话间就出现了一个。

一个熟人，挑选了某个周末给 10 岁的女儿和 7 岁的儿子安排了富有意义的出游计划：去南京西路一个叫做恒隆的写字楼，参观她本人的独立办公室。办公室没有旁人。根据小朋友的转述，熟人向他们展示了办公室里的各种服务，比如每天会有人把泡好的咖啡或者茶，切好的水果按时送到桌子上；绿植有专人维护，若是死了马上换新；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然后把孩子们带到外间，总结陈词：“你们要好好学习。学

习得好，就会跟妈妈一样，拥有这一切；如果学习不好，就只能跟外面这些人一样，坐个小格子间！”

“恒隆宝训”有没有震动到小朋友不可知（要震动也是好好学习的震动），它到底震动到了我们。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妈妈），是吧？

之所以震动，可能还和前面的一个铺垫有关。就是“小鸟文学”还在筹备的时候，熟人对“好奇心日报”已然觉得非常文艺非常没有前途（后来果然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断了前途），如今又要做一个更文艺的，听说还是文学，更觉得超出了她的想象。于是断然发问：“是不是《读者》那样的？”

当时的震动如今犹然在脑，一是觉得对照组如此古早，二是觉得人的眼界可以如此狭窄。不过时隔三年，《读者》评语和“恒隆宝训”之间隔空击掌，一个人自信满满的世界里，除了财务常识、巴菲特传记和中学时写作文用的《读者》，对“功成名就”的定义也是如此单调——就是下午有人给端一小碟切好的水果，和一个更大的格子间。

本来可以开阔一点的啊。

当然，什么叫做“本来”，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iii

开阔、不一样和（之前说的）波希米亚。

先说明，这里的波西米亚是真·波西米亚，不是布尔乔亚式的波西米亚。好了……我们想说的是，在做过这么多定义之后，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在我们这里，过不一样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不结婚就想过这一生，会遇到你妈；不想做 PPT 就想去做报告，会遇到老板；不想做核酸不想被关在家里……那你麻烦可就大了。

不一样，是对正常生活的冒犯，那些认为代表了正常生活本活的人，通常也是爹味最重的人，会觉得你冒犯的是他。“你想得跟我居然不一样”，“你不按我说的来”，你异类，你受人指使，你被人利用，你变态，要不就是你包藏祸心，我得盯住你……追求不一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结果。

有很多人投降，合流，但总有人不拘泥于庸俗，就是不一样。多可贵。

我们要保持一种冒犯的姿态。

iv

这一期的非虚构图书馆作者。

是杜强，他因为写《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广为人知。杜强为小鸟写了一篇不一样的文章，与他以往的（包括两篇他选出的代表作——三和大神系列）作品有所不同。

在这篇《城市的异物》里，他把目光投向自己，他于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可能来自于一种年龄上的自觉，也可能来自于过去一年或者三年境遇的应激反应，总之我们看到了自我阐述的可能。与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或者文章相比，它离出色还有距离，但我们也看到，在这篇不是很长的文章中涵盖了大量的社会性话题于其中。它是一个开放的，或者像我们前面说的，是“开阔”的题目。它让人去思考自己。它是真诚的。

v

更多的人陷入深思之中。

刘苏里老师今年继续与小鸟文学合作年度书单的发布。它以中国最好的学术书店——万圣书园的销量为基础——2000 种图书的大名单，选出 200 种，在 200 种中选出：(1) 2021 年 11 月到 2022 年 11 月出版的新书；(2) 学术价值；(3) 初版，不是旧版新出；(4) 销量。

刘苏里先生与我们做了一个长达八个小时的访问。他说，有 15% 是他的价值取向权重。这个大约算是第五点。

我们会分三期在小鸟文学上发布。

我们说“更多的人陷入沉思”，是因为在这个书单中，我们看到学界的焦灼——如

果考虑到一本书的写作和其后的出版周期，有些书操作之始大约在两年之前，那时
候重新思考世界力量对比、文明冲突、大国崛起等等正热，其后又转而进入困惑与
茫然之中，学界的思考在这些作品中都有体现。苏里先生有精彩、深入而且忧心忡
忡的解读。

vi

分享《消失的真实》中的一段话。

人生既短暂又漫长。之所以说短暂，是因为半个世纪前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而漫长指的则是那无休止的流变。特别是我这一代人，身处现代性遭受巨大挑战的
时代，心灵受到接连不断的冲击，前一个冲击尚未过去，后一个又带着排天的巨浪
而至。让我惊奇不已的是，人到老年，居然还在思考与青壮年时代差不多的问题，
而我则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从事真实性哲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我总
是想到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的话：“有人从西班牙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
啊！黑夜还有多儿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
你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我想问的是：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
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

这是一代人的告别了。

vii

这一期的封面和内容提要。

除去以上说到的这些，“田野中国”栏目最近在更新一个新系列，讲述年轻人的价
值观和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各种人。如果你没看过，推荐你看一下。

我们最近收到了一篇投稿，写的是俄乌战争之后从俄罗斯出走的年轻人。语言很
节制，细节很饱满，是一篇优秀的纪实写作。我们正在和作者沟通，如果可以，非
常荣幸可以在本卷发布。

本卷还会发一篇写足球的“24 小时文学聚会”，来自之前的作者高桑。我们很喜欢，
它和高桑之前的科学家系列一样，主人公有一种迷蒙的美感，但是因为写的是踢假球，
所以又惨烈得让人不忍直视。“24 小时文学聚会”这个栏目感觉最近不是特别有力量。
加油啊，作家们！

本卷封面的鸟是红头环喉雀。

对了，小鸟 3 月在宁波和“假杂志”联合做了一个特别展，你有机会看到（无法购买）
的实体杂志，我们推荐的一组关于“记忆”的书，以及“接力访问”里六位受访者的故事。
欢迎去玩。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春天就要来了。在上海，上一次见到它还是两年前。愿我们这一次能与春天同在。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铜魂

金特 | 24 小时文学聚会

老铁们，鲁迅说啦，
会—好—的，会—好—的

她是户籍民警，等会儿去鲁美带人。一个女学生病了，用螺丝刀捅了男老师，所长说，咱这都是男的，只能借你顶个班儿。所长还搞了套装备，围上吧，像回事儿。这个呢，她问，指手铐。见机行事，他说，配合大平。大平开车，从大门直接干到鲁迅雕像。她就骂，想死呀。小丽，他问，知道我最烦谁吗，就这人，真的。跟我有啥关系，赶紧逮人，完事儿回家。沈阳最高艺术学府，嘿，镇一南方拧巴主儿，邪性，这人邪性。崔大平，你是沈阳人不，是沈阳人，你整啥北京腔儿，下车。刚下车，保安迎上来了，雕塑楼，二楼一号工作室，凶手被控了，老师轻伤，也在呢。楼下有人看热闹，保安扒拉着让路，她走在后头，走着走着，从大平背上望二楼，一排脑在看她，像串麻雀。楼道有股骚味儿。昨胡没，大平问，她错开他的屁股。那能吗，保安说，必须老实儿的。动手了你，她问。那不能，咱又不是警察。老哥，大平说，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母们就不跟您过这个，咱沈阳城有规矩。嗨！她突然大喊一声。出事门口，有个男生在人里对她竖中指。放下！又竖另一根。她拽着装备冲过去，被人挡了，那小子转身就跑，在另一边楼道里喊，风一紧一扯一呼一唆。大平不管那个，命令两男一女，恁仨啊，恁仨，进屋儿。阿 sir 儿，我们不认识他呀。没一有用，知道吗，南方人也没有用，进屋儿。她不吱声。保安先进，跟着仨学生，大平从旁边往里挤，她在最后。屋里有血腥味儿，一个大长方形工作室，被人和黑了吧唧的雕塑挤满了，暖气还发膻。凶手是个短发女生，用血搓过鬓角，额头也有，被一个年轻保安抓着肩膀摁在地上。女生垂着头，两条黑腿（黑色牛仔裤）像男人一样从私处分开。伤者斜靠着椅子背，是个秃顶中年男人，右手捂胯骨，见到警察，就用另一半屁股顶身子想站起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没事儿，我没事儿，别抓她，我不告她。一个马尾辫女生照顾着他，她说，宋教授，别激动，让警察处理。我没激动，他扭着脑袋扫一圈人，没一有。没人应。小丽这时才发现，女凶手的两条胳膊给透明胶绑着呢。女孩一身黑，短版羽绒服底下露着一截肚皮，和肉色的内裤边。见小丽到跟前了，年轻保安松了手，对不起了，他说，亚楠，对不起了。杨哥，女生开口了。在这儿呢，杨哥回身，先看一眼小丽，俯下身听。能给我喝点水吗，女生说，凉的，我胃里热。马上，马上，杨哥说，就逃了。门被堵死，暗了一大块，扑灭女生私处那的光。把头抬起来，小丽说。像

有只手从脑袋后拽了一下，嘎巴，女生就仰平脸，含着泪，合不了嘴，斜着眼睛。叫什么。吴一亚一楠。哪里人。沈一阳一人。做了什么。警察同志。怎么了。我渴，能给点水吗。去拿了，回答问题，是你刺伤人家的吗。是。因为什么。女生就艰难地移动瞳孔，找到宋教授，再移回来，泪就糊了眼睛，整块的涌出来，因为，因为，没一希一望一了。小丽盯着她，蹲下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不管这个，懂吗。女生蠕动喉管，懂。那就给我一个别的原因。比一如一呢。小丽盯着她，盯着，盯到时间死了，才挺轻地问，他骚扰你了是吗。没等回答，小丽顺手合了女生的腿，起身问周围，谁绑的。都不吱声。大平在给宋教授做笔录，也看她。谁绑的。保安大哥举手了，我，系主任的命令。用你这只手，小丽指一下它，去找把剪子，等会儿，是一剪一子。保安大哥到门口时，杨哥在人头外面对小丽晃矿泉水呢，她走过去，人就躲，先接了瓶子，看着俩保安一进一进。杨哥不敢再迈一步，还被个学生扒开肩膀，挡着我了，边刺切。小丽握着水，抽出了手铐，在门口等着。大平冲马尾女生指吴亚楠，她说你认识。嗯，不认识。你是谁。我是周宁。哪个宁，我记下，喂，女生，哪个宁。宁静的宁，警察同志，她误会了。哪里人。绍一兴。嘿，巧哈。是的，和鲁迅先生同乡。和一母们一没一关。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和你无关呢，鲁迅先生为什么和你无关呢。咱不拧巴，咋的，周同学，非得拧巴得跟这些雕塑似的，就是不麻木吗。我不知道，警察同志。你不用知道，沈阳没阿 Q，不信是吗，不信的话，看那儿，咱沈阳的姑娘，多一敢一干。沈阳老爷们呢，警察同志，门口有个小子问，大伙都乐了。小丽回头瞅人，他就老实了，用二指禅碰碰太阳穴，嘿，必须滴，猪一样老实。大平也乐，说，沈阳老爷们连阿 Q 都比不上，彻底玩蛋了。门口就鼓掌，还吹口哨。行了行了，办案呢，消停点儿，大平说，你们学艺术能让心里更明白点儿，一丁点儿，就行了。阿 sir 我举报，三个南方学生里的女孩举个手，又指向周宁，说，她在说谎。

两个同伴就拦她，嘀咕咕地说方言，把女生惹急了，我一不一怕，她就是在说谎。宋教授咧开了嘴，哎呀，这位学生别添乱了成吗，你不了解情况，很复杂的。南方女生“切”了一声，怎样啊，复杂了又怎样，你们三个不是好人，阿 sir 儿，他们三个搞事情的。大平收了记事本，抱起肩膀问，怎么搞，说吧。这个老渣男，想和她，还有她，一起做爱，操一她一俩一的一逼……门口就炸了，大笑，鼓掌，口哨，刚才那个小子还挑大拇指，好样的，你现在是一名优秀的沈阳人啦。屋里呢，是死寂。雕塑们不能发声的。俩同伴一个捂女生的嘴，另一个喊不是的不是的，阿 sir，她傻掉了，她傻了，她是傻逼逼的，原谅她。门口那小子却伸出一只胳膊，去质问，为啥原谅啊，她哪儿错了呀。女生推开同伴，滚。你神经病啊，痴线了你，男同伴气急了，朝门口喊，这个傻逼（女同伴）是来搅浑水的，她有病，阴一茎一仇一恨一症，把所有鸡巴都割掉世界才会好，好不了的啦（他开始转圈摆手），好不了的啦，完蛋了，她在找东西，大一鸡一巴，地球肯定有一根大鸡巴的，从南方一路到沈阳，她就说，哈一哈一哈，这一根一大一鸡一巴在一沈一阳，原一来一在一沈一阳，哈一哈一哈，我一要一在一沈一阳一割一地一球一的一大一鸡一巴，你们，你们全是喷出来的臭精液，包括你，阿 sir，别那样盯我，我是在学她，抓她，她有精神病的。大平没动，门口那个小子突然急了，去你妈的吧，彻底弄反了，我告诉你们，南方小逼崽子，那根大鸡吧是来操沈阳的，去你妈了个逼的吧，把子宫操烂了都，都懒得操了，拔出来，去操你们南方啦，哈哈哈哈……南方女生就扑过去，被小丽拦了。傻逼啊你，女生骂小丽，护着用鸡巴说话的人，护着操你的鸡巴吗。小丽争不过，突然尖叫一声，放屁，你这个行为……逻辑是不对的，懂吗，笨蛋。女生就是不听，疯了似的又去扑，这时候，周宁从后面抱住了她，别怕，别怕，是我，我，女人。然后，周宁吻她的耳朵，说了句话，女生便安静了。两个同伴顺势接过她，没忘答谢和抱歉，离开了。周宁呢，发现自己的手在抖，原地看着它们，慢慢地移动目光，把它们亮给大平，警察同志，抓……我……大平歪个身，为什么呀。我是凶手。短发女生就骂她，给我闭嘴，闭嘴。真的，警察同志，周宁接着说，是我捅伤了宋教授，知道吗，本想捅他那里的，因为他心里想过用那个东西伤害我的，他想过的，我确信他想过，只要他想过，就让我恶心和恨，抓我吧。那个宋教授就嚎啕大哭，啥跟啥啊这是，周宁啊，你咋的了呀，我没那样想过……闭嘴，周宁甩出马尾吼他，闭嘴，老东西，恶心的老东西，闭嘴，你想过，你想过，你就是想过，恶心，呸，去死。我……没……有。滚。这节骨眼，挤进个老婆子，开口就骂，吵吵啥，给我都闭嘴，谁让找刀子的。剪子，小丽说，这儿不需要刀。又挤进俩保安，站到老婆子身后。保安大哥被挡在外面了，插空给小丽晃剪子，黑色的环，刚买的，他悄声说，老快了，哎，系主任您好。老婆子没搭理他，嘴更狠了，我郑重地建议您，这位女警官，不一能一剪。哦，为什么。因为她是凶手。我也郑重地告诉您，您这是非法拘禁，如果她行凶属实，得用这个（手铐），懂不。懂一不，警察同志，这里是鲁美，沈阳最高艺术学府，以为绑她没理由吗，她一勾一结一境一外一势一力，在鲁迅的英灵之下搞一事一情，还问我懂一不，我太懂，就是太懂了，年纪轻轻的，你自己搞同性恋没人管，都二十一世纪了嘛，

搞个基不叫事儿,但敢在这儿搞事情,能不收拾你吗,盯着你呢,证据多着呢,救护车呢,还不来呀。她边吵吵,边往里走,人在雕塑间有了晃动。还有你,男警官,你一大老爷们说自己完蛋,心好受是咋的。大平翘一根食指,嘻,玩笑的玩,玩一蛋,嘻嘻嘻。呵,您能玩儿,她呢。吴亚楠就晕倒了。有个男生在外面大笑,死老娘们儿,操你妈,哈哈哈,风紧扯呼喽。系主任就冷笑,我妈早见马克思了,操得着吗你。趁这功夫,一个蒙黑围巾的男学生,在她身后毛腰闪过去,扶起吴亚楠,用剪尖儿划透明胶。小丽拧开盖儿,去喂水,帮忙扯胶布。她喝不进去,又摔倒了,被蒙面人安静地放稳,瞅一瞅,又听她鼻孔的气儿。英雄救美喽,系主任抱肩膀冷笑,哼,有点意思,瞅啥啊,瞅吧,瞅我,你们不就是想看见一个鲁迅笔下的形象吗,好,我做给你们看,看吧,看完了咱再算账,算笔历史的账,算一算究竟是谁,才真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你吗,宋教授。宋教授痛苦地闭眼。你们吗。雕塑间的人就僵了。你俩吗,她瞥瞥身后的俩保镖,你俩就算了吧。你们呢,堵着门口,进不来,又走,难受吧,那就麻木嘛,省心呀。那一—我一喽,系主任更入戏了,我是二十一世纪沈阳版本儿的女阿Q喽,可是,不好意思哦,这个新阿Q得为你们负责哦,哇,历史真诡异哦,阿Q上一位—了哦。吴亚楠醒了,拼命地喝水,又呕出几滩胃液。把带我走吧,她太虚弱,只能恳求小丽,他(宋教授)是无辜的,他是个好人,是我父亲的发小.....我不用螺丝刀,她就用剪子了。然后,她吻蒙面人的耳发,谢谢你。他顺势缩了,把她的胳膊绕到前面,和另一只并好,从后面扶她起身。小丽凶恶地拷上她。周宁突然抱住她,嚎啕大哭,对不起,亚楠,对不起,她吻亚楠的脸和唇,对不起,我只是怕.....大平埋下脸,摁了摁装备带,一排雕塑就在他身后变成多米诺,全部坍塌了。宋教授吓哭了,嗷嗷地哭,还干呕。没人扶他。所有人涌向门口,除了系主任。门口、走廊挤着学生,楼下也是,是的,学生们包围了这栋建筑。他们沉默着。鲁迅的铜雕坐在那,没有声音,也没风。你和南方女孩说了什么,小丽望着鲁迅,轻轻地问周宁。子宫,周宁说,不能变成阴茎。一个活人,踩鲁迅的大腿往上爬,搂住铜脖子转个身,坐上那坚实的肩膀。喂,喂,他骑着鲁迅的头,快乐地向这边摇手臂,老铁们,他(鲁迅)跟我说啦,老铁们,鲁迅说啦,会—好—的,会—好—的.....



金特

满族,小说作者,作品有《冷水坑》《冬民》《罪与爱》等。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周六见。

2018, 沈阳, 腊月



图片来自 [Ben Wiens](#) on Unsplash

小说

岳指导

高桑 | 第二回

现在他把皮球传给了我，
我努力跟上他的幻想。

是胖子陈聪介绍我认识岳指导的，那天晚上，苏州寅狮队二比零击败了合肥城市队。我和陈聪是老朋友了，他在寅狮队担任队医兼营养员兼某些球员的私人教练，有时候，他还要联络接送大巴，或者在场边像副教练一样指挥比赛，让人觉得整个寅狮队就他一个工作人员。我清晰地记得，那天，陈聪拍了拍刚踢完比赛、臭汗淋漓的岳指导，对我说：“这就是岳指导，要不是他，你们这些赌棍都没得玩。”他的言外之意是，几乎所有球员和老板都在赌球，只有岳指导不赌，真踢，他是赌盘里唯一的不确定性。正因为有他的存在，赌球这项游戏才不完全是庄家说了算的，别人才有得玩。那场比赛，正是岳指导在第八十四分钟的时候打进了第二个进球。他是个左边前卫，接到球的时候还在禁区的左上角，面前有合肥队一字排开的四个后卫，几乎没有任何进球的角度，可他就是把球打进去了。陈聪和我说过，这场比赛已经定了，一比零，让我就这么买。但我觉得总跟着他没意思，就买了二比零，可是他既然这么说了，我也不敢多买，只下了两千，赢了一万四。现在回想起来，岳指导起脚的时候，面前虽然有四个合肥队的后卫，可他们四个人都松松垮垮的，没有一个上前封堵。等球踢起来后，也没人鱼跃出去，试图用脑袋把球顶开。对他们来说，比赛大概已经提前结束了吧。可不管怎么说，这一万四是岳指导帮我赢来的，我必须请他喝一杯。

他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陈聪已经在吧台处买好啤酒，专程跑到岳指导身边，意味深长地拍了两下他的肩膀，然后看着我，一边摇头一边笑。我太了解他的意思了，岳指导让他输了钱，又让我赢了钱，我又是他的朋友，这两拍大可以解读成对岳指导无可奈何的警示。接着，他作为营养员，开始给球队里的人分发香烟配额，“来来来，比赛后小抽一支。”岳指导摇手拒绝。陈聪离去后，我想给岳指导点杯酒，他还是不要，只要了一杯冰牛奶。

“没怎么见过你来。”我说。

“这地方有什么意思？”

的确如此。其他人坐在离我们七八米远的桌子那，平日里，他们现在应该在大谈对滚球的复盘了，争论的内容几乎穷尽了一场足球赛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因为比赛的结果已定，他们的乐趣就在于，赌这球是第几分钟进，有几个角球，角球在左边开还是右边开，某某

某是用左脚进球还是用脑袋进球，等等。我也无法理解，赌博赌到这等庖丁解牛，支离破碎的地步，还有什么意思。今天，岳指导作为他们的搅局者也出现在此，他们就不知道聊什么了，显得格外安静。

“那今天怎么来了？”

“胖子叫我来的，他说有个人肯定想见我。就是你。”

其实我倒没有这么想见他，估计陈聪也就是打趣儿一说，可岳指导看上去一本正经，好像在等我说出来找他有什么事。既然如此，我必须说点什么。不过我对聊怎么赢钱没兴趣，况且岳指导能在中冠踢真球，也是人中豪杰，不该拿这么低档的话题羞辱他。

“第八十四分钟的时候，你踢得可真牛，在禁区外拿球，趟了两步，其实根本没角度，太靠左边了，前边还有后卫。没想到你能突然射门，还他妈进了。”

“哦，那球啊。我拿球的时候在左路，对面四个后卫离门都比较近。这个时候九号出来接应了。他一往外走，对面中后卫也被扯出来了。我传给他，他又传给我，一个撞墙配合，我面前就有空间了，就踢进了。”

我顿时一头雾水，哪来什么撞墙配合，我记得很清楚，寅狮队的九号中锋一直吊在越位线的后头。别说帮岳指导拉扯空间了，他一直堵在门前，差点没把那脚射门顶出来。我怀疑是双方的理解有偏差，就再和他聊起第一粒进球。那球是岳指导的助攻，他在左路一直跑，快到底线的时候高空传中。但他和我说，他在禁区外观察了大家的站位，原地和队友传导了两脚，等待右边卫跑到相应的位置后，他就直塞过去，一击命中。这下，我彻底不知所云了，那场比赛，进第一个球的明明是寅狮队的右边锋，绝不会错。直至今天，那粒进球的相关记录还可以在二〇一二年中冠的历史数据中查到。不仅是我们对场面的描述差别很大，连最后进球的人都不是同一个，我觉得我们俩说的压根不是同一场比赛。

没过几分钟，陈聪开始带着几个球员吃起烧烤，也不管所谓的香烟配额，开始一根接一根地点烟。岳指导说，他不想闻二手烟，就先走了。

那天的两周之后，寅狮主场踢福州，陈聪短信我，一比二输球，我跟着下了一些钱，来到现场。寅狮队总是租借一些专科大学的足球场当主场，稀稀落落的观众（无非是一群想第一时间下注的赌棍和刚好路过的学生）就站在跑道上，我可以清晰地观察岳指导是怎么在一群踢假球的人中间活动。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地跑位，经常出现在绝佳的空位上，可是没人给他传球。这时候，他就会极严正地大喊，“这里，这里，操。”或者，“给啊，传那边。”整个场上就他一人声音，想必这就是“岳指导”这个外号的由来。二十分钟，福州队进第一个球。我明显感觉到岳指导忽然变得暴躁，步频加快，防守也更加凶狠。十分钟后，他左路拿球，才推进了几步，就内切打门了，时机完全不成熟。皮球打在对方后卫的身上，阴差阳错地弹给了寅狮队中锋，那人将球打进。岳指导不迷恋于庆祝，急于乘胜追击，但我知道，寅狮队里一半以上的串通者都决定结束进攻了。从那之后，我越发感到岳指导孤立无援，他一个人在前场逼抢对方的后卫，无人配合。他随着对方的传导，从左边抢到右边，又跑回左边，别的队友却在他身后十几米外踱步。或者，他好不容易抢到球权，想朝前输送，却没有人帮他跑位。我忽然感到眼前的画面有些可悲，不免设身处地为他的处境感到绝望，就像在看电影《楚门的世界》。直到七十三分钟，福州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般再入一球。当我和岳指导日益相熟后，我甚至还为此问过陈聪，既然他踢真球，你们为啥不干脆让他替补算了。陈聪笑道，哎，让他踢呗，一个人能闹出什么花样，其实那小子挺有意思。

赛后，我朝他挥了挥手，示意在老地方等他。他朝我走过来时，也看不出有太多沮丧，和之前差不多，一本正经。他的确挺有意思，走路走到一半，还自顾自把双手朝外一摊，左脚平推出去，做了一个虚拟的传直塞球的动作。我为了安慰他，也为了重新和他聊天，便开始说起寅狮队的那粒进球，也算是他策动的进攻。我说他射门很果断，要不是他的射门，也不会出这个机会。但他似乎很漠然，问我，他什么时候射门了。我提示他就是他们的那个进球啊，而且隐晦地提到，他踢得太急了，其实不该那时候起脚，总算最后还是进球了。他忽然明白了我在说什么，开始和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他把手指戳在桌面上，示意他就是在这里拿球的，又连戳了四下，戳出当时四名防守球员的位置。这时，他手一划，说他们队的9号开始这样朝前跑。于是，他开始朝边路有节奏地带球，为的是让防守球员逐步靠近他，给9号制造空间。最后他一记直塞给了9号，球才打进的。我死死地盯着他，陷入一种很深的恐怖，他却沉迷在他的讲述里。为什么我们对比赛的记忆总是截然不同呢。我决心再度试探他，提到福州队进第二个球之前，岳指导在中场倚靠防守球员背身拿球，因为没人呼应，被迫回传导致被断球。可岳指导却说，那一次他左脚连续拉球将防守球员摆脱了，还说，就像皮尔洛一样。

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地跑位，经常出现在绝佳的空位上，可是没人给他传球。

自那之后，寅狮队每次踢主场，我几乎都会去看。谁都不会稀罕低级别联赛的假球，我也不是冲着看球去的，单纯就是想看看岳指导。更具体地说，是想赛后和岳指导聊聊天，搞清楚我们对比赛复盘的偏差到底是什么。但几乎每一次都陷入同样的困局，我提到一个比赛中的时间点，在我记忆里，岳指导做了某套动作。他也从那套动作的起点开始回忆，讲述出一套崭新的，在球场上压根没有发生过的动作。一开始，我出于礼貌，没有反驳。等我们熟悉之后，我终于直截了当地指出，“你记错了，你明明是传了直塞球，哪来什么高空传中？”这时，岳指导必定深皱眉头，说，“那种情况，肯定只能传高球，我怎么可能直塞？”我们两人面面相觑，陷入无从求证的死结。

#

如果单看比分的话，中冠也和世上所有的联赛差不多，一比零，二比零，或者一比一什么的，寅狮队也是有输有赢。作为一个赌球者，我的时间就这样一个比赛日一个比赛日地过去。或许我是唯一一个愿意和他聊足球的人，一个赛季下来，岳指导已经和我走得很近。一四到一五赛季开赛之前，他邀请我去他家里玩玩儿。

那是个三伏天，起码三十八度，岳指导住在一个老拆迁小区里，窗帘拉得密不透光。我想，大约是他不想开空调，故而防止热量输入进来，只有一个电风扇在摇头。他对我解释，开空调影响体质，要道法自然，但我一到，他也就开了。进门后，我发现有什么声音在低语，而且属于我听不懂的语言，像是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而后我跟着岳指导进了他的卧室，发现声音的来源是他卧室的电视机。他家明明有一个客厅，挂着一台更加敞亮的电视，可岳指导却搬着一张小凳，缩在卧室里看一台老式的大屁股电视机。那台电视机放在一张四方凳子上，旁边连接了DVD盒。在昏黑的空间里，那只小屏幕上正变幻着极其粗糙的画面，我细看时，发现那是一场足球赛，噪点之大让人根本无法分辨上头的人脸。这比赛的年代相当久远了，因为球员的球衣还是很深重的纯色，而且不少人把衣服掖在裤子里面。

“尤文图斯打AC米兰，1999赛季。”岳指导对着电视目不转睛，向我解释。

“我就说，听着像意大利语。”

“齐达内，真牛逼。”

这一次，齐达内的头型我倒真能看出来了，他正在中场使出了一个马赛回旋，过掉一名球员。我也坐在他的床上，开始和他一起看。那场比赛已经接近尾声，AC米兰二比零赢了尤文。岳指导马不停蹄地从一边又取出一张碟片，看98赛季尤文和博洛尼亚的比赛，我知道他是尤文的铁杆球迷。

“操，98年的都有。”

“多着呢，你看我柜子。”

我把他的衣柜拉开，里头整齐地叠放着无数碟片，每一盘的封面都手写着年份，如“1998”加上球队的名称，尤文，国米，巴萨，皇马，不胜枚举。我自己是个阿森纳的球迷，也在某个位置找到了阿森纳从1997年到2010年的所有比赛光碟。

“这些你都看了？”

“有的都看了两三遍了。”

我怀疑那个下午就是岳指导生活的缩影，一个人在黑咕隆咚的卧室里，盯着满是雪花斑点的电视机看世上所有比赛的录像带。我感到有些困顿了，终于，在尤文一比零博洛尼亚的比赛结束后，他推了推我。

“我给你看点好东西。”岳指导笑道。

他开始打开另一扇衣柜，在某个角落对着碟片翻寻起来。我以为他说的好东西，可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贝利踢球的录像，或者八十年代马拉多纳的某个绝版的影像。但是，电视上却出来了一个裸体的白人金发女郎，没过一会，她开始和一个男人做爱，动作浮夸。他说的好东西原来是一部色情片，且年代也相当久远。

“你知道这是什么黄片不。”

“这他妈我哪知道。”

“你看过《国产凌凌漆》吗？”

“看过。”

“这可是《国产凌凌漆》里面周星驰看的黄片。你记不得，他身上中弹了之后，要给他取弹片，太痛了，他就看黄片转移注意力。就是这部。”

我回想到，电影里的确有这个桥段。好在岳指导并不准备和我一起看完全片，演示完后，他就笑着把碟子取了出来，放进叠盒。还拿到我眼前让我看一眼电影的名字，那个盒子上也夹着他的手写便签，《春潮烂漫海棠红》。之后，他重新蹲到衣柜边，精准地把片子塞到指定位置，整个衣柜无比整齐。就在那个注视着他背影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岳指导

只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比我小了不少。可人们似乎无法正确感知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年龄，当足球运动员可以踢上比赛且冷静地处理每个球时，我们不会想到他才二十出头，总觉得他已经相当成熟，像个三十而立的人。等他真到了三十岁，我们又说他老了，好像他已经到了七八十岁，即将入土为安。

当我认识到他只有二十五岁之后，这间屋子开始急剧地走向冷清，紧闭的窗帘，两张木凳子，一台大屁股电视机，无数整齐的光碟，所有的东西对二十五岁来说，都太冷清了一些。

那天离开时，岳指导取出一盘碟子塞在我手里，盒子上写着“2003-04阿森纳”，还说了一句“阿森纳，不寒碜”。他带着训练包，和我一同出门，说去练会球。

我佯装走了几步又折回去悄悄跟踪他，想看看他是怎么练球的。出小区后再走三五百米，有一片公共的七人制球场，如我所料，三伏天里的球场空无一人。起初，岳指导进行了一些常规的，我所能看懂的训练，比如沿着边线带球热身，站在罚球点射门，或者不停绕着S形折返跑。他跑S形的时候，每一个弧度都相当均匀，好像他可以看到草地上并不存在的，每八十公分摆放一个的障碍物。如此热身了约莫十分钟，他在绕某个虚拟的障碍物时忽然加速，用了一招“油炸丸子”进行变相，变相后，也没有再回到既定的路线，而是继续狂奔向前，就像在比赛中过掉了最后一个防守球员后，开始全力向球门冲刺。我以为这套动作也是训练中的某项程序，会停下来，然后重复若干遍。可这并没有发生，岳指导冲刺了几米后，把球往横向一传。几秒钟后，他跑到球的位置，又将它漫无目的传向另一处空荡荡的草地上，继续把球追到。追到后，他一本正经地紧绷在球前，做了一个假动作，且举头四顾，仿佛周围有一个想要压迫他的幽灵。随即，他一脚长传，把球踢到了场地的边角，仿佛那边又凭空多出了一个站位极佳的队友。可刚一踢完，他便朝着在高空中飞翔的球猛追过去，在球的落点做出接球的动作。我意识到他在一人分饰多角，既是传球者又是接球者，也许还有很多想象中的防守队员逼在他的身边。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把球混乱地踢向各个位置，又不断追上，时不时做一个过人的动作，低头狂奔，完全沉浸在自导自演的比赛之中。那片烈日下的绿色的球场上只有他和一颗皮球，我站在远处，看到他浑身是汗，呼吸猛烈而急促，一心一意地追着皮球，像是一条不停追着一个无法企及之物的狗。最后，他从中圈把球转移到了左路，又亲自到左路拿回慢慢旋转的皮球，不断内切，内切，将球打进空虚的球网。

#

那天之后，我对岳指导自然了解了更多，甚至多少触碰到了一点儿他的内部。虽然我和他对比赛的复盘还总是没法对上，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好在这点小事并不会影响稀松平常的生活，我上班，赌球，如果寅狮踢主场，我周末就去看他们比赛，不出意外，就和岳指导赛后喝上一杯。如果现在回望，所有足球运动员都会觉得那几年充满了难以再得的光辉感。一三年，广州恒大得过亚冠冠军，到一五赛季结束的时候，他们又拿了一次亚冠冠军，整个足坛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生机，球员的转会潮也在那个时候格外汹涌。用陈聪的话说，现在每个人，每支球队都想往上走一步。连他都开始和足协领导运作，看看领导能不能同意下赛季让寅狮升级，去踢中乙。岳指导是中冠一四到一五赛季的助攻王，进球数量也相当可观，夏天的转会窗口刚一开始，就传出中乙的珠海队要买他。七月初，我喊他吃顿晚饭，其实就是想问他，珠海队要他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好像告别就在眼前了。他故作轻松，一边夹一块肉，一边说，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说，反正老板还没通知我，管他妈的呢。

我意识到他在一人分饰多角，既是传球者又是接球者

那顿饭后的几天，岳指导就给我发消息，说真要去珠海一趟。然后，他就离开了。我每天都企图从体育新闻中找足球新闻，足球新闻中找转会新闻，转会新闻里找中国人的转会，但无论我怎么搜刮这些讯息的缝隙，都没法找到“岳一洲”三个字，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张琳芃转会皇马的事儿。也对，哪有记者闲到来报道中冠呢。所以我只能时不时去寅狮队比赛后的那家馆子里，偶遇假期在那里和球员们聚会的陈聪，从他那探寻一点岳指导转会的进展。

头几天我碰到陈聪的时候，我问他：“你知道岳指导都去珠海了？”

陈聪说：“我能不知道吗？我还问他，要不要我和他一起去，他小子不要我去。”

“看来转会是真事。”

“呵，我跟你讲，我和他一起去，这事儿能成。他一个人去，基本没希望了。”

“怎么？”

“岳指导愣头愣脑，他会找对面的教练伐？会找老板伐？会找总监伐？他会个屁，这种事情，不带个三十万，人人照顾到，啥人买他的账。”

我沉默不语，总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话讲回来，带个三十万过去，你又不会亏的。现在，在中乙，一两个礼拜，最多一两个月，本钱就回来了呀。进球有奖金，赢球有奖金，工资又高。岳指导啊，他这个人拎不清的，真以为别人叫他去体检体检就好了。”

又十几天过去了，岳指导还是没有回来，我去那家饭店也更加频繁了。有时候陈聪不在，我也坐过去和寅狮的球员聊聊，旁敲侧击地问关于岳指导的事情。大概是长年不和他们厮混，这些球员对于岳指导也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是偶尔提到，“说是，他可能在体检了”，“估计要签约了，所以这么久”，便也不再细说。至于陈聪，连他都语焉不详起来，大概是岳指导的事儿真要成了，他说的东西没能应验，失了底气。可岳指导还是没有回来，一切都没有确切的说法。直到八月底，那时中冠新赛季的日程都已经定了，九月初就要开赛，我在开车途中，忽然接到陈聪的电话。他特地来告知我，岳指导的事吹了，珠海队签了个非洲的左边锋。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填补脑中的空白，我随口问了问：“非洲的谁？”陈聪说，“我他妈哪知道，几十万转会费的事儿，中乙你还想签埃托奥啊？”我又僵硬地问道：“怎么签非洲人？”陈聪说，“我跟你说了吧，他一个人去不来事的！广东那边么，非洲人多呀，签个非洲人，球队就国际化了，也算有外援了，体面呀！现在哪个队没有外援……”

一五赛季开赛日的前一天，岳指导才短讯我，说从珠海回来了，一块见个面。那天晚上，我们在一条河边散步，临了的时候，我才问他：“什么时候从珠海回来的？”

“其实回来了有一阵了，今天才找你。”

“我听说了，哎，这些球队，都是面子工程，非要找个外援。也没事，踢好了，还有冬窗，还有明年转会窗。”

“其实无所谓。”

“怎么，你还不想去了？”我笑道，试图乘机舒缓他的情绪。

“我是想去啊。但说实话，在这个世上，从中冠转到中乙，啥也不是，谁在乎。”

他说得不错再做安慰就显得刻意了，我俩就这么隔着几米在案边的栏杆上靠站着突然，岳指导直起身来，正对着我，双手向外平摊，左脚平推出去，又做出那个虚拟的直塞动作。他大概臆想出了一个皮球，现在他把皮球传给了我，我努力跟上他的幻想，按照他平推的角度，那个球应该稳定且平直地向我滚来，岳指导的地平球本就是一绝。我也做出传球的姿势，接住那颗不存在的皮球，朝着岳指导踢了过去。

#

一五至一六赛季开始，不知道是否受到转会风波的影响，我明显察觉到岳指导的球风发生了转变。按理说，他的年龄在增大，踢球的风格应该趋于稳定才对，但他却遗弃了这种稳定性。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好的变化，因为他正变得像一个天赋型，或者灵光一现型的球员，踢出的好球在变多，但作为代价，他的失误也在变多。有时候，他简直像一个真正的球星，可以一过三射门，直挂死角。或者从左路传出一记弧线型的直塞球，穿过对面的三四个防守球员，直接让队友获得单刀机会。但有的时候，他却莫名其妙地把球传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被对方没收，或者直溜溜地滚出边线。他还经常背身拿球，直接后脚一磕，好像边路有自己人在等着和他打二过一配合，但那里明明空无一人。

二零一六年，寅狮队零比一输给了排名垫底的重庆队。七十二分钟的时候，岳指导在左路拿球，中线位置的中锋和两名中场明都有绝佳的空位，但岳指导却执意突破，一启动就被断球了，诡异的是岳指导流连在原地，没有及时防守反抢，似乎还想朝前跑，直接导致重庆打出反击并进球。我和他聊起这粒进球的时候，他和从前一样，用手指比划出对面的防守球员，他说，他先用抹球，再用一次变速将他们都过了，最后射门没进。我知道，我们之间的错位再次出现了，我几乎有些急躁地问他，为什么？他说，当时的处境就和零五年尤文击败都灵的五十六分钟一模一样，特雷泽盖就是这么过人的。一七年，岳指导的一次传球失误让他们输给了长春队。当时的情况就和我说的那样，他回撤到中场的位置接球，当时他的两侧各有一名球员离他很近，他却不传，径直把球塞进前排防守球员的空档里，但那里空无一人。他却不以为意，甚至和我说那是一次绝佳的传球，就像九九年某场（他说过具体的场次，我忘了）比赛，齐达内也是这么找因扎吉的。终于，我们两个对比赛的解读在一八年第一次对上号，那是一七到一八赛季的最后几场球，寅狮凭借岳指导的八十分钟绝杀一比零赢下了榜首球队延边。那天，岳指导飘忽地游弋到了禁区中间，队友给出一记高高的传中球，他竟然侧身跳起，倒挂金钩将球打进。他说，这就是齐达内的天外飞仙，我同意了。而后的几场比赛，岳指导也发挥出色。即便如此，寅狮还是没能

成功地冲击到中乙，陈聪的意思是，有的球不是赢不了，是领导没同意，既然领导没同意，该输的比赛你就得输。不然，中冠你都没得踢。

那一记天外飞仙之后，岳指导的状态进入绝佳，一九赛季开始后尤甚。开赛季的第一场球，寅狮就三比零大胜，岳指导贡献一个进球一个助攻。那天晚上，我祝贺他，他却格外严肃，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有可能，他想再试试去中乙。还说，寅狮队今年降了很多工资，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可能没几个赛季了。陈聪也隐约和我抱怨过，“足坛要变天了，内部消息说天津天海都要解散了，你想想，一个中超的球队，说解散就解散，玩儿似的。”

好像边路有自己人在等着和他打二过一配合，但那里明明空无一人

接下来的五场比赛，岳指导连场进球，寅狮队打出了破天荒的中冠六连胜。第七场比赛，寅狮对阵济南，我和往常一样到现场看球。那天的气氛有些不对，我在替补席上没有看到随队的陈聪。岳指导一如往常，见到我就大声招呼，可他周围的人都格外静默，用冷眼看着他和我说话，甚至让我感到有些肃杀。我问岳指导，陈聪上哪去了。他轻松地答，不知道。因为这几场比赛状态火热，岳指导变得大大咧咧，说话声音也响了，之后，他继续回到场上热身。我看到他的队友虽然在和他传接球，但动作都格外沉缓，没有生气。比赛正式开始之后仍然如此，场上的所有人都像是按下了慢拨键的电影，只有岳指导一个人不断冲刺，逼抢。有时候，他不满地对着队友大喊：“逼一逼啊！”他们就像牵线木偶一样，若有似无地逼上去。甚至连济南队的球员亦如此，我感到场上的一切动作都阴郁诡谲。我想，大概是连场胜利之后，现在全队都反买了自己输球吧。中场结束前，陈聪竟打来电话。

“喂，你去看球了？”他声音虚沉，急促。

“我在啊，你今天咋没来。”

“我刚在老板办公室，才被放出来，现在几分钟了？”

“四十。”

“我跟你说，他们二十万，买岳一洲一条腿。”

“什么？”我有些不明白。

“他前几场太乱来了，砸了别人的赌本，现在别人要他一条腿！场上办，不犯法。我没办法，就在中场前。”

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木然地看向球场。就在这几句话的同时，岳指导在熟悉的左边路接球。一个防守球员靠上，岳指导自信地横向拉球，准备摆脱。这时候，一个寅狮的球员却跌跌撞撞，和他跑位重合了，从岳指导的右边窜出来。一下子，他被这两人包夹起来，左右为难。但他试图连续折线拉第二次球，继续摆脱。但是来不及了，前方，济南队的右后卫冲刺过来，在接近岳指导的位置凶狠地下地铲球，鞋钉猛烈地踹在岳指导的小腿上，随着一声惨叫，岳指导倒地不起，那名后卫红牌下场。我呆立在那里，岳指导在担架上从我旁边经过，我看到那块断裂的护腿板被取了出来。

#

他小腿骨折，那个赛季接下来的比赛便统统缺席。我偶尔去医院或他的家中看望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为什么骨折一事，我没能拦下那场悲剧，心中总存有许多内疚。而岳指导自然心情郁结，每天躺在床上，吃很少的东西以保持体型，稍能走动便努力康复训练，渴望能早点重回赛场。但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是没办法的事。想要能剧烈运动四个月打底。一天，他让我帮个忙。他很少让我帮忙，我自然想竭尽全力，便问他什么事。他说，寅狮队马上就要没了，赛季的最后一场，他想上。我担心他的腿还不行，他却执意说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打点封闭针，一定可以。我约了陈聪，三人在饭馆里见面，说了此事。

“你的腿肯定不行。”陈聪说。

“打封闭针。”岳指导简短地回道。

“封闭针会落下长根，何必呢？”

“寅狮最后一场了，我就是想上个场，有始有终，留个念想。”

陈聪默然，朝我看了一眼，我极微小而隐秘地点了头。

“好，让你上，这场比赛，零比二输，最后一个盘口，谁都指着这一把。你别坏事，你坏事了，我真保不住你。你记住，就是上去踢一场纪念性的友谊赛。”陈聪说。

“我知道。”岳指导轻声答道。

最后一场球，寅狮有冲击中乙的希望，对面的青海就是末流球队，所有人都觉得寅狮一定会拼死一搏，加之实力悬殊，零比二的赔率想必巨大。可见，所有人都想在球队解散之前再捞一笔。我在饭桌上心惊胆寒，因为我真怕岳指导上去进球，这次出了差池，未必是

断腿这么简单了。陈聪走后，我两人坐在桌上，岳指导忽然说道：“这一场球，你买一比二。我要进球，而且寅狮还是输，就算一比二，赔率也很高。中乙，我是去不了了。”我说：“你别。”他起身离开。

我难以面对那场比赛，几乎压着时间才进场。那时候，球员已经站好队形，等着中圈弧开球，岳指导看到了我，只是看了我几秒钟，没有打招呼，我也没有挥手。

我以为可以愉悦地看着这支身边的球队谢幕，可因为这家伙，比赛的每一秒钟都是煎熬。岳指导的表情前所未有的坚毅，杀气腾腾，他从第一分钟就开始前场紧闭，虽然拿球机会并不多，但一旦拿球就企图向前推进。他已经不相信任何队友，只想一意孤行地向前，却因为没人接应，屡屡被断。而青海队只是控制着球权，并不急于进攻。因为庄家想让悬念保持到最后地几分钟，以收到更多的本金。而这种悬而未决的结局却吊在我一个人的头上，让我紧张得几近要呕吐。中场休息，零比零。岳指导在我身边经过，什么话都没说，就说了一声，“操”。

下半场一开始，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一幕就出现了。岳指导带球被断之后，竟然毫无察觉，他脚下已经空无一物，但仍然做出脚背带球的动作朝前奔跑，好像前方还有防守一样不停晃动闪躲。实际上，青海队早就没人管他，重新组织进攻了。岳指导跑了一段，直到撞在对面中卫的身上才幡然醒悟。我看到陈聪充满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等我做出解释。从意识到自己被断球一刻开始，岳指导仿佛陷入疯狂，朝球狂奔过去。他已经不管自己左路的站位，而是径直跑向右侧的皮球，但哪有这么容易断球呢。他不停地被对面的后卫戏耍，我开始担心他的腿能否支持。等到他持球时，他却往旁边没有人地方传球，立马又跑过去把球接住，自己和自己做了个传接配合。接着，他抬头观察局势，冷不丁一个长传，把球传向对侧的无人区。球滚出边线，寅狮再次丧失球权。陈聪坐不住了，走到我身边，轻声问：“这小子在踢什么玩意？”而场上的岳指导还在对着球拼命奔跑，他已经不在乎其他人在干什么，自顾自虚拟地过人，虚拟地接球，偶尔拿球就立马胡乱传到没人的位置。就连场上的其他人都不知所以地看着他。我渐渐觉得，这一时刻似曾相识。

七十分钟和七十六分钟，青海队连进两球，当然，这两球都是迷迷糊糊被送进去的。几个寅狮队的后卫还装模做样，一屁股坐到地方，满脸悔恨的样子，青海队还抱在一起庆祝，煞有介事。只有岳指导站在中圈弧，示意大家赶紧开球。他显然没有放弃，一拿到球就迅速规划路线，展开突破。但我看到，他的左脚小腿微微抽搐，颤抖，他的呼吸已经极度急促。因为没有体能，他的每一次带球都地被对方轻而易举地化解。我看着手表，期盼比赛结束，起码在这个时候结束，所有人都可以相安无事。八十九分钟，岳指导最后一次拿球，他右脚一抹，开始下底俯冲，被后卫断下。但他继续朝前跑了几步，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禁区内切一下，又假装往外一扣，最后右脚推射一团虚无的空气。射门后，他还左手握拳，走火入魔般庆祝了一下。所有人都像看戏一样看着他，难掩嘲讽的笑容。等他做完这套滑稽的动作时，比赛吹停，零比二结束。

岳指导拿起自己训练包，朝我跑来：“走，我们快走，上你的车。”说罢，拽着我便跑。

上车后，我朝他的小区开，问道：“你急什么？”

“你看到了吗？我绝杀了，就在终场哨之前。他们一定想杀了我。我说了要进一个，我必须进一个……”

他脚下已经空无一物，但仍然做出脚背带球的动作朝前奔跑

我心里一动，我以为岳指导即便做出了那一套完整的动作，但也只是为了过把瘾，可他似乎真的觉得自己进球了。我反驳道：“你没有……”

“我买了二十万，一零二输球，赔率十七，我有钱了，三百四十万。三百四十万！”

岳指导的声音逐渐打颤，我握着方向盘的手也近乎麻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在心里狠狠地揣摩，二十万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致命的数目，因为它已经付诸东流。

“你看到那个进球了吧，你应该很熟悉吧。那几个防守球员的站位，最好的破解办法就是这么突破，就是像亨利租借回阿森纳的那个突破一样，你肯定知道。我做到了，在那种瞬间，只能这样突破，才能破解那个防守。”

我时不时静默地看他一眼，他还在手舞足蹈地讲述他是如何进球的。我可以确定他没有开玩笑，他真的认为自己打进了。一时之间，那些过往的错位似乎都变得有据可循，岳指导时不时就沉湎进了他幻想出的比赛之中。那些幻觉，都来自于那些不断被播放的录像带。当他在球场上看到某种局面的时候，他可以立刻从看过的比赛中搜索并回想起，在过去的某场五大联赛的比赛里，这种局面也曾出现过。然后，他便在脑中播放当时的画面，现实和那些模糊的、布满噪点的录像就混杂在一起。整个下半场，岳指导都在踢一场只有

他自己能看到的，虚幻的比赛。

“你跟着我买一比二没有？”他忽然把头转向我，目光坚毅地说道。

“我没买。”

“怎么不买，你跟着陈聪买了？难道你买的零比二吗？”

“我根本就没下。”

他沉默了片刻，问：“为啥？”

“老早之前开始，你踢的，你们寅狮队比赛，我就下了。”

“为啥？”他继续追问。

我的思绪回到二零一四年的夏天，我站在七人制足球场外，远远地注视二十五岁的岳指导一个人练球。他就像疯狗一样，追逐着那只被他自己踢出去的，蹦蹦跳跳的皮球，好像别的东西都不存在，那个皮球就是从虚无中跳脱出来的全部的意义。那一刻开始，我决定不下注了，因为对着他下注太过残忍，我做不出来。可我那时却故意嬉笑起来，说：“为啥不下？怕被你搅黄了呗。”

#

果然，一九赛季一结束，寅狮队就宣布财政危机，球队解散。和他们说的内部消息一样，没过多久，连天津天海那种大俱乐部都解散了。寅狮队那群队员，平时踢不上球的，都去当体育老师，或者给小孩上足球课，赚的也不比原来少。踢得上球的，还有去别队的机会，有时候降级去省级别的联赛也难免。岳指导当然属于后者，他所幸还留在中冠。云南队想要免签他，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我对此毫不意外，只要能踢上球，去南极和企鹅踢他都会去的。不必说，他去了云南，我就见不到他了。现在，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他。我们偶尔会发几条消息，比如，我半夜刚看完阿森纳的比赛，准备上床睡觉，他就给我发来一句，“你们阿森纳又被踢花了。”过几天，尤文输球了，我也得适当反击，“好像尤文能赢似的？”诸如此类。我还知道，他在云南恋爱了，是个当地的姑娘，但他还能不能上场当首发球员，我却拿不准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去云南的一年后，二零到二一赛季，二零年的冬天。虽然苏州寅狮解散了，常州还有一只中冠球队，他告知我要去常州踢客场比赛，让我有空去看。开球时间是晚上，我下了班就开车过去，抵达时离比赛开始只剩下二十分钟不到。岳指导已经在球场上热身，他一见到我，就像过去一样遥遥地朝我挥手。我看到他留着长发，扎了个辫子，皮肤黧黑，人越发精瘦。那场比赛，我该怎么形容他的表现呢，或许只能说中规中矩吧。他还是老样子，踢着踢着，手就举起来指指点点，指挥队友该怎么传球，或者大喊“这边，那边”的，可是球一到他脚下，也没有什么太过出彩的地方。总算他没有丢球，总是能把球扔回去。我还是为他高兴，因为经历了几年的灵光乍现的踢法之后，我终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球员最终必须获得的稳定。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和球队中的其他球员差不多在场上和谐地成为一个整体。或许那次伤病多少有些影响加之没有科学的训练，体能本就是中国球员的短板，六十分钟后，岳指导明显有点儿累了，动作开始变形，几次停球也没有停好。六十五分钟，比分还是零比零，教练用一个染着黄头发的球员将他换下。我心想，他也才三十出头，但球员的时间就是这么短暂而无情，现在，该轮到我对着岳指导说，他老了。

被换下后，他立马披了一件长款运动羽绒服，朝我站着看球的地方走过来，打了个招呼：“Hello！”

我迎了两步，拍拍他的肩膀，“对面防得太密集，就是冲着平局来的。”

他看了一眼球队的替补席，小声地笑着说：“我们进攻也不怎么样。”

接着，我们站在跑道边，沉默地看了会比赛，聊了些家常，无非是他问我家里可都好，我问他云南可还待得惯。有几分钟没有话题，我本想问他退役了准备干嘛，但想了想，觉得和球员聊退役就像逼老年人立遗嘱一样，不大吉利，就没有说出口。再之后，我们聊起阿森纳混得不怎么样，总是踢欧联杯。再话赶话的，聊到国足上头。

“你看着一帮巴西人给我们踢球，有没有啥意见？”我问他。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又不是足协主席。”

“我是问你，情感上接不接受。”

“不接受。他斩钉截铁。又说：“但是归化都归化了一不做，二不休。有本事你就归化十一个，弄进世界杯去。现在归了几个，一会用一会不用，预选赛还是那副模样。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没意思。”

“是，没意思。”

岳指导豁然地笑了一声：“中国足球，就是那么回事儿。”

没过多久，比赛结束，还是零比零。云南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也陪着岳指导朝他们替补席走过去。

“你这就走了？”我问。

“我去问问，能不能住一晚走，都这个点了。”说着，岳指导小跑过去，和教练说了几句话，我只隐约听到教练和他嚷嚷了起来。一会他走向我，说得走了又他妈凌晨一点的春秋航空，他们就图便宜。”我点点头，示意他，没事儿。

我站在一边，等他们收拾东西完毕，球场的灯也关了。霎时间，月光如洗，整个球场像草原一样辽阔，空寂，只有他们衣服窸窣的声音。岳指导说，那我们走了，他们就朝门外的大巴走去。临近大巴的时候，我得走向另一个方向了。这时，他忽然喊了我一声，我与他相隔数米，对面而站，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可他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朝外平摊，左脚轻推出来，做出直塞的动作。我认真地注视那颗虚拟的皮球，看见它轻柔又平直地朝我滚来，在靠近我的那一刻，从我身旁静静划走。



高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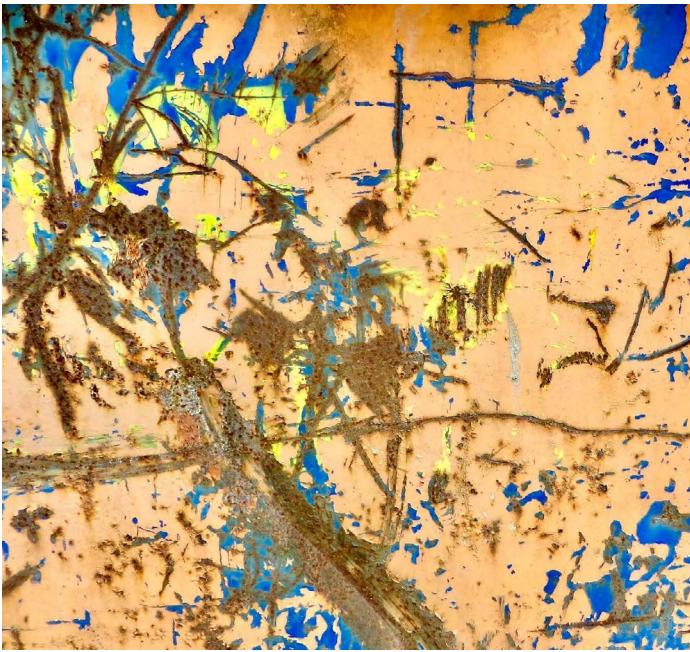
98年生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上海交大理论物理博士在读。写小说，出版有《火速逃离平江路》。

2023.2.12

上海

24小时文学聚会

这是“24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Bekky Bekks](#) on Unsplash

小说

白兔·第七匹马

莉奥诺拉·卡林顿 | 故事群岛

她挥手时，手指纷纷落地，
就像流星一样。

白兔

我该讲讲发生在佩斯特街 40 号的事了。房子的外墙是发红的黑色，好像刚从伦敦大火中抢救出来似的。我窗户对面的房子黑漆漆地空着，外墙上偶尔趴着一蔓植物，和遭遇过瘟疫又被火焰和烟雾舔舐过的住处没什么两样。这不是我想象中纽约的样子。

天气太热了，我冒险上街的时候都会心悸；于是我坐下来，观察对面的房子，偶尔去洗掉脸上的汗。

佩斯特街的光线一直不算充足。街上总像是弥漫着烟雾，朦朦胧胧的，能见度低得恼人。但我还是可以仔细乃至精确地研究对面的房子。何况我的视力一直很好。

几天以来，我一直观察对面的房子是否有动静，但什么也没发现。最后我终于可以在打开的窗户前自在地脱衣服，并乐观地在佩斯特街浑浊的空气中做呼吸练习。这必定让我的肺黑得像这些房子一样。

一天下午，我洗了头，坐在被我当作阳台的一块小小的月牙形石头上，晾干头发。我的头悬在双膝间，看着一只丽蝇在我两脚之间吸吮一只蜘蛛的尸体。我抬起头，从长发间看到天上有黑色的东西掠过。如果是飞机，这种安静可不是好兆头。我撩开头发，正好看到对面房子的阳台上飞落一只大渡鸦。它站在栏杆上，似乎在看向空荡荡的窗内。接着，它把头埋进翅膀里，显然是在捉跳蚤。几分钟后，我愕然地看到双扇窗被打开，一个女人走上阳台。她端着满满一大盘骨头，全部倒在地上。渡鸦感激地呱呱叫了一声，跳下栏杆，在并不美味的一餐间挑来拣去。

那个女人留着黑色长发，她用自己的头发清理了餐盘，然后直直看向我，友好地笑笑。我回以微笑，挥了手中的毛巾。这似乎鼓舞了她，因为她卖弄风情般地甩甩头，像女王一样优雅地向我回礼。

“你家正好有不需要的腐肉吗？”她喊道。

“有什么？”我回答，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有臭了的肉吗？腐烂的肉？”

“现在没有。”我答道，怀疑她在开玩笑。

“周末会有吗？如果说有的话，你要是能送过来，我会很感激的。”

然后她走进空荡荡的窗户，不见了。渡鸦也飞走了。

第二天，出于对房子和房主的好奇，我去买了一大块肉。我在阳台上垫了一张报纸，把肉放上去，等待它腐烂。没过多久，腐肉的味道就浓到我必须用回形针夹住鼻子才能进行日常活动。偶尔我会下楼去街上透透气。

快到周四晚上的时候，我注意到肉变色了。我轰走一群恶意满满的丽蝇，把肉装进梳妆袋，向对面的房子走去。下楼的时候，我注意到房东太太似乎在躲着我。

我花了点时间才找到对面房子的前门，它藏在层层叠叠的各种东西下面，仿佛已经好多年没人进出过了。门铃是老式的拉铃，我拉得比预想中用力，直接把它扯了下来。我懊恼地推推门，门却整个向里陷去，一股可怕的腐肉味扑面而来。门厅里几乎一片漆黑，似乎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

女人窸窸窣窣地走下楼梯，手里举着火把。

“你还好吧？你还好吧？”她礼貌地咕哝着。我惊讶地注意到，她穿着一条漂亮的绿色旧丝绸裙。她走近时，我才看到她皮肤惨白，但闪闪发光，上面仿佛点缀着上千颗小星星。

“你真是太好了，”她继续说，用她闪亮的手挽住我的胳膊，“我可怜的小兔子们会很开心的。”我们爬上楼梯，她走得小心翼翼，让我觉得她在害怕什么。

最上面几级楼梯通往一间装饰着深色巴洛克家具和红色长绒地毯的闺房。地板上遍布啃过的骨头和动物的头骨。

“我们很少有客人来，”女人笑着说，“所以兔子都藏在自己的小角落里。”

她低沉地吹了一声悦耳的口哨。我看到大约一百只雪白的兔子从各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冒出来，它们粉色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女人。我愣在原地。

“过来，小宝贝们！过来，小宝贝们！”她轻声叫着，把手伸进我的梳妆袋里，扯出一把腐肉。我带着深深的厌恶感退到角落，看着她把腐肉扔进兔子群中，它们像狼一样争抢。

“你总会喜欢上它们的，”女人继续说，“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兔子的个性可独特了，你根本没法想象。”

她提到的兔子们正在用锋利的门牙撕咬着肉。

“当然了，偶尔我们也会吃兔子。我丈夫每周六都会做一顿美味的炖兔肉。”

角落里的动静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时我才意识到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女人手中的火把照亮了他的脸，我看到他的皮肤也一样闪闪发光，像是圣诞树上的金箔。他穿着红色的袍子，僵硬地坐着，侧脸朝向我们。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也不理会那只坐在他膝盖上饕餮的大白兔。

女人随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笑了起来。“那是我丈夫，孩子们以前总叫他拉撒路[1]——”听到熟悉的名字，他转向我们，我看到他眼睛上缠着绷带。

“埃塞尔？”他用非常单薄的声音问，“我不希望有客人来，你明知我坚决反对这种事。”

“好了，拉撒路，别说了，”她的声音很哀伤，“别因为有人陪我而生气。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新面孔了。何况她还给兔子们带了肉呢。”

她转向我，示意我走到她身边。“你想和我们待在一起，对吧，亲爱的？”我突然被恐惧攫住，只想跑出去，远离这两个可怕的亮闪闪的人和这群吃肉的兔子。

“我觉得我该走了，晚饭时间到了——”

椅子上的男人发出尖锐的笑声，吓跑了他膝盖上的兔子。它跳向地板，消失不见了。

女人把脸凑到我面前，她难闻的呼吸似乎要将我麻醉。“你难道不想留下来，变成我们这样的人吗？只用七年时间，你的皮肤就会像星星一样。只要短短七年时间，你就会患上《圣经》里的圣病——麻风病！”

我跌跌撞撞地向外跑去，惊魂未定。跑到前门时，漠神般的好奇心让我回头望了一眼；我看到她正隔着栏杆冲我挥手。她挥手时，手指纷纷落地，就像流星一样。

(1941 年)

第七匹马

一只长相怪异的生物正在黑莓丛里蹦上跳下。她的长发被灌木紧紧缠住，让她进退两难。她边骂边跳，直到鲜血从她身上流下。

“我不喜欢那东西的样子。”两位女士打算去游览玫瑰园，其中一位说道。
“可能是个年轻女人……但是……”
“这是我的花园。”另一位女士回答，她身材干瘦得像根木棍。“我绝对不允许有人闯入。我猜是我那愚蠢可怜的丈夫放她进来的吧。他就像个小孩似的，你也知道。”
“我已经在这里好几年了，”那生物愤怒地叫道，“可你太蠢了，蠢到从来看不见我。”
“这东西还很无礼，”第一位开口说话的女士说，她被人叫作默特尔小姐，“你最好还是把园丁叫来吧，米尔德丽德。靠近她可不安全。她似乎完全不懂礼貌。”
赫瓦莉诺愤怒地扯着自己的头发，仿佛想对米尔德丽德和她的同伴下手。两位女士转身要走，临走前还与赫瓦莉诺恶狠狠地对视了好一会儿。
园丁来解救赫瓦莉诺的时候，春天的傍晚正在变长。
“约翰，”赫瓦莉诺躺在草地上说，“你能数到七吗？你知道吗，我可以恨上七千七百万不停歇。告诉那些可怜的人，他们注定要完蛋。”她慢慢走向她住的马厩，边走边嘀咕：“七千七，七千七。”
花园里的有些地方，所有花草树木都交缠在一起。即使是在最炎热的日子里，这些地方也笼罩在一片蓝色树荫中。废弃的雕像上长满青苔，喷泉早已荒废，还有被扯掉头颅的破旧玩具。除了赫瓦莉诺，没有生物会光顾这里。她跪下吃低矮的草，观察一只从不离开自己影子的迷人的鸟。白天，鸟看着影子在自己身边滑过；月亮升起后，鸟让影子从自己身上掠过。他总是坐在那里，张着毛茸茸的嘴，任凭蛾子和小昆虫飞进飞出。
赫瓦莉诺在灌木丛中被缠住的当晚，她去看鸟儿进食。六匹马陪着她。他们默默地围着那只胖鸟转了七圈。
“谁在那儿？”鸟儿终于啼啭着开口问道。
“是我，赫瓦莉诺，还有我的六匹马。”
“你们的脚步和喘息让我没法睡觉他的回答带着悲伤如果我睡不着我就既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如果你们不离开，不让我睡觉，我就会逐渐消瘦。”
“他们要来杀了你，”赫瓦莉诺说，“你最好保持清醒。我听人说，他们要给你塞上欧芹和洋葱，把你涂上一层热油烤熟，然后吃掉你。”
胖鸟向赫瓦莉诺投去忧虑的目光，赫瓦莉诺紧盯着他。
“你怎么知道的？”鸟儿喘着气问，“快告诉我。”
“你太胖了，根本飞不起来，”赫瓦莉诺不依不饶地继续说，“就算你想飞，也不过是胖蛤蟆跳死亡之舞罢了。”
“你怎么知道的？”鸟儿尖叫道，“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在哪儿。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七十七年了。”
“他们还不知道……暂时不知道而已。”赫瓦莉诺把自己的脸靠近他大张的鸟喙。她向后缩起嘴唇，鸟儿能看到她长长的狼牙。
他胖墩墩的身子抖得像块果冻。
“你想要我做什么？”
赫瓦莉诺扯出一个狰狞的笑容。“啊，这就对了。”她和六匹马围着鸟儿转了一圈，他们用突出的眼睛无情地注视着他。
“我想知道房子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她说，“快点。”鸟儿向周围投去惊恐的目光，但马儿们已在他周围卧下。他无处可逃。他的羽毛被汗水打湿，紧紧地贴在他的肥肚腩上。
“我不能说，”他终于开口，声音从嗓子眼挤出来，“如果我把能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厄运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涂上热油烤着吃。”赫瓦莉诺说。
“你疯了，为什么非要知道与你无关的事啊……！”
“我等着呢。”赫瓦莉诺说。鸟儿痉挛了好长一阵。他的眼睛已经凸出来，什么也看不到，但他还是把视线移向东方。
“他们在吃饭。”他最终开口。一只巨大的黑蛾子从他嘴里飞出来。
“饭菜是为三个人准备的。米尔德丽德和她丈夫已经开始喝汤了。她正怀疑地盯着他。
‘我今天在花园里发现了让我不愉快的东西。’她说，放下了手中的勺子。我觉得她应该不会再吃东西了。
“发现了什么？”他问，“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生气？”
默特尔小姐刚才进屋了。她逐一打量夫妻俩，似乎想猜他们正在讨论的内容，因为她说：“没错，真的，菲利普，我觉得你应该多注意一下，你让些什么人进了花园。”
“你在说什么啊？”他生气地问，“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要怎么注意呢？”
“花园里有一只丑八怪，半裸着身子。她被灌木缠住了。我看到她都得移开视线。”

所以“你把那动物放走了吧？”
当然“没有。反正她已经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她脸上那残忍的表情，觉得她会严重地伤害我们。”
“什么！你们就让那可怜的东西被困在灌木丛里？米尔德丽德，有时候你让我觉得恶心。我受够了你在村子里到处游荡，用你的宗教祷文去叨扰那些可怜人。而你今天在自己的花园里遇到一个可怜的东西，除了虚情假意地抖抖身子，什么也没做。”
“米尔德丽德一声惊呼，用一块有些脏污的手帕捂住脸。‘菲利普，我可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么残忍的话？’
“菲利普一脸无奈的恼怒，问道：‘试着描述一下这个生物的样子，它到底是只动物还是个女人？’
“我不想再说了，”妻子啜泣着，“你对我说了那番话，我现在头好晕。”
“‘你得当心点，’默特尔小姐轻声说，‘她现在的状况很脆弱！’
“‘状况很脆弱是什么意思？’菲利普愤愤地问，‘你们就不能有话直说吗？’
“‘怎么？你肯定已经知道了，’默特尔小姐假笑着，‘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菲利普气得脸色煞白。‘我受够你们这些虚伪的谎言了。米尔德丽德是不可能怀孕的，她已经整整五年没有上过我的床了。除非我们家有圣灵，不然我真不知道她怎么怀孕。米尔德丽德的忠贞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也无法想象她会委身于别人。’
“‘米尔德丽德，是真的吗？’默特尔小姐说，她的声音因甜美的期待而微微颤抖。米尔德丽德尖叫着抽泣道：‘他骗人。三个月后，我就会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了。’
“菲利普扔下勺子和餐巾，站起身来。‘我会回楼上吃完晚饭，这已经是七天里的第七次了。’他说。但他突然停下，就好像他刚刚说的话触发了某段回忆。他摇摇头，忘掉这个插曲。
‘我只希望你不要跟在我后面发牢骚。’他对妻子说，然后离开房间。她尖叫起来：‘菲利普，我亲爱的丈夫，回来喝完你的汤吧，我保证不会再添乱了。’
“‘来不及了，’菲利普的声音从楼梯上传来，‘已经来不及了。’
“他慢慢走到顶楼，眼神落在前方很远的地方。他紧绷着脸，好像在努力倾听远方的噩梦和死寂的现实之间的喋喋不休。他来到阁楼，坐在一个旧箱子上。我觉得箱子里装满了旧蕾丝、褶边短裤和裙子，可它们又破又旧；一只黑蛾子在其中饱餐，而菲利普坐在那儿，盯着窗户。他打量着壁炉架上的一只毛绒刺猬，它看上去饱受折磨。阁楼的气氛似乎让菲利普感到窒息；他猛然打开窗户，长长地……”
鸟儿在此停顿，一声凄长的嘶鸣声响彻夜空。六匹马站起身来，用它们刺耳的叫声回应。赫瓦莉诺愣住了，她向后缩起嘴唇，鼻孔颤抖。“菲利普，马儿们的朋友……”六匹马向马厩飞奔而去，仿佛在服从古老的召唤。赫瓦莉诺颤抖着叹息了一声，也跟上去，头发在身后飘荡。
他们到达时，菲利普就在马厩门口。他的脸色光彩照人，苍白如雪。马群跑过时，他记着数。他抓住第七匹马的鬃毛，跳到她背上。母马飞奔而起，仿佛她的心脏要爆炸了似的。而菲利普在这整段时间里体会到了一种让他欣喜若狂的爱意。他觉得自己已长在了这匹美丽的黑色母马的背上，与之合二为一了。
黎明时，所有马都回到马厩。满脸皱纹的小马夫正在擦去夜间结下的汗水和泥块。他小心翼翼地为马匹擦拭身体，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睿智的笑容。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主人正独自站在一个空荡荡的马厩隔间里。但他知道主人就在那儿。
“我有几匹马？”菲利普终于开口。
“六匹，先生。”小马夫回答，止不住笑意。
那晚，米尔德丽德的尸体出现在马厩附近。人们会认为她是被踩死的……可“马儿们明明都像羊羔一样温顺”，小马夫说。如果米尔德丽德真的怀孕了，她被放入一口体面的黑棺中时，没有人发现任何迹象。但也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第七个空马厩隔间里会出现一匹畸形的小马驹。

[1] 拉撒路 (Lazarus) 原本是《圣经》中的人物，跟耶稣一样也经历了奇迹般的复活。



莉奥诺拉·卡林顿

墨西哥作家、艺术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家庭，少女时代先后被两所修道院学校开除。1937年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私奔，成为巴黎艺术圈宠儿。1940年，丈夫被纳粹逮捕，卡林顿精神濒临崩溃，被送往精神病院。从医院逃走后去了美国和墨西哥。晚年投身墨西哥妇女解放运动，在墨西哥度过余生，直至2011年去世。

译者：李思璟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闻专业与英语专业双学士。曾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专业，研究流行文化。译作包括《两全其美》《这就是培根》《弗朗西斯·培根：肖像习作》等。

《白兔》《第七匹马》均选自即将出版的《卡林顿短篇小说集》。由一页 Folio 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为电影《莫娣》(2016)剧照

小说 幸福 玛丽·拉文 | 故事群岛

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幸福——又值多少呢?

妈妈很能说。这并不是说她讲个不停，而是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她汲取话语的源泉很深，很深，很深。她的主题是幸福：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哪里找不到；还有，如果找到了，该如何守护。我们决不能将它和愉快混为一谈。也不该把它视为悲伤的对立面。

“看看休神父。”妈妈望着他，两眼放光，“按他的说法，悲伤是幸福的要素之——一种必备要素，你们听听！他想抗议，她抬手阻止。这种说法或许的确有诡异的事实依据——对某些人来说。但对我来说不是。但愿，对我孩子来说，也不是。她严肃地看着我们姊妹仨。我们笑起来。我们中谁也没有体会过多少悲伤。我们父亲患上一场起初看似不太严重的病、不久便溘然长逝的时候，比依和我还很小，琳达才一岁。“我知道有人把悲伤当作幸福的替代品。”妈妈说。

休神父再次抗议：“我说，你不是把我归进那一类吧？”

父亲去世后，休神父是和我们家走得最近的人，在不和我们中任何一个特别亲近的前提下——和妈妈也不。他住在我们米斯郡农场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在根据我们父亲政治地位举行的安魂大弥撒上，他是几位司仪神父之一。那天他第一次见我们，但后来常常顺道来访，想着填补留在我们心底的孤独大坑。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一个空洞，更不知道我们能填补它。那时他和妈妈都还年轻，他频繁出入我们家，待到很晚，而且，当真，觉得在特殊情况下逗留一整夜也没什么，比如我们有谁生病的时候，或许有人觉得这些都是丑事。他甚至偶尔睡在那里，要是夜间雨太大不方便穿过田野回去的话。

我们姊妹仨小时候，完全习惯在家里看到休神父，跟他从不拘礼，当着他面擦干头发，剪指甲，更不在意到处乱扔的是哪类衣服。至于妈妈，如果有事要告诉他，怕不说就会忘，穿着衬裙、刷着牙或梳着头从卫生间跑出来在她看来也不算什么。她容不得别人批评她的行为。“独身禁欲又不是让他们生活中完全没有温暖和家的感觉。”她说。

在这一点上，比依也很坚定。比依，姊妹中的老二，是我们的智者：“我很高兴他有我们妈妈，”她说，“不只是高兴妈妈有他，因为太可怕了，大部分女人都那样对他们——我是说神父——就好像他们是社会弃儿。妈妈把他当人看——仅此而已！”

听到关于她和休神父过于随意的闲话时，妈妈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可他只是个神父啊！”她说。

比依咯咯笑。“幸好他没听见那句。”随后她对我说，“否则妈妈对他的良好影响就会消失。你会以为他是太监呢。”

“比依。”我说，“你觉得他是爱上她了吗？”

“就算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比依坚定地说，“他要的是她的灵魂！也许他想确保她进天堂！”

但妈妈从不为死后去哪儿烦心。“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孩子们，”她说，“我意思是，很突然，或者你们不在我身边，或者我不能跟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保证不要难过。没必要！只要记住我有过幸福的人生——还有，如果让我来选择天堂，我还选在这人世间和你们一起，不管你们把我烦成什么样！”

你瞧，按照妈妈的说法，烦恼和疲乏，乃至疾病和痛苦，都能与幸福共存。她习惯在——至少可以说——我们看来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问别人是否幸福。“那你幸福吗？”她会在某个人卧病在床，浑身是汗或饱受阵阵牙痛折磨的时候询问。还有一次，她当我们面，在一位老朋友临终卧床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随后我们责问时她说，“临死前感到幸福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吗？看看我父亲！你们知道他走之前说了什么吗？临终卧床的时候，他说我找不到一个比他过得更好的男人。虽然痛苦得不行，他的脸却闪耀着幸福！”妈妈舒畅地点头。“幸福祛除痛苦，以火灭火。”

自己的认知无法与她的相匹敌，我们大口饮下她的激动言辞。只有比依有所怀疑。“可能是他传给你的，像疹子或发烧那样。”她说，“或至少是那种可以转手的。”

“你觉得要是那样我会拿吗？”妈妈喊道，“在那个时候，他最需要它的时候？”

“不是当场！”比依执拗地说，“我是说像遗产那样。”

“你不觉得，要是那样，”妈妈气鼓鼓地说，“他会感到更有必要把它留给你们外婆吗？”

我们自然明白，虽说外祖父有一颗慷慨的心，却没能给外祖母带来持久的幸福。他把这个任务传给我们妈妈。可妈妈完成得不怎么样，哪怕是爸爸依然在世，她有他——以及，后来，有我们这些孩子——帮忙的时候。

至于休神父，他早早就在这场较量中放弃了我们外祖母。“万能的上帝也不能让那个女人幸福。”有一天他说，眼见妈妈因为疲惫，面色憔悴又苍白，正准备去她母亲的公寓，每晚这样跑一趟让她心力交瘁。

有些晚上，她从图书馆下班回家，我们见她手里拿着车钥匙站着，努力去想哪一种更糟——硬撑着走过去，还是再把车开出来。其实路程很短。漫长的是妈妈的一天。

“你不是今天上午才去看过她吗？”休神父问道。

“那也没什么！”妈妈说。她无疑在想她离开时我们外祖母总爱摆出的那副孤苦伶仃的神情。（“别说晚安，薇拉。”外婆会哀求，“这让我觉得很孤独。而且你说不好——人睡前可能还会再滑一跤呢！”）

“你知道几点了吗？”比依会不耐烦地说，如果她恰好在妈妈身边的话。天色已晚的确实算不上什么，因为妈妈很可能还是会再跑一趟，哪怕只是路过窗户底下，看到灯光熄灭，或站着聆听，确保据她所知一切都好。

“要是她幸福，我觉得没什么。”妈妈说。

“你怎么知道她不幸福？”我们就问。

“人幸福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们不能吗？”

幸福祛除痛苦，以火灭火。

我们说不好。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外祖母是个快活的人，一个小鸟儿般的人物，即便年事已高，还能笑得像个小姑娘，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平日里唱起歌来也像。但她有铁做的喙和爪子。要是妈妈跑腿稍有差错，外婆觉得派她去商店跑三趟也算不了什么。“不是那种糖——太细了；我要的不是细白砂糖。但也不能那么粗。我要的是中间的那种。”

有一天，我最小的妹妹琳达被激怒了，转而开战。“你真刻薄！”她喊道，“你就爱使唤人！”

外婆得意洋洋，仿佛琳达夸赞的是一种优点。“我一直都很难被取悦。”她说，“还是姑娘的时候，别人都叫我‘蛮横小姐’。”

有生之年她依然是蛮横小姐，人到暮年也不例外。后来她的命令带上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复杂感，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她开始和我们一样，管她女儿叫“妈妈”。

我们外祖母每句话都喜欢用一个绝妙的词来开场：“要是”。“要是，”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会这么说——“要是你们来早一点就好了，我等你们等得都没劲了！”倘若我们去得早，

便说，要是晚一点就好了，那样她可以休息好了再和我们玩，有精力招待我们。给她带花儿去，她就叹气，觉得要是我们前一天送来就好了，那样她有客人能欣赏到，要么，茎再长一点儿就好了。要是我们采的有几片绿叶，或多带一些花苞就好了，因为，她瞧不起她说，我们带来的破花儿都开始谢了。一年年过去，外婆的念珠串上又多了一颗新珠子：要是她的朋友们都没死就好了！他们不在，任何事情都毫无真正的乐趣可言。我们父亲——她女婿——是唯一差点就让她满意的人。但就连这也有一处美中不足。“要是他是我亲儿子就好了！”她总爱这么说，伴着一声叹息。

妈妈的妈妈活过了我们的童年时代，一直活到我们步入成年（不过她比我们外祖父留给她的钞票活得长），在我们心目中，她是勇猛和挫败的复杂结合体。她在自己人生的领域中勇敢又慷慨，然而她最简单的要求在我们妈妈的人生大框架中都显得庞杂，所以我们永远无法以观察外祖父或父亲的清晰视角来观察她。他们，我们只是透过妈妈的眼睛来看。

“看看你们外公！妈妈这样喊，他立刻浮现在我们眼前，双眸闪亮地盯着我们——没错，盯着我们，尽管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出生：我。还有时候，妈妈会大喊，“看看你们父亲！”他立刻浮现在我们眼前——高大，英俊，年轻，更适合娶我们中的某一个，而不是可怜、狼狈不堪的妈妈。

最精彩的时候，妈妈会说“看看我！”接着犹如施了魔法，我们凝视岁月倒流，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小姑娘，黑头发，镶扣的靴子，尽管相貌平平，噘着嘴，却耀眼得像明星。“我很幸福，你们看。”妈妈说。于是我们绞尽脑汁，试着去理解如今依然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神秘光芒。“我以前总爱靠着一棵长到河面上的树，”她说，“透过灰暗的叶片低头看下面的流水，我常常觉得不是河水在流淌，而是我，在水面上一跃而起，飞过空中！像一只鸟儿！相信我会找到秘诀的！”她说起来好像真有那么一个秘诀，等着被发现。还有一次，她梦想成为大歌星。

“我们都不知道你会唱歌呢，妈妈！”

她只好笑笑。“唱得像乌鸦。”她说。

有时她以为自己可以游过英吉利海峡。

“你游得那么好呀，妈妈？”

“哦，不算好——只会蛙泳，她说，那会儿还得靠我父亲吹起来绑在我腰上的两只猪膀子。但我曾经浑身颤动着——没错，颤动着——幸福。”

背着妈妈，比依扬起眉毛。

那是什么，我们曾问自己——我们确信她一定叫错名字的，是哪一种品质？是勇气吗？是力量、健康或高昂的情绪吗？那种你给不了也求不来的——双关谜题？随遇而安的游戏？

“我知道啦。”比依喊道，“装样子！”

不管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妈妈决不允许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劲风将它从自己跟前吹走。然而，一天晚上休神父也在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听她宣称，有时候，人可能需要松开它——放手——然后再牢牢地抓住。我们猜，类似于星空布景中走钢丝的人必须等到他要抓的那根横杠开始像作对似的离他远去才跃入空中。哦不，不！五脏六腑那样猛然下坠我们不能忍，气沉肚里鼓得像只梨。把幸福晾在一边。“毕竟，很多人好像没它也凑合着过呢。”比依大喊。这事情太棘手了。莫非它需要天分？“光有天分不够。”妈妈答道，“看看休神父。要说谁有，他，完全有天分——一种天生的能力！你们只消看看他放松警惕的时候，比如和你们这些孩子在一起，或在花园里给我帮忙的时候。但他拒绝幸福！他把它从自己身边赶走。”

“完全不是那回事，薇拉。”休神父大喊，无意间听到她的话，“我只是不像你那样把它看得那么重而已。我觉得它不足以支撑人一辈子。我是说，走到最后——还有走后。”

“哦，我们才走到中间呢，先别提最后。”妈妈喊道。况且，的确，那一刻她脸上闪耀着巨大的幸福，很难让人不去相信她的人世就是她的天堂。她自然常常表示，她拥有量大惊人的幸福。然而，这一点，我们私下里有所怀疑。或许她的确经历过幸福有余的时候——比如，她小时候，和她厉害的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爱在她周身闪耀光环，把冬天变成夏天，冰也可以变成火。可能她刚结婚那几年也有过充盈的幸福。仔细看，我们就能从脑海中找到那些奶与蜜的时光留下的些许痕迹。我们父亲还在的时候，为我们的一切都施上魔法，为她也一样。他的爱擎在我们头顶，如同一把伞，挡住后来找上我们、如同倾盆大雨的种种麻烦！

我只是不像你那样把它看得那么重而已。我觉得它不足以支撑人一辈子。

但我们清楚记得父亲去世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倘若她早年当真有过非比寻常的幸福，那又有什么用呢？父亲走后那几周，她徒然寻求内心的平静，怕她离开我们视线，比依和我跌跌撞撞地跟着她到处跑，穿过树林、沿着河岸，我们怎能忘记它给我们带来的忧虑？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应邀去法国住朋友家，她走在费康的崖壁上时，我们为她的担忧近乎疯狂，我们揪着她的胳膊，拽着她的裙摆，指望能在她离悬崖太近时像铅块般镇住她。但夜里我们不得不放弃守望，被迫遵循完整的家庭——完好无损之家的作息规律——跟其他孩子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妈妈偏偏爱在海岸巡逻队员不在近海的小艇里、沙滩和大海一般冰冷灰暗的那种时候去游泳。等她给我们洗完澡，亲吻我们后离开，我们的心简直像死在了胸腔里，我们会偷偷溜下床，赤脚站在复折屋顶上，望着她奔下石子滩，奋力游到那片远方海浪、天空和迷雾浑然一体、灰色将她笼罩的水域。倘若我们的视线离开她片刻，就再也寻她不见。

“哦，让她调头，上帝啊，拜托了！”一天晚上我大声祷告。

比依吓了一跳，从窗口转过脸。“她肯定要调头的，不是吗？除非……？”

我们湿漉漉的手紧握在一起，又朝外面望去。“她不会的！”我小声说，“那是一种罪孽！”

有罪孽的震慑力护航，我们松了口气。随后比依又屏住呼吸。“要是她游得太远，体力耗尽了怎么办？她游不回来！那就不算罪孽了！”

“主要看意图。”我耳语道。

片刻后，我们看见一条胳膊吃力地举起、疲惫地劈下，最后妈妈在浅滩出现，蹚水上岸。

“别让她瞧见我们！比依大喊，就好像咯咯响的牙齿不会暴露我们似的她会来看看我们，旋而回到走廊另一边自己屋里，夜深，那边时而有哭声传来。

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幸福——又值多少呢？

妈妈从未质疑过。有一次她告诉我们：“冬季里的一天，我给我母亲带去一朵雪滴花。那是当年第一朵——没怎么长好就提前冒出来的淡淡花苞——我觉得是个好兆头。但你们知道你们外婆怎么说的吗？‘雪滴花现在对我有什么用？’听听这话！不能始终保持价值，永远不失去它，雪滴花还有什么用！这不就是雪滴花的全部意义吗？那也是幸福的全部意义！要是它会被擦得不留痕迹，那还有什么用？看看我和那些黄水仙！”她俯下身子，把脸埋进放在桌上等着被插进花瓶的那一束中。“如果它们不能保持自己的美，美得绝对，无法回避，你们觉得我经历了你们父亲住院时的那件事后看到它们还受得了吗？”

这个问题在理。爸爸住院时，妈妈陪他一起去，住在街对面的小旅馆里，这样就能整天伴着他，从早到晚。“因为这对他来说太可怕了——待在都柏林！”她说，“你们不知道他多讨厌那里。”

他快死了，他俩谁也没意识到。他们那颗星星划过天际时，他俩怎会知道它是一颗流星！但一天晚上她留爸爸独自睡觉，回家几小时看看我们过得怎样，只见遍地都是黄水仙——林子里，树下，大街两旁，她心都碎了。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她想到爸爸错过它们真是太糟了。“你们给他送去几小束，可怜的宝贝们！”她说，“小捧也很漂亮——在你们的小拳头里紧紧攥成小束！但把它们塞进花瓶里不能真正弥补他看不到它们生长的遗憾！”

所以回医院的路上，她停下车，采了一大捧——抱得满怀。“它们堆满整个后座，”她说，“想想我都激动，走进他屋里，把它们抛到他床上——我说——直接抛下去，这样他就能嗅到它们，感受它们，然后看呀看！我没打算把它们插进花瓶里，或做其他类似荒唐事儿——要找个雨水桶才能放下呢。哇，我上台阶的时候被挡得看不见路；我一路磕磕绊绊。但等我走进大厅，那个修女——我跟你们说过她的——那个修女朝我走来，看起来就像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不过我现在明白她是在等我，知道得有人让我清醒过来。但她的方式啊！伸手揪住那些花儿，大部分都掉了——我记得它们被踩了。‘你带这些傻花儿去哪里，你个傻女人？’她说。‘你不知道你丈夫快死了吗？你现在能给他的只有祷告！’”

“她说得没错。我很傻。但我没得治。后来，我那样拖着你们几个孩子跑遍欧洲全凭一股傻劲。就好像一个地方会和另一个地方不一样，会更好，会没那么凄凉似的。但带你们去你们父亲和我原本打算带你们去的地方很满足——不过，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可能不会在你们那么小的时候带你们去。他或许也不会有明确的目的。但最主要的是，他不会开一辆破成那样的车去旅行。”

哦，那辆车！那是一辆破旧不堪的红跑车，配件少得可怜，结果等我们终于有了一辆新车之后，妈妈拐弯时依然把手伸出窗外，雨天还跳出去用衣袖擦挡风玻璃。被惹毛了，她摇下车窗冲人吼，忘了自己现在有喇叭。我们居然连人带行李都被塞进去了，真是个奇迹。

“你们都不是小胖墩——一个也不是！”妈妈自豪地说。“你们很健康，很强壮。”她转向我。“想想你在瑞士是怎么让那辆车开上小山的。”

“阿尔卑斯可不是小山，妈妈！”我像当年那样冷冷指出，情况是这样的，那辆车没能爬上一道坡。妈妈倒车，结果卡进岩壁，我只好下车去推，直到她再次挂上一档开起来。可一旦发动，它就沒停下接我，最后一路开到山顶，她们在那里等我，等了很久。

“啊，是呀。”她说，想到那些旅程怀旧地叹口气。“但愿你们从中学到了些什么。一路旅行对你们学地理和历史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能始终保持价值，永远不失去它，雪滴花还有什么用！这不就是雪滴花的全部意义吗？

我们互相看看，露出微笑，接着妈妈自己也笑起来。“记得那次吗，”她说，“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那天复活节，所有商店都堆满食物？那些肉铺门口挂着家禽和野味，羽毛还在，可怜的脑袋滴着血，橱窗里有可怜的小羊羔、乳猪、小山羊，全都剥了皮，吊着后脚挂着。”妈妈打了个寒战。“他们满脑子都是吃的。我看着反胃。我得赶紧走开。可是琳达，当时应该只有四岁，拖着我看呀看。你知道那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对残忍和血腥的东西有一种病态的迷恋。她小脸通红，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急匆匆地把她带回旅馆。但第二天早晨她溜进我屋里。她爬到我身上，紧紧贴着我。‘我们可不可以回去，就一次，再看看那家店？’她小声说。‘那个复活节把小孩子吊起来的地方？’当然啦，是那些小山羊，但我猜我说的是‘小孩子’。我们笑得呀。”但她一脸严肃。“你们在那些旅行中表现很好，个个都是。”她说。“你们总体来说都是很好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投入那么多精力来养你们，因为我根本就不是当妈的料。你们让我做到了最好！当然啦，我在你们身上倾注了超常的精力，因为我是按照你们父亲的标准来的，我都忘了，要是他像别的父母一样活到中年，被生活困扰，或许就不会那样恪守原则了。”

“呀，这项任务现在差不多完成了，薇拉。”休神父说，“你完成得也挺不错。”

“那是休，”妈妈说，她直起身子，用手撑住腰背，像她有时在花园里跪着除草后起身那样，“我没向敌人投降！我们挺过来了！”然后一丝轻蔑从她眼中闪过。“而且我们很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神父皱起眉头。“你又来了！”他说。

妈妈反击他。“我觉得你没注意到那些为阻碍我们幸福而发起的进攻！罗伯特一走，他们都冲我来了——成群的亲戚、朋友，甚至还有陌生人，个个像蝙蝠一样穿着黑衣、张开臂膀让我与他们为伍。‘生活就是泪谷。’他们说。‘你有幸那么年轻就知道了！’嘿！等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重新稳住生活，他们全被击退了。我第一次笑出来的那天——噗，他们都像蜡烛似的被吹灭了。他们根本就没有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他们属于一个鬼影般的世界，活得很快意：只要坐着抹眼泪就行了。把封墓的石头推开走出去是需要努力的。”

努力。努力。啊，但若是有人尚未领悟其中奥义，那个听起来怪怪的词语就很难激发同情。对妈妈来说，最难熬的想必是我们两个大的读大学的那些年——不再是孩子，却仍然依赖她。的确，我们那时进入了全新的活动和情感领域，对她的需求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和我们自己一样来去自由，结果那栋房子常常和小咖啡馆一样——宠物不被禁止，还能坐在我们的椅子和床上，和人一样随心所欲。再说了，很难同情像妈妈这样让自己陷入一团糟的人。满屋子的杂乱。她的书房就像是邮局退件处理室，到处摞着纸，已支付和未支付的账单，已回复和未回复的信件，纳税申报单，小册子，传单。大风天我们不巧忘了关门，回来就会发现纸张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在空中飞舞。妈妈的高效仅仅体现在最终能够完成自己开启的每一项任务，因此在外人眼中，按照她的方法，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可能完成。为了保持别处整洁，她把自己的屋子变成了大仓库，我们其他人什么都往里扔：要送走的东西，要修理的东西，要储存的东西，要珍藏的东西，要归还的东西——甚至还有要扔掉的东西！到底，那间屋子仿佛是一座陈年垃圾堆。而且没人帮得了她；她生活的混乱状态如同创造行为一般个性化——帮她就好比尝试去写完另一个人的诗。

岁月流逝，妈妈更是一刻不停地忙里忙外。比依和我结婚了，不在家里住，只有节日和某些周末回去，但琳达比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吵，我们每带回一个追求者，她能带二十个。这栋房子根本没有安静的时候。退身为访客，我们看着妈妈紧张得要晕过去，心里明白，她像只陀螺，若非倒下就不会停息。但现在稍有小状况，休神父就会找医生，妈妈被送上邮船，送往伦敦。有必要把她送得足够远，让她每晚往老家打电话贵到承受不起。

遗憾的是想到离开往往刺激她快马加鞭加倍努力维持各项事务有序。她会忙到凌晨，翻腾她的书桌。对她来说，和平日一样，再短暂的离开都意味着一场赴死般的准备。一如她将不久于人世，我们也会被召集来，不过她没空和我们说一句话，因为出发前五分钟她

仍在努力回复堆积数周、需要整整几天才能处理完的信件。

“你知道出租车等在门口吗，薇拉？”休神父会说，他的手挠着灰白的头发，模样不修边幅。妈妈有时惹得休神父和她一样心烦意乱。“别的来不及了。剩下的留到回来处理。”

“我不能，我不能！”妈妈会喊，“我得取消我的计划。”

一天，休神父打开她门厅里已经捆好的箱子，胳膊一挥，把桌上所有文件一股脑儿扫进箱子里。“你可以在船上解决，”他说，“去伦敦的火车上也行。”

此后，妈妈的行李中总有一只空箱子，用于存放她桌上没处理完的文件。多年后，“爱尔兰邮政”的一位乘务员告诉我们，大家都知道她，从霍利黑德到尤斯顿一路都在处理信件和账单。“她差不多到拉格比或克鲁就放弃了，”他说，“她会跟车厢里的人聊起来。”他微笑道。“有一次我走在火车过道里，碰巧看到她一脸心虚地关窗户。我没吱声，但我猜她把她的那些文件清出窗外了！”

他们属于一个鬼影般的世界，活得很快意：只要坐着抹眼泪就行了。

很有可能。我们小时候，远离我们几小时都能让她镇定。两周或更短之后回到家，她活力的源泉重新注满。我们都快认不出她了——脚步是那么轻盈，眼睛是那么明亮，她的爱和耐心再次畅快地流溢。但无需多久，整栋房子又将充斥着太多的人和太多的动物带来的嘈杂与混乱，我们又将和猫猫狗狗、蝙蝠、老鼠、蜜蜂乃至胡蜂争夺生存空间。“别弄死它！”要是我们冲着一只愤怒的胡蜂抬起手，妈妈就会大喊，“抓住就行，亲爱的，把它放出去。打开窗户，让它飞走就好！”但这一待遇有时被认为过于残酷。“等等。关窗！”她会大喊，“外面太冷。它会死的。所以它才飞进来，我猜！哦天哪，我们该怎么办？”生活再次开足马力。

妈妈只能在一个地方获得安宁。她临界崩溃点快要倒下，便出门走进花园——不是坐坐或散散步，而是挖土，除草，移动大块的球茎或根状茎，或者十分频繁地将大石头从一处挪到另一处。她总是在铺路，修筑干砌墙，或制备小山一样高的肥料堆。不管出去时多么憔悴，最后天黑被迫进屋时，她的脚步都会散发着小雏菊一般的活力。所以即便她没有成功定义出我们可以理解的幸福，我们也能看出，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妈妈在她花园里时彻底拥有它。

一个星期天，比依和我下午来串门时，我们中有人这么说了。休神父又和我们在一起。“但这是一种欠考虑的幸福。”他说。我们站在客厅窗口，望着窗外渐弱的光线中妈妈跪着除草的地方，那片从房子一路伸向树林的长长花圃。“我在想，要是病倒了不能再做重活她可怎么办！”他说。他或许有点嫉妒她可以俯身弯腰？他已经开始拄拐杖。就连我常常都有些嫉妒她，虽然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我结婚早，感到生活如岁月般沉重。“她不好好照顾自己。”休神父伤心地说，“看看她在那里，膝盖底下没垫东西隔开潮湿的地面。”天色昏暗，我们几乎看不见她，但就连客厅都是阴冷的。“太阳下山后就不该让她待在外面。”

“那你倒试试让她进来啊！”琳达说，进屋刚好听到他的话，“现在你还不知道吗，在别人看来要命的事情貌似只会让妈妈更强大？”

休神父又摇摇头。“你好像忘了，她可不是越活越年轻！”他动来动去，忧心忡忡，好几次走到窗户边焦虑地往外看。他真的越来越老了。

“来坐下吧，休神父。”比依说，为了让他把心思从妈妈身上移开，她开灯隐去花园。于是我们不再是透过窗户观看，望向它犹如镜子，在摆着花儿的桌子和灯之间，我们看到的是隐约在动的自己。和休神父一样，我们也在等她进来，结束这一天。

“哦，这太荒唐了！”休神父最后大喊，“她得讲点道理。”他回到窗户边，一把推开它。“薇拉！”他大喊，“薇拉！”——很坚决，坚决得比亲切更亲密，他的语气让我们震惊。“她没听见我。”他说，在亮灯的屋里转身冲我们眨眼。“我去叫她。”他转瞬间从屋里消失。正当他疾走在花园小径上时，我们面面相觑，惊呆了；和他的声音一样，他的脚步，也是恋人的脚步。“我来了，薇拉！”他大喊。

除了要紧急，妈妈一点儿都不僵，可她没有动弹。她像做其他任何事情时一样全身心投入，俯身贴近地面。渐弱的不只是光线；她的视力也在衰退，我听从直觉跟上休神父的时候想道。

但走到半路，我住了。我看见了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妈妈一只手看似撑在她当新娘时栽下的那棵老牡丹的一枝树丫上，其实没有抓着它，而是叉在上面。另一只似乎在湿土中摸索的手，实则陷入松软的沃土。“妈妈！”我尖叫，跑向前去，可到她跟前时，我用手捂住脸。“哦，休神父！”我哭喊，“她死了吗？”

回答的是比依，歇斯底里。“是的！是的！”她哭喊，然后她抡起拳头捶打休神父的背，就好像这是因为他的悲观话语导致的。

但妈妈没死。起初医生甚至说她有希望挺过来。但从休神父抱她进屋的那一刻起，我们便不再抱有希望，因为就连并不强壮的他都能将她轻松抱起。他把妈妈放到她床上时，她脑袋几乎没有压皱枕头。妈妈又活了四个小时。

一如她生命中的那些日子，妈妈最后的四小时弥漫着担忧和焦虑。半是清醒，半是神志不清，她似乎把床罩当成了她的书桌，手指在上面乱抓，好像在努力应付一堆账单和信函。我们不再漠然，痛苦地听着从小到大都很熟悉的烦躁叫喊。“哦，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刚才还在呢！我到底放哪儿去了？”

“薇拉，薇拉，别操心了。”休神父恳求道，但她挥手打发他，继续在床单里翻找，就好像那是一张张纸。“哦，薇拉！”他哀求，“听我说。你难道不知道……？”

比依挤到他们中间。“你不能告诉她！”她命令道，“为什么要吓她？”

“但我不是要吓她。”休神父说，“这就是我一直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她会被吓到。”那一刻，似乎是为了验证他的话，妈妈的手闲下来，落在床罩上，掌心朝上，其中空空。接着她转动脑袋，把我们从一个盯到另一个，目光恳切。“我面对不了。”她耳语道，“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哦上帝啊！”比依说，然后她哭了起来。

“薇拉。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休神父喊道，自己的脸紧贴她的脸，近乎一个吻，不往向她耳语，试图将自己的信仰之光注入她眼前的黑暗隧道里。

但在我来看来，妈妈想必已经盯着上帝迫切的眼睛了。“我不能！”她喊道，“我不能！”

然后她的思绪从荒芜的幽冥世界转入她身体依然弥留的世界，可就连这个世界也已变成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面的东西只有她能看见。蓦然间，她眼神聚起来，望见休神父，稍稍抬起身子，指着某样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要把它们怎么样？”她的声音很紧张。“总之该把它们放进水里的。”她说，接着，身子探出床缘，指向地板。“别踩到那一个！”她尖声说。随后，她的声音更加尖厉，对我们所有人说话。“把它们送到普通病房去。”她断然说，“别让那个修女拿到；她只会把它们供到祭坛上。上帝不要它们！主是为我们创造它们的——不是为他自己！”

这是带着她一辈子讲话特色的耳熟激动言辞。我们一时迷惑。接着，比依倒吸一口气。“黄水仙！”她喊道，“爸爸走的那天！”于是她面露时常闪耀在妈妈脸上的那种光芒。她侧身靠在床上，一把推开休神父。然后，她伸出双手，将妈妈的脸温柔地捧在她掌心，仿佛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没事了，妈妈。你不用面对了！结束了！”紧接着，原本严厉禁止休神父开口的她爆出真相。“你和这世界已经结了，妈妈。”她说，由于坚信自己传达的消息是欢乐的，她声音洪亮。

妈妈做出生平最后一次努力，领会了比依的意思。她叹出一口气，闭眼躺回去，这一次，她的脑袋深深陷进枕头里，即便是一只石枕，也会被压出凹痕。

《幸福》(Happiness)选自玛丽·拉文同名短篇小说集(1969)。© Literary Estate of Mary Lavin

[1]Irish Mail, 1848至2002年间运行于霍利黑德和伦敦尤斯顿车站之间的特快列车，与爱尔兰岛的渡轮服务相连。



玛丽·拉文

玛丽·拉文(1912—1996)，爱尔兰小说家，被视为女性文学的先驱之一。她的作品主题经常明确地涉及对女性的关注和深刻的天主教信仰。她的作品中尤其著名的是关于寡妇的短篇小说。

译者：徐阳

自由译者，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译有《时间之舞》《干草耙，羊粪蛋，不吃毛茛的奶牛》《女孩们的地下战争》《萨伏罗拉》《如何写出“抓人”的故事》和儿童文学《小月的秘密》等，对文学、视觉和舞台艺术等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充满好奇。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题图来自 [ZHENGFAN YANG](#) on Unsplash

非虚构 城市的异物 杜强 | 非虚构图书馆

他难过的不是贫穷，
而是他们被安置了一种身份

一

从大学毕业起，我时常因为自己的过去而陷入忿懑自怜的情绪。

这件事本身有些羞于启齿，毕竟我并未经历过什么大江大海的人生，所谓过去，也无非是出生在一个西部的小村庄，一步步读书、考入重点大学，然后过着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如此经历过一番的人又何止千万——可要是城市出身的朋友这么说，我还会愤怒不已，“你根本不能理解。”

2017年五六月，我作为特稿记者曾到深圳采访三和大神，这群对生活绝望的打工者，认定进厂打工不会有任何不同，于是卖掉身份证件、切断家庭关系，流连在肮脏破败的城中村网吧，靠着打零工度过一年又一年。在三和结识的打工者宋涛，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跟我一样出生于1988年，都在小镇上读书到初中、考进城里的重点中学，并且很快发现自己如同城市的“异物”，想要退学回家。不同在于，宋涛言出必行、南下打工，而我在一次作文中提起退学的念头，被语文老师发现，他给了作文满分（本身不值得），并在空白处劝我：“千万不要回去！”

在三和的特稿中我写道，自己“与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仅有一步之遥”。可宋涛跨了过去，10多年来孤身漂泊，终于脱离了生活的体制。他告诉我，自己绝不会成家，绝不会有孩子，因为“有了孩子，还不是被别人踩在脚下，不如从我这里断了。”他红着眼眶，讲述在工地、流水线、餐厅里，似乎存在着一群“高级的人”，从不正眼看他，这让他耿耿于怀。

尽管后来经历不同，但宋涛说出了我感受到的一切。我非常怀疑，如果是一个没有农村经验的作者，听了宋涛的话是否还能感同身受。

对于城市的朋友们，难以理解的首先当然是贫穷、不公带给一个人的伤害。但这其实不重要，我们早已习惯。更大的折磨在于，当一个人被安置了一种身份，他们后来便无法心安理得，永远认为所得只是侥幸，像一个莫名其妙的顶替者，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他们想要抹掉个性中的印记而不得，并且这么做时，内心里会生出深深的

背叛感。

去年11月末，疫情防控政策正处在荒谬的顶点，某个晚上，我推开单元楼下的玻璃门，一股冷风灌进来，躺在楼道入口的两个人立刻坐了起来。“没事，我回家，你们继续睡吧。”他们听了一言不发，躺回去，使劲掖了掖两层黑乎乎的被子。想起自己两天来的嘴脸，我感到非常难受。

十几分钟前，我在业主群里看到邻居发来的视频，他在小区南门被“不明人员”攻击、推搡，“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回家，这是我家！”他大声喊着，气息已经不太正常。我始终不知道这位邻居的名字，但小区封控期间，他怀孕5个月的妻子因为社区的不作为而流产。“他现在就是想发泄、想找人打架！你们快去！”他的妻子在群里说。

作为“抗争群”群主，我立即@所有人，号召大家下楼。我第一个到了南门，指着不明人员，“你们干什么的，站着别动！”那是两个年轻人，也许只有20出头，看到赶来的业主越来越多，他们垂着手呆呆站着，像挨了训斥的初中生，解释说，南门已经封闭，他们负责看守，但那位邻居非要从此进入。

“你们哪来的？凭什么看守！这是我们家！”邻居们越来越激动。我让他们交出身份证件，向邻居大声念出名字，质问他们的上级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让我们来的。”

物业经理小跑着赶来，说人是由街道派来，小区门口有，单元门口的也是。对此他们知情，但不清楚具体人员的身份。这句话惹恼了业主，“如果他们跑到业主家偷盗、抢劫怎么办？！”即便在当时，我也感觉这话非常刺耳。

那段时间本小区接连发现阳性病例，已经是“重灾区”，物业经理说，“这些看守是街道通过人力公司找的，我们没法干预，但他们其实就是本街道的一些务工人员，原先在商场卖货、当服务员，还有几个小饭馆的老板，疫情期间实在没有生计，就临时来做看守。”我被物业经理的话击倒，脑子嗡嗡的，后来发生的事已经不记得了。

带着邻居们抗争的几天里，我们争取到低风险楼栋自由进出、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对此我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联想到秋后算账，生出可耻的悲壮感。可后来邻居们监视、驱赶外来看守的时候，我已经变得软弱。他们形容不明人员鬼鬼祟祟，指责他们随地便溺、乱丢防护服，我全然无感，只注意到他们夹着胳膊、冻得哆哆嗦嗦，而且更容易被另一类信息刺激到，比如有邻居说，本小区邻里团结、名声在外，“房价又要涨一波了”。

不久之后，疫情防控政策变化，我退出了群聊。有邻居私下说，怎么退群了？我们正打算推举你进业委会，还附上了一张笑脸表情。可是，我甚至不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只是一个来北京读了大学、顺带留下来打工的不明人员，连居住证都已经过期好些年。我竟然带着一群千万富翁，去驱逐跟自己出身类似的人们。后来跟朋友聊起这事，我说，“感觉自己屁股坐歪了。”

就是这样，尽管一步步远离过去的烙印，可十几年来，总有一些时刻提醒我自己究竟是谁。

我无法忘记采访时一位清华博士的眼神。他从贵州大山来到北京读书，本科阶段总是受到班里同学的排挤，他想不出理由，是因为口音？没见过世面而让人尴尬？还是糟糕的卫生习惯？他反复提起，暗恋的女生在拍毕业照时不愿站在他旁边，生气地躲开。不过，“都不重要了”，他说，眼神里闪着亮光，他加入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誓言“要为工人、农民奋斗一生。”这大概发生在2017年。

他的话让我惶恐。既因为窥见了一种正在崛起的思潮，也因为对照之下，发觉自己已经非常麻木和冷漠。最初并不是这样。

二

写到这里，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是在控诉，只是对象不明。但在高中阶段，我的愤怒指向所有的城市同学。

我讨厌他们的穿着，标准的普通话，白皙的皮肤，厌恶他们谈论《梦里花落知多少》，不希望他们纠正我一个单词怎样是英音、怎样是美音（我很想跟他们说我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对他们毫不掩饰地打量我的破鞋感到恶心。也会惊讶，他们拥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辜负。在篮球场上，厌恶他们一举一动都像极了日本动漫，对他们穿裤子的方式感到十分不爽，因为他们营养良好，宽松的裤子竟然可以卡在臀部——你不能想象一个身材干瘦的农村学生这么做。

他们后来便无法心安理得，永远认为所得只是侥幸，像一个莫名其妙的顶替者

后来我跟北京的朋友们聊起这些，他们大概是被我当时敏感又扭曲的心理吓到了，不知道可以说什么。我开玩笑，“我不是反社会人格，城市学生没做错任何事。”实际上高中时我算是非常正常，有不少城市朋友。我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愤怒。

2003 年，我因为中考成绩好，进入市里的省重点高中，分在了重点班八班。很快，我就发现了许多以前不能想象的事情。比如，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谁来自农村、谁属于城市，甚至不用观察他的穿着或者听他讲一句普通话。农村学生的眼神永远在躲闪，自卑的，懦弱的，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眼神。

最明显的差别当然还是学习成绩。农村学生要被这所高中录取，必须达到重点班录取线，而另外 10 个普通班名额只分配给城市学生。在整个高一，我大概还处在 culture shock 里，年级 1500 多学生，成绩在 1200 名左右，前 100 名当中几乎没有农村学生。我那时也才知道，城市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英语，而我是初一，直到高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音标和汉语拼音是一个原理。

不知道其他农村学生怎样，但我羡慕城市同学拥有健康的青春期。他们可以很自然地跟异性交谈，大胆的甚至当众接吻。这对我当然是惊掉下巴的事情。在我那个初中，男女生之间不怎么讲话，从未听说过早恋。当城市同学在教室后排传阅一些软色情杂志，讲黄色笑话，我会很尴尬地跟着傻笑，但说实在的，我根本不知道性是什么。初二的生理卫生课，我们的老师离奇病倒，一病三个月，另一个班倒是上了课，但老师说，“这部分没啥好讲的，你们回去看看自家母猪咋搞的。”还有，我上了高中才看了第一本杂志。

不过，当时我主要的烦恼还不是这些，而是没有衣服穿。夏天时我只有两件 T 恤，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前晚晾晒的 T 恤在夜里淋了雨，滴上了铁丝上的锈迹，于是那天上午就没法去上学。冬天更麻烦一些，只有一件棉服，穿过一个月之后袖子上黑乎乎的，却没的更换。鞋当然还是夏天的那一双。跟看得见的穿着比起来，吃什么就不重要了，虽然当时身高 175、只有 90 斤，有时会因为营养不良突然眼前一黑晕倒，但确实算不上烦恼。后来当我跟老婆说起这些，她啧啧称奇，问我，“真的有那么穷吗？”最奇怪的地方正在这里，我当时寄住在姑姑家，常年见不到父母，如果需要衣服当然可以告诉他们，但我并不知道衣服没得穿是可以买的。或者说的更准确些：作为一个农村学生，我根本没有向父母提出物质要求的习惯。至于贫穷，当时因为一些家庭变故，穷也是真的穷。

细节无法言尽。因为这类事情也遭遇过不少屈辱的时刻，现在回忆起来只是想笑。比如我当时暗恋的一位城市女同学，就叫 F 吧，她曾对我说，“杜强，你终于换衣服了。杜强，你真是一个‘有味道’的男人。”现在我还有 F 的微信，看到她在朋友圈发一些街舞视频，我总想起另一位农村女生：在一次班级联欢会上，F 听说这位农村女生也会跳舞，强烈要求她跳一段，然后农村女生红着脸扭了一段秧歌。F 愣了好几分钟。这是我最好笑的噩梦。

现在你大概可以理解，我和宋涛为什么会生出退学的念头。我们想要融入城市，可有一些东西会毁掉我们的灵魂。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我发觉陆续有农村学生永远地消失了。

高二选择了文科，没有退学，又糊里糊涂度过一年。高三将要开始的暑假，我忽然意识到，再这么下去可能考不上大学，决心奋力一搏。当时姑姑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民房，用作存放药品的仓库，靠北窗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我在那里开始了苦读。夏天太热，便在地上洒上水，冬天窗户漏风，我只能裹着被子、抱着热水瓶，时常半夜醒来发现在桌前睡着。成绩提高倒是很快，好多次年级第一名。当时我们分出了文科火箭班，志在考取清华北大，原本名额只有 10 个人，但多塞进来 7 个，几乎都是领导子女，有一个虽然成绩一般，但评了省级三好学生，高考可以加 10 分。

高考前大概一个月，我在仓库里做习题，突然听到门外的敲门声，我妈满脸愁容地进来，坐在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话。十来分钟后我父亲又敲门进来，以一种十分夸张的助跑动作，飞起身一脚踹在我妈腹部。我妈哭了十来分钟。很奇怪，我虽然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但没有问。当晚，我们三人脚对脚躺在一床被子里面，关了灯，我爸问我，“你能考上大学吗？这是高中以来他们第一次问我学习成绩的事情。我说可以。

高考之后，估分填志愿，我估分 660 分，所有人都认为清北没问题。我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估分结果。后来听我妈妈说起，当时他们在地里割大葱，听到分数她高兴地抱起一大捆扔到空中，被泥巴撒了一脸。

“你知道 660 分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但是我看别家孩子估 400 来分都很高兴。”我妈说。

填报志愿那段时间真是欢歌笑语，所有人都非常乐观。我最终填报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全英文授课。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只有一位远房亲戚提醒过一句，“你们知道自己和西安学生有多大差距。”

录取结果公布，离清华录取线差了 3 分，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落榜，无学可上。最懊悔的竟然是我的数学老师，因我数学只错了第一道大题的第一问，整个试卷最简单的一道题丢了 6 分。

我原本已经接受命运，打算去第二志愿，华北电力大学广告学专业读书。但我的姑姑拿着一叠《华商报》回到村里，建议我去西安复读。那张报纸的封底是西工大附中的高考喜报，一所高中考上清华北大 100 多个。后来我才知道，西安市最强的三所高中，几乎占据了全省所有的清北名额。

几天后，我坐火车，第一次坐火车，到了西安，经过门卫引荐，见到了西工大附中的一位高三班主任，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她在系统上查了我的准考证号，告诉我可以到西工大附中复读，学费和住宿费全免。

我原本以为已经见识过了什么叫不公平，但在西工大附中，全省第一的高中，我发觉自己很幼稚。

三

在西工大附中近一年，我从未搞清楚过东南西北，只知道校门前的路叫白庙路，沿街开着一家家小饭馆，再往里是挂着红绿绿招牌的城中村。所有寄宿复读生被安置在初中部楼上的一间大教室，住了 10 来人，有延安榆林，也有宝鸡安康的，几乎都与清北分毫之差。他们跟我解释为什么西安的高中如此强大：它们在中考时就已经在全省掐尖招生，我所在的市只有中考前 3 名可以来西工大附中。此前我闻所未闻。

这所高中里有很多怪物。开学后第一次考试，我数学只得 58 分，满分 150。因为试题太难，好几个理科班甚至没有收试卷。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十多个满分。晚自习时，寄宿生都在同一间教室，有一晚我听到背后有个理科生在读《诗经》，时不时赞叹，“太美了，最美还是《秦风》。”后来他和其他几位理科生一起消失了，听说是得了奥赛金牌提前保送北大。

我们想要融入城市，可有一些东西会毁掉我们的灵魂。

文科班只有两个，特征很一致，大概有一多半学生非常厉害，剩下的则有些莫名其妙，高高大大，一身名牌，有些还带着耳钉，通常不怎么学习，每天由父母豪车接送（我并不知道是什么车，只知道造型很奇怪），会在课间用手机播放黄色电影。在附中，我听到了许多非常好听的名字，很简单，但意蕴十足，显然父母都很有文化。不像旧高中的农村学生们，姓名像是从村头标语中挑来的字眼。

全校学生，来自农村的大概只有我一个。同宿舍有位同学，父亲是政府的领导，某天下午我回到宿舍，发现他父亲的司机来看望，抽空替他刷鞋，但不清楚哪些属于他，干脆刷了地上所有的鞋子。我看他擦着我的破鞋卖力地搓洗衣粉，回过头一脸错愕。

那大半年过得很快、很虚幻，成绩起起伏伏，也考过全校第一，只有英语很麻烦，我搞不懂为什么西安学生可以轻易考到 140 分。还有数学，习题集市面上买不到，几乎每道题都不会做。有次模考我解出一道很古怪的题目，挺得意，但实际上西安学生很多都会，“这不就是奥赛题吗？”我第一次知道奥赛是在初二，不知在哪捡到一本小学五年级的奥赛题集，觉得非常有趣，仅此而已。

附中的一切都很平常。教学楼里挂着一副书法，“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我总是默念着这首诗走进教室，日复一日。

然而，高考之后的估分阶段，我才知道我们每一科老师都是省阅卷组成员甚至组长，他们抽空赶回来，宣讲阅卷的细则，例如有某个字眼便可以加一分。语文作文估分很难，但老师让我们写出来，他的估分与实际成绩几乎分毫不差。填报志愿时有两个信息让我非常震惊，同班有至少三位应届生获得了 60 分的高考加分，此外，因为西工大附中太过强大，它从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这类高校得到承诺，本校填报清华北大但落榜的学生，它们可以直接录取，不过只针对应届生。非常不公平，当时本省没有平行志愿，像我这样清华北大落榜的学生，第二志愿几乎是作废的，浙江大

学甚至不会看一眼。

我的估分并不理想。高考前两天，也许是因为紧张，我高烧不退，在城中村的小诊所打了一针，考前刚刚退烧。但即使一切顺利，我也没有胆量再去冒险。我还记得父母正在村里种葱呢。很好玩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这所高中根本不算什么，寄丢了之后，我在邮箱的一叠过期报纸里面翻了出来。我想起小学勤俭学的情景，一大片丰饶的麦田，我和小伙伴们拎着化肥口袋，在田垄间寻找遗失的麦穗，非常快乐。

虽然在省会西安近一年，但我几乎没有离开过白庙村，每一天过得如同复制而来，只记得白庙路上一家新疆面馆很好吃，几乎天天去，饭馆老板走路姿势很奇怪，我总怀疑他的前半生一直骑在马上。有天傍晚忽然发现饭馆倒闭，自己一个人在路口，望着逐渐亮起来的霓虹灯，站了半天不知道该去哪里。还记得的都是一些碎片了，比如晚自习时，白庙路上的音像店一直在播放网络神曲，“不要再来伤害我”。还有自己带的一本课外书，《海子诗集》，睡前总要读一读，后来总被他们调笑，“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离开西安的时候，我终于抽空坐公交路过了一次钟楼，发现平平无奇。我不明白，为什么钟楼那么矮？

有一些亲戚来祝贺，暑假的时候，当然免不了问我，中国人民大学究竟是几本。我不能生气，因为我们村甚至没人上过大学，亲戚当中，学历最高的是我的大舅，在60年代就考上了我所在的省重点高中，但因为太穷辍学了。

之前的高中同学已经读完大一，不少女生烫了头，看起来成熟许多。跟他们约过几次饭，但有两位农村同学，J和C一次也没来过。他们从朋友圈里消失了，所有人都感到很奇怪。但我在县城遇见过一次，J搂着C的肩膀，谈恋爱了，看起来很般配。还在高三的时候，我在城南的人力市场遇见过一次J，他看起来很惊讶，但还是邀请我去他家坐坐。所谓家，其实是他父亲跑劳力市场时租住的民房，打开门里面昏暗不堪，跟我的仓库很像，靠着墙摆着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少许碗碟，除了一把铁锨，再没别的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我能理解J和C，他们想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

J先我一年考进了人大，读法学，后来我去过他宿舍，见床头贴着一幅字，“法律是冷酷的激情”。他戴着副眼睛，总是乐呵呵的，走路有些傻里傻气，我有很多理由和他成为朋友，但始终没有，我想可能因为太理解彼此。我们也从未聊过农村学生的话题。实际上，不管在县城还是西安，我从未听到城市同学的蓄意嘲讽和歧视，相反获得了很多友谊。我相信他们从未想过用农村 – 城市去区分任何人，魔怪只在我们这一边。

四

大学入学后两个月，我接到校医院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医生告诉我，结核病皮下测试，我的结果是阳性。一旁的护士嘀咕了一句，“看起来脸色确实不太对。”怎么染上的不清楚，但和营养、居住条件有关。

定点医院在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半小时。结核病并不可怕，但我不知道怎么告诉父母。接通电话说了病情，我妈不出预料哭了起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以为往后就好了……”“没什么大问题，吃药就行。我捏着手机，在公交站牌下踱来踱去。那是个非常神奇的时刻，远处的车辆从深秋的树林里驶来，呼声略过一个瘦削的年轻人，在他心里，第一次感到长大成人，而同一瞬间，父母变得无比孱弱。

后来因为采访，我接触到很多农村大学生，他们都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此前父母多么强横，在考上大学之后，他们就成了家庭的权威，人生的所有事项全凭自己做主，当然也意味着，得不到任何帮助。

大学的开销并不算贵，但务农肯定不够。我有些没头没脑，虽然也去兼职当家教，但一直不清楚4年里我们以什么为生。毕业后才知道，一开始我妈成了“职业赌徒”，天天泡在麻将馆。她牌技极好，面前码的牌几乎都记得，后来竟然还找了个同伙，出老千，“眼睛眨一下，肩膀动一动，对方就知道要什么牌。”时间久了，她们必须经常换场子，县城的麻将馆几乎都跑了一遍，直到一次在城乡结合部遇到危险。

靠着墙摆着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和少许碗碟，除了一把铁锨，再没别的了

“那天打到很晚，我俩没办法回家，路上拦了一辆私家车，两个男的开车，开了一

会儿我感觉方向不对。”我妈说起来没什么表情，“越走越远，往西安方向开了。我俩吓得不敢说话，我开始哭，求他们，说我还有个儿子，这些年好不容易……副驾男的说不算了吧，这才把我们仍在高速路边。我俩一边哭一边走，走了好久才回来。”

我问。“你跟人家说我上大学了，还是说我瘫痪了？”我妈听了一边笑一边掉眼泪。

县城里，父母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在我大四实习那年，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处破房子，开麻将馆。我知道很破，但寒假回家时还是惊呆了。在一排建材店背后，二层小楼将拆未拆，已经塌了半边，走上一处很陡的楼梯，左边是卧室兼客厅兼厨房，右边两个相连的小房间，各放了两台麻将机，前一晚的烟头瓜子皮撒了一地，我爸爸正在扫地，样子竟然非常安详。

再往后走，有个房间没有门，里面堆满破烂和建材，靠墙有一张床，虽然被褥又黑又破，但显然有人睡。我妈告诉我，一个叫小李的年轻人，不到20岁，在附近流浪，有天晚上我妈遇见他在墙根冻得瑟瑟发抖，请他到破房间住一晚，后来干脆就留下了。我很不理解，但她说，“我一看见他就想到你，一个人在外面，可怜的。”这真的令人无语。他们对城市如此陌生，以为我去北京差不多是去流浪的？我还以为我奶奶问“北京有没有馒头吃”是开玩笑。后来我想，他们当然知道一个人去了北京并不代表流浪，但他们的孩子就未必了。就好像《乡下人的悲歌》里面，出身阿巴拉契亚山蓝领家庭的作者万斯，告诉家人自己考上了耶鲁大学时，家人问他，“你是不是假装自己是黑人了？”他们把自己放在了尘埃里。

大四实习的时候，我已经打算在媒体找一份工作。说起来很可笑，我学的新闻，但实习时才知道南方周末。隔壁宿舍另一位同学，高中时喜欢三联生活周刊，收集的杂志铺满房间地板，他去过三联编辑部，“朝圣”，但他似乎知道传媒业的状况，最终没有当记者。我最终留在了南方都市报，并在那里认识了前女友。她的父亲是某医科大学的校长，80年代最早一批海归博士，我曾跟她回去见父母，在夫子庙附近的餐厅吃饭，席间见到她的表弟，正在东京大学读书。令我知道双方家庭差距的细节很奇怪，她问我春节期间为什么走那么多亲戚，“我们不怎么走亲戚。”于是关于城里人的奇怪知识又增加了。

临近毕业时，我接到小姨的电话，我妈腿受伤住院，让我回一趟家。见我以为问题不大，她才说，我妈从麻将馆的楼梯上摔下去，昏迷住院，当晚就需要决定是否做开颅手术。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出主意，托关系也找不到。小姨发来颅内CT，前女友的父亲找到全省最权威的大夫，电话告诉我，“可以保守治疗，假如做手术，大概率会瘫痪。”他提醒我，不要听本地医院的，他们也许是为了解救。十多天后，我妈清醒过来，问起摔倒原因，她告诉我，她收留的小李走了，而且将她的牌客引到另一家麻将馆，那天上午她一失神摔了下去。她非常伤心。但后来，小李带着水果去看她。

后来我跟北京的朋友聊起过去的经历，被他们说是“小镇青年伤痕文学”，我无从否认。我只是感到，有很多人能过上普通的生活，父母安康，已经是侥幸中的侥幸。我从未写过这些故事，也极力不去回想、不去忿忿自怜，但总有一些时刻无从躲避。

有过一个特稿选题，写网络神曲，我在北京采访了一位“神曲教父”，艺名叫老猫，公司一处文化园里，装潢得红红绿绿，非常浮夸。老猫老师叫来了歌手王蓉，我很想开玩笑告诉她，“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污染了一代县城青年的青春。老猫带我参观公司，又播放了几首他的代表作。听到“哥哥哥哥你真坏，妹妹妹妹我想把你爱”，我简直吓坏了，想起了父母的麻将馆：寒假回家时，我在客厅搭了一张床板睡觉，早晨总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小杜，醒了？”一个瘦瘦高高的赌徒径直走进来，坐在老虎机前面开始投币，他每拉动一次摇杆，老虎机就播放一遍“哥哥哥哥你真坏”。真的是噩梦。

做特稿记者好些年，各种类型的题目都写过，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落魄的人，最好的好人，最坏的坏人，离奇死掉的人，侥幸活着的人，很多题目我非常感兴趣，也有不少只是应付，而感兴趣的那些，多多少少和阶层问题有关系。我忘不了陕北的一处山沟里，一位父亲见我第一面说的话，“唉我们农民嘛”。我很想劝他，你不要这么说。但没说出口。我能说什么呢。他难过的不是贫穷，而是他们被安置了一种身份，里面包含了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大家都忘记太久，因此变得特别合理特别平常，像地里长出来的似的。

我时常想，出于经验和情感，我完全应当变成另一种倾向的、愤怒的人，但出于理性，我不是。不过，这样的人，我在深圳三和的人力市场见到了许多，在清华大学也见过不少。他们只是沉默而已。



图片来自 [ZHENGFAN YANG](#) on Unsplash

月里，这些想法并未成真，但更令人气恼的东西代替了它们。

01

廉价旅馆

临行前我并非毫无把握，农村的生活经验至少不会让我轻易露馅，可一踏进三和人力市场，我知道此前的想象全错了。传闻三和大神三餐不继、精神萎靡，日子过得落魄，但他们实际上全然不是苦哈哈的模样：招工大厅的人群中，只有拖着行李的新打工仔才皱着眉、含着肩，生怕踩了雷似的，走路犹犹豫豫；真大神气定神闲，腆起肚子、趿着拖鞋，走路姿势带着四海飘零、天下我有的自在劲儿。

我也知道不应该压抑说脏话的冲动，但只能放在一句话的头尾作为感叹，“他妈的，一小时才 12 块钱，哥们有什么好日结没有？”我站在招工广告前，试着跟打工者攀谈，却发觉对方拿脏话当副词用：“*** 我今天 ** 去那 ** 工厂， *** 的中介 ** 跟我说不累，不累 ** 的 **！”表达效率虽然不高，但胜在情绪饱满。骂完脏话，他问我，“你刚来三和吧？”我支吾着说，“我来找我弟弟，他一年多没回去了。”

后来我才听打工者说起，三和大神不仅能一眼认出同类，甚至能透过衣着的表象，看出他有钱没钱。后者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基本都没钱。但为保险起见，在三和游荡时，我随身只携带身份证件、破手机和 30 块现金。

非虚构

卧底、小偷和赌鬼 | 废物俱乐部

杜强 | 非虚构图书馆

它是一种反抗，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
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反倒变得正当、强横

2011 年临近春节，为了给曾祖母上坟，我回到村里，在大路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王朗。自从去了北京读大学，我害怕跟他们遇见，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不对劲。

“你去广东打工了？”我问他。

王朗从袖管里抽出左手，做了个数字“8”的手势，见我没明白，又翻了面，“手指头没了，一根赔一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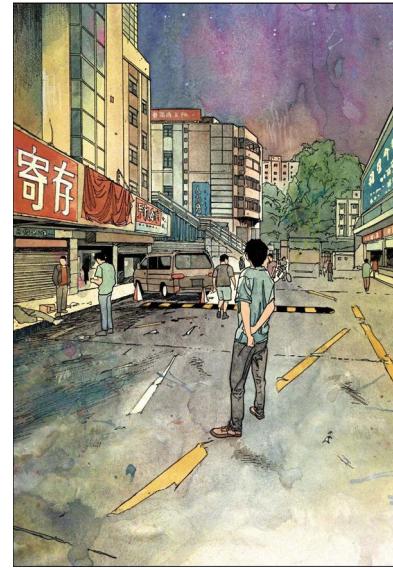
小时候，王朗为了打小霸王，常带着馒头赖在我家，一听见他爸的脚步声，立刻像只猫似的钻到床底下。他技术差，玩《双截龙》《超级玛丽》，三两下就掉到火坑里，只能坐在板凳上观看。可能他太专注了，每次到了凶险的关卡，总会情不自禁地脱了短裤，用黑乎乎的双手猥亵自己。

王朗初中没读完就出门打工，而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省重点，但始终无法适应，常常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一次期中考试，我在作文里说宁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种小麦和玉米，语文老师给那篇作文满分，但在空白处劝我，“千万不要回去。”

7 年后，我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跟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像模像样地生活着。我不再为过去感到羞耻，以为自己摆脱了出身的捆绑，成了“自由人”，可每当看到打工者的新闻，我总会想起王朗弄丢的三根手指，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

2017 年夏天，我从衣柜里翻出最脏的 T 恤和最破的鞋——一件优衣库的绿色短袖，胸前印着黑色的恐龙；一双匡威的新款，因为踩了雨水，只穿了一周左右——打算换上它们，到深圳去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非虚构作者的工作需要，但从准备行李开始，我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虚伪的嫌疑：我也许会抑制不住地觉得庆幸，心里有清理不干净的优越感，鄙视他们，矫情地以为自己负有某种义务，或者未料想到的别的什么。后来的一个



三和街头，游荡的大神。

一条三联路横穿三和而过，最北端的人力市场是打工者周游的中心，用以找工作或假装找工作，尽南边的景乐新村则是乐园，廉价网吧里人头攒动，饭馆老板从我背后挤过，捏着菜单和对讲机大声叫卖。网吧唯一的缺点是厕所不好用，肮脏倒在其次，总有人在里面洗澡或者干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沿着三联路走到最南端，中式牌楼的后面便是打工者落魄时的最后据点——龙华公园，石凳上、树底下躺满了人，但蚊子太多，入夜之后难以久留。

我返回城中村，找了一家廉价旅馆——店名就叫“廉价旅馆”。老板听清来意，夺了身份证件，“十五天。”随即领着我上了四楼，指着屋里的双层铁床，“上铺是你的。”狭小的房间里，一盏风扇在墙上吱扭作响，十二个铺位里躺着三个，两人呼呼大睡，醒着的一个正观看色情电影，手机里传来一阵阵娇喘声。我艰难地踏上铺位，才发觉臭味不仅来自屎尿横流的卫生间，床单也很久没洗过，沾满了棕黑色的污渍。

三四天之后，我自以为外形已经融入了三和：头发粘在一起，T 恤上透着大片的白色汗渍，膝盖以下被臭虫咬了十几处，这两天已经流了脓。但我仍然难以接近三和大神，我凑到打工者跟前，“哥们哪里人？”刚开口，对方扔了手里的瓜子皮，起身走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

每天清晨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爬起来，多半原因是感到嫌弃和不适。从窗户望出去，偶尔能看见睡在路边的打工者，这让我有些自责，随即又感到羞耻，总之不



三和街头，打工者睡在路边。

白天穿行在三和的人流里，我时常想起王朗，想起村里的伙伴，甚至有一丝迎面撞见他们的微弱念想。在我进入高中后，他们大都出门打工，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个个梳着亮亮的头发，熟练地弹一根烟塞到嘴里。村庄曾经是属于他们的——抽烟、打架，将摩托车骑得像匹野马，在高高的树顶搭建舒适的窝棚，牵着细犬、在雪地奔走一百里追撵野兔——所有时髦的事情都属于他们，但此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那画面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

我想象自己跟同伴行走在人力市场，在电子厂、玩具厂、酒店、快递的招工广告里费力寻找，询问中介工时和工价。但那情景太过浮浅，我无法知道当我们犹豫地望着对方时，是怎样的心情。

“要不要去富士康？”人群里，一个瘦瘦小小的打工者突然问我，“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是等死。”

02

秘密据点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小曾的打工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时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早该被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你们这群废物，活得跟狗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倒不是说他的见解有多发人深省，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垃圾”人渣“挂逼”这类称呼——挂逼，就是废了瘫了、完蛋操了的意思；而是说，小曾一身无可救药的毛病，最终竟能奋身一跃，离开这伤心绝望的地方，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你不去富士康看一下？”小曾问道，“管得比较严，干活不累，没事的。”

不过那时，我来三和前的豪迈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回答他说，“先等等看”。

“你脏不脏？”聊过几句，小曾又问我，他的一双迷离眼在浓黑眉毛底下眨巴着，说罢扯了扯汗涔涔的黑色T恤，把破了洞的下摆塞进因为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牛仔裤，“不脏的话可以睡在我那里”。

小曾领着我拐过巷口，钻进了一栋民房，快步上楼的样子像是赶去搭救什么人。一个星期前，他在城中村四处搜索，发现了这处满是瓦砾的楼顶，于是扯了居民的被子和床单，铺在楼梯间做了床铺，此时卷作一团，扔在一桶乳胶漆上。他走到平台，一脚踩在破烂花盆上，指着眼前的大片民房，“只要楼顶没人，都能睡，比路边好多了”。

瞅着这状如狗窝的地方，我不明白小曾问别人“脏不脏”是什么用意，可他始终一脸得意，叮嘱我，一定要记清楚是哪栋楼，要是他下午过了富士康的面试，此处秘密据点便交由我来继承。

出了居民楼，小曾问我什么打算，我指指马路对面，“到网吧转转”。他摆摆手，朝着公交站踱去。

城中村靠近三联路的一面，干净整洁，商店一字排开，可内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一捆捆线路像曲张的静脉似的搭在头顶，网线拐进网吧，电线接着饭馆，手忙脚乱地越过窗边的空调，又向着巷子深处延伸而去。三两个大神坐卧在墙根，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和饭馆倾倒的污水，清洁工正举着皮管冲刷路面，即便如此，暑热还是夹带着酸腐的气味四处弥漫。

大家乐网吧门口围着一圈居民，原来，一个打工者刚从里面抬出来，两位村中妇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聊着天：

“那天有一个靓仔在这里，饿得走都走不动，站在老板娘那里，口水都出来了，老板娘给他炒了一碗粉，他不敢吃，老板娘说不用钱，你拿走，我不看你。左看右看不敢。我说没得救了，还是自卑。”

“你看路上睡了多少个，我真想拿衣服给他们，脏兮兮的，你说父母生的，这是干嘛？”

“我拿了十块钱给他，他不敢要，问他怎么了，说东西掉了。”

“晚上拼命上网，白天去找事情能有精神吗？（打工）回来的时候靓靓的，从网吧出来都跟鬼一样。”

同情心抒发完，她们中的一个转身回了网吧，另一个继续在路口吆喝起旅店生意。

网吧少有冷清的时候，即使下午时空位也不好找，我在角落的电脑前坐下，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左边的大神操纵着英雄在草丛里飞来蹲去，右边的家伙正旁若无人地浏览色情网页。



深夜在网吧里玩游戏的人。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小曾。“回来了？面试没过？”

“他妈的。”他咒骂着打开了电脑。那阵儿龙华富士康正赶着造iPhoneX，缺人，有手有脚就能进，中午跟小曾一起去的大神总共十七个，蹭顿饭走了十五个。他狠劲摁着键盘，说，妈个逼的，老子还没干活先欠中介两百多，什么体检什么路费，干，拿了身份证老子就跑了。

他新开了一局《英雄联盟》，拉上我一起打，起初场面很不顺，队友很快点了投降认输，小曾自言自语地算了算，“不要放弃，我们能赢”，他瞪着屏幕，手指飞快地敲着，冲我大喊大叫，逆转获胜的一刻，啪一声摔了鼠标，“爽不爽？！”

“走，出去抽烟。”小曾推开椅子，走到吧台要了两根“南京”，一根五毛，出了门靠在电线杆上。马路当中车来人往，像一架兀自运转的机器，精确、冷酷，无需谁来操心。小曾默默地抽烟，情绪似乎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今天又废了”。

03

龙城派出所

两天后的晚上，我刚脱了短袖铺在床上准备躺下，小曾发来信息，说一整天没吃饭，觉得自己很没用，想死，此刻正站在楼顶。

我赶忙起身，拎了包子和矿泉水，找到小曾叫我“千万记得”的居民楼，走上漆黑的楼道，看见他瘦瘦的影子站在楼梯间门口。

“不行就回家吧。”我劝小曾。

“回家？赚不到钱。”

“赚不到钱的人多了，不用成天这样。”

“回去也没用，过日子而已。”小曾说，“我哥坐牢了，出来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去干大事了。”他的哥哥小时候在乡里贩毒，后来在市里，总之赚了很多钱，一沓沓钞票摆满一整床。哥哥被抓后，他怕受牵连，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去过武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温州，什么活都干过，最后落在三和。家里人知道他挣不来钱，两年多没联系，小曾也无所谓。

“小钱很容易搞，”他嚼着包子，脸上鼓出一个疙瘩，“在一线城市好多人说带毒，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心，要是逼到绝路，肯定就去干了。”

就这样，小曾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我，虽然我不能投桃报李地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经过那次聊天，我们从萍水相逢的打工者变成了“朋友”。

往后的十多天，我们一起通宵上网、骑着没有坐垫的共享单车四处晃悠，他教我三和什么活能干什么活不能干，结论是都不能干，还告诉我村里的姑娘不能娶，因为没见过世面，QQ炫舞上的妹子可以约出来，但嘴巴得机灵。有一天中午，他涨红了脸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能不能先借我10块钱吃饭，回头还给你。”

我非常珍惜跟小曾的关系，那是一种非常明确、直接的“我对别人有用”的体验。当然，

我也疑心自己其实只是享受那种“强于”别人的感觉，但这念头并没有很频繁。

一天下午，小曾坐在极速网吧门前，指着另一个身穿蓝T恤、眼神飘忽的打工者说，“这屌毛跟我在龙华汽车站认识的。”那天晚上小曾无处可去，在车站醒来时，有好心人扔了两块钱，他买来矿泉水，顺手分给了身旁的家伙。

“哥们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对方迟疑了，当我打算聊点别的时，他才嗫嚅说，“张伟伟”。

小曾从椅子上起来，“就这里。”他抬起左脚，指着一坨黑乎乎的止血棉。

前一天晚上，有两个落魄的三和大神向小曾求救，声称一整天没吃饭，想去干活，但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鞋。小曾领着他们上了天台的秘密据点。天亮后，小曾还在睡着，楼道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响声，他惊醒后摸摸口袋，立刻光着脚追下楼，但跑出楼门没多远，脚底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瞬间血流不止。

手机被偷后，小曾报了警，不过案由是抢劫。“从今天开始，对天发誓，我不会救助一个不认识的人，警察对我说，尤其是穿得脏兮兮的人，你们要小心。”临走时，警察见小曾可怜，给了他200块钱应急。

作为后见之明，我发觉小曾非常渴望友谊，甚至不惜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来交换，对三和大神来说，这不寻常的举动有时显得很仗义，有时又很愚蠢。但小曾的热情并非毫无目的，每认识一个打工者，他照例都要问问对方，“要不要一起进厂？”他说，“一个人跟木头一样干活，真没劲。”

小曾一瘸一拐地走着，决定到人力市场去看看行情。张伟伟骑着只有右边脚踏的小黄车跟在后面。“三和真不能呆，”他说，“越过越死越过越死，我来之前还没这么懒。”他以前在惠州干催债，给欠债人家寄棺材，一天挣几千块，后来遇到黑吃黑，这才跑到三和，两个月来几乎没怎么干过活。



人力市场一角。

人力市场里熙熙攘攘，打工者一圈圈地围着工头，迟迟拿不定主意。下午时分只剩下快递、酒店还在招人，小曾说：“要不先去看看？”张伟伟一脸苦相，快递他干过，“分到大件都是重的货，一箱怡宝，一箱酱油，还有贵的红酒，打烂要赔钱”。与其累得要死，他宁愿老老实实地瘫痪。小曾有些失望，“妈的，又过一天。”

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一辆小黄车，沿着三联路朝着龙华公园的方向骑去，经过空旷的工地和巨大的广场，经过神情匆忙的深圳市民，拐进不知名的道路，在狭窄阴凉的巷子里一遍遍摁着车铃，当回到大路时，傍晚的凉风已经吹了起来。

我回忆起高中三年级，在备考最紧张的4月，我也常常骑着自行车，独自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时县城还很凋敝，最高的大楼仅有13层，却起了“国际贸易中心”的浮夸名字。那时我仍旧跟城市毫无关联，未来也模糊渺茫，却也由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在深圳街头再次体验到那种情绪时，我试图搞清是怎么回事，但毫无头绪。

路灯亮起的时候，小曾、张伟伟和我徒劳无功地回到网吧，还没打开电脑，警察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小曾！”

原来，“抢劫者”跑掉后，在天网下窜来窜去，走得气喘吁吁，但到了晚上就被抓获。

小曾坐在警察电动车后座，去了趟龙城派出所，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哈哈哈，那两个傻逼跟我道歉，丢人啊，他们要关几年，三年起步。可恨至极，当时还哭了，跟老子说对不起有屁用，有人让我打我没打，下不了手，我说，懒得跟你说，*你妈的*。

04

销赃废品站

台风正从海上赶来，深圳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五天里晴雨无常。

自打认识小曾之后，我床睡得坦然、脏话说得顺溜，走到大街上还时常光着膀子。更加融入三和大神时，粗鄙不仅可能，甚至变得必需——它是一种反抗，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反倒变得正当、强横，似乎某样东西终于得到了维护。

临近中午，我照例去找小曾，他蹲在便利店的台阶上，看一个打工者正在求签问卦，“算一算我有没有牢狱之灾。”小曾抱着胳膊蹲在一旁，捡起地上的铜钱，捏在手里看了又看。

算命先生搔了搔花白的头发，他在三和闻了太多马路上的烟尘，也见过太多迷茫的眼睛，为了改变命运，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据他说，曾有人花十万块请他挪动院里的一块石头，也有人听了破财免灾的建议，将100万现金抛撒在附近的河里。他收起铜钱，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说：入室盗窃的劫数已经渡过，发财上岸也指日可待。

打工者将信将疑地付了钱，仍是一脸茫然。仅仅半年之前，他还是央企的员工，却迷上赌博，扔下巨额债务逃到广州，跟同伙潜入民宅，盗走两万多的财物，从此活在惴惴不安中。“真的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告诉我们，本打算今天卖了血，到关内送外卖，但没有找到门路。“卖吧，我卖血就会死，”小曾说，“我没有多少血了。”

五天来，小曾花光了警察给的200块钱，这才忽然意识到，他需要一笔钱才能进厂，否则没法挨到发薪水的日子。眼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他饿得头晕，心脏疼，疑心自己快死了，可他既没带毒，也没干活。三和的确有这种魔力：让人的意志变成一滩烂泥，不管是雄心还是恶念，统统无从施展。他用最后两块钱买了包子，递给张伟伟一个，一起到龙华公园喝水。



睡在公园凉亭里的三和大神。

公园的石凳上躺满了流浪汉，十米外的小广场断续传来提琴声，居民在下象棋、练歌曲。张伟伟笑哈哈地拍了视频传给我，画面里，小曾躺在凉亭中，饿得睡不着，嘴里念叨着，废了，我们废了。他突然跳起来，趁四下无人，凑到一辆电动车跟前，抓起电瓶猛地一蹬，抱在怀里往城中村跑，“快走！快走！”

我放下手机出了旅馆，楼下的巷子里，几十个村民堵在警察身前，齐声喊着：“我们要生存！”政府受不了三和的坏名声，打算再次清理整顿，规定网吧不许通宵、民房不能群租。“你们说村里有逃犯，我们可没看见！”村民情绪越来越激动，撺掇围观的大神往前冲，小曾和张伟伟从公园回来，跟我站在一伙，嘿嘿地笑着，哪里指望得上。

小曾提着电瓶，领我们路过超市，他提议进去看看，也许有食品可以试吃。在三和久了，突然走进超市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视线里一片红红绿绿的色彩，头脑不断蹦出“太多了、太多了”的白目，货架摆的是什么完全顾不上看。试吃食品除了半碟面包屑外，什么也没有。

超市里人多手杂，小曾突然兜起三个西红柿，冲我们使眼色。他溜进人少的货区，双手捧着西红柿，三五秒吃完，鼓着嘴巴盯着我。我感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考验，于是狠狠心，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像有意把汁水涂在脸上似的迅速吃完。我从未想过成为小偷会如此轻易和自然而然，扭过身看时，张伟伟正涨红了脸，始终下不了手。离开时他遭到小曾一通数落，“不甜，不然我再吃一个”。

从公园东面的巷子朝北拐，在龙济医院路口左转，小曾终于找到了销赃的废品站。电瓶上了秤，26斤，一斤3块。小曾又重新拥有了钱。他递给我10块，“前几天借你的。”说罢痛快地跨上小黄车，骑到巷口时又突然停下，“要不要避孕套？计生服务站可以免费领。他笑哈哈地凑到自动售卖机跟前，领出来拿在手里，冲着路过的女士使眼色，“哎，要不要？10块一盒。”

小曾提起女性的事情，来来回回只有那么一件：“上回胖哥请我去嫖娼，在沙尾，80块。”但渴望从未消失，他时常望着走过的年轻女性，痴痴地自言自语，“女孩子身上怎么那么香啊？”

回到人力市场，小曾请我和张伟伟喝挂逼啤酒、吃挂逼香蕉。哥哥贩毒的那几年，小曾承认也跟着做过，“那时候我们一起，超级嗨，什么事都不想，就是抽烟打牌看电影，那日子过的。妈的。”小曾一脸苦涩，没喝完的酒一甩手摔碎在墙角，白沫泛起又迅速消失。

临近傍晚，更多的打工者来到人力市场，工头们又开始叫卖，“快递快递，14一个钟，先吃饭后干活。”

小曾站在告示板前，看了一阵，犹豫着转过头，“去不去？”

“很累，六个小时啊。”张伟伟不大乐意。

“先看看，分的（岗位）好了就干，先吃个饭，不好就不干。”小曾盯着我们，眼神里几乎是祈求的神情。

在当时，我并不能体会他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直到后来小曾与我们决裂、破口大骂，我才明白他经历的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种斗争：在一片灰暗、令人作呕的气氛当中，你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对手是谁，自我的意志太过脆弱，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你所能寄望的仅仅是一丝脆弱的人间的瓜葛，而它又时有时无、稍纵即逝。

张伟伟和我站在小曾对面，谁也不说话。伟伟并非懒得干活，而是害怕有钱——身上超过500块，他会像毒瘾发作似的浑身发抖（并非比喻），因为金沙赌城的入场门槛是500块。我怀疑张伟伟分不清哪个更令他痛苦——连续两天挨饿，还是无法自控所引起的强烈悔恨。

小曾有些生气，“就去吃个饭，懂不懂？”

“你不做凭什么吃饭？跟修车（嫖娼）一样，修完不给钱？”张伟伟一点不示弱，“你没遇到狠的，吃完不做事，揍你一顿。”

这是小曾和张伟伟第一次爆发矛盾。

05

创维厂面包车

卧底采访的中途，朋友来了深圳，得知我在三和的落魄经历，请我到五星级酒店住一晚。

我可以放纵自己的虚情假意，告诉朋友，“感觉自己背叛了小曾和张伟伟”。可实际上一点也不，那点摇摇晃晃的心思在走进自助餐厅时就垮塌了。我真的很享受。食物的享受倒在其次，重点在于告诉厨师“现烤的牛肋排一份太多，只要半份”时，那点不自我观看的诚心诚意。微信朋友圈里也一如往常，朋友们晒出美食、画展，诉说清淡的焦虑，甚至琢磨逃离过于精致的生活。一位作家朋友收留的流浪狗咬坏了宠物龟，他打算花500块钱修补龟壳，没过两天，又玩笑说，要为乌龟举行一场葬礼。

等我回到三和，张伟伟不知去了哪里，留下小曾独自坐在人力市场的门店里，跟大神们一起观看香港黑帮电影。

前一天下午，他已经坐上了电子厂的大巴，临近开车一刻又跳了下来，“妈的，我都精神崩溃了，招去又回来，招去又回来。”上车之前小曾想拉上张伟伟，质问他，不干活怎么上岸？

“昨晚又叫他去酒店他不去，他要是去我分分钟跟他去，妈逼，就他不去，他不去老子心里也不想去，跟着他挂逼。”

几天来小曾已经对张伟伟充满怨恨，后者一次次地以“太累”“黑厂”为由劝阻，小曾终于怒气冲冲地说，黑都要干，累也要搞，我想吃苦，我再也不能听别人指方向。他指责张伟伟害了他，“我相信我是正常人，不会真的死在三和”。

正在播放的黑帮电影里，小弟阴谋篡位，被老大训斥，一阵压抑愤怒之后，突然抽出刀杀死了大哥。大神们被剧情震惊，瞪大了眼睛，小曾自言自语地说，“再不走

就废了。”他挪到人力市场的窗口，交了身份证。“穿无尘服无所谓，干七天，然后找正式工干，不然连水钱都没有。”他扭过头问我，“去吧？一起去，一天一天在这里跟狗一样。走吧，不要犹豫了。”

“走！”他作势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去吧。你不去吗？”

他见我不作声，又说，“没办法啊，我只能去了。”

看到小曾的表情黯淡下去，我心里感到难过。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一个朋友、获得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我并不能成为那样一个人，只能欺骗他，“我要回家去了。”距离上车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担心小曾随时又要放弃，而且明白那最终意味着什么。他坐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



三和人力集团，无所事事的人们。

人力市场永远是同一幅景象。无所事事的人群里，一个半裸的胖子蹲在小黄车旁边，一次一位数地试着密码锁，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天空突然飘起雨，还没等打工者躲到凉棚下，雨又停了，招来一阵阵咒骂。

小曾转过头，对我说，他在楼顶的窝被人端了，昨天下雨时他去拿行李，被子和床单不见了，没有那个他没法睡觉。上次去他的秘密据点时，小曾说谁要是敢把他的东西扔了，“妈逼老子弄死他”。那时我就明白，那处狗窝对他来说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老是看见三和大神，看腻了。”小曾扔掉了烟头。要去的创维厂开始点名，小曾答了一声“在这”，跟着老太婆朝马路的方向走去，“走了，回头跟你联系”。

他抬起脚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面包车，刚坐下时司机问他，检查屏幕噪点伤眼睛，没问题吧？身旁的大神告诉小曾，这活儿他干过，没几天眼睛就受不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小曾问。大神有些不耐烦，“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那一刻小曾的表情很奇怪，不说话看着我。我在脑子里琢磨，想找些话说，但也没什么话可以告诉他。汽车开动了，拐过铁门，消失在三联路上。小曾的离开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三和也许永远都会是它本来的样子。

06

台风掠过奇迹之城

台风登陆的晚上，政府担心三和大神睡马路有危险，开放了龙华小学给流浪汉睡觉。我乖乖地站在街道办领导旁边，表情僵硬地拍了照片，领上矿泉水和八宝粥，穿过地上明暗错落的小水洼，进了篮球馆。

北面靠墙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近百个大神，张伟伟看到我，招呼我躺到他旁边。几天前他发了信息给我和小曾，声称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想死，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如果当晚死不了，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他好歹进了厂，可是分配到了“飞机拉”（注：快速流水线，好似飞机拽着跑），他干不过来，零件堆了两层，拉长看到了又开始大骂，张伟伟忍不住，一把掀翻了桌子。前女友知道他落魄，竟然打来1000块钱，不过很快又被他赌没了。

“小曾请你吃饭了吗？”张伟伟问我。

“没有。”

张伟伟搞不清楚小曾这是怎么了，只是觉得他“不够意思”。

干了几天活之后，小曾在QQ群里发来小视频，他只穿条内裤跟工友躺在床上，笑哈哈地闹腾。工作确实不轻松，来了好几批人几乎都走了，但小曾能坚持。去超市偷西红柿时他只有85斤，现在长到了91，要是再过一个月没有95斤，小曾说

他就吃屎给我们看。

可是他对三和大神的怨气还没消，说，“我在三和给那些狗逼带坏了，天天去找工作，这不做那不做，把老子拉下水，带我玩，给我吃，弄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由于请过小曾吃饭，我怀疑他骂的人里也包括我在内，但确实为他感到高兴——至少这一次，因为我也没多少把握他不会再回来。

篮球馆外的风声越来越大，场内的大神鼾声四起。汽车从东面的马路驶过，一道光晕扫过窗户，照亮了顶棚上装饰着的各国国旗，我们恰好每人躺在一面旗子的正下方。西班牙说自己曾在殡仪馆洗尸体，20天赚了一万六，半夜时还听见过嘎嘎的哭泣声，不过这样的好工作不容易找。蒙古国说，我们好好聊聊天，培养一下兄弟感情。我作为英国，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岸，蒙古国接了话茬，为什么要上岸？我觉得有一天过一天挺好。

我躺在地板上，想起小学六年级时，城里老师来支教，女老师姓童，穿着棕色的风衣，跟我们又黑又瘦的王老师简直天差地别。早晨交作业，看到同桌满是冻疮又脏兮兮的爪子，童老师做了个奇怪的表情，我不能理解。此刻回忆起来，其实只是嫌弃，我想当时自己只是没有胆量理解。支教结束，她简短地告别，“你们好好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黑瘦的王老师回到讲台，她说，“童老师骗你们的。”

临近十二点，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天气预报，台风正在登陆。”轰隆隆的雨声在球馆顶棚响起，大神们安静了下来，陆续睡去。在台风掠过奇迹之城的夜晚，这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灵魂，暂时找到了一处栖息之所，等到明天来临，他们也许还有事要做。

* 张伟伟、小曾均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16日“谷雨实验室 - 腾讯新闻”。

插画：左马 / 摄影：冯海泳。



杜强

媒体人、非虚构作者。曾获得2019年瑞士“全球真实故事奖”、“人民文学之星”等。代表作品《太平洋大逃杀》、《废物俱乐部》。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Jimmy Jin](#) on Unsplash



深圳三和地理位置示意图。

尤其擅长甜言蜜语，连服务他的小姐也乖乖地交出证件。不过，此时他正盘算着偷渡去缅甸。

“唉，现在三和不好玩了。”石头大哥叹口气，“以前这里都是车（站街女），‘哎老哥来玩啊’，还有义务的呢，‘走，姐赏你一炮。’”

“有这种好事？”

“红姐啊，你不知道吗？”他瞪圆了眼睛，仿佛不知道红姐是件了不得的事情。“得了艾滋病，死球了。”他说，可要是红姐还在，他也敢找，“人生不过一死，什么都要试一下。”

石头大哥收了手机，把背包从轮椅扶手挪到腿上，“连红姐都不知道。”他一边嘀咕，一边摇着座驾，消失在三联路的人流之中。

三和附近人来人往，行走其中，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是觉得厌恶，各种叫人绝望的怪事都发生在这里：出租屋抬出一个人来，盖着白布送上救护车，喊叫着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打工者跟中介大打出手，疯了似的敲击人力市场的玻璃，动脉割破，鲜血洒了一地，起因只是工钱短了两块；一个自称“正宗三和大神”的家伙每逢挨饿，便四处找人打架，声称饿红了眼容易干坏事，只有痛痛快快打一架才能排遣。

就在城中村东面，一个人称“皮裤哥”的打工者，悄没声地饿晕过去，舒舒服服地摆成一个大字，下巴磕在水泥地上，骨头都快碎了。之所以十几天不吃，据他说是因为没有遇见慷慨解囊的好心人，旁人问为什么不去翻宝箱（垃圾箱），他恶狠狠瞪一眼，“关你什么事？”

连续上网打游戏不挪窝，有人坚持了三个月。由于三和有不打听姓名的潜规则，一律“屌毛”相称，所以只知道那“屌毛”从工厂出来，饥渴地钻进网吧，昼夜砍服，等到钱财耗尽、行李被网吧老板扔出门，他已经头发打结、浑身酸臭，走在大街上精神恍惚如大厦崩塌。为了在网吧多赖上一天，我见过不止一个人卖身份证、卖血、卖捡来的一片枕头，偷盗、抢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至于三和大神的数目，有人说几千，有人说两万，人群进进出出，即使有人想要统计也只会束手无策。但城中村 80 多栋六七层的民房，二层往上都住满人，10 平米的房间摆着 6 架双层铁床，公园、街角、网吧还有想象不到的角落也塞满了人。



三和街头聚集的“大神”们。

我想知道三和大神如何一步步落到这般田地，只不过，他们愿意跟你聊一切事情——坂田和沙尾哪里嫖娼更划算，怎么把一坨大便扔到主管脑袋上，特朗普的头发究竟是不是真的——但从来不愿意聊自己。我低价将身份证转卖给一个打工者，追在身后攀谈，他猛地转过身，作出凶狠的眼神，“你别跟着我！我不在现实里跟人说话。”

“你知不知道红姐？”我换了一种方式接近他们，打工者立刻变得兴致勃勃，“知道啊，

非虚构 三和女神红姐和她的男客们

杜强 | 非虚构图书馆

“他们哪怕不在这里流浪，
也会去别的地方。”

01

精神鸭

在三和人力市场的拐角处，石头大哥四仰八叉地坐在轮椅上，他腿部以下没知觉，可模样看起来只像是走累了、顺手找地方歇歇脚。每当有人从身边经过，他便像摊开扑克牌一样拿出十几张籍贯各异的身份证，一边兜售，一边评判起各省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小姐的质量。

卖给我一张证件后，他开始指点迷津，年轻人，我看你长得还可以，要不要去做鸭？见我犹豫不决，又教授门路，“只跟富婆聊聊天也可以，嘴巴甜一点，忽悠得她神魂颠倒。”“那就是谈恋爱啊。”我说。

“太俗了，就是精神鸭，那才是赚大钱的。”他正赌着码，右手颤巍巍地挡着手机屏，好让开奖数字挨个显现。“深圳是个空虚的城市，懂吗，那些人空虚，所以你有钱赚。”

说话时，附近的廉价网吧和饭馆刚刚点亮了招牌，灯光照射下，打工仔、赌徒、酒鬼和出卖身体的男小姐聚集在街巷里，一脸萎靡的神情。

龙华区的这片城中村紧挨着三和人力市场，从南到北不过 300 步，在盖楼跟养蘑菇似的深圳，它不起眼的程度跟不存在差不多，不过却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成千上万被称作“三和大神”的打工者，热爱这里自由堕落的生活，把它当作心灵的港湾”。要论空虚，没有人比得过他们。

“你绝对可以，我好心跟你讲。”石头大哥劝我，这社会现实无情残酷，没一技傍身不行。他几年前在家乡欠下 200 万赌债，从福建一路嫖娼到新疆，又从新疆一路嫖回来，在三和多年，他从来没工作过，主业是赌博，副业是倒卖身份证银行卡，

死了。”太老了，没搞头。“别说知道，我还搞过，给了 30 块钱，你别说，心肠真挺好。”

据他们讲，三和大神的鼻祖、传说中的红姐现在很难见到，年轻的时候，红姐还叫阿红，后来年龄大了出来站街，她像侠女一样从人力市场走过，后面呼啦啦跟着几百人。红姐人好，不挑客，不少钟，真没见过这么仗义的人，不像老王，既是工头又是鸡头，带大神去打工，赚了钱回来再介绍个小姐一条龙榨干，只五分钟就赶你出来，太黑了。

早年三和附近有不少站街女，2014 年警察围了老巷子，站街女跑光了，只剩下红姐。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太久没见过女性，眼睛都绿了，感觉红姐特别靓丽。可不知从哪天起，红姐也不见了。有人说，红姐赚够钱上了岸，嫁了好人家，还买了海景房，跟三和的垃圾们永别了。也有人像石头大哥那样，以为红姐得了艾滋，叫当年跟她好过的赶紧去查查。

后来历经周折，红姐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露了面，她穿着白衬衫、黑短裙，端庄地坐在椅子上，语气冷冷地问，“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

“我知道，我听他们讲过。”

“你直接说出来，没关系。”

我意识到她的用意，可也没空琢磨，“用我们的话讲，您可能是提供性服务的。”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神情像瞅着一个呆子。之后的几天，她用远为粗俗的词语形容自己，又不断提起“尊严”这回事，前一秒还冷静自在，后一秒就红了眼、扯开嗓门，“我不不要脸，因为我就是个最不要脸的人，我连饭都吃不上了，我要脸干什么？！”

02

猎物

按红姐的意思，她尚且保有尊严的时候并不算久远。四年前她在五星级酒店打零工，靠着婚宴上的红包攒了不少钱——有客人给的，有她偷偷拿的，两者界限也许不明显，她心理没负担。眼看攒够了五万，她却迷上了赌博，很快一无所有，恰巧又跟酒店起了冲突，工作就这么丢了。

可为什么要赌呢？哎呀，她说，不赌的话永远没机会。

眼看身无分文，红姐只能回到三和，她一出现，打工者立刻凑过来调笑，“红姐你结（工资每日一结算）啊，是不是日完就结？”红姐豪放，不会拒绝他们的风流话，突然一个小伙子走上前，“姐姐我给你一百块钱。”红姐有些好奇，也有些荣幸，伸手接了。周围人开始起哄，把他俩像送入洞房一样推来搡去，没一会儿警察赶了过来。

想到可能要在派出所过一晚上，红姐哭了鼻子，警察指控她站街，红姐也没法反驳。离开派出所时，警察谴责小伙子，可越是咒骂，他越是寸步不离地跟着红姐。

那晚之后，他们竟住到了一起。听小伙子说，哥哥开了电子厂、茶庄、酒楼，家里赚了几千万，但那指的是继父的家庭，他独自一人待在三和。红姐感到小伙把自己像妈妈一样用”，甚至打算带她回家，说家里人怎么看他不在乎。一个月后，红姐逼走了这个 23 岁的年轻人，走时他哭得很伤心。

自那之后，站街这件不光彩的事她一直做了下来，“可能老天爷要让我吃这碗饭吧”。不过，命运的安排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红姐透过男女之事这块半透明的玻璃，看到了三和大神们无能为力的灵魂，甚至也更加看清了自己。

从业后红姐常去网吧“找猎物”，一排人东倒西歪全睡着，跟“太平间尸体”没两样，大半夜精神了、快活了，杀啊砍的，要买装备要喝血，她站在那简直多余，打工者大多没那雅兴，有也是看看 A 片，抽空去厕所打个飞机，大神说了，“打飞机也只是想找个事做。”

他们成月不出网吧门，经常迷迷糊糊打起来，冷不丁就动刀子，猝死的也不少，鼠标摁着摁着不动了，老板一摸才知道断了气，父母买了花圈跑来，天天吹喇叭，要毒网吧还儿子的命。也有打工者知道身体不行了，去城中村开个单间，过段时间躺平了被抬出来，红姐撞见的就有两回。说起来有些残忍，但猝死只是三和最稀松平常、最无害的死亡方式。

早几年，街巷里还有二三十个站街小妹，最小的只有 16 岁，“到了晚上，鬼哭狼嚎的”，红姐说，有一晚她住在旅馆里，听见铁棍声和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后来听说是欠了嫖资遭到毒打；一个站街女死在出租屋时，全身缠满一圈圈的胶带，身上有十几处刀口，行凶的也是一个欠了嫖资、被打坏了内脏的打工者；还有人在玩牌时，因为一点点输赢，突然抽出刀子，剁掉了对方的手掌。

如今情况大有改观，但红姐仍然小心翼翼地行事，做这行，“人家也算是给了点面子，你在眼皮底下做什么，别人心里清楚”。除了规矩，还有更多恼人的事情等着她应付。龙华公园里出没着两个酒鬼，醉时跟死尸似的躺着，醒时总来纠缠，“红姐，拿 10 块钱给我，我去买酒喝。”“红姐，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红姐不敢招惹，给了钱，好心相劝，“你不要这样喝，会没命的。”后来一个酒鬼被警察带走，另一个烂醉时摔了脑袋，拉到医院时已经断了气。

公园是打工者无处可去时最先想到的地方，但却是个不祥之地，除了酒鬼，红姐还在同一棵树下撞见过三个倒毙的大神。在公园睡觉时，如果身上还有财物，手机或者身份证，打工者就用塑料袋包好，在花园中挖个坑埋了，早上起来再挖出来。



三和龙华公园一角，流浪者们拿着手机刷着各种招聘信息，但通常都是一无所获。

红姐时常在公园遇见男同性恋者的聚会，大姐、二姐、三姐坐在一起织毛衣，老四看到红姐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我美瞳你看还行吧？”他曾告诉红姐，以前饭都没得吃，自从做了男情妇，房子租了，金戒指也有了。红姐套过话，知道他并非真正的同性恋，但丧失了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附情人过日子。

大部分三和大神当然渴望接触女性，红姐知道这点，但平时遇见了，他们只顾着翻白眼，不敢像正常人一样有眼神接触。红姐每次在人力市场出现，大神们聚作一堆，掰开脑袋想看看一圈围着的究竟是谁，她简直“比范冰冰还范冰冰”。可当她主动跟大神说话，对方立刻就变了脸色。即便发生关系，红姐说，“大神更喜欢屁眼，不喜欢阴道，因为 * 了阴道女人骗他一辈子。”

我得承认，红姐讲述的事情超出了料想，在我的认知里，性之于人，既是最初的动机，也是最后的尊严，而三和大神的情状，已经不是简单的堕落与绝望，反而证明了红姐依据诸多事实得出的结论——那是“人格的毁灭”。

如今红姐极少在人力市场露面，但还时常接到大神的电话，与我聊天时，她的手机一次又一次响起，对方先是沉默，隔了很久才怯怯地问，“在哪里？”红姐挂断电话捋了捋头发，她有些不好意思，“可能你有人缘，平时就接一两个电话，今天突然这么多。”打来的电话有的找服务，有的只是聊天，说挣不到钱、娶不到老婆很苦恼，

红姐就安慰他，“你只要努力，只要好好干，有钱了肯定能找到。”

红姐心肠好，愿意说些宽心话，可是，十多年来她自己也先后十次想要换个活法，去过武汉、厦门、陕北、鄂尔多斯、上海，受尽辛苦，最后一次回到三和后，再也不敢轻易离开。十年前她经常见到的大神，十年后还在这里。离开三和其实很容易，可要是落到精神瘫痪的地步，就得有长没短地挂着了。对此，红姐自己也深有体会。

03

女将军

如果时间一格格地倒转，龙华区的高档写字楼和成片的工厂会像积木一样悄然挪走，不出十年，便只剩下遍地芦苇和铁皮屋，回到“一片荒岛”般的景象，而天南海北鱼贯而来的打工仔也会比如今更加显眼——他们个个怀抱凉席、提着水桶，像蚂蚁一样聚在三和人力市场附近。

红姐记得刚来三和时，局势更加混乱，明目张胆的抢劫者夺了她的财物，逗乐一样喊：“来追我呀！”红姐追不上，气得直掉眼泪，可她说，那会儿“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28岁时，红姐被丈夫毒打一顿、扫地出门，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涯，小小的县城连洗碗的工作也没几个，她只能做了舞女，在歌厅录像厅一坐一整天。独自在外时，她总看见窗户上闪着白影，梦见小小的棺材装着7岁的儿子，但栖身之处不好找，“哪怕是糟老头，也要和他睡，为了一张床”。

红姐也有过好运气，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兴冲冲地带回娘家，但大哥摔了碗，咒骂她，“离了婚你不要再回来！在她的家乡，人生的体制远比想象的顽固和保守，在大哥眼里，如果不领了结婚的红本本，她带回去的就只是嫖客、下三滥。

伤心绝望的人，有时会将自己像颗石子似的扔出去，好碰碰运气。红姐离开家乡打工，磕磕绊绊，终于落到龙华区臭气熏天、墙角发霉的出租屋里，狭小的房间头挨头、脚挨脚住着十几个男女，但大伙儿你说我笑，路上遇见了，还会慢悠悠地问一句，阿红去哪里？红姐觉得安心，她甚至认了几个好姐妹，临别时抱头痛哭，约好常联系，只是后来没了踪影。

虽然三和混乱而凶险，但红姐不仅不怕，“还把这里当做家”，她声称在三和找到了归属，“找到了活着的证据”。同样重要的理由还有，工厂里男工多，她觉得有盼头。

然而，孤身一人、没有同乡照应，工厂对她并不友好，“主管的嘴巴跟孙悟空似的，扁得人眼泪下来”，红姐受够了气，冲着他大喊，“你这王八蛋，我不怕你！”后来换的工作多了，她疑心这根本就是一种管理风格，专找老的丑的手慢的，杀鸡儆猴给其他工人看，而她总是不幸中招。红姐不敢再进厂，一手创立了三和打零工的模式，最多时两个月竟赚了三千。

“感觉好刺激、好舒服。”她手舞足蹈地说，就像流浪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了大衣、突然当上了主席。有时日结也懒得干，一群人进厂“干跳楼”，关铡刀、拔电线，讨要精神损失费，红姐也跟着闹，她想一想，“以后还是个穷人，又不可能让我做一辈子，今天我也可以叉叉腰，也能出口气。”

在红姐风风火火像个女将军的2010年，龙华富士康连续发生了14起员工跳楼事件，据大神们说，自那之后，三和开始了它的“黄金时期”，聚集了越来越多只愿做日结的打工者。三和轻松快活，“日结一天阔（可）以玩三天”，差不多成了一句暗号，在一众伤心又懒惰的打工者中间流传。

后来接受过红姐服务的人当中，我认识了打工者宋涛，也就是付了30块钱、觉得红姐心肠不错的那位。“那会儿没什么女人，全是男的，全是光杆司令。”当时宋涛看到红姐，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事后又有些刻薄，认为红姐薄利多销，没什么智商，而且说实在的，太老了。

宋涛来到三和是在2011年，那时他惹了一身网瘾，揣着最后几块钱连夜赶来，下车时看到一排人躺在人力市场门口，个个扯个没完，说一时落魄，还告诉他“你不要怕，明早有日结”。早晨醒来，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堵得老巷子水泄不通，工头大喊一声，几十人跟着他，钻进大巴、送上工地和流水线，赚了钱再回到网吧接着瘫痪。宋涛惊呆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来的地方。

和我走在城中村时，宋涛的表情很是凝重，好似望着被大火狠狠烧过的老房子，他指着一家网吧昏暗污浊的内部，“就那个地方，早上起来有个人不动了，没气了。”

路过双丰面馆时，里面飘出一股多闻两下便要作呕的香味，老板娘从水桶捞出泡

得发胀的猪肉，蹲在地上剁碎，头也不转扔进了锅里。胖厨师从来面无表情，不管你点什么，端上来的都是同一种黏糊糊的面条，4元一碗，十年来从未涨过价，宋涛说，他们管这叫“孟婆汤”。

网吧当中无法自拔的人各有各的理由。

留守儿童小麦仰赖父母的歉疚，每月得到1000块的支援，只盼望成年的时刻晚一些到来，他表达“这样生活太爽了”靠的是一连串脏话，不堪入耳的程度连网吧老板也束手无策；在他身边，一个打工者一边盯着自己胸戴红花、光荣入伍的照片，一边唱着军歌，当他诉说完为了婚姻放弃军职却遭遇出轨的经历，抱着我的肩膀嚎啕大哭，“兄弟你不知道，我心里难受啊。当年的风流呢？哪里去了？”

宋涛的理由是无法忍受“那种眼神”。他自小父母离异，17岁出门打工后，羡慕别人举家在外、有所牵绊，而他孤独一人，四处碰壁。“走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人家根本不正眼瞧过你，但三和不存在这种眼神。”宋涛说，“大家不慌不忙、悠悠闲闲，好像没人歧视我，不存在什么‘高级的人’。”他用了跟红姐一样的词汇——“就好像找到归属感一样”。

宋涛曾以为，三和的快活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但半年之后，他发觉心里的某样东西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起初他们为了上网还愿意干活，时长日久，便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还有十几块钱，算了不做了，先上网，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很多人为了省下网费，一天只吃一顿饭，能卖的东西也全卖了。实在没钱，便像个原始人一样在巷子里转来转去，希望碰见熟人，接济个五块十块。宋涛见过一位残疾人，一只手拍着键盘打“地下城”，大伙都羡慕他，催他赶紧去要饭，有天赋别浪费，可那家伙连要饭的勤快劲儿都没有。

后来聚集到三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更大，日结更少，一天早晨网吧散了场，“大家你问我，我问你，有日结吗？”宋涛看到，成百上千号打工者望来望去，几条巷子都堵满了。“都没日结，完蛋了。”

自从睡上了廉价床位，红姐也放松了脚步，姐妹们不再愿意去工作，只顾天南海北地聊天，或者干脆倒头大睡。“基本上一年四季在冬眠，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这样。”红姐想了想，“就是，也感觉到没意义。”

宋涛已经戒烟三个月，但这会儿又蹲在路边抽上了。一个打工者趿着拖鞋从我们身边一摇一摆地经过，他跟宋涛似乎认识，但谁也没说什么。三和不存在友谊这回事，6年来，宋涛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行尸走肉的，没人想知道别人的名字”。

我问他，难道不感到害怕？不想想40岁之后怎么办？

“你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三和大神是不正常的，明白吗？”宋涛语气温了：三和不允许你有那种想法，城中村都是要死不活的人，你只想随波逐流，一个星期之后都不愿去考虑，今天能过了就是好事。“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一切为了游戏，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自卑，因为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很悲哀。”

人的意志常常被误以为像开关一样，今天关上，明天还可以再打开，但像宋涛那样经历过一番才会明白，意志会锈蚀、腐化，当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而更糟糕的事情往往还接踵而来。

04

孤魂野鬼

三和大神身无分文、无法劳动，想必毫无利用的价值。但周边发廊里的学徒不这么想，他们搬来半身镜，将打工者摁在座椅上，像剪羊毛似的练习手，两分钟后一拍肩膀，他们就顶着怪异的发型乐呵呵地走开了；城中村里的帮派更不会这么想，东北帮、河南帮、安徽帮、湖南帮，在大神挨饿时，递上5块钱，“养着”，不久就骗去做法定代表人、做分期贷款，如果有人质疑，难免被堵在角落里，拳脚相向。

宋涛也曾饿昏了头，交出身份证换来800元报酬，直到法院打了传票到家里才知道闯了祸。后来又兴起了“撸小贷”，我所见过最厉害的一个家伙，手机里整整三屏网贷APP，但他的态度是，凭本事借的，不还。这些都让三和大神越陷越深。

帮派横行的时候，红姐时常听到巷子传来凄惨的啼哭，“我的身份证被骗了！”跟她齐名的小黑是受骗之后才人尽皆知的，他勤快、爱干活，骗子骗走他的身份证，在网上发帖嘲笑他，小黑受不了，精神失常，从此走路不穿鞋，跟兔子一样连蹦带跳，还养了条流浪的小黄狗，有点相依为命的意思，后来小黄狗被人偷走吃了，小黑也

消失不见。

打工者们结队上访，终于换来 2014 年三和的大清理。

宋涛自此才醒悟过来，“因为活得太累了，真的很想死。”他进了南山的工厂，同去的三和大神干活有气无力，没过几天只想拿钱走人。不过，要是工厂有厂妹，他们“拼了老命也愿意多待几天”，宋涛说，虽然厂妹大多是穿金戴银的正式工，看不起邋遢的三和大神，但至少让他们觉得有盼头。只不过，近些年深圳的制造业少了，厂妹转去服务行业，很多工厂成了“和尚厂”，连这个念想也破灭了。

工期结束时，宋涛拿着 5000 块工资，茫然地站在工厂门口，“离开了这个厂，你又成了一个孤魂野鬼”。他仰着头不让眼泪掉下来，除了三和，他无处可去，又进入过去生活的循环。他说，三和的“那种共鸣太可怕了”。



“三和大神”们。

城中村里网吧一家接着一家，转过路口，666 网吧的老板正站在门前，逗弄着一只土狗，宋涛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在）这家网吧一口气待了 7 天”。其实后来他已经不能从游戏中得到任何愉悦，只有烦躁、自我厌恶，可还是走不掉。一切社会关系都已停止，他像在一片虚空里坠落，很想随手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停下，可这世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给他预备。

六年来，他没有跟父亲说过话，“他不理解，你挣不到钱就是没用”。来三和前，宋涛有过一个女朋友，可随着那段关系不了了之，他彻底没了打算。即便成家有了后代，宋涛说，“他的人生很痛苦，干脆从我这点断了。”

红姐也发觉，很多三和大神已经断了组建家庭的念想，好几个人告诉她，“就算赚了几十万，也不娶老婆，因为一辈子的心血，不能交给一个女的。但红姐自己不这么想，这点不同让她时不时还挣扎一两下。

如果找到一个人相依为命，红姐愿意跟他扫地、打零工，哪怕干到死也好。为了这事，她几乎到了心理扭曲的地步，在工厂干活，遇到合适的男工，红姐只想立刻黏住他，因为“等一下他回家，你再也见不到了”。

在三和十年，红姐认作老公的有三个，男朋友有三个，其中五个半都是三和大神，

但每一个都让她伤了心。

遇见第一个老公的时候，他正在三和做小偷——勤于偷盗显示他对生活还有超出一般三和大神的热情，因此只能算半个——结识后两人回老家包了工地，一番辛苦攒了八万块钱。一天晚上，老公带着积蓄从侧门溜走，红姐坐上摩的，不停地催师傅快点。“不要命了，我车轮胎都要跑掉了。”慌乱间撞了车，红姐眼睛缝了 13 针。她不甘心，追到陕北，在一个光秃秃的、喝水要用骡子驮的山顶见到了老公的家，想找的人却不在那里。

从陕北到鄂尔多斯，红姐带第二个老公回到三和，可他熬不住，带头闹事搅得工厂不得安宁。

一起生活两年后，红姐才发现第三个老公精神不正常，一开始还以为小伙子爱聊政治、很有才华，后来他一刻不停地说话，搞得三和大神们闻风丧胆，受不了的当场给他两耳光。原先在工地干活时，几千斤的吊篮砸下来，工友压成重伤，第三个老公压断了腿，打了八根钢钉，但从此震坏了脑袋，红姐寻思着有个伴也好，可他一天到晚不停地说话，红姐终于也忍受不了，单独租了个房子养着他，“现在我就当作是一条狗”。

头一个男友不愿住旅馆，宁愿独自到网吧睡，反反复复播放许嵩的几首情歌；第二个爱听《天空之城》《十里春风》，常常夜里十二点偷偷发短信。临近分手红姐才搞清楚，歌曲是他们前女友钟爱的，两人都放不下。红姐极力挽留，拉着袖子不让他们走，结果一个用酒瓶砸她，一个对她拳打脚踢。

白白遭了这些罪，红姐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人。“三个老公，（我）性欲也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也没了，感情也没了。”红姐说，两个男友相处一场，到头来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一聊起感情他们立刻封闭了自己。

有一段时间，红姐觉得可能自己的缘分不在三和，独自去了武汉、厦门、上海。上海消费高，跑到腿软也找不到便宜的旅馆；厦门海风大，红姐又冷又饿，在火车站睡了一晚。离开 10 次，又回来 10 次，她再也不敢折腾，身无分文却无需担心的地方，恐怕全世界只有三和，“大不了今天去发个传单嘛”。

跟我见面时，红姐刚刚和第三个男朋友分了手，她坐在椅子上挽起裤腿，晾出一块块淤青。“我连死的感觉都有，”她抬起头，“但女人真的很贱，他打得我这么惨，我还时时刻刻想念他。他打我，我拉他，他一直打，我一直拉，他走的那一天，整个龙华我疯了一样地找，很想很想找他过日子。”

一年来，红姐维持着她所说的“这个家”，但男友对她只有敷衍，反倒与男性朋友亲近，等到发现了贴在网上的照片——男朋友穿着高跟鞋——红姐才明白，对方只是利用、玩弄自己。

尽管如此，红姐没法停下来，她根据自己心里的一点点渴望，认定三和大神只是缺少一份寄托，假如有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爱人、朋友，事情会有所不同。“如果有个好家庭带他回家去，可能就重新开始了，如果没有，他们哪怕不在这里流浪，也会去别的地方。”

005

999 朵玫瑰

台风引来的雨水在深圳落了三天，红姐再来时，带上了自己的徒弟林丽。

三和大神都知道林丽有些木讷，红姐解释说，小时候林丽的父亲犯了事，被枪毙，不知怎的，林丽记忆里竟然看到了那一幕，精神受了点刺激。两人第一次在龙华公园遇见时，林丽身无分文，照红姐说法，林丽刚开始“比较浪，见到男的就上”，认识她以后改了，至少知道收点钱。林丽想辩解，说当时也是为了有饭吃。

前不久红姐和林丽因为男人的事情闹了恩怨，红姐第三位男朋友走后，跟林丽凑到了一起，俩人吵了架，差点打起来。但没过多久，林丽也被抛弃。男人走了，她们反倒和好如初，继续做了姐妹。

这几年下来，林丽攒了几万块钱，红姐劝导她，既然有点饭钱了赶紧离开，别再让人骗了去，应该好好珍惜自己，再找个男人嫁了。林丽打算一个月后离开三和，红姐让她不要再来，否则，“我绝对会打你”。红姐自己赌了码，攒得少一些，但也说是最后一年在三和了，只是语气不那么确定。

早年还在家乡流浪时，红姐带过五六个小女孩，有几个是父母离异后抛弃的，相当于认红姐做了干妈，“不是做什么小姐，就是天天带着她们向人家要点吃的”。现如今，

她们有的已经嫁了人。红姐说起这点小小的成就，脸上显得很自豪。

红姐打算离开的 2017 年夏天，三和又一次经历大清理，规定网吧不能通宵，民房不能群租，大神们开始迁徙，向着周边的弓村扩散，有的甚至打算集体迁往龙岗，但没过多久很多人又跑了回来。

我问红姐，你走了，三和几万大神，也许性需求还得要一个出口。

她同意，但觉得不该是她，她毕竟年龄大了，应该要个年轻一点的。红姐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太多钱了，假如有，她想找个心理医生到三和，像教堂一样的，免费给大神们吃住。最主要的，她要招一些女孩，不是不健康那种，而是落魄的大神来了，拍拍他的肩膀、聊聊天，因为她自己无数次地想要得到那种安慰。“我有这种幻想。”她说。

只不过，红姐留在三和的传说太深入人心，不会有人关心她有什么幻想。

前两年有好事者将红姐的照片贴在了网上，她一下子成了名人，有人问她在三和怎么才能做鸭子，有人问她几号生日，要订制蛋糕送给她，也有的只是哇一声，感慨原来真的有红姐。

据红姐说，年初的时候，上海的一个富二代订了丝袜、高跟鞋、999 朵玫瑰送给她，打算带她像情侣一样去旅游。富二代来时开着路虎，也许是真人让他大失所望，勉强吃过西餐，他塞给红姐 300 块钱便离开了。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好像全世界压抑苦闷的男人都知道了遥远的三和有自由快活的生活，知道了有位红姐，这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天津的一位高管慕名找来，许诺给她一整栋楼居住，还发来 800 元红包，问红姐是否能满足他激烈的性需求；北京某公司的小领导每次喝醉了酒就想起红姐，“老姐，你昨不来北京啊？”又说北京压力大，自己打打杀杀，好好的生意有人要跟他抢。

更多的人只是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流浪般的生活，他们问红姐，三和怎么去？三和是否真如传言的那样迷人？

本文采访完成于 2017 年夏天。文中宋涛、林丽、小麦均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谷雨实验室 - 腾讯新闻”。

插画：左马 / 摄影：冯海泳。



杜强

媒体人、非虚构作者。曾获得 2019 年瑞士“全球真实故事奖”、“人民文学之星”等。代表作品《太平洋大逃杀》、《废物俱乐部》。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写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题图为电影《大闹天宫》(1961)剧照

非虚构

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这个社会，
对年轻人更好了吗？

01

“我们想了解‘富裕一代’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富裕一代，差不多就是1995年到2005年出生的这一代吧，他们对贫穷或者短缺的记忆都不多了，对，我们说的是城市里那些孩子，可能还偏一线二线的……”

“或者叫‘富足社会一代’？这样比富裕要更准确一些，一个家庭到底富不富裕，每个人的感知不太一样，对富裕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时候鸡同鸭讲，有的时候完全南辕北辙。‘富足社会’这种对社会总体定义大家更容易获得共识。”

“很关心他们对世界是怎么看的，他们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

2021年6月7日。我们前一天在杭州单向街书店做活动，在那里与嘉怡汇合，然后一起回上海。我们跟嘉怡说你来做田野调查的访问对象吧。她同意了，而且还带来了她刚刚认识的朋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大四学生杨楠。于是我们四个人——嘉怡、杨楠、杨樱和我——在小鸟的办公室聊天。我和杨樱给嘉怡解释我们现在做的事。

嘉怡为小鸟文学写过一篇叫《我们》的小说，很多人叫好。两个东北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故事背景看起来像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小说是能看出时代感的，写得如此真挚与准确，以至于我最初读它时，以为作者是个中年男人。后来才知道她出生在2002年，是19岁的高中女生，惊为天人。

“我开始以为是你爸写的。”见到她时我跟她说。她不太喜欢这个玩笑，大概觉得我冒犯了她。我解释说小说里有些东西很真实，感觉就像真的在那个时代生活过。嘉怡在隔了很久之后解释，可能东北发展比较缓慢，很多东西被“冻”过去了。她出生在哈尔滨下面一个叫阿城的地方。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东北整个就像一个冻结在过去时空里的地方，冻结的时间点各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远的可能还有七十年代，更多的是世纪初那十几年。后来惯性和后劲都不足，就哪儿哪

儿都看着有点力不从心。嘉怡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中，不时会有穿越之感，对于作家来说这真是一件好事，难怪有“东北文艺复兴”。小环境里，嘉怡的生活环境很舒适，没有丝毫落魄，父亲大学毕业，读的是法律，但不知为什么成了中学的体育老师，母亲幼师毕业，转行做了教师培训，嘉怡不大知道她妈妈到底做哪一类的培训，只知道出去给别的老师讲一次三两天的课，就能赚个几万块钱。在阿城和哈尔滨，称得上富裕。父母对嘉怡教育，取开明甚至有点佛系态度，基本上放开了由她成长，自由而且蓬勃。我们听她讲过一点自己故事，觉得算是一类中的典型，因此请她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就是随便聊天，没有特别问题。其实从昨天到现在，你一直在给我们提供各种信息。”

“比如，从道理上说今天你应该在高考才对，你高三，今天是6月7号，对吧？但你现在就拖着大箱子出现在我们办公室，这事儿搁前些年都算魔幻。”

“你拖着一个大箱子到处跑，又是北京又是杭州，现在又跑到上海，你说你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妈不担心你？”

嘉怡和我们之间的不同，是我们觉得是个问题的地方，她总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们，大概是“这有什么好问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此刻，她就会反问我们，担心什么？我们说安全啊，遇到坏人啊。她说她一直是这样跑来跑去，她妈觉得她能照顾好自己。这种安全感是八九十年代哪怕是2010年代之前都很少有的。前一天凌晨，她说她跟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在西湖边，正在拿大荷花叶子盛酒喝，我们脑补这场景哈哈大笑：这也有点太刻意了！我说我们东北人就见不得西湖，见不得水杉，见不得烟雨江南，一见就不能自持，毫无抵抗力，要爱死了。这不是重点，主要是，十几年前，我们可能第一个要想的是，朋友靠谱吗？以前见过吗？认识多久了？

嘉怡有一个朋友，大她二十岁，1982年出生。有一天问她，“你是不是那种要一碗麻辣烫对着墙听耳机那种小孩？”嘉怡有一天看到学校门口的公交车会到一个叫“剑桥郡”的地方，她觉得在阿城有个叫“剑桥郡”的地方是件诡异的事，就上去了。结果发现自己到了荒郊野外，“剑桥”只是一个楼盘。该楼盘唯一有点特色的地方是有个书店，由此认识了这八二年的老板，有时候他还在嘉怡世界里扮演启蒙者角色，从此嘉怡的耳机依赖就小多了。

书店老板还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好几个人格，其中一个认为自己是个女生，嘉怡那个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小说《我们》，最初的灵感应该就是来自于他。嘉怡给我们讲他的恋爱故事：一个女生，网名叫“赵灵儿”，书店老板网名叫“李逍遥”——这恋爱传奇即使在我们看来也有点太古早了——赵灵儿不接受他对自己性别的理解，“你怎么的，你偶尔还是个女的？”

讲得活灵活现。她完全没想过从她上公交到交到朋友这整个经历，可能会被认为是小概率事件。

“你第一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

她想了想，那就得算是瑞士了。

“瑞士？不是你高二的时候吗？在那之前你没出过远门？北京上海之类？”

她又一次把疑问的目光投向我们：“这也算啊？很早就可以出来，初中？高中吧，发现什么东西很好玩什么人很有趣，你会关注它，然后你会去那里玩啊。比如我来上海，就看到你们。高中时去北京，北京有我大姨，跟家里说，我在我大姨家住啊。他们也知道我会见朋友，比如以前有演出，看花样滑冰，那时候有花样滑冰的朋友。”

你看，什么是“远门”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十几年前，我们可能第一个要想的是，朋友靠谱吗？

嘉怡在高二那一年，获得AFS国际交流文化组织一个中学生交流十个月的机会，她给自己一个gap year，去瑞士一年，这也是19岁的她比同龄人晚一年上大学的原因。而回到这一天，她可以在高考的日子坐在这里聊天，是因为她读了国际学校，她选择IB课程，通过了LSE伦敦政经学院的审核，将于九月份去英国。“国际学校”以及所有相关概念是最近十几年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需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在国内还是国外读大学，去英国还是美国……至少在初中之前家庭要做出选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这个决定还要更早——可能从选择幼儿园开始就已经选定了

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嘉怡这样的一代所要面对的人生选择。

02

“再后来，发现不光是这些‘富足社会一代’跟我们想得不一样，他们的上一辈想得也不一样。”

“他们为什么跟我们想得不一样。”

“他们觉得有钱，富裕这些概念是天经地义的。”

“物质主义是个结果，消费社会也是个结果。他们有的人看待消费社会就跟看待空气和水一样，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另外还有些人，就是反抗这个东西。”

“他们上一代人把这个当成奋斗的目标。中间差别大了。”

“上一代人还会搞出很多名目，比如抓住机会啦，勤奋会有回报啦，机会到处都有，只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啦。等等。他们强调机会。”

“我们想知道这中间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会有什么影响。”

“还想知道这一代人对世界的看法是怎么形成的，通过什么路径。”

“然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谁是正常的。或者说，这事无所谓正常与否？”

事儿要从《好奇心日报》更早介入这个话题的报道开始说起。

2016年，那时候整个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饱满、高调、膨胀、志得意满，创业家、投资家和创业投资思想家们一头盯着风口，一头盯着年轻的消费群体，预估新风口并抓住所有年轻人的“痛点”，年轻人所思所想所有行为所有习惯所有场景方方面面都被那些贪婪的眼神抚摸无数遍，想年轻人之所想，为年轻人服务，年轻人被资本所“宠爱”……因此《好奇心日报》做的专题叫做《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所有这些看似抚摸着心灵、揣摩着需求、大动干戈地制造出的那个美丽新世界，指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手中的一点点钱、消费主义狂欢、娱乐至死……另一方面，唯利是图，犬儒主义，抱大腿，明哲保身，成年人世界告诉给你的“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这样的功利主义厚黑哲学……

更何况属于上一代的、可能还有更上一代的，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掉。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辈，虽然其勇气可嘉，但新一代进入是前辈改革出来的深水区，难道那不是一条更需要判断力、更不可捉摸的路径吗？

在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人群的时候，大约也是从2016年开始，短视频为代表的手机应用更凶猛地占据人们的生活。不分年龄，不分背景。人们沉浸在手机里，远远超过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占据客厅“娱乐至死”的时代。

所有模糊的问题讨论和基础的公民教育，都被物质发展的话术覆盖。在我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新四大发明”的光环还耀眼无比，它带来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提得还挺对的。”

“顺着这个问题往下走，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被动接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消费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大家都多多少少有点不能自拔。但很快就发现还有另外一面，这一面就是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下的、越来越不容易理解的世界。年轻人本来是要反叛的，他们反叛谁呢？当然是父辈，这差不多是本能，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消费主义社会没有抵抗，另一方面又对消费主义——父辈留下的消费主义社会逻辑持一种敌视的态度。”

“上一代人多少是相信西方文明解放生产力这一套东西的，大家把它叫商业文明，那是一套价值体系吧，从经济到政治，从个人到社会，但新一代对此有天然戒备。”

“他们用本能的反叛和简陋的知识结构，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那个体系越来越显著，2016年以后吧，比如对资本的敌意，对奋斗的怀疑，对大人物教化和虚伪的反感，还有对普适价值的不以为然。”

这些都是我们试图和嘉怡、杨楠解释的东西，也是一种思路整理。

如果不那么严谨，我们会说我们在试着写写“小粉红”。到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小粉红”骂方方，方方也毫不客气地启用了侮辱性词汇来说“小粉红”。“小粉红”这个称谓出现在更多人口中。我们从2020年开始与这个群体密切接触，这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发现之旅，而且很显然，像很多人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话题越来越

越复杂了。

03

在我们四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聊天之前，若干个问题已经在我们自己对话里盘旋一阵子了。

(1) “小粉红”是骂人话吗？

“当别人问起你是不是小粉红的时候，你除了承认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就是想羞辱你。”说这话的人是杰克苏，他爸爸跟我们说他是小粉红，我们聊天时他在北京上波士顿的网课，那是2020年的9月。他出生在2001年，也毕业于国际学校。

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衍生问题。比如“极左”是骂人话吗？虽然所有人都告诫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应该远离政治，但我们还是从各个年龄段的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解释中，感受到一点，它在被使用的时候，通常更像“一根打人的棒子”。

(2) “小粉红”是时代定语，还是人群定语？

我们在探讨成年人时，我们会用更多的标签来定义他，职业身份，家庭身份，地域，性别，收入，这些东西对于判断一个人更重要，我们自然会忽略政治身份。只有在针对具体某件事的时候，才会流露出这个人的政治光谱。但是，一般成年人保持一种表面的客气，也大体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不会刻意去关注，除非他的角色感特别鲜明。

他们用本能的反叛和简陋的知识结构，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

但是在互联网上，逻辑并不完全如此。一个人的普通社会标签可能被隐匿，识别这个人的特点变成了他的网络动作和观点，甚至包括遣词造句的习惯。政治身份站到了前台，在你真正“认识”一个人之前，你认识的是他的政治身份。

我们想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想知道所谓“小粉红”的普遍性。如果它仅仅代表了某种政治身份，那么这样的身份底色来源于何处？它在人口基数上占据多大比例？假设真的要测算，又应该把多大的时间维度估量进去？

在和很多人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和“小粉红”这个词出现频率一样高的，是“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因为知识分子势必是公共的，只不过在我们这里，还需要特别加持一个定语。

“公知”还被允许发言的时候，我们说，至少开拓和讨论多样性还是可为的，这可能是“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好不好”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也是唯一一个。我们也一度试图去寻找力量的失衡点：公共言论被抑制之后，是不是“粉红”的存在感会显得更强？抑或是有可能，粉红从来是主流？只是现在它被年轻人和互联网上的政治身份表达强化了出来。

多样性从来都是少数派。

(3) “小粉红”是某个个体的一个面，还是全部？

杰克苏的爸爸并不担忧他的世界观，而且认为儿子总是缺少生活的锤炼——他们家的共同特点是只用“锤”，并没有后面那个“炼”字。

“只要用不上外卖，他就知道生活的真相了”，他爸爸说。

杰克苏认为爸爸那一代之所以总是愤世嫉俗，对各种生活不能抱之以乐观积极正能量的态度，大体上是因为他爸爸那一代是被“锤”过，“我奶奶生病的时候，他可能感觉到世态炎凉，觉得自己还算有体面的职业，但居然求医无门，多少有点仇视社会……”

如果翻译一下“外卖”这句话，就是这位爸爸认为，儿子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真正要考量的事情发生，所以现在闪耀给人看的全是政治光谱，未来就好了——或者如前一个问题中所隐蔽的，更多的标签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好了”。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就放任不管。张晓奇是个热衷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材料学博士生，他的舅舅作为家族长辈，八十年代的留法博士，批评他不能只想着做宣讲、治班理政，“你得有专业性，你发明什么材料了？你们这一行当里的大牛是什么人？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吗？认识他们吗？”在与我们交谈时，舅舅跟我们解释：体面的

中产阶级，应该认识院士，应该与这些人打交道，应该进入这样的圈子。

舅舅是成功人士，必须以专业性来解决小粉红政治光谱单一化的问题。

(4) “小粉红”失去的只是锁链？

但是真正的挑战还是在哪里，并没有人撼动它。那个挑战是，不管是继承了家族财富的人，还是在上一代财富竞争中落败了的新鲜第二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赚好多好多钱、买房子、自我奋斗的机会没有了。

“很富裕的社会，但没有东西是我的”。一部分人会这么说：“我们家已经买了几套房子，他们那一代赚钱容易，我怎么赚钱也买不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吧？”

他们都能熟练使用“阶层固化”这个词。代际的不同见解变身为阶级矛盾，“没有什么丧失的，小粉红失去的只是锁链”，说这话的人是张晓奇的表弟，留法博士的儿子，他出生在2001年，喜欢以旁观者的姿态、以知乎“谢邀体”的语言来聊社会，把自己的观点包装成“他们”的观点，“他们反对大资本、反对大地产商，再正常不过。”

(5) “小粉红”是左派？

各种觉得“小粉红”不足为惧的态度里，也有一种“过来人”的达观：这又怎么样？谁没有年轻过？激进很正常，要求打乱一个旧世界也正常，新一代人要重新分配财富也正常。这就是规律。三十年代全世界左翼都相信苏联成就，因为西方搞出金融危机了嘛。全世界正义力量都去西班牙支持共和军。

左派有魅力。问题但凡与左右在一起，就是一笔糊涂账。有的时候我会直接站出来反对：“小粉红”不是奥威尔。他跟去西班牙反独裁打内战支持正义事业的人不大一样，奥威尔他们是有巨大风险的，实际上奥威尔就被枪击中了脑袋，活过来是个奇迹，他们面前的对手是强权。“小粉红”的对面也是吗？

这中间的差别可大着呢。有时我甚至还会戴上有色眼镜来看这事，不是对“小粉红”，是对他们的父辈们。因为父辈们的价值观里经常包含了这样的龌龊成分：与强权站在一起，这有什么不好呢？

它的根源深处是来自于父亲那一代的犬儒主义。这是一个我们最终会面对的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我们这整个的调查都与这个问题有关。这么说吧，这个结果，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很明确地说它是一个“恶果”，为什么会这样。它与过去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七十年，过去一百多年都有关系。

(6) 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没有告诉杰克苏的爸爸，如果订不到了外卖，杰克苏会怎么样。这个时间都不需要是2022年，当时就有答案：杰克苏最喜欢的游戏被下架，起因是有人举报这游戏的配音问题。有人为这个游戏辩护，认为我们应该容忍这样的游戏——这些都是杰克苏自己说的。我们问他怎么看，他的回答是，我不赞同为这个游戏说话的人。

为什么？你不是应该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被夺走了吗？

他没回答。

我们遇到的困惑不止这一个。留法博士的儿子，在高考前的最后一年拼命学习，终于考上了自己还算满意的学校。此时他没有提自己的投入和努力，而是衷心地感谢了学校的“威权”管理：墙体都是玻璃的，学生的动作一览无余，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会被发现和制止。正是这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他没有机会偷懒。

我们想问而最终没问的问题是：“那如果没有考好，你还会崇尚这样的权威吗？”

04

杰克苏的爸爸跟我们讲起一个很老的笑话。

“一个女人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回家的路上开车小心，交通广播说，高速公路上有一个车在逆行。‘何止是一辆，他妈的所有的车都在逆行！’”

在我们看来，这个笑话完美地表达了我们发现的真相，即：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所谓“小粉红”只是一群人，互联网上九五后到〇五后这个年龄段尤其集中。而其实，异类是我们，不是他们——“小粉红”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是一个时代符号。

关于“我们”和“他们”的问题，要说一瞬间明白然后就神清气爽地继续前进，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我们在隐约感受到自己的假设发生偏差之后，有那么一点时间，在和各种有可能交流这件事的人聊天的时候都要拿出来讨论验证一下，而观察他们

的反映，后来也逐渐成为我们“矫正”假设的一种参考。

我们和一个老媒体人坐在茶室里。我们很久没见面了，只知道他离开体制，开设了自己公众号，为大众普及企业家精神。在媒体业普遍的犬儒主义生存方式里，他还属于理想主义范畴的——尽管我们常常不是那么同意他公众号里的东西，但他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说话，而且是真的相信。

我们聊起了正在做的事情。那个茶室有点奇怪。说是茶室，其实更像是饭店午休之后闲置的一个包厢。圆台面上有可旋转的玻璃板。一壶茶。我们顺着四分之一圆坐下来，聊起各自的近况。

作为一个互联网参与者，老媒体人知道很多东西，比如方方和“小粉红”的吵架。但作为一个信奉商业文明、信奉企业家精神、信奉市场经济的媒体人，他不能把这个事件看成某种更广泛的现象，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不曾出现别的东西。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提及一些年轻人的观点和行为方式之后，他沉吟半天，然后说了句：“变天了啊。”

这说法是不是夸张不好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就和我们之前一样，他没意识到自己也是在“逆行”。

你可以看作这是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落。他们产生了一种“白忙活”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的改变、成功和幸福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及一整套管理体系行事规则有关。对自己的价值观没有传承下去这件事，既痛心又疑惑。跳开一步说，这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会与经济上的右派有相同的主张——这套体系的引入对中国发展起到相当正面的作用，他们当然对商业文明在中国大转型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持相当积极肯定的态度。

发现“逆行”的打击程度，来自于对自我安身立命的担忧——在复杂和倾向于保守的环境下，原本被认为有价值的社会共识逐渐被遗弃和消失。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自己将处于何地？

但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存在失误。我们的意思是，当时代的语境被“粉红”标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者自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会认为这是利维坦和时代的问题。总之非常宏观。而作为站在他们反对立场的人，事到如今还被要求思考“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第一反应都是“冒犯”。

我们在和这些人交流的时候，的确会问他们：“你们想过这样的结果吗？”“洗脑这个词我们后来用得比较谨慎。如果说整个一代人如果被成功洗脑，这显然是一个结果，但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很少听到回答。

阿花就觉得H女士做得挺好。

那是在北京通县一家星巴克里，我们同样是在探讨到底要不要反思的问题。然后说起H女士。我说小粉红对H女士主持的媒体有一套看法，比如觉得它们与美国走得太近，与大资本走得太近。换一个角度去看，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媒体人，她因为与资本和国际资本走得太近而被污名化，我觉得是要认真面对这个问题的。

阿花认为它们并没有与资本很近，一直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无须反思。“听别人意见就完蛋了”。

我说，业务能力的判断，当然是专业人士意见重要。一个人成天研究怎么做好媒体，一个普通读者可能只是想那么五分钟，当然前者更专业。但是，媒体是要有受众的，如果五年十年以后，她和她的同事经过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培养了一堆她的敌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希望改造的社会诞生了大量她的敌人，这事无论如何值得反思。

阿花举例说明，即便罗翔现在退出微博，板子也不能打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当年北大反对胡适，也不是胡适的错。她的意思是说，这事不能怪罗翔和胡适，这是其一；其二是媒体做媒体专业的事，“家庭教育由家庭来负责，学校教育由学校来负责，社会教育就是大家各做本分的事，H女士做新闻，一个case一个case地做，她的报道留下了。”

我还是不死心：她的产品是面对整个公众的，公众本身发生了变化，而她的影响力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大体上是可以量化的。特别是对年轻读者的影响来说，如何变化，也是可以评估的。更不要说，面对变化的公众，怎么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也是一桩需要“反思”的事。

阿花有点妥协，现在时间还有点短，不好为读者得失做出结论。

我还是坚持，一个诞生了大量小粉红的社会，一定有诸多原因。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责任。每个人都有必要反思。做媒体，总归要干预这个社会——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方法，方法不会成为目标，也不能成为目标；干预这个社会干吗呢？当然是让社会变得更好；H 女士肯定对更好的社会有自己的理解，她反思的东西不一定是要自己犯了什么错，而是这世界哪里出了问题。一个敏锐的人，应该对此有足够的思考。

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希望改造的社会诞生了大量她的敌人，这事无论如何值得反思。

我们很难说服对方。但在与阿花的交谈中我们又明确了一个现实困境：我们谁都知道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但我们会习惯于把这个问题推到一个自己无力干涉的地方。在家里，说到儿女是小粉红的时候，除了视而不见，可以说这全因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僵化的教育、陈旧的教材还有应试教育、整齐划一的要求、对个性的忽视等等——好孩子就这么被训练坏了；学校则会抱怨社会的失控，原子化的社会生存现状、越来越长的手机使用时间、游戏和家长的纵容……社会，社会能说什么呢？学校家庭都没做好的事，社会能做出多大的补救呢？媒体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更何况还有一个巨大的利维坦。你拗得过它吗？

最后就是，把全部原因都推给那个利维坦。如果说原因，它当然要排在第一位，但这不等于大家因此一推了事。

05

这个世界是上一代人一手创造的。财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如此。利维坦在塑造扭曲这个社会，这一代人也在纵容、顺应、融入利维坦，直至用利维坦的思维方式，在利维坦控制的社会里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顺利化身为利维坦。

小郭先生，一个“迷途知返”的少年，在杭州一家芯片公司上班，拿出周末时间慷慨接受了我们的访问。提起人生过往，小郭先生痛彻心扉。他讲了很多他理解公知的心路历程。“以前被公知蒙蔽，爱看他们的东西，后来信息多元，懂得交叉印证，觉得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到底什么东西让他觉得被骗？

有趣的是，似乎每一代人都有“被蒙蔽”的历史。比如，六〇后的人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接受的错误观念，会说是被“四人帮”蒙蔽的；2000 年初，学会上网的第一代七〇后人，会讲自己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新一代像小郭先生，把账算在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的似是而非的洗脑宣传上。

知乎上有一个人说，1949 年以前的书都烧了，其实不影响现在的生活。这个说法功利、短视而又法西斯，简直令人惊骇，但你知道这么想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少，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会表达出来，或者他没有表达的平台和机会，所以看着很平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表达方式民主化，更多的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你终于发现，原来这世界跟你想得并不一样。

“跟你想得不一样”，也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桑切斯的孩子们》的作者奥斯卡·刘易斯曾经发问：你是不是已经不会跟穷人说话了？多大程度上你在跟这样一群人共享这个网络，共享一个国家。他们相信水能变油，相信现在没有水变油只是科技原因……这些人的存在会随时提醒我们，想问题不要过于依赖我们自己习惯的路径。不能仅看城市里、特别是一线城市里与你接近的那个群体的态度和立场，还要看乡下人的、小城镇的、城市里低阶层的、地铁里放所有手机声音的人……他们是更典型的互联网使用者、传说中的网络暴民、键盘侠爱国主义者、抖音视频重度用户。它跟“对年轻人太好了吗”那个问题的路径一样，优绩主义的成功人士制造了需求，一股脑地塞给年轻人和“愚昧”的大众，把他们带入“奶头乐”的赛博空间，然后优绩人士们享受“庞大，更庞大”的市场，享受不断升级的市场带来的红利。刘易斯说的“你是不是已经不会跟穷人说话了”，在我们这里，在如今，应该这样表达：你多大程度上愿意跟他们交流，而不是一句“愚昧”就把问题抛在一边。

每个人都以为时间和某种变化是能解决问题的。每个人都在掩耳盗铃。留法博士的妻子与我们交流她眼中的父子三人（他们有两个儿子）的时候，相信只要打开视

野就好了，语气就像杰克苏的爸爸说起外卖，只要杰克苏定不到外卖，他就能认清这个世界。

外卖为什么会消失？打开视野的契机如果现在没有出现，那何时才算真正的出现？

在 2022 年 4 月之前，外卖在城市中消失还是个需要想象力的事情。这个生意充满象征意义：从消费心理到人与消费各个环节的关系被重新整合，商业运转体系和社会运转体系随之发生变化，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有算法和大数据控制外卖小哥的报道在传播，一下子反对奴役和剥削的左派也全员投入地关注起来。

和嘉怡她们聊天的时候，很少说话的杨楠是个纯真的左派青年，在提到外卖员的时候一口气说了很多。从对资本家的恨意到否定点外卖这个行为本身，一直说到了毫无意义的工作——那时候同名的书籍还没有出来，它们会出现在另外一个章节里。这里想说的是，外卖会突然消失的社会堂而皇之地在我们身边出现，这确实是件值得反思的事情。

而打开视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简单。与我们交谈的年轻人，他们几乎都看过《一九八四》，有人能读出老大哥，读出真理部对真相的控制，有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心生恐惧，也有人完全无感，不但无感，而且看完之后丝毫不影响他对威权部门的好感，一门心思地相信只有他们提供的才是最真实的信息——任何质疑都是大逆不道的。《一九八四》差不多是最直白的了，几乎是手把手教你认识一个集权政府可以糟糕到何种程度。有一位很有责任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了自媒体，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卖他认为有价值的书，隔三差五就会推出《一九八四》。他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会多一点自由的保障”，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聊下来，觉得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乐观了。为什么如此，还是在反思的问题列表里。

打开视野的契机如果现在没有出现，那何时才算真正的出现？

成天反思，“你们不担心这样会扭曲自己吗？”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始终会有这样的疑问笼罩着我们。

谁知道呢。其实我们对自己往往很宽容，超过预期。伊恩·布鲁玛说过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们这一辈在战争阴影之下长大的人，常耽溺于思考自己在极端压力之下，究竟会做出什么事。譬如说，我有那个胆子冒生命危险加入反抗军吗？受到严刑拷打时，我可以守住秘密吗？我没有办法回答。不过，我对另一个恐怖的问题更有兴趣：在某些情境之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这问题也一样难以回答。”在我们接触到的所有年龄段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思考到这一步。他们一律相信自己历史性地选择了正确的一方，可能还是个受害者，是个明辨是非的人……能不能把自己做得像想象当中一样好是可以质疑的，但很少有人质疑自己是不是在非正义的阵营里。

就我们的观察来看，仅仅是对“正义”的理解，就足以产生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矛盾，但都会在他们各自对‘正义’的理解之上产生冲突。这其中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父辈拥有权力，他们也拥有把自己认为的“正义”强加给另一方的能量。即便“正义”本身无可置疑，但傲慢和父权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合理的方式，是自我审视和引入某种纠偏机制。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太高了，还是对社会的要求太高了？

06

上面提到的这些，我们在 2021 年 6 月 7 日的聊天里都絮絮叨叨过了。那天计划中的采访变成了我们的独白——嘉怡和杨楠的表情在很多种情绪中来回转换——开始时对小粉红突然占据主流的不解，想把他们找出来，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思考的，然后发现这其中的偏见，然后发现他们父辈的作为更有探讨空间，继而试图去描述这个社会的特征，多大程度上我们要为自己身处的社会担负起责任来，就像这一篇标题里所表达的，“利维坦之外，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都做了什么”。

“所以，你们现在想好写什么了吗？”嘉怡的耐心令人佩服。

在那一天，我们给出的答案还是否定的。可能确定的是身份要更清晰一些。我们希望尽力平和，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会不自觉地显露出“爹味儿”，特别是在我们觉得显而易见的答案就在那里摆着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表达很容易超过想从他们

那里了解到的信息的时候。托克维尔在写《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说，“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差不多也是我们想要表达的。

俯瞰各种各样的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所有东西挤在一起的凌乱的故事。他们姿态各异：九五后的女生要跟爷爷学《了凡四训》，爱国 up 主在伦敦小小地破坏了一次八国联军的纪念雕像，开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家庭辩论中逼自己的儿子跪下，出轨的父亲们，失去奋斗目标的儿子们，读毛选的愤怒青年，头上长了“反骨”一定要解放全世界受苦人却对利维坦心悦诚服的材料学博士，从女儿那里发现社会达尔文风格小说的父亲兼网站总编辑，即将退休的报社主编，书店老板，让我们叫她“省会做题家”的北大女生……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个案，似乎都不足以代表这个时代，但它们也都用个性来丰富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提醒自己用一种谦逊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相当一部分人，我们不能说很了解他们，我们确实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还会讨厌坐在我们对面的人，但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一种常态。我们尽可能走近他们，打量，猜测，有时靠经验，有时靠知识，总的来说靠理性。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优点——很多时候还依赖请教：你们为什么这么想？多数时候他们并不能完全解答。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提问和请教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语境或者他们熟悉的范围之内。所以，困在语言或者困在自身营造的困局里，就成为经常发生的事，它也很像我们这个时代。但我们可能都向着真实的情况近了一步。

接下来，他们都会出场。他们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我们称之为父辈的，他们有些是公众人物，有些是普通人，虽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成就非凡，我们或可称之为普通的中产阶级一员，公众人物，我们尽可能以公众的开放态度来处理。另一组人，就是年轻人。

上一代人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有一种紧迫感，要提及时间——比如强调四十年的历史，痛心疾首，很难再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来建立起成熟、有效率可以自我成长的体系了，他们几乎是一种面对不可再生资源式的难过；还会强调历史的纵深，大尺度，唐德刚三百年历史三峡的气魄都不足以覆盖我们的历史了，我们不是四十年的尺度，而是千年……所有时间问题背后只有一个真相：他们的焦虑。

另一端的年轻人截然不同。杨楠在那一天里一共没说几句话，她总是频频点头，随时准备赞同你，赞同得多了，我们就会回头去看我们之间的共识，是不是有太多的水分。杨楠解释说，很多东西我也没有想好。

我们会想起杰克苏说到他自己，“可能我的想法还有很多变的空间”，“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懂”，“可能以后会好一点吧”。

你看，杰克苏他并不焦虑。他的示弱未必是一种妥协或者油滑。“我没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凭我的直觉判断，这只代表我现在的想法，不代表以后。”

对或者错，都是现阶段的事。我们现在所写的，确切地说是 2020 年的一群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冲突，我们偶尔会把 2023 年的他们作为对照。但总体上来说，它是在 2023 年这个时间点上对 2020 年的记录。

这期间变化的东西有很多。但就像我们在 2020 年时提醒自己的，会不会变好或者变得不那么好，没必要去做预测。

杰克苏提醒得对。我在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想法千奇百怪，有些笃定的东西倒是没有变化，但大多数东西可能都会在其后二十年里，反复审视、反复观察，人生终究没有一定之规。

用同理心来想，如果二三十年前，有人采访我，记录下来我说的东西，印在纸上、书里，这些年过来，有好事的人跑过来跟我说，“嗨，这书里是你说的吗？你那时候的样子……”我大概会羞愧难当的吧。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 [Pavel Neznanov](#) on Unsplash

非虚构

四个离开俄罗斯的年轻人

蒋莉、刘天 | 生活亲历者

“我不觉得我在逃避，
我只是不想参与这个游戏了。”

本文由两位作者一起书写，我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去年9月，本文的作者之一莉去了法国留学。那段时间，正值中国大规模封控，而与此同时，普京开始在俄罗斯征兵。

在学校，莉交到的第一个朋友是俄罗斯女孩Lisa。莉曾经说，“我想我和Lisa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有相似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一种美国同学和法国同学很难共情的体验。我们对各自政府的观点，一种国破家亡的悲怆，一种无法回头的决绝，看着我们的母语和家园被摧残，我们的人民在受苦。或许肉身已经逃离，甚至已经有了一个更长一些的计划，但是这些折磨并不会变少，你可以逃到欧洲，逃到美国，但你逃不到一个理想的俄罗斯。”

被Lisa的故事触动，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三位逃离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曾经坚信“世界大同”，但他们秉持的信念正渐渐被普京的政策和西方的制裁双击碎。

此时此刻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我们突然想起，当我们和另一位采访对象Alisa在Zoom里闲聊时，她说跨越三个时区的聊天很棒，“三个女孩，一个中国人在法国，一个中国人在北京，一个俄罗斯人在亚美尼亚，大家还能相谈甚欢，无论如何，人还是可以交流的。”

01

出走

“不要计划任何事情，必须现在就走。”

2022年3月17日，星期四，在普京正式对乌克兰宣战的三周之后，生活在莫斯科的Alisa和丈夫来到了机场。

离开的前一天，Alisa最后一次走过自己居住的街区、每日遛狗的街道、平日买咖

啡的店铺。她试着记录下自己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但因为情绪的起伏，她的前两次拍摄没有成功。

宣战之后，Alisa身边每个人都在讨论离开，“虽然最终不是每个人都走了，但每个人都在讨论走”。“因为有差不多50%的人没有护照，他们的选择就很少。就算你有护照，因为时间有限，你也只能选择那些不需要签证的国家。”

这不是Alisa第一次考虑出国生活，她一直想试试旅居国外。她有很多价值观都和俄罗斯这个国家相悖，比如她不喜欢受苦的文化，不喜欢这个国家对待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但按照之前的计划，离开至少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战争使这一切彻底加速，最初几天她觉得很恍惚，“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那些1940年代的德国人和我现在的感觉一样吗？”

“每天都有关于征兵的小道消息，感觉这件事明天就能发生，我们必须得加快步伐了”。

机票的价格翻了五六倍，几乎花光了Alisa的裁员赔偿。她曾在一家Instagram的供应商工作。战争之后，Instagram不再在俄罗斯提供服务，公司裁掉了大部分员工，包括Alisa。

Alisa把自己十年的生活打包进六个箱子里，并订了六天之后的机票。在登上飞机之前，她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能走。这些日子的俄罗斯，六天足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哪一天走，去哪里，买哪一班飞机，这些全部都是风险”。

幸运的是，飞机照常起飞。“这不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是个百感交集的故事，紧张、焦虑、激动、期待，这些情绪都在里面”。Alisa称自己为expat，一个暂时旅居海外的人，“没有人逼迫我们走，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02

排队

6个多月后，Dima也踏上了出走之路。和Alisa不同的是，他选择了陆路。

几天前，普京宣布了“部分动员令”，征兵的传闻在喧嚣了半年之后终于成为事实。

根据德国之声，出走的俄罗斯人里，有6万多人去了欧盟国家，更多的人选择去中亚地区，比如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加起来将近30万。靴子一落地，很多人收拾行李开车逃去邻国，这样更近，也更省钱。

此刻Dima被卡在里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他和同伴已经在这里等了两天。数十公里长的车队在等着过关，而边检每小时只会放十辆车过去。

与此同时，俄罗斯马上就会封锁边境的传闻，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等着过关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统统开始想办法插队。有些卡车的货斗里坐满了人，靠前的人开始琢磨生意，把自己车里的座位高价卖给那些排在后面的人。

Dima和同伴准备下车朝边境的方向走，但随即他们发现，不知道谁规定的，必须乘坐交通工具才可以通过边境，步行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个排在前面的司机愿意载他们过关，作为酬劳，Dima和同伴把车卖给了他，低于市场价。

这个司机和边境的官员很熟，看来常年往返边境两侧。他持俄罗斯护照，但出生在哈斯克斯坦，这些天靠着往返边境运输客人赚了不少钱。或许是因为司机在边检的关系，他们通关的时候，官员几乎没有询问任何问题。

Dima忐忑了好几天，犹豫如何措辞，思忖万一自己的名字在通缉名单上怎么办。但什么都没发生，他就这样离开了俄罗斯。

03

求婚

异国了半年之后，Lisa的男友Hagen飞来莫斯科向她求婚了。

两年前，19岁的Lisa在大学里认识了21岁的Hagen，两人相爱了。Hagen是Lisa的初恋。战争爆发后，Lisa的学生签证到期了，她只能回到俄罗斯。每一天看着和战争相关的新闻，Lisa非常焦虑，“如果俄罗斯彻底封锁边境，我就再也见不到Hagen了”。

异国的煎熬使两人更加明确对彼此的依恋，他们都不想让这份纯粹的感情被局

搅散。

Lisa 很快申请到了一个法国的硕士项目，这样起码在读书期间，两人可以继续见面。“我太爱他了，我宁可做出牺牲，也不能失去他”。

与此同时，在瑞士的 Hagen 联系了 Lisa 在莫斯科的朋友，悄悄安排了一个求婚仪式。Hagen 希望通过结婚，减少身份给这段关系带来的阻力。

最初的欣喜过后，Lisa 发现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前在甜蜜的校园恋爱中，他们没想过太多现实的问题，而备婚却涉及无数现实的商讨。

随着俄罗斯和欧洲关系的不断恶化，Lisa 对两人能否顺利结婚感到担忧。Lisa 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战争的进展，着急推进结婚的进程，而 Hagen 却总是忙于工作，显得没那么上心。

在瑞士结婚，Lisa 需要很多文件，妈妈帮她寄到了法国，但这些文件只有六个月的有效期。“我们必须在文件到期之前完成注册，现在从俄罗斯往欧洲寄信已经很慢了，之后如果邮政服务彻底停了的话，那我就没法结婚了”。

就算能够顺利提交结婚申请，Lisa 又担心瑞士政府会不批准。“瑞士真的对外国人很不友好，我们现在分居在两国，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绿卡欺诈。以前你的身份是游客、学生，每个人都尊重你，至少假装尊重。但当你想移民，你就会在方方面面感到不平等，更何况你是一个俄罗斯人。”

没有人逼迫我们走，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她在酒店实习时的经理曾经好心告诫她的未婚夫，“小心这个俄罗斯婊子，她就是图你的身份。”

Lisa 对身份的认知有了强烈的变化。

“我会说好几种语言，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我读了很好的大学，又读了硕士，我到底还要怎么证明我足够好，证明我配得上欧洲呢？”

Hagen 是出生在瑞士的华裔，拥有四国护照的他难以理解 Lisa 的沮丧和焦虑。“现在像是我在推一步他走一步，可能他还没做好准备，”Lisa 有些失望。“他去哪里都不需要签证，而我却需要一个居住许可才能留下来，我甚至需要先有一个申根签证才能来申请这个许可。这些事对他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他有时候会发火。”

在经济上，两人之间的天平也歪向了一边。Lisa 家境很好，父亲在俄罗斯有律所。战争之前，两人在经济上很平等。但从 6 月开始，Lisa 的海外账户被冻结了，原因是神秘而含糊的“内部政策”。

“父母没法再给我汇款了，即便我妈妈是乌克兰人也不行。”

没钱寸步难行，男朋友给了她一千欧元现金，让她先拿着花。Hagen 家理解这一切，会承担婚礼和蜜月的一切费用，Lisa 会搬进 Hagen 的家里和他妈妈一起生活，但她觉得自己像在被施舍。

“现在我好像只能说‘好’。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从去哪家餐厅吃饭，到未来在哪里生活，我都会说‘好的’，”在这段关系里，Lisa 的话语权越来越少。“我并不想在关系里成为卑微的一方，但我好像越来越卑微了”。

04

重逢

9 月 14 日，Seniya 一家终于团聚了。四个月前，国外媒体开始出现关于征兵的传闻。

一个周四的晚上，Seniya 和丈夫 Vlad 坐在厨房，讨论以后的生活。他们不想去赌传闻会不会成真，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我们其实早就想离开俄罗斯，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好，而是想试试新生活。新冠大流行之前，我们俩在越南生活过一年半。如果 2 月 24 号什么事都没发生，谁知道我们会在俄罗斯待多久。”战争和制裁促使 Seniya 一家做出了早就想做的选择。

5 月 9 日，Vlad 先离开了莫斯科，从土耳其转机，到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为了省钱，Vlad 先去塞尔维亚安顿，找到工作之后，Seniya 再带着儿子过去。

来不及咂摸自由的滋味，Vlad 一头扎进了艰难的生活。即便以前来过塞尔维亚，有朋友帮衬，最初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因为制裁，你甚至不能在网上订酒店。我只

能沿着街区一家一家旅馆问。”刚到的那两天，Vlad 睡在朋友的办公室，因为旅馆的价格太贵了。

通过在当地电报社群里面推销自己，Vlad 找到了一份在农场摘覆盆子的短工。Vlad 在农场的太阳下度过了塞尔维亚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提到这段日子他直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息，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因为我不会说塞尔维亚语，农场主一家也不会说英语和俄语。”

与此同时，Seniya 退租了莫斯科的房子，带着儿子前往母亲位于俄罗斯南部的家乡。在那里，Seniya 见到了一部分支持战争的群体。

俄罗斯的偏远乡村，与莫斯科完全是两个世界。经济不佳，设施破败，信息滞后，没有盼头。人们关心的事情很具体，钱够不够吃饭，有没有酒喝。

和城市里那些带着战争英雄情结，真心实意支持普京的中产阶级比，村子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电视节目告诉他们，俄罗斯正在竭尽全力保护大家，人们当然会相信。他们没有时间质疑，甚至也不想质疑。”Seniya 不想责怪这些人，“他们只是被蒙蔽了双眼。”

没有签证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只能在塞尔维亚呆 30 天。但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每 30 天跨过边境，去对面波斯尼亚抽根烟再回来就行了。”

在去波斯尼亚抽了三次烟之后，Vlad 终于找到了一份对口的工作，但是待遇比在俄罗斯低了很多。离开俄罗斯之前，Vlad 是工程师，有优渥的薪水，足够负担一家人的开销。

这份工作在距离贝尔格莱德 80 公里外的小城。那个城市有多小呢？当地甚至没有能长租的房子。但无论如何，这个分别了四个月的家庭终于要团聚了。

秋天，Seniya 带着儿子踏上了去塞尔维亚的路。直到坐上飞机之前，Seniya 都会因为紧张而双手发抖。飞机半小时的延误，她会神经紧张地猜想他们是不是走不掉了。

两岁的儿子还不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他用力地吮吸着棒棒糖，在飞机延误的那段时间里交了新朋友。

登机了，Seniya 离丈夫越来越近，舷窗外，俄罗斯越来越远。

05

歧视

“我终于能用信用卡了。”

这是 Dima 离开俄罗斯之后最直接的感叹。因为制裁，他从 3 月就不能用信用卡了。经历了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忐忑，他最终在格鲁吉亚落脚。

刚到这里，Dima 感到新奇和冲击，有过很多疑问。比如，为什么格鲁吉亚人直接喝水管子里的水？为什么路上躺着那么多狗？为什么晚上 9 点路上就没灯了？为什么格鲁吉亚可以用加密货币支付一切？

但时间长了，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身上的俄罗斯痕迹太多了。

Dima 去买咖啡，店员拒绝了，告诉他已经闭店。“但其实时间还早，根本不可能关门，很可能是因为我跟店员说了俄语。”

走在路上，Dima 能感觉到本地人总是打量自己。“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挺容易区分的。也许我的长相、走路的姿势或者口音，让别人一眼就看出，噢，这人是俄罗斯人。”他无法不在乎。

墙上的英语涂鸦也是写给俄罗斯人看的，“这里不欢迎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滚回老家”。这些出走的俄罗斯人，似乎在哪都不受欢迎。在俄罗斯他们被视为逃兵，在国外他们被看作战犯。

格鲁吉亚人对俄罗斯的讨厌不是没有原因的。

俄罗斯利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亲俄分裂分子的不满作为入侵乌克兰的借口，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于格鲁吉亚。

2008 年 8 月，以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局势紧张为借口，俄罗斯曾短暂入侵格鲁吉亚。停火后，俄罗斯宣布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

所以当首都第比利斯街头到处都能听到俄语的时候，格鲁吉亚人并不高兴。许多人对涌入的俄罗斯人没有多少同情，因为人们怀疑这些人里不乏依然支持普京的，只是怕死在战场罢了。

在法国小城，Lisa 几乎没有俄罗斯朋友。下课之后，很多时候她一个人回宿舍待着，等待在瑞士的未婚夫下班，打一通电话。更多的时候她喝酒，流泪。

她有时也参与欧洲和美国同学们聚会。年轻女孩们聊天的日常话题，无非是谁选了不适合自己的裙子，谁发了状态谁点了赞。她享受同龄人的聚会，但也感到沉重。

在俄罗斯他们被视为逃兵，在国外他们被看作战犯。

“我和莉关系更近，是因为她知道来自一个不被欧洲主流社会认同和喜欢的国家是什么感觉。”Lisa 觉得欧美同学对自己的同情是伪善的，他们并不真的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想让话题快点过去。

“他们在太舒适、太平静的环境中长大，这一切他们很难想象，也懒得想。战争只是新闻，他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订婚之后，Lisa 经常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往返。11 月初，Lisa 在瑞士边境被警察拦了下来。

警察咬定她的法国学生签证不能进入瑞士，因为签证上只印了“法国”，而不像旅游签一样写着“申根”。

幸好 Lisa 还有一个在有效期内的瑞士旅游签。警察放行了，但严词警告，如果下次再用法国学生签进入瑞士，会被永久驱逐出境。

Lisa 害怕地问莉的签证是什么样的。她有点绝望，学校里那么多人去瑞士，大家都是一样的签证，为什么只有她不行？

实际上，法国政府的网站上清楚明白地写着 VLS-TS（长期学生居留签证）持有者可以自由在申根区行动。Lisa 又给瑞士大使馆写了两封邮件，得到的答复是“法国学生签证的持有者，可以前往瑞士”。

从此以后，Lisa 的包里多了装着一沓纸，里面有大使馆邮件的打印件、法国政府官网关于签证说明的打印件、法国签证生效文件等等一系列证明。

与此同时，Lisa 紧锣密鼓地计划着婚礼。她邀请了几个好朋友，希望她们能来瑞士做她的伴娘。

伴娘群里一位格鲁吉亚朋友嘲讽：“俄罗斯刽子手竟然没被制裁，还能坐飞机到处旅行。”

又一次，她在伴娘群里询问大家是否能确定出席。另一位朋友说，都什么时候了，你难道不知道基辅现在正在被轰炸吗？

“我他妈当然知道！”

Lisa 非常委屈，“她们非常明白我的立场，我不可能支持战争。她们也知道我爸爸是俄罗斯人，妈妈是乌克兰人，我的外婆就住在乌克兰，我比其他人更关心这些事。但我没有权利享受自己的生活、计划自己的婚礼吗？”Lisa 常常强调自己的乌克兰身份，这或许是辩解，或许是自豪，也或许是一种自保。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并不亏欠任何人，也常常陷入愧疚和自责。

“很多人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苦，我有机会在这过着平静的日子，我真的值得吗？我不是做得不够？”

Lisa 走向阳台，点了一支烟，默不作声。

06

热情

与 Dima 和 Lisa 的境遇相反，Seniya 和 Alisa 几乎没有因为国籍而受到过为难。

Seniya 对塞尔维亚人展现出的热情和乐善好施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对孩子。不管认不认识，人们见到小孩，总是会摸摸脸蛋，亲亲额头。

有一次，Seniya 一家走在路上，邻居大爷开车路过。他停好车，拿了一大袋子玩具出来送给 Seniya 的儿子。“那应该是他孙子之前的玩具，玩具还湿着，看起来刚洗过。”

她甚至替热情的塞尔维亚人感到不公。“我们总说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是兄弟国家，但俄罗斯人远不如塞尔维亚人那么友好和开放，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在哪。”两国的友谊叙事，在想象中是光明的，但是现实情况却有些暗淡。“我觉得这不算歧视，只是跟俄罗斯的文化教育脱不开干系，你很难指望 1.43 亿俄罗斯人了解 600 万塞尔维亚人的一切。假如你去问一个俄罗斯人，‘除了俄罗斯之外你还喜欢哪个国家’，他们会沉默，想很久。”

对移民来说，即便塞尔维亚人再热情，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依然存在。有时回看

以前在俄罗斯拍的视频，Seniya 会放声大哭。

她猜想自己是太孤独了，因为他们居住在小城，很难见到朋友。有时她认为自己是太想念故乡了，“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前半辈子，我爱那里的一切。现在我只能记住我的感受，把它们打包随身带着。因为我爱的俄罗斯几乎消失了。”

Alisa 去了亚美尼亚。这里让她有种错觉，好像从来都没离开过俄罗斯。2022 年 3 月以来，Alisa 所在的亚美尼亚小城涌入了大量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社群的联结很紧密，他们每两周就会约着喝酒、爬山，清理山上的垃圾，喂养当地的流浪狗。

前苏联时代，俄语曾是亚美尼亚的官方语言之一。几乎所有亚美尼亚人都会说俄语，尤其是 30 岁以上的人。对这些出走的俄罗斯人来说，基本交流不用担心。

好客似乎是刻在亚美尼亚人基因里的品质，但很难说这种热情与俄罗斯人的国籍无关。

以前，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亚美尼亚只是夏天避暑度假的去处，这里的房子在其他季节几乎是空的。而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仰赖俄罗斯。

这一年，俄罗斯人的涌入让房源供不应求，房租涨了双倍也照样有人租。相比本地人，俄罗斯人赚得更多。

“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宣传是一样的。”在亚美尼亚打开电视，看到的频道和在俄罗斯几乎一样。“他们相信俄罗斯对乌克兰出战是正义的，是在打击法西斯，并且亚美尼亚和乌克兰曾经也有过矛盾。但其实亚美尼亚人并不那么关心俄乌冲突，他们更在意自己国家跟阿塞拜疆的冲突，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去解决。”

但在大国中心的国际叙事里，小国之间复杂微妙的冲突几乎无人问津。“不过我不觉得亚美尼亚人会当面告诉我他们心里真正的想法，我也避免和人们谈起政治。”

通常，Alisa 和亚美尼亚朋友们聊天的话题很安全，比如亚美尼亚的风景有多美，食物有多好吃。

“亚美尼亚人对自己的国家特别自豪，他们总会开一种玩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起源于亚美尼亚。如果说我喜欢吃披萨，他们会告诉我披萨是亚美尼亚人发明的。如果谈到汽车，他们会说第一个开上汽车的是个亚美尼亚人。”

在亚美尼亚住下的这段时间，Alisa 试着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她享受这份工作。公司创始人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公司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一起为美国客户工作。

“在现在这种特别疯狂的状况下，还能看到这些人作为一个团队正常交流，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工作，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但没干多久，从小把 Alisa 带大的奶奶去世了。她请了一个月假回去参加葬礼，处理后事。回来之后，她经常控制不住情绪而在开会时放声大哭，而且要花更多时间完成工作。

她又被辞退了。

07

玫瑰

去年的妇女节，Lisa 在乌克兰的外婆收到了一支小小的玫瑰。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敲开了外婆住的楼里所有还有人应声的门，为每一位孤独的女人送上一支玫瑰。

从 3 月开始，俄军每两周就会轰炸一次乌克兰平民。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永远不知道哪颗炸弹会落在自己头上。

还能看到这些人作为一个团队正常交流，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工作，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身处战争中心的外婆，每一天都很充实。她擦窗户，做饭，做了好吃的会与邻居分享，会被邀请去邻居家做客。“有一次她说，Lisa，我今天吃了一块巧克力，这让我很开心。我的外婆坚韧、善良，我很自豪能成为她的外孙女。”

但 Lisa 不确定这辈子还能不能当面见到外婆了，外婆已经 77 岁了。

4 月，战争进行了两个月，Seniya 还在俄罗斯。当她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总会有人来问她：

“你怎么不去抗议？”

“你怎么什么都不做？”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开心？”

“战场上的人在水深火热里受苦，在死去，你竟然在这儿享受生活？”

……

“我对战争感到难过，可是俄罗斯人也是人啊。发动战争之前，没人来问我同不同意。现在好像全世界默认俄罗斯人都同意了这场战争，这太傲慢也太懒惰了。说起这事儿，没两句 Seniya 就得深呼吸，劝自己冷静。

以前，俄罗斯民众和政府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民众不参与政治，政府带来经济收入。近些年这个平衡被破坏了，经济一直在下滑，民众开始承担不参与政治的后果。

在俄罗斯，人们不能在街头或社交媒体上公开反对政府，《假新闻法》会让人直接入狱。

“你不能说‘战争’这个词，也不能说普京不对。”为了躲避审查，Seniya 隐藏了频道里有‘战争’这种词的视频，“当你身处自由之中，发表任何观点都很容易。但外国人根本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法反抗。以前所有抗议活动的结果总是一样的，不管你怎么做，赢的总是‘庄家’。我们不想重蹈覆辙了。”

“我有家庭，有孩子，我不想惹麻烦。”她收起政治观点，分享她的 32 岁感悟，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女性，要在孩子和朋友之间选择。给大家看她的冰箱布局，分享俄罗斯人的日常食物。她品尝自己做的香蕉果昔啤酒，也会晒儿子的牙牙学语和大笑。

“现实很分裂，所以我希望记录那些高兴的事。”

08

轮盘赌

动员令颁布的那一天，俄罗斯境内发起了很多街头抗议行动。

Dima 混在圣彼得堡围观的人群里，把手机藏在口袋，假装与旁边的人聊天，实际上正悄悄在 Youtube 上直播这场抗议活动。

忽然有个人走过来，“喂，那边那个戴帽子在打电话的人在盯着你，你注意点”。

Dima 在人群中穿梭，转移到广场的另一端，继续进行直播。有位观看直播的观众给他留言，“Dima，你的直播现在在 # 俄罗斯征兵 # 这个话题下面热度第一”。Dima 有些紧张，因为他知道这些警察其实在监控互联网动态，他决定停止直播，并且隐藏直播记录。

在回家的路上，Dima 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根据从谍战片里学来的技巧，Dima 假装停下来打电话，“嗨，你要不要我带牛奶回去？”

从余光里，Dima 又看到了之前盯着自己的那个人，对方也在“打电话”。他快步走进一条弯弯绕绕的巷子，从另一个出口出去，找了一个角落躲在暗处，随后他又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试着让自己的形象相对难以辨认一些。

第二天，Dima 回到住处，准备拿走一些贵重物品。邻居告诉他，在他回来之前，有几个人来过他家。Dima 火速收拾好了东西离开，后来邻居说，那些人当天又来过一次。

“这完全是运气，天啊，或许这是上天的旨意”。

而几天后，两千公里外，Alisa 和丈夫帮助了 7 个因逃避征兵而被通缉的朋友。他们在 Alisa 亚美尼亚的家中住了两周，同吃同睡，之后逃去德国。

原本 Alisa 想将这个经历整理之后发布到网上，但担心这样做会暴露那 7 个人的行踪。在这之前，在政府下辖单位工作的妈妈曾因她发布的视频而被领导警告，“这太扯了，我那个视频的浏览量都不到 1000。”

Alisa 用了好几次“俄罗斯轮盘赌”来形容这一切。

俄罗斯轮盘赌是一种起源于俄罗斯的自杀式决斗方式。参与者把子弹放进左轮手枪的弹膛，旋转弹膛，然后轮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直至有人中枪、或不敢按下扳机为止。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枪就打到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抓走，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山。

为了不让仍在俄罗斯生活的家人为难，Alisa 不再发布任何有关立场和态度的内容。她也不再看新闻，对战争的信息都来自丈夫偶尔的转述，“我不觉得我在逃避，我只是不想参与这个游戏了。”

Seniya 一家获得了塞尔维亚的临时居留许可，租到了一间月租 100 欧元的小房子，包水电费。他们全家都在学习塞尔维亚语，打算让儿子在当地上幼儿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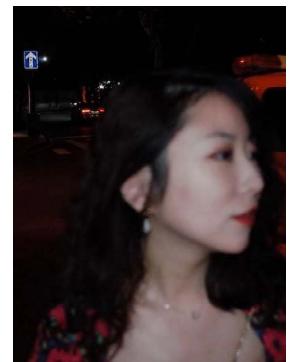
1 月的最后一天，Lisa 和未婚夫的结婚申请被批准了。4 月 18 号，他们将在瑞士领证，莉被邀请去做证婚人。

Lisa 终于松了口气，准备把之前悬而未决的事一件件落实。莉最近一次见到她时，她开始为婚礼减肥，并且为婚礼做了细致的计划，她激动地分享自己选的裙子和场地。

为了维系割舍不下的爱，她被时局推着成为一个瑞士公民。但她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属于瑞士，因为她忘不了这一年，瑞士是如何对她的。

“经历了这么多创伤之后，我对一切都是 fuck you 的态度。你因为我是俄罗斯人恨我是吧，没毛病，我也恨你。”

Lisa 不喜欢的瑞士，是 Dima 最喜欢的国家。他从没去过瑞士，但他想象中瑞士既平静，又美丽，“可能因为俄罗斯总是有新的冲击和考验，我喜欢平静的国家。”



蒋莉

干过编剧，教过英语，目前在法国做酒鬼，喜欢玲娜贝儿和猫。播客“几乎正常”的主播。

刘天

干过营销，做过创意，爱在饭馆偷听别人聊天，爱骂人，爱玩。播客“几乎正常”的主播。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尾声

战争持续了一整年了。Alisa 领养了一只亚美尼亚当地的小狗，经常带着它一起爬



题图为电影《斯大林之死》(2017)剧照

档案

斯大林之死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 发现经典

是啊，一切的发展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1953年2月，斯大林突然生病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星期六那天，我们全都在他的家中聚会。那是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斯大林已经把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的命运“挂”了起来。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全会上，他就提出不设政治局，设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并念了许多新人的名字。我和其他原先的政治局委员都感到很吃惊：这个名单是怎么拟定的，又是由谁拟定的呢？斯大林并不了解这些人嘛，是谁给他帮的忙呢？我至今未知其详。我问过马林科夫，可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论地位，马林科夫应当参与主席团的设立、人员的遴选和名单的拟定，但却没有让他参加。也许，此系斯大林自己所为？如今，我根据某些迹象推断，他在遴选干部时让卡冈诺维奇帮过忙。主席团内部有个范围更窄的常务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上并不开会，一切问题均由常委会决定。这是斯大林想出的一个完全不符合党章的形式：党章中并未规定成立任何的常务委员会。

斯大林为什么要成立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呢？看来，他不便马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开除掉，于是便搞了一个扩大的主席团，然后再挑选出一个范围较窄的常务委员会。如他所说，是为了进行及时有效的领导。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均未进入常务委员会，也就是把他们“挂”了起来。我敢说，斯大林只要多活上一段时间，那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会惨死。反正在十九大之后，斯大林就马上实行了孤立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政策，无论去别墅、去住宅、去电影院，从不邀请他们，先前我们都是一起到这些地方去的。

然而伏罗希洛夫却人选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这是斯大林独特的做法。有一次，我们在他家用餐时坐了很久，他突然说道：“伏罗希洛夫怎么钻到常委会里去了呢？”我们都不看他，垂下眼睛。首先，“钻进去”是什么词儿？他怎么可能“钻进去”？后来我们说：“是您自己提的名，他就选上了。”此后斯大林再也不提这个话茬儿了。不过他的这番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早在十九大之前他就不让伏罗希洛夫做政治局委员的工作了：伏罗希洛夫从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文件也不发给他。斯大林在小圈子里对我们说，他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当然荒唐透顶。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又“怀疑”起莫洛托夫来了。当时我在斯大林的别墅，好像是在新阿丰。他忽然心血来潮，认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卖身投靠美国，因为他在美国办事处坐的是沙龙车厢。就是说，有自己的车厢，准是卖身投靠了！我们解释说，莫洛托夫不可能有自己的车厢，那里一切都属于私人铁路公司所有。可见斯大林临终前几个月已经糊涂到了什么地步。

那是个星期六，他让人打电话，请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他邀请了我、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我们去了。他说：“我们来看电影。”电影看完了。后来他又说：“走吧，我们到近郊别墅去吃点东西。”我们去用了晚餐。晚餐拖的时间很长。斯大林把这种晚上的、很晚的晚餐叫作午餐。我们大概是在早上五点或者六点钟时结束的。这是他的“午餐”通常结束的时间。斯大林略带醉意，心情很好。没有任何可能发生意外的兆头。

我们来到门厅，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出来送我们。他一个劲儿地开玩笑，好像是用指头在我肚子上戳了一下，管我叫米基塔。他心情好的时候，总是用乌克兰语管我叫米基塔[1]。我们道别之后便各自驱车回家了。

我们离去的时候心情都不错，因为用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午餐并非总是在如此亲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我们都驱车回家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以为斯大林肯定要叫我们去，所以整天都没有吃午饭，我想，也许他会早早地叫我们过去吧？后来我还是吃了点东西。电话始终没有打来！我不相信他会为了我们把星期天牺牲掉，几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可是不然！已经晚了，我宽衣就寝。

突然，马林科夫给我来电话说：“刚才接到斯大林那里的小伙子、肃反工作者（他点了他们的名字）打来的电话，他们提心吊胆地报告说，斯大林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得赶快过去。我给你打电话，也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您就直接过去吧。”我马上叫车。汽车就在我的别墅里。我迅速穿好衣服，驱车赶到，这一切花了15分钟。我们商定先不到斯大林的房间，去值班室。我们来到值班室，问道：“怎么回事？”他们说：“斯大林同志通常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1点钟左右，肯定按铃，叫人送茶过去。有时候他也吃东西。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我们派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去查看一下，这是个已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多年，一个目光短浅然而为人正直且对他忠心耿耿的女人。

肃反工作者对我们说，他们已经派她去看过那里的情况。她说，斯大林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他的身下全都尿湿了。肃反工作者将他抬起来，放到小餐厅的小沙发上。那里有大餐厅和小餐厅。斯大林是躺在大餐厅的地板上。可见，他是从床上起来，到了餐厅，在那里摔倒并且尿湿的。我们听到出了这样的事情，这会儿他似乎正在睡觉，于是认为，既然他处于如此不体面的状况，我们就不便到他的房间去让自己在场。我们各自驱车回家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电话铃声。还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斯大林同志身边的小伙子又来电话了。他们说斯大林的情况还是不大对劲。尽管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说他睡得很安详，可这是非同寻常的睡眠。还得再去一趟。”我们商定由马林科夫给常委会其他同志打电话，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没有来用餐，第一次来别墅也没有他们。还商定把医生也叫上。我们又来到值班室。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医生们都来了。医生中我记得有著名心脏病学家卢科姆斯基教授[2]。还有一位医生同他一起来，具体是谁，我现在不记得了。我们进了房间。斯大林躺在沙发床上。我们让医生开始自己的工作，检查一下斯大林同志目前的身体状况。第一个走过去的是卢科姆斯基，他倍加小心，我理解他的心情。他轻轻摸到斯大林的手，仿佛摸到了烧红的铁似的，甚至还抽搐了几下。贝利亚则粗暴地说道：“您是个医生，就好好地摸吧。”

卢科姆斯基说，斯大林的右手不听使唤了。左脚也已瘫痪，他不能说话，情况危重。这时马上把他的衣服剪开，又穿上衣服，抬到大餐厅，放在他平常睡觉的小沙发上，这里空气流通一些。当时就决定让医生在他身边值班。我们政治局常委也安排了自己的固定值班。是这样分工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我和布尔加宁，都是俩人一组。主要的“决定性人物”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们要值白班，我和布尔加宁排到了夜班。我很紧张，说老实话，我为可能失去斯大林而感到惋惜，他眼下病情依然极其严重。医生说患这种病的人几乎没有谁能恢复劳动能力的。人还可以活下去，但是要让他依然保持劳动能力，不大可能，而且这样的病往往病程不长，预后却很糟糕。

他好像是笑着用手给我们指：瞧，我就和这只小羔羊一样。

我们眼看斯大林已失去知觉，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开始给他喂东西：用小勺喂肉汤和甜茶。医生在那里发号施令。他们给他导尿，他则依然一动不动。我发现在导尿时他尽量想遮掩起来，感到很难为情。就是说，还有点知觉。白天（记不清是他患病

后的第几天了)斯大林恢复了知觉。这可以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出来。然而他不能讲话，只是抬起左手，不知是指天花板还是指墙。他的嘴唇仿佛出现了类似微笑的动作。后来开始同我们握手。我把手伸过去，他用左手握着，右手已不听使唤。他是以握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当时我说：“知道他为什么用手给我们指吗？墙上挂着从《星火》杂志上剪下来的某位画家的一幅画。小女孩正用奶瓶喂羊羔呢。我们用小勺给斯大林同志喂东西，他好像是笑着用手给我们指：瞧，我就和这只小羊羔一样。”

斯大林刚刚病倒，贝利亚就毫不掩饰地对他大发怨气，又是漫骂，又是取笑。简直叫人听不下去！不过有趣的是，斯大林刚刚恢复点儿知觉，有了能够康复的迹象，贝利亚就扑过去，跪在地上，抓住斯大林的手不住地亲吻。只要斯大林再次失去知觉、闭上眼睛，贝利亚就直起身子，往地上啐唾沫。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贝利亚！就连对于他似乎捧到天上、敬若神明的斯大林，同样是阴险狡诈。

轮到我和布尔加宁值班了。白天教授们来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去斯大林别墅，晚上再来值班。当时我对布尔加宁比对其他人更加开诚布公，我把最隐秘的想法都告诉他，我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斯大林很快就会过世。他显然是活不过来了。医生也说他活不成了。你知道贝利亚给自己定了个什么职位吗？什么职位？他要当国家安全部部长（当时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是分开的）。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只要贝利亚主管国家安全部，那我们的末日就快到了。他担任这个职务，为的是把我们统统除掉。他干得出来！”

布尔加宁说，他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行动。我对他说我跟马林科夫说说。我想马林科夫也是这个意见，他肯定什么都明白。应当采取措施，否则党就会大难临头。”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们，而是涉及整个国家，虽然我们也绝不想受到贝利亚的打击。那就会是回到1937～1938年，甚至更糟糕。我感到怀疑：我认为贝利亚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不过是混进党内的。我脑子里老是浮现出卡明斯基的话：内战期间英国人占领巴库时，他是英国反侦察机关的暗探，这只披着羊皮的狼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身居要职。斯大林本人也认为他是个累赘。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斯大林很怕贝利亚。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产生类似的想法，我愿在这里说一说。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那里坐着。他突然看着贝利亚说：“为什么现在我的身边全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贝利亚说：“这都是对您忠心耿耿的人。”“为什么格鲁吉亚人都忠心耿耿呢？俄国人就不忠心耿耿了吗？全都给我撤走！”很快，仿佛挥手之间这些人就被弄走了。贝利亚受斯大林之托对其他人干过诸如除掉、下毒等勾当，他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人对斯大林下手。因此，在斯大林看来（如果替他想的话），他认为贝利亚也可以对他来个如法炮制。就是说，必须撤走身边的人，因为贝利亚通过他们可以直接进入斯大林的卧室和厨房。那些天贝利亚跟丢了魂儿似的。

然而斯大林年事已高，他不明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阿巴库莫夫^[3]在向他报告一切之前，已经事先向贝利亚做了汇报，并且得到了关于如何向斯大林报告的指示。斯大林以为他提拔了一个新人，这个人就只干他所吩咐的事情。“梅格列尔案件”就是这样。斯大林当时口授了一个决定（该决定已公布），说梅格列尔人同土耳其人有瓜葛，他们当中有人向着土耳其。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斯大林针对贝利亚的行动，因为贝利亚就是梅格列尔人。就是说，他准备打击贝利亚。当时逮捕了许多人，然而贝利亚却巧妙地滑脱了，他作为“斯大林的刀子”介入这个案件，开始杀害梅格列尔人。那些人真不幸。他把他们像羔羊一样推上断头台。

还有足以证明贝利亚如何居心险恶、斯大林对他并不信任的其他事实。总之，我把一切都对布尔加宁讲了，我们值班一结束，我就回家了。想睡上一会儿，因为值班，我很久没睡了。我服完安眠药就躺下了。刚刚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电话铃响。马林科夫说：“赶快，斯大林病情恶化。赶快！”我马上要了车。的确，斯大林情况很不好。其他人也来了。大家都看见斯大林生命垂危。医生对我们说，斯大林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已停止呼吸。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进来一名彪形大汉，开始给他按压，进行操作，以便恢复呼吸。说老实话，我很可怜斯大林，大汉那么折磨他。于是我说：“听着，请您别做了。人都已经死了。您想什么？他不可能复生了。”他已死了，可是看着他受折磨心里难受啊。毫无必要的操作停止了。

斯大林刚刚去世，贝利亚立刻驱车从近郊别墅奔赴莫斯科。我们决定把全体常委都叫来，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叫来。我记不太准了。他们将到未到时，马林科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急火燎。我决定同他谈谈。“叶戈尔，”我说，“我要同您谈谈。”“谈什么？”他冷冷地问道。“斯大林去世了。我们往后怎么生活啊？”“现在说他干吗？等大家都来了再说。就是为了这个才开会的。”好像是很民主的回答。然而我却有另

外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他同贝利亚老早就把一切问题都说好了，一切早已讨论过。“那好吧，”我回答说，“回头再说。”

大家都全来了。也看到斯大林去世了。斯维特兰娜也来了。我去接的她。我见到她时十分激动，失声痛哭，无法抑制。我是真心地可怜斯大林，可怜他的孩子，从内心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为党和整个国家的未来感到不安。我感到贝利亚马上就要开始掌管一切，而这就是末日的开始。我不相信他，我已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和杀手。

开始分配职位了。贝利亚建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解除其党中央书记的职务。马林科夫建议批准贝利亚任他的第一副手，将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两个部分合并为一个内务部，并任命贝利亚为该部部长。我一言未发，布尔加宁也是一言未发。这时我担心布尔加宁可别到时候抢着发表意见，因为事先暴露自己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出了其他人的情绪。假如我和布尔加宁说我们反对，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指责我们在钩心斗角，是捣乱分子，指责我们在斯大林尸骨未寒时就开始在党内抢位子。是啊，一切的发展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莫洛托夫也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建议选举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免去什维尔尼克所担任的该职务。贝利亚对什维尔尼克说话很不尊重，说什么国内谁也不知道他。我看到贝利亚的计划已纤毫毕现，他想把伏罗希洛夫变成这样的人，就是以命令的形式使得贝利亚将要开始屠杀时的所作所为具有法律效力。贝利亚建议免去我的莫斯科党委书记职务，以便集中精力做好党中央的工作。我们还通过了其他的任命事项。通过了葬礼的日程和向人民发布关于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的安排。我们，他的继承者们，就是这样开始独立领导党和国家的活动的。

本文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述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

[1] 赫鲁晓夫的本名为“尼基塔”。——译者注

[2] II. E. 卢科姆斯基（1899～1976），著名内科医师，教授，若干医学院教研室主任，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63年起），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1967年），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69年），《心脏病》杂志主编（1966年起）。

[3] 维·谢·阿巴库莫夫（1908～1954），1930年入党。1922年起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被开除出党。1954年12月被判处死刑。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原苏联领导人。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至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Kirill Zhylynsky](#) on Unsplash

档案

斯大林想和我谈谈

爱伦堡 | 发现经典

吸引我的是那些严酷的、
动荡不安的年月盛衰沉浮的故事。

我再次看见莫斯科时，不禁大吃一惊：我出国的时候正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最后几个星期。现在一切全是另一副样子。卡片消失了，人们不用再去指定的地方购买东西。各个机关的编制大大缩减，谁也不去编制庞大的计划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诗人也不再写以宇宙为主题的诗歌。诗人米·格拉西莫夫对我说：“正确，但有点闷……”

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的女打字员，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们叫她克娄巴特拉），早已忘记“戏剧中的十月”和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的叫喊了。她站在彼得罗夫卡的商场旁边卖乳罩。

老工人和工程师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使工厂恢复了生产。商品出现了。农民开始把鸡鸭拿到市场上出售。莫斯科人吃胖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是又高兴又伤心。报纸上谈论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丑恶现象”。从政治家或生产者的观点来看，新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知道，它提供的东西正是它应当提供的。但是心灵有自己的论据：我常常觉得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丑恶现象。

我记得刚刚回到莫斯科后，我在食品商店门口怔住了。那儿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那个招牌“艾斯托马克”[1]（胃）。肚子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推崇。在彼得罗夫卡和斯托列什尼科夫拐角的一个咖啡店里，一张标语曾使我笑了声：“孩子们请光临，这儿可以吃到凝乳。”我倒没有发现孩子，然而顾客却很多，我觉得，他们眼看着都胖起来了。

许多餐厅都开门营业了：这里有“布拉格”，那里有“埃尔米塔日”，再远一些是“里斯本”“巴尔”。侍者们全穿着燕尾服（我一直没弄清楚，这些燕尾服是新缝的呢，还是革命前就藏在箱子里的）。每条街的拐角处都有喧闹的啤酒馆——有的是狐步舞曲，有的是俄罗斯的合唱，有的是茨冈舞曲，有的是巴拉莱卡琴的演奏，有的干脆就打耳光。人们喝着啤酒和波尔图葡萄酒，希望快点醉倒；有的人吃豌豆或里海拟鲤，他们叫喊着，挥舞着拳头。

餐厅的旁边，马车夫们在等候顾客，同我久远的童年时代一样，他们低声说道：“老爷，我送……”

这里也可以看见乞丐和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他们央求道“给一个戈比吧”。戈比是没有的，有的是百万巨钞（“柠檬”）[2]和新发行的十卢布纸币。在赌场里，一夜之间可以输掉数百万：这些钱都是经纪人、投机商或普通小偷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

我在苏哈廖夫卡广场上听过各种各样的小调，也许它们比许多其他的描写更能清楚地告诉读者什么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丑恶现象”。有一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小调：

红烧小鸡，红烧小鸡，
小鸡也想活下去……
我不是苏维埃的，我不是立宪民主党的，
我不过是禽类的政委。
我没骗过人，我没枪毙人，
我只啄食过小小的谷粒……

一个卖小面包圈的女人唱着这样一个小调：

我的爸爸是酒鬼，
他嗜酒如命，
他撒谎，还妄自尊大，
我哥哥是小偷，
姐姐是妓女，
已完全堕落，
妈妈又是烟鬼——
多么可耻！

还有一个土匪的小调，好像是从敖德萨传来的：

同志，同志，我的伤口很痛……
同志，同志，我们干吗战斗，
我们干吗流血——
资本家大吃大喝，资本家兴高采烈……

我遇见了一个革命前在餐厅卖唱的茨冈女人。1920年，她几乎每天都去找梅耶霍德，要求批给她一份口粮。后来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将她介绍给音乐部。她笑着对我说：“我过了四年的流浪生活，现在终于定居下来了，现在我在‘里斯本’演唱。”

引用：我不是苏维埃的，我不是立宪民主党的，我不过是禽类的政委。

一个熟识的女演员请我去她家做客。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在克鲁泡特金大街附近的一座别墅里保有一所单独的住宅。客人很多，大家跳着狐步舞——隆重异常，仿佛在举行什么典礼似的。午夜时分，来了一个穿浅棕色窄上衣的年轻人，他故作宽容地说：莫斯科的人分辨不出一种狐步舞跟另一种狐步舞有何不同，他不久前出差去国外，看见莱比锡的人怎样跳狐步舞。所有的人都在静听他的议论。留声机开动了，还是巴黎和柏林的舞厅里的那些小调：《你喜欢香蕉吗》《我寻找我的梯丁娜》。一个女演员对我说，这个过去莱比锡的年轻人和她一起在戏剧学校学习过，如今在外贸部工作。“恐怕快要蹲监狱了，他受了不少贿赂……”

有产者从小就过着富裕的生活，胡乱花钱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旧的资产阶级跑到了世界各地，许多人在国外的遭遇相当凄惨，从富足和游手好闲沦为贫困和干粗活，使许多人陷于绝望，或者自杀，或者犯罪。耐普曼[3]的社会出身是极其复杂的。从前的一位律师助手，曾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过两年，这时突然干起贩卖卧铺车厢车票的生意。我认识一个诗人，1921年他在“多米诺”咖啡馆朗诵半未来派的诗，如今却在贩卖法国化妆品和爱沙尼亚的白兰地了。古容工厂从前的一个工人、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受到了审判——他偷了一车厢布匹，偶然落网了：他在饭馆喝醉了酒，打碎了镜子；人们在他身上搜出了八百万。当然，他不像一个传统的有产者，正如过去是富有的房主的儿子，如今迫于贫困而进了巴黎的工厂的一个中尉不像无产者一样。百万巨钞冲昏了耐普曼的脑袋，他们胡作非为，吵嘴打架，很快就毁灭了。很少有人想到困难的日子：大家既

不相信新经济政策能实行很久，也不相信纸币。在合法的暴利和非法的投机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一个厨师知道，什么时候该撇去鱼汤上的浮沫，但是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是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

旁边是另一个莫斯科。从前的“大都会饭店”成了苏维埃第二大厦，一些负责的工作人员住在里面，他们在食堂里吃着薄薄的炸肉饼，继续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工程师和医生、教员和农艺师，如果不是抱着先前的浪漫主义热情，那也是抱着先前那样的决心来恢复被国内战争、封锁和连年干旱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技术博物馆讲座的门票仍像过去那样难于弄到，商店里的书籍卖得很快——对知识的冲击仍在继续。

我在 1924 年写道：“我不知道，这一代的青年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呢，还是美国化的专家，但是我喜欢这新一代，他们勇敢而莽撞，能够冷静地学习和愉快地挨饿，不是像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剧本中的大学生那样挨饿，而是严肃认真地挨饿，他们能扔下机关枪捡起自修课本，也能扔下自修课本再去捡起机关枪，他们在马戏院中哄笑，在悲伤时严峻，没有眼泪，对柔情蜜意和艺术格格不入，献身于精密科学、体育和电影艺术。他们的浪漫主义不是表现在创造世间的神话，而是表现在勇敢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建造出成批的工厂，这样的浪漫主义已为十月革命所证明，已被七个革命的年头的鲜血巩固下来（当然，这种措词流露出我过去对结构主义的迷恋，但是我觉得，我正确地指出了那些年的青年人的一些特点。）我补充道：“他们能够批判地对待事实，这很好。如果有人对任何一个报告人都唯唯称是，他们就取笑他，叫他‘是先生’——这个词是从单音节的‘是啊，是啊’变来的……”

我所说的这些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都是本世纪初出生的。我比他们大十岁到十二岁，但是两代人的差别却非常显著。我的同辈人有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茨韦塔耶娃、费定、曼德尔施塔姆、帕乌斯托夫斯基、巴别尔、特尼扬诺夫。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革命前度过的，我们记得很多东西，这有时妨碍了我们，有时也帮助了我们。而 1924 年的大学生是以少年人的眼光看革命的，他们是在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成熟的。这一代人有法捷耶夫和斯韦特洛夫、卡维林和扎博洛茨基、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和卢戈夫斯基。这一代人也为数不多了。那些活着的人也都已退休，他们有充分时间研究雨果所说的“做祖父的艺术”的那种东西；而且我发现，年轻人同他们较之同自己的父辈更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一片白雪怜悯地覆盖着一切。当解冻的天气刚一来到，地面就暴露出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市侩习气使我们大为震惊，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绝望，那时我们也太天真，不明白改造人远比改变管理国家的制度困难得多。

我在莫斯科没有住宅，我被安顿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的改良学者生活中央委员会里。在那儿常常可以碰见一些年老的学者，他们不是谈谈天就是一言不发地叹着气，——他们太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了。

在那些年代，许多诗人也在唉声叹气，但由于他们唉声叹气不是在改良学者生活委员会的餐厅里，而是在杂志上，所以招来了责骂：笑容被认为是政治坚定性的证明。一种名叫《在岗位上》的杂志出版了，名称颇有浪漫主义气息，但实际上与其说它像战斗岗位，不如说像民警的岗位。岗位派对所有的人都骂——阿·托尔斯泰和马雅可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叶赛宁、阿赫马托娃和魏列萨耶夫都挨过骂。然而，诗人继续在唉声叹气。阿谢耶夫写了一篇关于爱情的感伤的长诗《抒情的插笔》，于是岗位派便兴高采烈地从中摘引出片断的诗句：

共产主义的一代，
既然时代被涂成棕色，
而没有被涂成红色，
我又怎能当你的诗人？

我去找马雅可夫斯基，在布里克的家里和往常一样，客人很多，他们喝着茶，吃着凉肉饼。马雅可夫斯基面色阴沉，他正在这里完成一幅招贴画。过了几天，我在俱乐部里碰见了他，他说，应该帮助国家同私人商业进行斗争，他写了一些标语：

凡是肠胃、身体或头脑
需要的一切，——

国营百货商店向人提供
一切。
或者：
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正在解决，——
生活中最好的是大使牌香烟。

夜里，他突然读起长诗《关于这个》里面一些出色的诗行，他企图用诗说服自己，他绝不会自愿地和生命告别……

我喜欢这新一代，他们勇敢而莽撞，能够冷静地学习和愉快地挨饿

散文的时代开始了：该对过去经历的一切作一番回顾了。法捷耶夫写了《毁灭》，巴别尔写了《骑兵军》，特尼扬诺夫写了《丘赫利亚》，左琴科写了《西涅布留霍夫的故事》，费定写了《城与年》，列昂诺夫写了《獾》。

我想在国内旅行一趟，我没有钱，但是一个文学晚会的组织者（这种人当时很多）的建议诱惑了我。他建议我去彼得格勒、哈尔科夫、基辅和敖德萨，作一些关于西欧生活的报告。这位巡回报告的组织者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以便增加一些收入，他是个年纪不轻的人，一向不走运。他考虑得非常周到：报告会由红十字会主办，一定可以弄到一笔收入，他还向其他城市派出了几个侦察员；其中之一就是这位组织者的儿子廖尼娅，这是个年轻的大学生，腼腆的无赖汉，他决心抓紧时间写一本关于我的书，便不住地拿各种问题来纠缠我：“请您谈谈您的初恋”“您认为谁更伟大，是伏尔泰还是安纳托尔·法朗士”“照您的看法，爱神是生着翅膀，还是没有翅膀”。另一位组织者则是个十分干练的人，他津津有味地吃着鹅肉，在小车站上寻找一些苦闷的姑娘，将她们引诱到卧铺车厢的单间里，和一些出租大厅的机关办交涉，他对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赚二百卢布，您瞧着吧，一定可以赚到……”

应当给报告会取个名字。马雅可夫斯基使观众养成了看海报的习惯，这些海报任何一个美国人看了都会感到羡慕：“诗歌即加工工业”“无限小的分析”“三个美洲的指挥”“里济斯特拉特 [4] 的白色小灌肠”“爱伦堡毕竟在旋转”“烟鬼魏列萨耶夫”“庆祝年轻女皇的舞会”“勃留索夫和腹带”。组织者恳求道：“选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吧……”我挑了我头一次想到的——“醉汉演说家”。

组织者在哈尔科夫租了“密苏里”马戏院。当时根本没有扩音器。我竭尽全力高声地讲着卓别林的影片，然而听众还是不断地尖叫：“听不见。”我想走开，组织者却拦住我说：“这样他们会要求退票的。我有一大家人……加把劲吧！……我的妻子正在给你搅和拌糖的生蛋黄呢……”

我第一次看见了敖德萨，过去我是从一些笑话中知道敖德萨的，“敖德萨——妈妈”使我惊讶：它蒙着一片忧郁的气氛。港口异常冷清。有的地方残留着一片片废墟。显然，昔日的轻佻早已无影无踪，生活还没有走上轨道。我在一个广场上看见一个满脸大胡子的有封邑的公爵的头像，下面写着“卡尔·马克思”。我作报告的那个剧院的一个年轻女验票员使大学生廖尼娅大吃一惊，因为她突然对他说：“干吗您老向我送秋波？……这早已不时兴了。您可以请我去‘伦敦饭店’吃一顿晚饭，那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因为我现在实行经济核算……”

“伦敦饭店”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其中一部分房间像过去一样住着负责干部，妻子们用煤油炉烧饭，照顾孩子，晚上谈话的题目不外是《真理报》的新社论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另一部分房间里则住着投机商人、新闻记者、小型文艺节目的演员、“红色商人”，他们通常是喝酒，有时也吵吵闹闹。我在市场上听见这样一支小调：“在什内尔松的家里非常吵闹……”实际上什内尔松家里十分清静，新改名的街道——国际主义街、无产阶级街、拉萨尔街、公社街也都相当清静。在佩切斯基咖啡馆中，投机商人要了一杯茶之后，就相互捣腾起一些破旧的绿色或橘黄色的美钞来。经纪人有时也神经质地打打哈欠，——偶尔也进行搜捕，抓走所有的人。

在当地报纸的编辑部里，秘书将一个敖德萨青年写的诗拿给我看，他写的是关于大海、鸟和鸟笼，这些诗我很喜欢，我问这个诗人叫什么名字，秘书回答说“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我的手表的玻璃蒙子碎了，去找钟表匠修理。这位钟表匠磨蹭了好半天，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等着，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今天的报纸上对寇松大加责骂。可我

对您说，寇松不怕他们。不过，我倒有些怕他们。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安局，第三，我怕您——我怎么知道您是什么人，您又为什么想叫我把心里话都对您掏出来……”

讨饭的女人们哀求道：“同志，给一点什么吧”“仁慈的公民，请看在上帝的面上”“老爷，给个戈比吧”……用语是混乱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基辅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雪橇经过克列夏奇克，突然，雪橇滑脱了，马和车夫向前奔去，我和雪橇的垫子陷进雪堆里。雪橇不坚固，但是市场上却出售许多革命前的名贵物品：茶炊、辛格牌缝纫机、摩瑟尔牌手表和商人用的大肚茶杯。

人的意识中的旧东西是最牢固的。在一个车站上，一个背着口袋的农妇误入了软席车厢。列车员大声对她吼道：“往哪儿钻？下来！现在可不是1917年！……”

在戈梅利市的车站餐厅里挂着一句格言：“不劳动者不得食”。坐在桌旁吃饭的都是卧铺车厢的乘客。一些无人照管的流浪儿也在这儿徘徊，希望得到一点残羹剩饭。有个乘客将碟子里剩的一小块酱肉递给一个小姑娘：“吃了吧！”一个侍者（或者如当时人们所称呼的“服务员公民”）跑过来，从小姑娘手里夺过了碟子，把那块肉和一片土豆抖在小姑娘那件破烂不堪的衣衫上。我大为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小姑娘一面哭着一面赶忙吃掉了。我在戈梅利市参观了一个火柴工厂，厂长从前是个工人，在和邓尼金打仗时负了伤，现在他抱病工作，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张罗糊火柴盒的糨糊，他一再地说：“国家需要火柴……”戈梅利的青年们谈论着汉堡的战斗，谈论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谈论着未来。然而我的眼前却是车站餐厅里那一个个愚钝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和遭到侮辱的孩子……

组织者能干的助手十分满意：他超额完成了计划。廖尼娅要写的那本关于我的书没有写成，他对所有的人说：“干吗写他？我对他太了解了……”廖尼娅的父亲失败了，虽然收入不错：从敖德萨到列宁格勒的途中，由于受到风雪的阻挠，我们在一个小站上耽搁了两天，我的巡回报告的组织者不得不付场地的违约金。有什么办法——他一辈子都不走运。至于我，我是很满意的：我大开了眼界。

每次报告会后，听众就向我提出一大堆问题，我记录了其中的一些：“为什么德国没有发生革命”“现在巴黎的时髦衣服是些什么样式”“您对您的《胡列尼托》作何评价，肯定还是否定谁更坏——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还是法西斯分子？请简单地解释一下相对论为什么小学又开始收费”“为什么你们这些作家总要引起姑娘们对形形色色的解释发生兴趣”“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要不要外国战士参加”“你是王德威尔德[5]的朋友，对不对？”有的报刊说，你是腐朽的产物，因此请告诉我，您作一次报告拿多少钱”“马雅可夫斯基说，诗歌是一种产品，但普希金不这么说：您认为谁对？”“共产主义是否会开辟战胜死亡的可能性”“你赞成足球还是赞成橄榄球”“请你谈谈卢瑟福[6]在原子变性方面的工作”“二步舞和狐步舞有何不同，在柏林人们通常跳什么舞”“为什么我们有人在翻译《泰山历险记》，而马赛尔·普鲁斯特[7]的长篇小说却没有译本”“依你看，币制改革对缩小剪刀差有影响吗？”“你认识毕加索吗？他现在做什么？”“性爱是资产阶级的残余，为什么不直接说明这点？”“不久以前在这里讲演的一个人说，在过渡时期，艺术还需要保留下来，但到了共产主义时代，艺术便消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请帮助解释一下”。

然而我的眼前却是车站餐厅里那一个个愚钝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和遭到侮辱的孩子

我摘引的这些问题按照原先抄录的顺序（确切地说是杂乱无章），我觉得，它们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些遥远的年代。

我经常同青年人谈话，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聪明，有的愚蠢，有的诚实，有的喜欢钻营。新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复苏，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它未必是一所好学校。所有的人都还清清楚楚记得国内战争年代的情景：功勋、荣誉、暴行、英雄行为、掠夺。青年人从前线、从乡村来到大学里，他们热情、坚强。大学生学习很卖力，而且很懂规矩，他们摇摆于朴素的功利主义和他们那个年龄所特有的浪漫主义之间。然而也有不少的人头脑发热，渐渐变成了沽名钓誉的人、没有起码道德观念的幻想家和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胡作非为的意志薄弱者。一些人过着俭朴的大学生活，另一些人则花天酒地。叶赛宁在其中作过垂死挣扎的“酒馆的莫斯科”酒气熏天，使许多人误入歧途。

一个年轻人对我谈起了一段很长的、糊里糊涂的但也并不十分复杂的故事：不久以前，他是个诚实的共青团员，学习也很好。后来一个同学引诱他去干一桩恶劣的勾当，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冠冕堂皇，——他接受委托去募捐，以便发展航空事业，实际上这是一群骗子在骗钱。这个大学生很愤慨，想去报告国家安全局，但是当他分到一沓钞票后，

浮华的生活使他迷了心窍。这时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她向他索取礼物，于是他干起投机活动来了，他被共青团开除了，正在等候逮捕。他有一双富有表情的手，这双手常常举起，做出威吓的姿态，或者表示哀求。

我想对他这样的人作一番描写。我走访法院，获得同被拘留的犯人谈话的许可。吸引我的东西，当然，不是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不是刑事案件，而是那些严酷的、动荡不安的年月盛衰沉浮的故事。

当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贪图私利者”，于是我便称呼我的主人公——一个基辅侍者的儿子为贪图私利者。我描写了他的童年、他对荣誉的渴望、他的自私自利，描写了他在革命初年的热情，如何参加国内战争，进学校，最后描写了他的堕落。米哈伊尔·雷科夫（我的主人公的姓名）有一个兄弟阿尔乔姆，他为人诚实，不大懂得爱情，但很善良，他竭力想使米哈伊尔避免堕落。我的主人公不是拉斯季尼亞克，他的心中交织着复杂的、有时是对立的感情。他爱上了一个贪财而且头脑空虚的女人，他同她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像个孩子。但是他却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比同志们优越得多。也可以说，他有点像一百年后出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的于连·索勒尔。他受到了审判，在监狱里自杀。

我在一封封信中写道：“我的《贪图私利者》即将脱稿。我甚至舍不得和我的主人公分手，虽然他是个坏蛋，是个有点浪漫主义情调的败类和热情奔放的投机分子……”现在我也认为，作家在表现批评家称之为“反面人物”的那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时，是对他们怀有恋恋不舍的感情的：因为他看见那个堕落的人的心灵里也有一些好的素质。我从来不打算替贪图私利者辩护。我选了一段谴责个人主义的古代祈祷文作为此书的卷首题词：“愿你发挥你的神力，使今年风调雨顺，愿那途中遇雨的旅人的祈祷不会为你接受，雨是旅人的障碍，却是世人的甘露。”

我知道，我还会遭到指责：干吗去写一个可怜的贪图私利者，周围不是有那么多崇高的、有鼓舞力的英雄吗？我想，医生的责任是诊断病情，恐怕只有疯子才会认为医生在判断流行病情况的同时也传播了流行病。我在长篇小说《贪图私利者》里面打算描写误入歧途的米哈伊尔·雷科夫的精神世界，附带以讽刺的手法描写一下那几年的生活。甚至岗位派分子也在理论上承认讽刺是必要的，然而，每当有人试图描写我们生活中的某一丑恶现象时，他们就立刻宣布这是诽谤。“我们需要我们的谢德林和果戈理”——这话我是很久以后才听到的。讽刺在理论上依然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却好像是一种破坏行为；有个诗人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我们需要
慈悲些的谢德林
和这样一些果戈理，
以免我们被打扰……

我在1924年写道：“如果在我的书中所谓的‘反面典型’具有更大的表现力，那应该把这看作是缺乏多样性和人类的天性有局限性，而不应看作是狡猾的诡计。我多么希望能看到一部描写健康的、朝气勃勃的新人的史诗般的卓越作品来代替我那些揭露性的作品啊！唉，好心的批评家们并不急于它快点写出来，他们更喜欢责备我。而我也更喜欢献身于我生来就酷爱的工作。我并不等候那部描写阿尔乔姆的鼓舞人心的书问世之日，我只想把他的兄弟的故事告诉同时代的人们……”

我在1925年1月26日写道：“波波夫拒绝了《贪图私利者》，因此它未必能够出版……”（我不记得我说的是哪一个波波夫了。）

一个相当著名的岗位派分子称呼我是“革命的公开敌人”，他写道：“《贪图私利者》的感染力就在于作者欣赏新经济政策时期那群贪婪的家伙，肯定资产阶级豺狼对我国整个经济机构的掠夺。这就是俄国的施本格勒之流昨天的候补人的最终覆灭……”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在忧伤的时刻写道：

稍微刮起一点北风，
我们便四向凋零。
我们用自己的躯体为谁铺幽径？
谁的脚掌将在我们腐烂的躯体上走过？
年轻的号手会践踏我们吗？
我们的上空是否会出现陌生的星座？
我们是老朽的橡树上的凋落的叶子……

我在铁匠街上一家书店的橱窗中看见了“苏维埃文学的大树”。树枝上挂着解说性的标签：“无产阶级作家”“列夫派”“农民诗人”“左派同路人”“中间派同路人”“右派同路人”“新资产阶级文学”等等。树下有几片落叶，其中的一片叶子上写着：“爱伦堡”。

接着而来的是十足强劲的北风。我没有凋落真是个奇迹。

[1]“艾斯托马克”是胃的法语读音。

[2]十月革命初期，由于货币贬值，旧卢布的面额高达百万，人们谑称一千万为一个“柠檬”。“柠檬”的读音与“百万”的读音相近。

[3]耐普曼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

[4]里济斯特拉特（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雕塑家。

[5]王德威尔德（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

[6]卢瑟福（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

[7]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

我正在看一张褪了色的小照片。距科尔多瓦不远的小地方蒙蒂利亚的一个酒窖。肥胖的主人，柳芭，恩斯特·托勒尔。一个多么愉快、轻松的日子。我们在凉爽的窖里久久地喝着葡萄酒。托勒尔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而主人则对我们说，世上没有比蒙蒂利亚酒更好的葡萄酒了：“要知道人们在赫雷斯酿造阿蒙蒂利亚多葡萄酒并不是偶然的，但在蒙蒂利亚却谁也不去考虑酿造阿赫雷萨多酒。”这句话说得很令人信服，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埃德加·坡写的一篇关于一只阿蒙蒂利亚多酒桶的短篇小说，又使我们还想尝另一种蒙蒂利亚酒，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暂时忘却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们都不急于离开，托勒尔说：“人不会自动离开天堂，只有被赶出天堂。”我们回到科尔多瓦已是深夜了。

我没有凋落真是个奇迹。

（战争时期，在距蒙蒂利亚不远的地方驻扎了几支共和国的军队。需要出一期军报，但没有纸张，于是报纸便用肥胖的葡萄酒商用来包酒瓶的一种薄纸出版了，在战报的字里行间隐约可以看到这样一行字：“蒙蒂利亚酒——世界最好的葡萄酒。”）

为什么我谈到托勒尔的时候要从蒙蒂利亚开始呢？须知我是1926年或1927年在柏林认识他的：我们常在巴黎、莫斯科、伦敦等城市里见面，进行严肃的谈话。我现在之所以回忆起我们在安达卢西亚省（我们在塞维利亚相遇，在阿尔赫西拉斯分手）共同度过的几天，是因为我当时所见的托勒尔是幸福的。他经历了艰苦的生活，他曾和别人争论、说服别人、诅咒别人、相信别人、感到绝望，而同时又是一个空想家、诙谐的人，甚至是一个奢侈逸乐的人，在谈到这位诗人兼游击队员的时候，我首先想起来的就是短短的抽一支烟的工夫。

托勒尔很漂亮，像一个意大利人，像新现实主义影片中的一个愉快而忧郁、经常四处碰壁的主人公。也许不寻常的温和是他的主要特点，但他却经历了十分严酷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蜡塑的，有的是石雕的，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天性问题，一个人常常选择一条跟造成他的材料不大适合的道路。我认识一些意志坚定、神经坚强、果断勇敢的人，但他们却选中了生活的后方，钢也会生锈。托勒尔是为沉思冥想、为柔和的抒情诗而生的，但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选择了一条行动、斗争的艰苦道路。

他活过的年头并不多——四十五年，但似乎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写文章谈论他的错误。他没有提出过抗议，有一次他对我说：“事实上我犯的错误要多一百倍，但有一半他们不知道。而且他们所列举的还仅仅是我独自一人所干的蠢事。可是大家又犯了多少错误呢？……”

托勒尔的某些错误是年龄以及时代造成的，他不仅承认了这些错误，而且已用行动把它们一笔勾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二岁，他很瘦弱，因而被淘汰了，但他经过力争，终于被派往前线——到法国去：他相信德国在捍卫正义的事业。巴比塞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四十岁，他相信法国在捍卫正义的事业。托勒尔很快就明白过来，他听信了谎言，做了普遍的变态心理的俘虏，便开始揭露战争的罪魁祸首。他被捕了，被送进了军人监狱，后来又被送进了疯人院。

他是一个年轻的、才气横溢的诗人：他的诗曾博得里尔克、托马斯·曼的称许。他本来可以用诗歌来描写和歌颂革命，但他却作了另一种抉择——他成为巴伐利亚革命的领

导者之一，中央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批评家们过去常说，而且至今也还在说，托勒尔的政治修养不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他却有丰富的良心——这是一种非常麻烦的特性，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总是要为它付出代价的。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总共只存在了几周，白党冲进了慕尼黑。敌人高价悬赏索取托勒尔的头颅，于是他被出卖了。他在法庭上说：“战斗刚刚开始，资本主义政府的任何刺刀、任何战地法庭都扼杀不了革命！他当时二十六岁，他在尼德山菲德监狱蹲了五年。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柏林看到托勒尔在狱中写成的一个剧本时有多么激动：这是一封寄往狱外的信。

德国反动派在那几年里处处告捷，不仅在巴伐利亚，同时也在柏林、萨克森、汉堡不消说，白党将军艾普指挥战斗要比诗人托勒尔高明。值得惋惜的是巴伐利亚的革命者没有找到自己的邵尔斯或恰巴耶夫，但责备托勒尔却未免荒唐：他知道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前面没有荣耀、没有权力，而只有镇压者的镇压。他被称为“伤感的革命家”，但是要知道，他不是从年复一年地考虑策略、制订计划的地下小组走向革命的，而是从诗歌走向革命的，他在政治上至死是一个无师自通者。

当他在1924年出狱的时候，他已在文坛享有盛名，他的剧作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剧院上演。它们的成功也许不仅是由于艺术上的优点，而且也由于主题的尖锐性，观众有时候也许不是向戏的本身鼓掌，而是向作者的生平鼓掌，但托勒尔在文坛上既不是一个冒名者，又不是一个偶然的客人。许多互不相同的作家——托马斯·曼、高尔基、罗曼·罗兰、辛克莱·刘易斯、孚希特万格对他都有好评。他本来可以伏案写作并成为一个大名鼎鼎、人人尊敬的作家。但他身上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不安定。他没有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而且也不可能成为革命战士，但他继续在打游击，良心看来要比对轻松愉快、无所牵挂的生活中的千千万万琐事的眷恋来得强烈。

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如果他没有一种罕见的魅力，他恐怕会引起所有的人对他的反感，但敌手总是出人意料地软化下来。一位很爱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曾当着我的面说“可是要知道这是托勒尔呀！对他能有什么要求呢？……”

我还记得在科尔多瓦的一次混乱而又美好的谈话。在谈话之前我们在城里漫步了很久，当地的一位都市主义者向我们解释说，古老的科尔多瓦的蜿蜒曲折的街道是经验丰富的建筑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设计的：即使在7月份的中午，所有街道都有一侧有阴影。我们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托勒尔称赞道：“他们想到了普通的步行者！”后来我们就谈起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托勒尔笑了笑说：“我写过几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失败的剧本。也许我不是一个剧作家，但行动的错觉却使我对戏剧发生兴趣……要显身扬名是容易的。易卜生出色地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公敌’是一个最正直的人……但是有多少沽名钓誉者、利己主义者和无聊之徒在叫嚷个人的权利！他们想混水摸鱼……应该为这样的社会而斗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既有享受阳光的权利，也有享受阴影的权利……恩人们开处方来却总是这样——不是给你一大堆阳光，就是给你一大堆阴影……我看到政权（即使是昙花一现的政权）怎样使人变形……”他谈到自己以往的趣事，谈到德国的作家们，突然忧郁起来：“我担心纳粹分子会胜利。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战争……”他想起了他在狱中写成的一部关于燕子的书：“不是的，我不是指我的诗。可您还记得一个工人，一个石匠的信吗？狱长下令捣毁燕子窝，于是蹲在旁边囚室里的一个工人就写了一封信，说这些窝是燕子们辛辛苦苦筑成的，它们都是正直而热爱劳动的鸟儿。当然，这封信并没有使狱长回心转意。这是一幅微型的战争画：捣毁燕子窝……想到未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窝是燕子们辛辛苦苦筑成的，它们都是正直而热爱劳动的鸟儿

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想写一个剧本：在金钱、傲慢、愚昧的世界里的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1]。这个剧本他没有写成。他曾对孚希特万格说，他正在写一部关于狄摩西尼[2]的长篇小说，狄摩西尼是一个想捍卫希腊文化免受野蛮摧残的人。长篇小说他也没写成。他总是忽冷忽热，刚开始写点什么就又抛开了——时代太动荡不宁，他太富于同情心了。

托勒尔在国外始终保卫苏联，甚至在他对我们这里的某种现象不大喜欢的时候也不例外。他在莫斯科有几个朋友，他常同他们推心置腹地长谈。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曾对我说，如果说他有什么希望，那就是莫斯科。

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托勒尔写了一本关于自己青年时代的书，他在书中描写了他对德国的爱，他的自白近似杜维姆的自白：“难道我不爱这个国家？置身于地中海

岸边壮丽景色之中，难道我不缅怀贫瘠多沙的松林，德国北方平静的、孤零零的湖泊？难道歌德和赫尔德林的诗歌不曾使我在童年时代神往？……德语——难道它不是我的语言，不是我用来思考和感受的语言，不是我整个身心的一部分，不是抚养并养大了我的祖国？……盲目的民族主义和可笑的种族傲慢正在所有的国家抬头。难道我能让自己成为今天的变态心理的奴隶？……我现在觉得，像‘我以我是德国人而骄傲’或‘我以我是犹太人而骄傲’这种话就像一个人说：‘我以我有深棕色的眼睛而骄傲……’一样毫无意义……”

不，他没有向时代的疯狂屈服：他依然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他悲惨地死亡之前不久，病魔缠身、悲观绝望的他曾怀着一种狂热集资赈济挨饿的西班牙儿童，他从那些自私自利、漠不关心的人们的口袋里挖出英镑或美元，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凑了一百多万美元。当托勒尔同铁石心肠的人们谈话的时候，就连他们也变得温和了，——善良发自他的内心。

西班牙战争开始之前不久，在 1936 年 6 月间，我在伦敦出席反法西斯作家联盟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后，托勒尔邀我到他那里去，他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他和往常一样忙于处理许许多多刻不容缓而又需要细心和耐心的事务，和往常一样虽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却很孤独，比在囚室里还要孤独，——他立刻就向我供认了这一点。我发现他面庞瘦削、神色郁悒。他觉得英国人和法国人轻视德国侨民，这使他感到气愤。报刊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不是捧场就是谨小慎微，托勒尔愤怒地用红铅笔画出文章中的重点然后就把报纸扔在地板上。他突然像一个孩子似的埋怨伦敦的冬天太冷没法取暖，我还记得他的话：“现在室外的冬天比莫斯科、比拉普兰的冬天都要长上十年或二十年。根子结实的人忍受得了。别的人就得一个跟着一个地冻死……”

托勒尔又支持了三年。我在巴黎见了他最后一面。乍一看来我觉得他的气色比过去好了，他甚至还试着开玩笑。当时他正在集资赈济西班牙儿童。我们告别的时候，他曾问我：“您睡觉不用服安眠药吧？……夜里真可怕——什么都比白天看得清楚……嗯，好吧……说不定咱们不久又会见面。我已决定离开美国——太远啦，在那里连随便提一提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都办不到，——人们感到奇怪，向我推荐神经病医生……再见！……”

此后我们不曾再见。1939 年春在纽约召开了笔会的代表大会。托勒尔在盛大的午宴上企图使举座震惊，便提起了缪查姆[3]、奥谢茨基[4]、图霍尔斯基[5]的遭遇。过了几天，5 月 22 日，他在旅馆的浴室里上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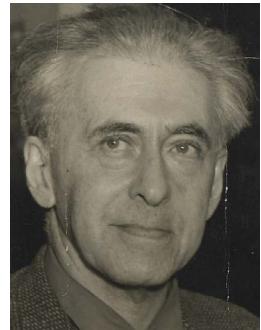
我现在一面回忆着托勒尔，一面轻轻地微笑：一个好人，朋友，诗人，不仅在书中如此，在生活中亦是如此。我喜欢他在狱中写的诗集《燕子的书》。



本文摘自《人，岁月，生活》
〔苏联〕爱伦堡
冯南江 / 秦顺新 / 王金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师们，
你们感到自豪。穷人砸碎了石头，
满腹忧伤的玻璃吹制工人，
用图案的痛苦遮蔽太阳，
人们用铜铸成钟，
拱顶直薄云霄，但求一死，——
你们把你们的石头献给死亡。
然而燕子们发出啁啾声和叹息声，
用泥土、细枝和干草筑巢，
并把那些木房——尘世的幸福、温暖的巢穴，
献给了生命。

托勒尔自己就像一只燕子，也许正像飞来得过早而没把春天带来的那“一只”。



[1] 堂吉诃德的随从。

[2] 狄摩西尼（约公元前 384—前 322），雅典雄辩家，反马其顿的民主派集团领袖。

[3] 缪查姆（1878—1934），德国反法西斯作家、革命家。

[4] 奥谢茨基（1889—1938），德国反法西斯政论家。

[5] 图霍尔斯基（1890—1935），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和政论家。

爱伦堡

苏联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一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后长期旅居法国，多年从事记者工作，一生著书甚丰。其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巨浪》《暴风雨》《解冻》及晚年的大型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我国文学界有较大影响。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Soviet Artefacts](#) on Unsplash

档案

人为的辩证法

以赛亚·伯林 | 发现经典

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

曾经有个人在海船上找了一份招待的工作。有人提醒他，当船在恶劣的天气里左右摇摆时，要想不摔坏盘子就千万不要走直线，而要尽量走 Z 字形，那是老海员的经验。那人说他明白。坏天气如期而至，而随便听到摔碎盘子的刺耳声音，那位招待连同他所端的美食一股脑儿都摔到地板上去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听从别人的建议。他回答说：“我听了，我是照他说的做了。可是当我向左走的时候船却向右摆，而我向右走的时候船又向左摆。”

能够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行为与党的辩证运动合拍搭调——对从左向右转这个精确瞬间的把握多半靠的是直觉——那是苏联公民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诀窍。如果你不谙此道，即使对这个体制有再深刻的理论认识也无济于事，一些才能出众、精明强干，在建国之初曾经狂热拥护、坚定支持这个政权的人最终却被打倒，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

—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科学声称能够越来越准确地预知组织或个人的行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一种政治进程仍然引起极大的困惑时，会感到奇怪。它既不是发生在某些尚未探索的自然领域，也不是发生在连心理分析也解释不清的个人灵魂的隐秘深处，而是发生在一个明显受到理性铁律支配的领域，据说，所有由偶然因素、人们的突发奇想、不可预知的情绪波动、自发性、不负责任、一切缺乏严格逻辑关联的事物所带来的影响，都已经被无情地排除到这个领域之外。我所指的进程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产党的总路线”。它在方向上的急剧变化，不仅让外界感到莫名其妙，也使苏联自己的公民觉得困惑；不仅苏联的普通公民困惑，就连国内外的共产党员自己也摸不着头脑。屡次弄得他们心惊胆颤、手足无措。

不能预测变化无常的路线对共产党员来说是最大的失败。轻则打乱他所有的个人计划；重则把他整个人彻底毁灭。莫斯科经常突变的“路线”连累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深受其害，这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来，尤以德国共产党最为明显。一批由熟悉内情的前共产党员巴尔明、西里加、罗西和路特·费舍尔写的书，以及由转向反对苏联政体的天才作家阿瑟库斯勒、汉弗莱斯莱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写的影射小说，都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生动的描述。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共产党对外政策中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大多数的这种不确定性必然都能被归结为俄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世界共产主义的整体利益或个别地方共产党的利益。此外，就算是苏联的领导人也不是都跟火星人一样，肯定也避免不了有失算、犯糊涂、无能为力和不走运的时候。但即便我们可以理解像民族主义、人无完人以及难以把握整个人类事务等这些不同的因素，可是贯穿在苏联意识形态政策中的这种毫无规律的变化仍然让人感觉非常困惑。

苏联或许不可避免有些依赖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口头上承认依据某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评判事物，而且实际上通常也是这么做的。尽管政治局里的成员肯定更擅长经验性思维而非理论性思维，但他们一直据以理解外部世界、规划各项政策的基本范畴，则都是来自马克思和黑格尔提出，并经过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人改造，也曾被法西斯独裁者以一种歪曲甚至颠倒的形式加以利用的那套理论体系。按照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你必须区分“高潮期”和“低潮期”——前者是指“历史”看来正处于一种热情高涨、渐趋革命高潮的时候；后者则更为常见，指的是万事都归于沉寂而安定的时期，至少看上去如此。虽然这个理论一定会告诫人们在平静的表面背后总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冲突就构成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个过程可能通常还一直是隐蔽的，看不见的——革命，用马克思（和黑格尔）从《哈姆雷特》中所引用的形象来说，就像地下的老鼹鼠一样还在不停地掘地。这正是革命党应该携起手来和衷共济而不是耗费精力相互争斗的时候。这种阶段交替的理论，早在圣西门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它似乎是对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斯大林政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

清算托洛茨基在中国实行的进攻路线被认为是暂停实行“激进主义”政策的最好例子。按照斯大林及其支持者的逻辑似乎已经得出结论：一个新的“平静”时期已经开始，因此在这个时候开展或支持暴力革命“注定”会失败。与之相反，要求诉诸武力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发生在 1932 年对德国共产党做出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指示，要求他们集中火力对付社会民主党，因为他们是比希特勒还要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讲话对此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显然他似乎已经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 1920 年代令人失望的低潮之后，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将再次兴起。他将 1929—1931 年的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显著的标志，标志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终将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最终摧毁整个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大厦。（顺便说一句，并不止他一个人把形势说得那么可怕；还有许多远在别国、持不同政见的评论家把这段时期说得更加耸人听闻。）在所谓的“革命”形势下，共产党开始发起进攻。在平静的潜伏期共产党不得不让潜在的对手和敌人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但潜伏期已经过去；一切所谓的与其他左翼势力和“进步”力量团结一致的假象都已经结束。一旦资本主义秩序内部开始出现崩裂的迹象，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就不会太远了，接下来列宁在 1917 年 9 月和 10 月间精心策划的那种所谓的最后一击就成了固定的模式。勇敢无畏、坚定刚强的共产党，只有它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前进方向，如今要与那帮“软弱”、糊涂的同路人、同行者、临时的盟友和暧昧的同情者断绝那种不真实的（但在前一阶段从策略上来说却是必要的）关系。它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已经向最后的夺权跃进了一大步，只有它——也只有它知道——为夺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新的“平静”时期已经开始，因此在这个时候开展或支持暴力革命“注定”会失败。

1932 年斯大林向他的德国盟友下达的进攻命令致使他们遭到致命的打击，对他本人的打击几乎也是致命的——全世界都非常清楚，其结果在此之后造成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损失。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对这种简单模式的信念。他们依然毫不修改地一再宣扬在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肃清那些对你已经没有价值的盟友，然后发起进攻，实施打击；在革命形势尚未到来的时候，则通过临时性的结盟、建立人民阵线，利用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掩护，引证那些提出可能实现乃至渴望实现相互宽容、和平共处的古老文本来聚集力量。最终希望能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可以通过投其所好或加深认识与潜在的对手达成妥协，同时又可以把右翼的对手——反动势力——置于所有最坚定最真诚地拥护自由与博爱、进步与正义的人们的对立面，使之陷入尴尬境地。

事实上，或许这一简单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解释 1946 年之后苏联为什么会

在宣传政策上摇摆不定。当初苏联的领导人以为会发生一场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与之相应态度也就变得咄咄逼人、毫不妥协。后来才逐渐地很不情愿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早有预言，他本人也因这个不合时宜的预言而遭到指责）危机不会来得这么快，目前可能不会来，或不会像预计那样来得那么猛烈。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要改变（至少对外的宣传是这样）用老一套的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的直接宣传，而代之以某些非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呼吁普遍的向往和平，或面对美国的指手画脚而激发地方或民族的自豪感，或发展比方说俄法之间所谓的传统友谊，截然不同于英法之间只有传统的敌对关系。苏联对这种平静与危机相互交替的历史模式（它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渊源）的信奉，或许并不能完全解释它错综复杂的对外思想政策，但脱离这样的假设，这些政策将变得根本无法理解，否则只能解释为莫斯科方面有些盲目、愚蠢或无谓的固执己见，另一方面，这也很难归咎于苏联今天的统治者。这充分说明了相信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二

然而无论指导苏联当局对外政策的是哪种历史理论，它都无法解释党的路线在苏联国内为什么也会摇摆不定。苏联政策的威力使它本国的公民也为之战战兢兢，尤其是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学者以及各类知识分子，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前途乃至命运取决于他们能否迅速而又准确地使自己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普罗透思式的政权千变万化的政策。当然，变化的规律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因此，1920年代决定“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就肯定会改变党的整个工作方向。所以看到早先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追随者，乃至与那位被驱逐的领袖有过私交的人果不其然受到迫害或遭到流放，明智的评论家也不会大惊小怪。同样，看到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禁止一切反德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看到在反抗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在官方鼓励下勃然兴起，也不会诧异。

另一方面，没人想到或能事先预言会发生公开批判党的官方哲学家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这种怪事。原因是他坚持认为卡尔·马克思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中的佼佼者而已，与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相比，照他的话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或高人一筹的地方。党的权威始终坚信仅仅把马克思称为哲学家是不够的，简直就是对他的诋毁；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把马克思说成是最杰出的哲学家，就好像说伽利略是最出色的星相学家，或人类自身是最高级最聪明的猩猩一样。而且也没人料到或能事先预见到会爆发出（在发生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和残酷迫害后那么近的时间里）强烈抵制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情绪，主要是针对那些有着犹太血统的作家和艺术家，认为他们是一帮“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和卑鄙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没想到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此后不久就草草解散。而且也不能责怪那些多年来一直赞成已故院士马尔的空想（但得到官方的认可）学说的语言学家无法预见他的突然陨落。世界上有谁能想到如此忠心效命党和国家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会遭遇如此古怪的命运，最高统帅斯大林本人以一种权威的语调宣布了关于语言、方言和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至高真理。

所有曾与苏联作家、记者或那些苏联的驻外代表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这些人都长有一双异常机敏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的最细微的变化。然而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完全都是好事，因为它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忽视路线在大方向上可能出现的转变。所以他们对每个人有意或无意的一个踉跄或前冲，自然就会产生无休无止的猜测；在苏联国内，他们则通常表现出那种深入骨髓的爱嘲讽、爱绝望的性格，没有这种典型的苏联式的临危不惧的幽默，就不会产生那些苦涩而又难忘的机智调侃。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就所有这些事实提出一个总的解释。既然苏联的统治者都是些头脑冷静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偏离衍生一切、决定一切的中心路线，而去冒险或按一时的仓促决定办事，因此我们认为提出一种可以详尽解释这一特殊现象的假设，并非完全是无聊的消遣。

三

我们的理论源于这样的假设：任何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毫无例外地都会受到两种主要威胁。

没有这种典型的苏联式的临危不惧的幽默，就不会产生那些苦涩而又难忘的机智调侃

其一是革命可能进行得过头——过分狂热的革命者可能造成过度的破坏，甚至那些最终依靠其智慧和才干革命才得以胜利、革命果实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开国元勋们，也难逃厄运。几乎没有哪场革命能够给它们狂热的拥护者带去他们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就出那些最优秀最成功的革命者的性格恰恰容易让他们过分地简化历史。胜利所带来的最初的兴奋感一过，在胜利者中间就开始萌发一种失望、受挫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满情绪：可能是由于那些最神圣的目标尚未实现；或是因为世间仍然充满了不幸；有些人必须受到指责；有的人缺乏热情，态度冷漠，可能还有人暗中破坏，甚至背叛革命。所以就出现下面的景象：许多人因为没有做到事实上任何人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遭到指控判刑和惩罚人们因为引发了一种实际上与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事实上根本无法避免的，那些目光敏锐、头脑冷静的观察家（正如后来所看到的）早已有所预见的局面，而受到审判并被处决。无数的审判与惩罚也无济于事。不满变成了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恐怖和越来越多的死刑。没有外界的干预或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一过程是不会自动停止下来的，因为要抵偿一项无中生有的罪过，或弥补因总的来说甚至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对形势的误判而产生的危机，搭上多少受害者都不算够。然而一旦形成了人人都相互猜疑、互相指责、以牙还牙的可怕局面，再想挽回就已经太迟了：整个体制在几乎波及所有人的疯狂的猎杀异端所引起的动荡中开始瓦解。所有在校的学生都知道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有多疯狂。

第二种威胁恰恰相反：它通常是第一种威胁的自然结果。革命最初的心气一过，热情（包括精力）就会减弱，动力也变得不那么强烈和纯粹，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献出生命和财产产生厌恶，正常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一开始那种大胆而又骄傲的试验气魄将慢慢减退，并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这在督政府时期的法国也发生过，它经常标志着革命阶段的终结。它似乎是每一次拉丁和拉丁美洲国家浪漫主义起义过后不可避免的结局。

所有的革命领袖都不希望看到他的政权被自己点起的烈焰所吞噬，也不愿看到自己刚刚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又退回到老路上去，因此避免这两种极端的威胁——既要防止雅各宾派自我毁灭式的狂热，又要避免革命后的厌倦与悲观——就成了所有革命领袖的首要任务。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自视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学说中发展出来的要义，世间万物——不论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处于一种永恒的内在冲突之中，冲突不断发展，直到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产生新的对抗——一种新的层次上的紧张和冲突。因此辩证法本身——由于这是所谓的过程——理应确保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充满活力。因为既然辩证法不可避免地“根植于事物的内在性质”，既不可阻止也无法回避，所以革命后的政权路线就必须——也只能——遵循它的规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爆发本身遵循着那些规律一样，它的由盛转衰以及在督政府时期的搁浅，乃至后来出现的帝国和复辟，大概也遵循着同样的辩证过程。无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认为包含有多少的决定论色彩（而且该学说无论是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都远算不上清晰，而在恩格斯的后期著作中则变得尤为晦涩），斯大林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打破以往革命的宿命，不让悲剧降临到自己的政权。尽管世界图景自我实现的宏伟进程不可阻遏，也不会为顺应多变的人心而偏离正轨，然而历史（据以往的表象看）似乎并不很确定是否一定能够保留下俄国革命中斯大林及其政党最想保留的那些特征。自然本身（虽然通常都很可靠）有时候也会失灵；稍加调整或许就能使她的发展更加接近正轨，更加可测。因此人类的技巧将被用来帮助宇宙更严格地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来运行。

因此，斯大林采用了一种原始的策略，完全契合我们时代的创新精神，特别是以人工产品替代自然产品的新风尚。别人制造人工橡胶和机器人，于是他也发明出一种人为的辩证法，让实验者本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操控和预测它的结果。他不是让历史自发地按照辩证的螺旋曲线上下波动，而是要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问题是要在冷漠与狂热这一对“辩证两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问题一旦明确，他的政策的实质就变成准确地把握时机，估算在特定的环境下要把政治和社会的钟摆摆向任何他想要的结果所需要的作用力。

让我们拿这个假设来说明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形。1941年，当时苏联体制看上去运行得还算平稳，人们允许充分地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对于此前被迫压抑了二十年的郁闷心情而言，它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党的领导人很清楚这股激昂的民族感情在激励人民抵御外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心理作用。局势的发展显然已经不容许像战前那样不遗余力地灌输共产主义的教条；赢得这场战争靠的是对祖国而不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片赤诚之心。人们开始感觉到一种宽松的气氛。作家的创作更加

自由；对外国人，至少对那些与盟国有关的外国人的猜疑也稍稍有所缓和，至少当时是如此。各种早已过时的带有大俄罗斯情绪的陈词滥调，以及对纯粹的民族英雄的崇拜又重新流行起来。而到后来，从国外凯旋而归的苏联军队，对国外的习俗和自由充满了（如同历次进军欧洲之后所经常发生的一样）美好的印象，这让当局开始感到紧张；毕竟 1825 年在经历了类似的情形后爆发了伟大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显然对当局来说重新强行灌输共产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说是将种族不同的苏联各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可谓当务之急。归国的士兵——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在德国等地获得解放的战争俘虏，以及那些在国内可能与他们有接触的人——将受到严格的监控，即便尚未形成反抗中央政权的中心。如果不迅速地进行这样的再教育，苏联的整个生活模式——所有集权国家仰仗的都是不停的规训和一刻也不放松的管束，很可能马上面临垮塌的危险。众所周知这一切集权政府走向灭亡的开始。到 1945 年岁末，一项更严格的正统要求被提了出来。严厉地禁止一切宣扬民族主义的政策。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当局觉得各个民族的杰出代表在美化当地历史方面已经做得有些过头，并明白无误地严肃要求他们遵循正统。地方史遭到查禁。这个国家再次笼罩在无所不包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巨大斗篷之下。要求全党揭露和开除各种机会主义者和那些在战乱期间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无赖。猎杀异端的运动又开始了（尽管没有达到 1937—1939 年那么骇人听闻的程度）。

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此类运动的危险在于它将权力置于一群狂热分子手中，他们剪除一切旁枝异端，不断地致力于保持教派的纯洁性，如今凡是生长没有多大促进作用的都成了他们的剪除对象。如果说不是他们，起码是他们的那些核心成员，盲目执着，像他们这种人是掀不起风浪的；可是此类事件一旦发生，过分的举动也就无所难免。那些检察官在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反对者之后，已经完全为自身宗教般的狂热所驱使，直到发现他们正逐渐把矛头伸向那些伟大的党的领导人本人的生活和著作。此时必须迅速地制止他们，否则整部国家机器将因此陷于瘫痪。之所以停止清洗，批判那些始作俑者是些已经丧心病狂的极端分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能取悦于党内和政府官员中那些战战兢兢、因绝望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普通成员（更不用说广大的老百姓）。一只巨手从天而降阻止了调查。克里姆林宫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它的子民所处的困境，不允许他们再受到它殷勤过度的公仆的层层盘剥。那些逃过一劫的人长舒了一口气；迸发出一片由衷的赞誉之声。一度在大屠杀中有过动摇的对善良智慧、洞悉一切的领袖的信仰，如今又得以重新确立。

1937—1939 年的大清洗过后发生过这种情况。1947 年又再度出现，只不过程度要轻得多，当时纯理论学说上的迫害有所放松，随即迎来了一个吹捧本民族，猛烈抨击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外来影响的时期。这种极端的沙文主义尽管从国外的角度看荒谬至极，尽管它对那些在苏联还幸存的少数广义上的文化代表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依然很可能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曾几何时，又有哪个民族会不热衷于宣传民族主义？）；更不要说它掌握在那些对本民族传统更为亲近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检察官手中。此刻钟摆摆向了为俄国骄傲和自豪的方向。但正是由于先前在肃清意识形态的方向上走得太远，这次的回摆自然也要过头。

苏联政府希望至少在它依仗的精英分子中能够保持起码的头脑清醒；因此任何一次钟摆的剧烈摇摆最终都需要进行校正。在正常的社会中，舆论的变化，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煽动的，都不会发生在真空中。它会遇到各种已有习俗和传统的抵制，并在某种程度上淹没或稀释于因自由社会中相对不受控制的思想感情倾向与各种陈规旧俗之间碰撞所激起的无数漩涡中。但在苏联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随机因素，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独立思想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出现了某种真空，任何人为煽动的观点都很容易过头，达到荒谬的地步，最后以自我否定收场——不但从外部世界看是这样，即使从苏联内部看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它又必须借助人为的方式摆回去。这就是我们在排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与沙俄时期残酷的“俄化”政策同等炽热的程度时所看到的情景。（近来对世界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所用的语言与 1905 年革命被镇压之后反革命、反犹太人以及盲目地反自由的出版社和警察的语言几乎如出一辙。）显然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恢复苏联统一的框架。按照一般的假设，党是从来不会犯错误的；要错也只能是因为对路线理解错误或执行不力。而且，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教义的体制中，任何触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举动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公然企图在政治理论甚至哲学这样核心而又关键的领域修改马克思主义原理都是不可能的，更

不要说取消了：因为那样会有相当大的危险，那些忠诚卫士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活之后，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混乱和恐慌。一个雇佣了成千上万职业鼓动家，并要求他们必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孩子和文盲的体制，不可能允许对它的核心真理有任何的怀疑和含糊不清。即使是斯大林，要想不危及到整个体制，也不能破坏那些意识形态的基础。

因此必须寻找一些更安全的领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调整需要一个看起来略为宽松的环境。音乐、诗歌、传记乃至法律均属边缘地带，在这些领域发表一些修正“路线”的学术声明不至于扰乱核心的关键区域。（如今）其他那些通常研究偏僻冷门、耳聪眼慧的知识分子立刻便领会了如此公开声明的个中寓意。语言学离核心区还要更远些，所以也就更安全。或许这就是斯大林选择语言学作为暗示，告诉我们追求纯粹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号召”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影响，该到缓一缓的时候了。尽管这种方式在外行看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在语言学领域要求微调路线的口子一开，其他许多相对“非政治性”的专家势必满怀希望地自问，他们封闭的世界是否也能指望略微放松一些——哪怕只是一道通往外界的缝隙，至少在其中能够获得一些呼吸的空间。语言学家获得的恩赐意味着音乐家、杂技演员和小丑以及数学家、童话作家甚至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不必那么谨小慎微了。连历史学家也抬起头来；一位作者在 1951 年夏季的一份苏联历史杂志上怯生生地主张，既然斯大林对历史研究没有说什么，那么他们是否也可以像语言学一样，跳出马克思主义的“超级结构”，拥有一种“客观性”和一些永久的原则？斯大林曾经严厉地拒绝将这种客观性和永恒原则赋予艺术或法律机构。物理学家、化学家，就连险些要颠覆历史辩证法的发生学家如今也得以松一口气；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路线在这些学科中的反复无常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出于形而上学的考虑，或是对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或科学“唯物主义”不可救药的癖好。而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一些更乐观更天真的西方同行，对苏联的科学理论感到困惑时，却一再地试图将之归结于此。

“和平”“共处”的主题明白无误地暗示在经历了朝鲜问题的错误冒险之后，辩证机器正在转向何方：因此那些对他们的学科的热爱并没有完全被扼杀的教授们又怯生生地重提“西方”的价值。而如果最初的几个谨小慎微的试探者没有遭到太粗暴的反对，那些尝试者就知道他们终于可以指望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的到来。而那些更有经验的人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很长。如今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约束放得太松了——对于一部机器来说放得太松了，如果不开始慢慢地收紧，它将根本无法继续运行下去。如今又重新主张一致性、纯洁和正统；又开始严禁任何的怀疑，新的循环又开始了。

因此必须寻找一些更安全的领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调整需要一个看起来略为宽松的环境。

然而有些事取决于推动钟摆的力量：恐怖施行得太过分（譬如 1930 年代末叶若夫统治时期那样），结果会把人们吓得什么话也不敢说。人们除了说些最老套的表忠心的套话，谁也不会和人谈论稍微有点“危险”的话题，而且说的时候还非常的节制，因为谁也无法肯定从今天到明天哪些话变得可以说，哪些话又变得不能说。这种因恐惧而带来的沉默也有它的危害。首先，虽然大范围的恐怖统治能够确保广泛地遵从和执行各项命令，但也有可能把老百姓吓懵：长此以往，严厉的镇压最终会把人们变得完全麻木，没有任何知觉。一旦意志变得麻木，便会产生一种彻底的绝望，从而势必会放慢前进的脚步，减缓经济的发展。其次，如果人们一言不发，政府雇佣的大批情报人员将无法充分地了解人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以及他们会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做出何种反应。如果水异常的平静，而且一眼望不穿水面，那么这汪水可能非常深。俄罗斯有句谚语：“静湖出水怪。”如果对人们所想的事情一无所知，政府将无法运行。虽然通常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可以说在苏联并不存在，尽管如此，统治者也必须通过被统治者的情绪来认识自己，从最原始的、行为科学的角度上说，这与动物饲养员能够判断他所养的动物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类似。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人们畅所欲言：禁令被解除，“共产党员的自我批评”，“同志般友好的讨论”，这类看起来酷似公共辩论的行为一再得到倡导。一旦个人和团体敞开心扉——肯定有人会露出底细——领导也就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立场，如果他们打算不受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坚持“总路线”，他们知道首先应该排除谁。断头机又被重新启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没声了。生活在这种严酷体制下的人们，刚经历过对美好生活的短暂幻想之后，背上又被压上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被

禁止沉迷于一切尽管不会妨碍劳动但可能分心的兴趣爱好——只有全神贯注，竭尽全力才能实现伟大的工业目标。事实上与外界的交流已经中止。出版界又重新意识到它的第一要务——提高公众士气，不断明确地重申正确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法。当沉闷的局势发展到让苏联人都感到无法忍受时，“路线”再次发生转向，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在倒数第二次的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生活又有了更多的盼头。

四

“人为的辩证法”——此乃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原创，亦为他对统治术的主要贡献，或许比“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还更重要。它是一种确保能够“弥补”自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并长期维持内在驱动力的有效工具——持续的紧张，长期的战争动员状态——也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办法是既不让政府变得过于软弱无能，也绝不允许它行动过激从而造成过多的内耗。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或后来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谈时“不和不战”方针的又一个奇异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版本。它迫使苏联政府采取一种左右摇摆的路线，给全体人民制造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局面，以免每当政策失误而急转弯时人民不知所措。

当然，要求人们就范并非决定路线最终方向的唯一因素。此外它还取决于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和社会需求等各方面的压力——取决于在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和能够对苏联政策施加影响的各派力量，尽管影响的方式有些古怪。苏联并非是一个完全在真空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它也不能超越心理学和经济学规律的制约。恰恰相反，它宣称要比那些注定无法克服自身“内在矛盾”的“反动”政权更清楚地认识这些规律，更自觉地依据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制定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西方的观察家，无论是务实的政治家还是现代政治的理论研究者，觉得苏联的政治行为如此的神秘莫测？这种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要归结于西方没有意识到苏联决策者对迂回路线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国内的安全以及政权的维持都直接寄托于采纳这种路线。在国内外所采取的一切有利于苏联政府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措施都必须遵循总路线的要求，这种确定“总路线”的技术绝对是一项具有高度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新发明。能否成功的操作取决于是否能够调动各种有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来完全地控制公共舆论，对全体人民实施极其严格的管束；总之，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握，要求每个操纵者都具有高超的技巧甚至天赋——尤其对独裁者本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需要这种技术——道理很简单，真正正确的“路线”，势必要在同样不可避免而又相互冲突的左翼和右翼的“偏离”之间波动——因此不可能机械地做出决定。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取决于一系列人为的决定；因此它的命运不能视为是完全可靠的。只有掌权者具备斯大林那种杰出的管理才能，“路线”的走向，尽管对于苏联内部或是外界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依然看不清楚，却并非完全不可预测。一旦他不再掌权，苏联的命运会如何（苏联是否会卷入一场大战），对此人们只能怀着希望和恐惧，很难做出理性的预言。因为无论如何，它绝对不是一部能够自行驱动、自行调节或能够自动运行的机器。如果落在没有什么才能和经验，缺乏自信的人手中，它很容易给人们带来一场人类社会在传统的统治形式下从未面临过的巨大灾难。

斯大林的继任者是否能表现出足够的能力，来驾驭这种需要如此完美地结合想象力和实际洞察力的新技术呢？抑或他们会完全地放弃它，果真如此，是逐渐地还是突然地放弃呢？抑或他们将证明非但没有能力驾驭它反而深受其害，这样一种复杂的技巧非能力有限者所能掌控——这种技巧在能力更为突出的上一代人手中所产生的奇效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法摆脱一场大灾难？我们说不好；看起来可以确定的是，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去世迟早将会在苏联各项事务中造成危机——一场比列宁的逝世还要更严重的危机。因为除了在一个高度独裁的政权中迫切需要重新调整的各种问题之外，还将面临斯大林精密的统治机器给后人带来的令人困扰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过于复杂，除了杰出的管理大师之外无人可以操作，另一方面无论是要中断、疏忽还是放弃它，都过于危险。

这种确定“总路线”的技术绝对是一项具有高度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新发明。

还有一件事看起来也相当明显：那些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因为太过无情太过压抑而无法维持下去的人们完全是在欺骗自己。苏联的体制，尽管还达不到能够自我驱动的程度，但确实也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毁灭的迹象。统治者也许残酷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被绝对

的权力严重地腐化：但只有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而非从实际的观察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才会使某些苏联的研究者预言这些恶行本身必将很快腐蚀那些作恶的人，让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从而自取灭亡。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也许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极其玩世不恭，渐渐变得冷酷无情，但只要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东欧或苏联（可能还包括印度和中国）人的这种生活环境，他们不仅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而且在其他几个处境同样糟糕的国家包围下，透过铁幕也看不到能够勾起想象或超出想象的生活方式，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把它们看作是正常的环境，设法找到活路，他们就像无休止战争中的士兵，被判无期徒刑的囚徒，在海上遇难的水手。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普通公民来说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如果通过集体的苦难即便不能产生自由，也能产生博爱和平等，而且一个人只要能拥有一些快乐和激情的时刻，真正幸福的时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严酷和最没有尊严的环境。

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杀或者被杀都比活着要好，操控“总路线”的艺术恰在于此。假如苏联的公民得不到一点的自由或者快乐，那么他们很可能变得难以驯服或干劲不足；也绝不能让他们陷入一种恐慌、绝望或冷漠的状态，那同样会让他们丧失行动的能力。“总路线”上的摇摆正好可以被用来避免这些极端情形的出现。因此，只要苏联的统治者将这种操控统治机器的技巧传承下来，并能够继续从他们的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内部的崩溃看起来就不可能发生，就连统治者都不会因专制独裁和对其他人肆无忌惮的摆布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而在意志和智力上发生萎缩。当苏联政府很明显还保持着充分的政治敏感性，这场对一个永久军事化国家进行的实验，从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来看，就远还没有到达它的终点。尽管这部庞大的机器可能受到各种困难和危险的困扰，但也绝不要低估了它的成就和活力。它的未来可能还不明确，甚至不稳定；它还可能犯错、翻船或发生渐变或剧变；但不见得一定会灭亡，除非人们的良心得到发扬光大。这个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没有哪个西方社会能够救得了它。而到那时，那些更好的社会机体早就灭绝了，在 1917 年之前，俄国在这方面并不比西方差。重建它们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总有一天它们会被重建起来，到那时，这段又长又黑的隧道只不过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与此同时，这项惊人的发明本身也绝对值得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即使只因为它是一种既能自动运行而又无所不能的操纵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们的意志，同时又能发掘人们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的最大潜能——这也正是那些最无情最狂妄的资本主义剥削者梦寐以求的东西。由于它源于一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更严重的对自由和各种人类理想的蔑视，并且统治了大约八亿人的生活，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不人道也是最捉摸不透的现象。



本文摘自《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英]以赛亚·伯林

潘永强 / 刘北成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 年 7 月



以赛亚·伯林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提出的两种自由概念和多元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生活的一块基石。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题图为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剧照

(一) 现实世界: 2022, 本地人和年轻人的万圣

“去年一定很艰难吧？”

我们的话题从这里开始。

“大学生一年没来。4月1号那天清华好像允许出校门，然后朝阳就有疫情，很快就要到海淀，大学生又被撵回去了。”

“也没有外地人。”万圣书园正常的比例是，45% 北京本地顾客，55% 外地来的，外地人中来自境外的有 15%，‘境外的都没有了，出差的人也没有，去年大约有三周的时间会有外地人。就那几天外地顾客能来北京。’

“2021年还有两三个月会有外地人。”

“上班的人也很少来，居家办公。”

这是北京 2022 年街边各行各业工作的日常。2020 年，新冠疫情从武汉开始，刘苏里说他又回到“一线”，也就是为万圣选书。因为员工日趋成熟，2015 年开始他退出一线，2017 年退出二线，那时候他放松，每两周来一次书店。2020 年 3 月开始，频率重新提高，每周至少五到六天留在店里。

“回到一线”意味着他要琢磨“调整产品线”。“选什么书，这本书该不该卖，这本书算是保留品种还是销售品种”……苏里说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可以帮着万圣“自救”。“自救”，2022 年他越来越多地提到这个词。

现实世界体现在万圣的书单上。这差不多是 90% 以上北京本地读者的销售量为基础的数据，虽然从概率上看北京本地读者也涵盖了所有类型的中国读者，但苏里也提到在“自救”过程中他会结合本地读者占比过高问题在选书环节做出调整——这其中会有隐含的变化：过去占比 55% 的“出差的人”和“外地读者”代表的是流动性特别大的人群，同时也是思维、行动活跃度非常高的群体，他们到北京，抽个时间到万圣买书——他们身上最重要的标签并非地域性的“本地”或“外地”读者，更有可能的标签是“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从事行业”、“年龄”之类的信息，相对而言，这些标签背后的阅读喜好会更多影响万圣的销售和年度书目构成。

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年龄。2012 年那一轮万圣读者结构年轻化可能在疫情开始的 2020 年就已经宣告结束，刘苏里是在近期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记得清楚，万圣读者群的年轻化，始于 2012 年的 12 月 9 日。那天万圣搬家，搬到现在的位置重新开业。本来搬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 2012 年正好碰上在那前后几年书店的倒闭潮。所有书店都以“我们要寻求新地址”这样的名义来宣布业务修整，但事实上，它们中的大部分的确也没有再开。读者也为万圣担心，刘苏里亦知道这一点，因此把搬家、装修过程都同步在微博上。“那时候微博还挺热闹，潘石屹啊任志强啊丘露薇都跟着转，带动了一批以前不知道万圣的新读者。”

自那以后，万圣读者从 45 岁的平均年龄进一步年轻化。从 2012 至 2022 年，万圣的主力客群是高级经理、白领、职业经理人、来自周边北大、清华孵化器的创业者。“他们大部分是挣钱了钱的。”

说起来，这有点像万圣外面从成府路、五道口、上地再到整个中国，可能还有整个世界十年间的潮起潮落。像这个过程一样，这个人群渐渐面目模糊，直到面目全非。

2022 年染病高峰过去，春节之后，北京街上塞满了人，万圣也一样。“你现在周末来，人挨人人挤人，都是什么人？更年轻化，更时髦，更漂亮，打卡的，拍照的。”

“他们买书习惯不一样，买便宜一点的，或者只买一本。买的书也不一样，轻学术，女性主义的环保的偏多一些。”刘苏里解释客群，就是解释书目总体的底色。因为是客群决定了销售种类。

他说，女性读者肉眼可见地多了。从新旧客群来说，旧客群总体可能没有变化，但被稀释了。一些熟面孔只有在周末早上出现。

“我们有新读者一直是高兴的。75% 喜，25% 忧。喜为主，因为他们喜欢的书也是我们采购来的，所谓忧，就是说它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潜在地影响万圣的格调或者说品质……现在在榜单上就看出来了……万圣会不会随着这个时代有某种变化？”

虽然有选书门槛，但刘苏里视万圣为公共平台——各种观念和主义之中，万圣尽量包罗万象。但在研究 2022 年那 2000 本书的时候，刘苏里感受到了“非典型万圣”的存在，继而一个偶然机会，他找到了答案：“有一天发现小红书和 B 站上万圣的视频之多，吓死人。对上号了！”

万圣里读者的变化，街上的变化，这个城市和国家的变化，中国最好书店“年度书目”

档案

与最好的书店聊天： 这一年的书，这一年的事

刘苏里 伊险峰 | 小鸟年度专辑

8 个小时的聊天里，我们盘点的不仅是过去一年的年度书目，还有诸般变化下的世界在出版、图书上的映射。

刘苏里在万圣书园办公室等我们。

每年底，刘苏里会针对这一年万圣书园的销售和热点整理一份书目。万圣书园是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书店”，它一年中呈现的万千气象被视为知识界、思想界的潮流所在。因为以销售为基础，所以很多人会理解成是“榜单”。实际上不是，尽管销售占比很重，新书是一个硬指标——一定是当年度，即前一年的 11 月到当年的 11 月（老版本层出不穷，引进版的新译本看情况，如果变化很大，比如加注加索引，翻译质量有很大提升，有可能算新书）。刘苏里还会给自己留 15% 之内的调整空间。所以万圣的年度书目，更像是刘苏里眼中的思想界潮流。

具体来说，万圣一年销售数据会产生 2000 本书的粗选书目，这是原始数据；结合销售量和口碑，200 本书会进入短名单；最终有 40 本会进入终选，在这个环节，刘苏里的眼光发挥那 15% 的主动性。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某本书本来正常销售，卖得挺好，进入短名单。如果没有什意外的话进入最终名单也有可能。刘苏里认真，最终名单上的书他得再读个大概，如果他发现，“啊，这本书有问题啊”，这倒霉蛋就不但不会进入最终名单，还会被特别关照从书店里下架。

和往年一样，2022 年度书目的 40 本书也分为“原创和翻译”、“学术与非学术”四类，每类 10 本。每类取前 10 名，隐含着销售的权重实际上再度调低。

年度书目在 2023 年 1 月下旬春节之前产生，在我们聊天之前，刘苏里说得给他留些时间做功课。去年底新冠感染之后，他的身体恢复得慢。我们不忍催他，把时间定在了 2 月下旬。2 月 23 日，上午十点到傍晚十八点，我们在万圣书园的醒客咖啡聊天：不仅仅是那 40 本书，还有从中申发开去的世界。

的变化，在刘苏里这里对上号了。

(二) 万圣书园·刘苏里 2022 年度书目

这是呈现了诸多变化的“壬寅年”书目。



“轻学术”这个标签出现在我们的聊天中。在刘苏里的分类体系中，本来只有“学术”与“非学术”的对照原意是把纯学术作品跟学者们写的通俗学术思想作品做个区隔，可一个字，一下子改变了原意，容易引起误解，二十来年，我们没注意到这个 bug。最早叫“非虚构”，似乎还贴切些，比如《万历十五年》《潜规则》《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看见》《江城》《寻路中国》《何为美好生活》……可近年上述题材作品很难得一见，有也不易引起共鸣，而学者为知识大众撰写的通俗作品越来越多，一方面说明这类写作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熟练，一方面说明有些作者消失于公众视野，作品自然也跟着消失了，再者，说明知识大众对学术思想的需求越来越大，硬学术思想难读，便喜欢读轻松点儿的，于是通俗学术应运而生、大行其道。”

这是 2022 年学术思想类书目的特点，比之纯学术思想，它们更轻一点，因此冠以‘轻学术’之名，以纯学术区隔。

看今年书目，学术和轻学术的界线不再那么明显，到底是一个家族的嘛。张维迎的书和陈嘉映的书，谁更学术思想些，分得清么？可偏偏在分在两类。首先要看跟谁比，我们的意见是跟他们自己比。陈作是一次讲课的记录稿，虽后几多修改，但坯子是讲课稿。他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试图把自己思考四十来年的题目，做一次整理，想明白的多讲几句，把握不大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既交给学生（潜在包括知识大众），也交给自己（未来我还可能说点儿什么）。顺便说一句，陈作获得今年“亚洲图书奖”，这个奖第二类有两部作品获奖。张作也是接着写的，他一直研究企业家，最早有《企业的企业家》《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企业家》，2019 年他还跟别人合作写了本《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再写《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既是总结，也有升华。它是一本完整的著作，学术、思想都有，但不难读，比陈作好读，但陈谈的话题，比张的企业家精神，起点就难多了，一个纯哲学的，一个跟个体的经验更靠近。

再看一个例子。《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和《民族的神话：欧洲中世纪的起源》，从书名看，你如何把它们分为两类？那个更像学术思想类作品？显然是帕特里克·格里嘛，有“起源”殿后。实际上，格里的书是写给欧洲读者的，解释近代国家起源的源头，让读者知道，别以为今天的法、德、英、西、意……自古以来如此，也不单纯是近代民族-国家建设潮流的产物，它可追溯的最近的源头，是中世纪。相比之下，卡尔顿·海斯的书，中规中矩，历史哲学意味浓厚，并不预先设计读者群。海斯阐述的是观念，格里告诉的是知识。

这两个例子说明，两种分类越来越难，区分起来，对读者、万圣都是个考验，稍不留意就会闹出笑话。就这样，也未必分的那么恰当。举个例子，黄克武《笔醒山河》跟托比的《亚洲中世界中的德川幕府》。黄研究严复数十年，尽力爬疏中外史料，该作主体部分以严复事功和思想为主，看上去并不输于托比。但黄作到底是传记性质，第一部分完全写严的出身和家世，末尾还谈到严氏后代的命运，相当通俗。即使主体部分，也是告知多。传记类，只有写成《天才之为责任：维特根斯坦传》，才跟学术思想类相关。反观托比研究幕末德川政权，是揪着争议很大的问题不放，通过大量资料和论证，得出结论：德川政权并非忙于闭关锁国，反而是日本开放的先声。该书顺利读下来，需要具备相当的日本史知识，以及对这段历史重大问题争议焦点的了解。反复考虑，托比的书为学术类，黄书为轻学术。

刘苏里总结 2022 年出版业的几点变化：

一是社会科学类别图书更丰富。“社科、人文非历史类著作数量显著上升，且学科缤纷，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国际政治学、考古学，乃至跨学科研究或讨论，让人大开眼界。跨学科，特别是所谓技术哲学，传统上讲叫科学哲学的书，更土更老的说法叫科普，这类的书在大榜单上特别多。往年，这两块跟非社科靠点儿边的，只有一两部，跨学科一种没有。”

刘苏里说“如果我拿那个尺子衡量，只能说，2022 年，发生了重大事变，甚至是转折性的。否则，阅读关注的领域，不可能跟往年，尤其去年比起来有如此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后来成了我们进一步对话的焦点所在，后半部分会有更详尽的交流。

二是轻学术类中，写人物的书减少了。从 2021 年的 6 部减到 2022 年的 4 部，纯传记其实只两本，罗新《漫长的余生》与黄克武《笔醒山河》。“也算是不小的变化”。

三是翻译类轻学术写人的作品也少，刘苏里颇感意外。“传记与回忆录，2021 年 6 部之多，今年则一本没有。2022 年传记出的不少，文学家的多，且部头很大，比如王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托马斯·曼、卡夫卡、川端康成等等，其它界别、领域的少。有本《福煦元帅传》，上市太晚，估计知道福煦的人也少。还有本《嵇康传》，我倒是想看看。新出的回忆录，我看过的唯一一部，是王赓武的。”

四是翻译作品，国别更集中。美国 11 种，以色列 3 种，德国 2 种，占去 16 种，余者英国、瑞典、保加利亚、日本各一种。刘苏里觉得英国、日本减少属于意外，最近十年，两个国家翻译上市的作品，始终排在前列，去年日本和英国各有三种。

“美国比重加大并不奇怪，往年大多数年份都占引进版图书半壁江山，只不过最近有些年份失衡而已。2022 年度回归‘正常’，有憋坏了的原因”，“仍可喜之”。

五是民营出版作品占比加重，14 种，去年 9 种，超过三分之一。“老牌突出是理想国、后浪、新经典、汉唐阳光；新品牌则有一页，今年入选 3 种，表现出色。渐露水面的，还有单读和铸刻等。”

公营出版机构品牌意识增强，“除社科文献‘甲骨文’‘九色鹿’、广西师大的‘新民说’、华师大‘六点’‘薄荷’、中信‘新思’‘见识城邦’、三联书店‘古典与文明’等外，有新品牌加入，比如南京大学‘远望’、社科‘鼓楼新悦’，尤其四川人民的‘一卷’，出品数量和质量颇受好评。”

(三) 刘苏里眼中的 40 本书

2022 年度书目比往年都难选，不是多而是少，特别原创部分。40 种，还有分类，却出现多次调整，是往年没有的现象。年度书目从来都是以读者购买数量为基础，这是个硬标准，不能随意差池，今年当然亦复如此。难，据我观察，与两个因素重叠有关。一是“疫控”严厉，京沪两个出版重镇，反复出现疫情，北京冬奥会和中共换届大会赶在一起，都对出版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出版调控日紧，大量选题，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展期。这种影响有预期中的，比如调控已非一年两年；也有偶发的，比如“疫控”停工停产。

最终，万圣还是选出了 40 种书目，难以理想，但还看得过去。

第一，社会科学类别图书，入选书目是往年不能比的，而且领域科目繁多。我给予的解释如下：

往年人文领域作品，比如历史类，占比较重，其实 2022 年度也不轻，中外历史皆是，只是市场表现不如从前。阅读人文类作品，与人所处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修为”，也可称为“人生进阶”，还有就是“闲适”。2022 年，是几代人，特别是新生代——他 / 她们是读者群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遭遇到人生从未有过的艰难门槛，失去了往常的心境。换句话说，他 / 她们的生存境遇面临重大挑战（和问题），未来难以预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人与人当面交往受到极大限制，使用通讯工具交流又有极大瓶颈情况下，阅读成为寻求答案的重要方法和渠道，社会科学类图书受到关注，与此关系甚密。

可能比生存危机感重要的原因是，所有人，特别是新生代读者群，对他 / 她们所处的小环境，比起往常的“当然如此”、“应该如此”的认知，出现了颠覆性疑惑和焦虑。他 / 她开始重新思考原本不那么重视的大问题，比如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比如周边关系，比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等等。

我多说一句，这里提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成了“硬问题”，而非“软问题”。这是我创造的词汇，“硬问题”更真实、迫切，亟待处理，“软问题”刚好相反。我举个例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工作、基本权利等，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上野千鹤子《始于极限》入选，典型反映了这种心态。类似比较好卖的，还有 2021 年出版的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上野教授的系列作品，《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北京联合 /2021 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 /2020 版），以及《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北京联合 /2022 版）。

平等与不平等话题近年潮涌般引发热议，是同类心态的反映。我随便举几个例子，2022 年有《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广西师大版），2021 年有《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广西师大版）、《歧视与不平等》（中信版），2018 年有《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北京大学版），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这种左翼思潮的泛起，其来有自源远流长，但在国内以如此规模同时出现，还是近年现象。它的埋伏期肯定更长。“图书出版和销售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嘛，有个埋伏期，终将在一个时点爆发，三年疫情便是这样的时点。

我们不妨看看另一面。同样的主题，陈嘉映先生的《感知·理知·自我认知》排在今年年轻学术第一。这本书获得 2022 年度“亚洲图书奖”。其重点，是通过对感知、理知的知识梳理，落脚在“自我认知”。什么是自我认知？就是认识自己啊。我给这本获奖图书写过推荐语，并在拉票环节做了陈述，你感兴趣，我发给你参考。（拉票原文：趁机为陈嘉映的作品做广告。这本书的“自我认知”一章，主要针对当下人们普遍的身份认知和生存焦虑而发覆。最近十年，大陆出版数以百计的通俗哲学读本，惟陈先生此书把一个再原始、朴素、普遍不过的问题<他自己思考了将近 40 年，为此写过三本书>，给了通俗、坚定有力但并不排他的解释，对其中涉及到的诸多元问题，捋出了线头，并予以回应……文辞严谨和煦，读之如沐春风。）

还有两本入选书，江绪林《生命的厚度》、李连江《学者的术与道》，都与同主题相关，说实话，我挺吃惊。万圣的读者越来越年轻，可这两本学者“矢志自道”的作品能被他 / 她们注意到，也是新鲜。你们可能都知道，江绪林是上海学者，自杀了。他的自杀，让我想起 1994 年上海学者胡河清的自杀，以及订购《胡河清文存》的往事。江 2016 年自尽，像是我说的社会心理脉动的潜伏期，具有某种寓言性质，虽然这本文集在他自尽 6 年后出版。其中有句话很震撼：“一颗渴望敞开却又把自己关在生活门外的心灵，承担孤独的重负，用不多的文字告白了自己的脆弱与珍爱、惶惑与思考。”翻译成知识大众听得懂的语言，不就是说，“我对眼下无能为力”么？李连江的书，是另一个样本。他从教多年，作品不多，但对自己要求甚严，近乎字字玑珠，振聋发聩。书中这么一句话：“不需要谋生存的人，往往没有真正的生存。我们需要谋生存，是我们的优势。我讲的生存不是简单的活着，是为自己活着，我们谋的是海德格尔说的本真存在。”说出这种话，要怎样的悟性！

书中还有别的例子，我就放下了。总之，对当下人的处境，反思是多维度的，立场也是

多方面的，不仅左翼。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学者的态度和选择，具有代表性。这里我多啰嗦一句，什么是学者？就是多读了几本书的知识大众。多读几本书，比多数人先进一步，感知早，某种程度，他们是在替多数人思考——李连江教授未必同意，不要紧。先进一步，很重要，启发更多人思考同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如何，以及应对的姿态。

重新认识自己所处大环境，换言之，重新打量原以为本该如此的国情、世情，是 2022 年度极为突出的阅读现象。我们来看书目。太多，不想多罗列占篇幅，仅“学术·原创”，就有 8 种与其相关：《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文明的两端》《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消失的真实》《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除杨华和李硕，都是开放后成名颇早的学者。提供的思考向度是多维的，书名各异，但问题则一。我重点说几部作品。

《翦商》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我为这本书写过封底介绍语，如下：本书带有界碑性质——作者攀爬到了该研究领域的顶端，还将是同类研究、写作，绕不过去的作品。它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出发点，凡对古典中国思想、信仰、伦理、心态、风俗，地理、军事、政治、制度、规则……有兴趣的研究者、普通读者，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你的探索。该部作品还是过往几十年社会承平和财富积累的结晶，让我们再次进入幽暗的历史通道前，一窥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将予我们鼓励，认识自己，直面未来。

这本书的意义远非介绍语可概括。它的销量，证明了它出现的价值。它刨根问底，讲述了我们的文明底色，以及它是如何被修饰过的。

何怀宏教授《文明的两端》，近似对李硕文字的佐证，虽然他俩写作身处不同时空，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北京，一老一少，思考的是同一主题，即我们活在其中的文明，怎么走过来（李、何），又是怎样的结局（何）。可以说，何怀宏教授的大作，是开放以来，第一部完整处理这个问题的中文专著。我主持过这部作品的一次读书活动，参加者清一色的年轻企业家，引起热烈反响，为什么？何谈的是世界文明，当然囊括中原（华）文明。他关于现代文明这一端的反思，打动了现场听众。待会儿我还会谈这个话题，按下不表。

葛兆光、金观涛、张维迎和杨念群的著作，都颇多建树。我分别谈几句。葛书看似很偏门，其实不然。它表面谈“方法”，实则谈观念——中国认知如果不扩大视野，永远自说自话。说的还是常识，但哲学家的专业，便是把常识做思考对象，因而这本书，有哲学气味。金书创造了一个概念，即“真实性哲学”。有真实必有虚幻。当今的虚幻是什么？科学万能，给人的感觉也是接近万能。但“真实”果真如此么？非也。金的结论，还是人类要回归人文，回归人之初。这部反思加建构的作品，也跟下面要谈的主题有关。张维迎的新书，并不新，据我统计，他这是第四次撰写同一主题，即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于现代社会何以那么重要。这个话题具有无限的当代意义。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过上好的生活，物质供应当然是其中重要的维度，那么就要善待具有疯子般的企业家群体，他们不是把事情从 1 做到无限的人，是从无中创造有的人。因为只有从无到有，才是竞争力量的根本。杨念群的专著，可以说写了 20 年，主题相当宏大，论证却小心谨慎。因为清代离我们太近，跟我们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息息相关，看起来认识颇深，其实远非如此。作为“外来”政权，满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统治合法性问题，这是所有政权面临的重大问题。杨书的贡献，是清晰捋出清朝统治者，如何追溯历史脉络，重新召回“大一统”魂魄，加以“现代”叙述，并改头换面，为我所用。大一统概念没变，但内涵却因应了“外来”合法的现实。此外，杨书委实点出了“中国”叙述之难这个敏感话题，给出了出于新清史又有别于新清史的答案。

(四) 还有，另外两本特别提名

见面前我们在线交流书目，刘苏里说：“有些非常重要的作品，因为部头大、定价高，且读者群有限、销售数量也有限，很难入选。但它们太重要了。我想今年开始，设一个特别致敬，原创、翻译各一本。”接下来，他又斟酌了好几天，有了下面两本书。

年度原创特别提名：

《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李启成校注，商务印书馆，2022.08, 398 元

年度翻译特别提名：

《烈火的审判：百年战争·第二卷》（上下）乔纳森·萨姆欣，李达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12, 168 元

他说：“还有几本大部头的，出几年了，等它们出齐了再致敬也来得及。”那次，他还说：“原来我们祖上真阔过。一百年前就开了议会，且有模有样。”他指的就是《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这一本。

有进一步解释：“李启成点校的这本书，2011年出过一版，序言有传说中的故事，新版没有序言，直接导读，这个导读值得读读，超过2.6万字，对这个16开1251页的大书内容做了简要梳理和提示。对议场辩论中涉及到的重大问题，予以简要评述。”

他还解释了2011年出版、2022年再版为什么要算新书，“注释者有个再版说明。10余年来，作者未中断过资料的收集，新版增加了50多万字，将近600页，将近一半篇幅。有规定，超过 $\frac{1}{3}$ 修订，是全新作品。只是这些数据统计，还不是主要原因。主题太重要了。我们的先贤们，在110年前，有过这么一场空前绝今的实践和实验，其早、其精彩让人震惊，且荡气回肠。亚洲第一共和国，不是徒有虚名。我们首先要纪念他们，记住资政院第一次辩论会。美国人不是有个费城制宪会议么？麦迪逊就留下一册《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翻译过来，两卷。辽教出过一版，译林出了一版，现在还在印，知识界应该非常熟悉了。但熟不熟悉资政院的辩论，很难说。”

高全喜出过一本《立宪时刻》，提出一个观点，即清帝逊位及其发布的诏书，是一个华夏版的“光荣革命”。“我们自己有过光荣的历史，不但不以为荣，还给妖魔化了。李启成教授将这个妖魔化了的历史剧，真正还原到了现场，原汁原味的辩论记录。”

估计大多数人不会去看这本书，所以额外多提供一个信息：这本书记录的是1911年9月24日到1912年1月11日的资政院常年会会议。这些天中武昌发生了辛亥革命，顶层斡旋，很快清帝逊位，走向共和。从此再没有这样的记录了。

另一本的“冷”在苏里看来是相对的、也可能是暂时的“冷”。“今天冷，不一定明天不热，比如都市人的精神状态类书籍，1998年前后我们就试图做过，直到20后才热起来；就历史写作类题材，比黄仁宇还早，即使黄仁宇引进，几年后才有吴思等人跟进，经过李亚平、谭伯牛等人，今天已蔚为大观。欧洲中世纪，是现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别说30年前，就是10年前也没人敢想。你看今年入榜的，还没入榜的，多少本这类书？2020年以来便有400余本，看电脑数据记录。”

年度致敬的翻译作品是《烈火的审判》，中文冠以“乔纳森·萨姆欣”百年战争系列，“系列”是什么意思？一连串嘛。据说系列有4部，多少卷不知道，已出的有两卷4册，各800多页，后两卷能否顺利出来，还在未定之天。”1337年到1453年，116年，英法两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间歇有两次、30来年的和平，仗打了80余年。“教科书中都学过百年战争，这四个字并不陌生。但这场战争某种意义上是欧洲世界的第一大战，今天的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这个知识我们是缺乏的。它是英国与欧洲发展道路分道扬镳的转捩点，法国最后夺回了诺曼、布列塔尼等多处英属领地，但从此走向专制主义，而英国由于战败，对王权的限制日甚一日，最终走向了宪政。假设英国人赢了呢？英国将是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国家，没准儿是个大陆为主的国家，英伦三岛只不过是个大离岛，政制会比法兰西还专制。”

这本书由“甲骨文”策划出版，在苏里看来，“甲骨文”是近20年国有出版机构创立的最成功的品牌。“春节后我见到该品牌的主要策划编辑董凤云，他说，甲骨文今年10周年，我吃一惊。创立、出第一本书的情境历历在目，一晃10年，要留个纪念，去年‘疫控’严厉，没法儿做活动。万圣应声，把第一个特别翻译提名，留给‘甲骨文’的出品。”

*

1、“具体可触摸的不确定性”

这一年里，人们在被动中生活，留下一个巨大的精神隐患，通常来说，我们会说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已经有些年头了，说起来有些矫情。但经历2022年，这不确定性似乎才真正让鲁钝的心灵也能感受得到。不知道小区什么时候封掉，不知道第二天是不是能买到菜，夜里会不会紧急转运到某个大巴车上，家里会不会进来消杀，宠物怎么办，出差不知道能不能住进酒店，不知道有一个“弹窗”告诉你不能回来……种种“不确定性”是具体的、可感受的。

这种具体的不确定性，偏偏是最少答案的。书里不会有答案。即使隔了几个月，我们与各种人聊起2022年的生活，普遍都会提起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病毒和对病毒的理解，还有精神状态。从惶恐到抑郁。

2022年还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因为巨大的惶惑，感觉应该通过更多阅读解决自己

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看书的心态都调整不出来，大量的时间用在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带来的情绪波动上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性支持，也就是不为环境变化所动的那部分，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突发信息上，如果有同理心，那就更焦躁。”杨樱说，“而且因为事情变得太快，支持就变得抽象，看起来愈发指望不上。”

“不知所措。对吧？”苏里总结。

刘 = 刘苏里，伊 = 伊险峰，杨 = 杨樱

刘：

初选2000种书目里有不少关疾病和健康的书，有几本销售还挺靠前，像后浪的《流行病与社会》，但不是太典型，身心健康方面的，近年历来都有，今年分布得更广一些，但是在我身上投射得不够，你们的问题提醒我了。

关于“未来忧虑”或说“忧虑未来”的新书，无论是本土创作还是翻译作品都很多。当然，同类旧书去年也卖得非常多，比如《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等，都在卖。

2、《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

杨：

《始于极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图书似乎很多。

刘：

女性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已经讨论四、五十年了。你俩大概看出在初选的2000种里它的“存在感”很强，这与出版会略微滞后于社会主流话题有关。一个话题最后成为“出版热”，有个酝酿过程。回头来看，它发端于几年前的metoo。女性平权、metoo，简体字出版到2021年前后才开始反应。另外，我们的出版编辑中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对此感同身受，报选题时驾轻就熟。紧跟着的市场表现又是正向反馈，出版社觉得这类书能卖，也是会尽量放行的。

你们知道，支配国际潮流的往往是西方左派的政治潮流。1960年代后，西方左派开始改变策略，最近30年，特别是最近20年非常明显，身份运动、身份政治这件事已经提升到国家的政策层面了。比如开始统计一个部门里的白人员工有多少，有色人种有多少。总之他们要打破秩序——人类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秩序。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破秩序之后想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对这类激进的欲求，我持怀疑态度的。

伊：

您说过您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身份政治还是可以促进“平等”或者与之类似的阶层流动等相关的思考。

刘：

所谓保守秩序并不是认为以往的秩序都是合理的，确实要改变不合理的秩序，而且需要时间，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保守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和左派最大的区别。前几天与一位大教授聊天——他出身落后的乡村，现在很有成就——他说春节回乡时，村村披麻戴孝。我们原来以为农村爆发疫情比城市晚几天，实际情况是农村跟城市是同步的，传染速度相当快。但是农村没有所谓的“医疗挤兑”，因为他们连医疗都没有，哪儿来的医疗挤兑？凭什么北京就有药，农村就没药，有什么道理？凭什么全国保北京。北京是个啥？北京不就是因为是政治中心吗？这不就是身份问题吗？

我问教授怎么解释这事儿。他说一是农村人认命。命里轮着你感染，轮着你重症，甚至轮到你死了，就认这天灾。二是发不出声音，有不满，但发不出声音来。农村的主要群体不是老就是小，有一点眼界、有一点知识的少壮都在外头。都是身份问题。

不过真的不能只挑漂亮话说。农村城市、男性女性、穷人富人，这些都是人类的本来面目：人类也确实有其发展进程，比如西方的选票，有投票权的先是男性，还要有财产，还有年龄限制，然后才给的女性和低收入阶层。整个西方投票制度花了二百多年，才落实到18岁的全体公民，对吧？

我赞成历史演化过程中不能少了左翼一支，但我不赞成激烈的手段，而且历史发展本身你也撼不动。激进往往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如果加上有组织的力量，尤其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就太可疑了。

3、《文明的两端》：知识分子的急迫

伊：

我读《文明的两端》的时候，觉得何怀宏老师在探讨文明开始的那一端，中规中矩，现状的那一端，感觉有点弱，不是太平衡。像托马斯索维尔、反社会的泰德·卡辛斯基这些，是不是代表了文明这一端，我是心存疑问的。

刘：

怀宏这本书的思考确实能看出有些犹疑。不过，主要问题还是靠我们近的这一端，不好说，国内外都有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这是 2022 年中国学界比较重要的一部原创作品。我看到的不止是不平衡，我希望怀宏再花几年工夫，写出像斯宾格勒那样的作品。

伊：

《西方的没落》？

刘：

他是有这个野心的。

伊：

您的书目中金观涛先生《消失的真实》感觉也是一个有更大野心的作品。他是要推翻整个体系的。

刘：

对，这个话题他要写三卷。

伊：

这是不是也有一种很急的、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人类文明，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心态？

刘：

从年纪上来讲他们是有些紧迫，把思考和忧虑都写出来。

伊：

我其实还有另一个疑惑，虽然这些书出版于 2022 年，应了这一年的“具体而且可触摸的不确定性”，它们被更多地赋予一种自我反思的色彩。但还有一层应该考虑进去的是，以通常理解，作者试图重新审视文明，其思考的准备期和写作周期会更长，他们的初衷有八九并非肇始于 2022 年的现实，而是更长远的一种对文明的再思考，这其中可能还包括了发展带来的自信。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不带有“中西对照”的眼光来思考文明问题，而过去四十年间的发展成果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者的出发点。

刘：

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其实不止他们俩，你再看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就更能看出他对人类文明的忧虑。中国知识分子也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阶段。

4、《县乡中国》：各怀心腹事的读者

伊：

我很想听您讲讲《县乡中国》。

刘：

这本书卖成现象级，我很意外。不过，每年都有这类题材，二三十年没断过这种题材。影响力大的，像是《中国农民调查》、《黄河边上的中国》、《山坳上的中国》，最近比较接近的，像去年兰小欢的《置身事内》。去年这两种书感觉受众有共同的出发点：原来有稳定步伐向前走，稳定进展，甚至还有某种稳定预期，当不确定的现象增加，或者发生了大的变化，人就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生活的地方。要说有多少特别的内容，倒不觉得。

伊：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比我想得要多一些。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本书，特别是语言风格。中国知识分子在做中国现实政治领域的研究时，瞬间就能把学术研究论文写成政府调研报告，满满的国师气和机关味儿。我说的启发是，有些东西是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不大会想到的；还有些东西是以前不知道如何想，看了它会有些启发。



比如说，去年封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与街道这样的组织打交道，观察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会跟你表达同样的喜怒哀乐，网上还有流传甚广的“我也无能为力”的街道基层干部哭腔。跟具体的街道干部聊天，他也会明确告诉你，“我们做的事都是错的”，“我们也理解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政策”，但他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不会在具体的某件事上对你有什么同情，也没打算给你任何怀柔政策——我很长时间困惑于“同理心”的问题，为什么在他们具体做事的时候完全无视其实算得上街坊邻居的存在……《县乡中国》真的会帮助我解答一些困惑，至少指出思路：比如街道与乡镇同级，没有资源可调配，他们仰仗上级拨款、仰仗上级评估体系来衡量自己的成绩。街道主任和书记的生态与乡长和乡书记的官僚的生态一样，最后只能“唯上”，不巧的是，他们又恰好在与普通民众最近的这个层级上，所以我们就会直接感受到一种残酷。

另一个启发也与“调动资源”能力有关。县这个层级，因为有资源调动能力，所以县长相对于县委书记来说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衡；而乡里因为没有资源，乡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乡长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在乡镇一级，权力更集中于书记。这里暗藏的一个逻辑其实很让人担忧，如果资源进一步集中，调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向上收，那么一层一层的行政体系的官僚可能都要沦为办事员。其实上海在封城期间，因为高度控制，整个官僚体系失去控制力，最终所有信息也罢、决策也罢都进入到一言堂状态，而且这一言堂还不相信科学，最后惹出大麻烦。调配资源的权力集中的后果比我们想得要恐怖得多——所有人都只能沦为办事员。

数字化显然提供更强一些的集中权力的可能性。以前说“皇权不下县”，是因为管不下去，半径不够……

刘：

“皇权不下县”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中国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大皇帝，额外有几千个小皇帝或者土皇帝”。几千个小皇帝是谁呢？是县官、县委书记，而不是地委书记、不是省委书记。很大程度上巡抚、总督这些是派出去的官僚，中央的眼睛看得到他，但中央的眼睛未必看到县委书记，这是其一；其二是从“落实”这个意义上，省委能落实什么？不管是处理危机还是地方发展，主要出头的是县委书记。所以，研究县乡治理，在中国是真问题。

伊：

张五常有一本小薄册子，说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一定是因为做对了什么事——他给出的答案也是“县级管理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事后查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论及县级管理，特别是长三角县级管理部门能量释放的内容颇多，譬如：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中央

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刘：

这么直面中国的书比以前少了。中国主题的书，现在转向历史题材，现实不能说。我个人看《县乡中国》时没有什么吃惊的地方，大概和我之前的阅读有关，很多东西以前也有从专业角度做的研究。但是你都吃惊的话，说明它自然有畅销的理由了：在这个意义上，杨华这书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国乡村》，当然，是一个缩写版的。

它不但可能应了“实”，可能还应了你所谓的“知识”。否则它很难像现在这样传播。前面不是说过嘛，这类题材书很多，贺雪峰、徐勇的书一本接一本本地出，销售都没达到这个量级，我找到原因了。

杨：

这本书流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因为流动性变差了，大家收入变低，也可能真的有离开北上广这样的事实，至少他们可能要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更想了解中国的县城乡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

看一本主题属专业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一般观察是销售上十万，读者就一定超出了领域，而且不止是知识人、读书人在看了，就已经深入大众了。

杨：

在我们身边，自由职业，或者说灵活就业的人正在多起来，也有人认为可以波希米亚一些，还有一些人会选择相对压力比较小的低线城市去生活。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另外，如今可能有相当多比例的人来自于县城或以下，但他们通常 18 岁考上大学，在大城市求学，留在大城市，他们对自己家乡其实了解是接近于无的——实际上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中产阶级概念化城市之外的地方，他有可能通过阅读小说去理解，像《县乡中国》这样一个了解的渠道。

伊：

像了解美国一样了解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县乡中国？

刘：

对。可能真的是这样。

5、《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嫉妒”

伊：

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能进书目也挺有意思。没想到它卖得这么好。我是先看了他的《回望》，一个经济学家短短四十年间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我以为会是《回望》卖得更好一些。

刘：

《回望》出书晚几个月，持续性还没看出来。另外，《回望》里的文章以前在网上能看到，当时维迎每写一篇，大家都争相阅读——没有经济学家这么写自己。《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张维迎写的第四本企业家精神的书，我认为相当前于是他 40 年以来关注这个话题的系统性总结。40 年，每 10 年写一本。再写都难了。

伊：

对，这本书给人感觉也像是告别。与何怀宏《文明的两端》、金观涛《消失的真实》有相似的地方，是总结之作。

刘：

不是告别此一话题，在这个时候，是告别企业家。以后不再有企业家了。这部作品是一个学者、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唱了最后一曲。

伊：

您注意到没有？这本书中间强行插入了一章有关飞艇和飞机竞争的故事，开始看的时候还感觉莫名其妙，“这是从何说起”。看到最后，讲中美贸易战，又重新回到飞艇与飞机竞争话题，点明飞艇派德国企业家雨果·埃克纳的三个冲突：一是一战后德国人和战胜国之间民族主义的冲突，二是他本人价值观与希特勒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三是美国人价值观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整本书差不多到此也就戛然而止，感觉还有点谋篇布局上的文学心思。

刘：

对，国与国之间竞争，企业家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最后一公里”的功能。前面的学者，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做的是基础设施，最后结果要通过产品和财富表现出来。苹果手机卖那么多钱，围绕它的全发财了，这里面包含的是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书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指向的企业家群体是“今天干事、明天会有什么结果完全不知道”的一批人。

伊：

冒险精神。在书里他还回顾了 1984 年在《北京日报》理论版上发布文章“冒险”与“探险”之争。他觉得“冒险精神”这几个字是核心，不能改。

刘：

他的回顾也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培育出来，这个东西是学不来的。当这些基本条件消失，也就再不会有这个“群体”，更不会有“精神”了。民营业主才是企业家，国有银行行长、国有石油老总叫领导，不叫企业家。

杨：

我觉得这本书的告别意义不止在这里，不止是工业化，它背后还有一个商业文明的体系，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它还是职场，上升通道。就在十几年前，大家好像还有共识，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大公司获得好工作，获得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的，现在这种可能性就弱很多。你想想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当时激励了多少人？大家是把它当成功学来看的，不是当做社会改革开放史来看。



刘：

这个有道理。企业家没有兴致了，不投资，后果不可预期。

伊：

看这本书时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心路历程。中间不断有变化。

开始不喜欢，觉得事已至此，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还在探讨公众嫉妒企业家、知识分子嫉妒有钱人的问题？特别是张维迎总结知识分子嫉妒原因是无知——无非就是引用托马斯·索维尔的观点。但你说在中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对平等和公正持续不断的经年追求，哪里有机会探讨企业家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被打下去之后，“大资本”就成过街老鼠了，关键也没有人帮着厘清资本企业市场这些概念，你现在还指责知识分子的偏见，感觉就是放弃“共同的底线”。

他还很认真地提到了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偏见，答案是“不嫉妒”。但是真正迫害企业家并让企业在偏见中被污名化的人——他们的出发点是嫉妒吗？他们似乎也并不

嫉妒。后来想，张维迎一生都在强调企业家精神，这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它拼命把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划等号。好像在威胁或者呵斥——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你的市场经济如何是好！但他不会不明白，有些人就是不想要市场经济了，任你苦口婆心最后全无着落。

但是，最后看到雨果·埃克纳三个文明的冲突，就完全被他的悲情所笼罩。然后，他讲起了中美贸易冲突，也没有太多说的余地，一两页结束，全书也就结束了。他讲齐柏林飞艇，无非是讲价值冲突，这事就完蛋了。企业家精神不管是对齐柏林还是对胡安·特里普，都不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其实不是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一定是想说，不要在价值观上起冲突，人类普适价值就是进步本身。但是，我在看的时候也很担忧，因为看了这个结果，一定也有人会进入到那个话题里：老二难，总要被卡脖子，老大老二之间果然必有一战。

如果读出这个结论来，对张维迎和他所倡议的这个时代来，就是悲剧了。

6、《战争指挥》和《世界历史的教训》：另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

刘：

你们注意到没有，今年还有一个题材是以前很难上榜的。就是战争。

伊：

因为俄乌战争嘛。

刘：

也不光是他们，切身担忧也有。更大规模的战争，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

伊：

人类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

刘：

交流。你说人类从婚姻到贸易到技术引进，这些本质上都是交流。什么文化交流，什么整合，人群之间的交流。战争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今天跟 1913 年 1914 年很像。有一本讲 1913 的书，写 1914 的更多了，“一页”最近就出了一本，《和平戛然而止》。1914 年，一战之前，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说实际上谁也不想打仗。

杨：

《和平戛然而止》的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寥寥几人就把世界带入战争”。还特意在括号里加上一句，“而且他们都是男人”。

刘：

第一是谁也不想打仗，第二是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可是为什么战争还是爆发了？你把一些条件套用到 1913 年 1914 年，跟今天有相像之处。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听到的都是想打仗……只是有人说出来了，说备战，要学会打仗，要打胜仗，重复了很多次，说出来的实际上是不想打仗，更想打仗的不会说。你看美国人说的更多的是和平，所谓保持现状、维持原有的国际秩序。但我看现在美国人更想打仗，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忍受不了这种乱搞。

伊：

这不是老大一定不会容忍老二的另一个版本吗？

刘：

但是他要先动手，会陷入被动。

像《战争指挥》，关于战争战略的，还有刚上市的《拜占庭兵法》。既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实际担忧，但好像也有对打仗的某种期待。

杨：

“谁不来谁是小狗”。

刘：

大家说的那些玩笑话都不是简单的玩笑话。谁不打谁是小狗，不打是孙子。就进入到这种状态。这些玩笑话透露的是社会心理。有些问题什么办法都没治，干脆打一仗。

杨：

不还是“让剑解决问题”吗？

刘：

战争引发革命，战争引发帝国的崩溃。大家对不公平的感受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希望有其他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公平的问题。民众心态越是无力的人，他越是激烈。为什么？他的力量改变不了，那么干脆一了百了。我认为，这才是危险的东西。民意有可能最后会绑架决策。当然反过来，决策也能绑架民意。

伊：

我去年看《黑羊与灰鹰》，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丽贝卡·韦斯特去南斯拉夫旅行。她看到的三十年代的民意，不公平。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所有各民族的人，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公平。

刘：

全世界都鸡飞狗跳，大萧条，没工作，没饭吃，更喝不着酒。所以憋着对不公平来次清算。

伊：

所以《世界历史的教训》里面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一章，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者的委屈，我们永远是天选之子，我们现在受欺负的地位一定要改变，不是个人委屈，国家也委屈。

(题外话。海斯对为什么一个地位低下的人特别容易成为激进民族主义者很早就给出答案：

由于大多数公民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理解并留意这些诉求。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个人的财富确实是国家的财富；属于特定群体的制造业、农业、商业和劳动力，实际上是国家的制造业，国家的农业，国家的商业，以及国家的劳动力。伦敦东区最穷的爱国者在想到英国的工业和财富时，往往会昂首挺胸——英国的财富，难道不就是他的财富么？由此推断，一个民族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会被期待认可本国同胞经济利益，并为之工作；不管他自己的职业或专业是什么，他都应当做好准备，把群体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这些群体都诚挚而雄辩地慷慨陈词，说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他因此可以自豪地——不管他是个记账员，还是个砖匠——谈到他的自然资源，他的工厂，他的船舶和铁路，他的农场，他的工业劳动力。可以肯定，“国家利益”的观念是最令人欣慰、最令人兴奋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当中最渺小的人，只要他抱有这个观念，便会立马高看自己三分，在自己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伟大而幸福的大人物。)

杨：

所以这算是您一个担忧。

刘：

我没有担忧。我是说社会心理有这个担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说实话都不是人力可为的，这就是保守主义。明白？另外我也不怕战争，该死死、该活活，人类就是这个德性，你怎么能对人类有那么高的期待？

在几年前我就说这件事。现在慢慢地更多的人开始认同我这个看法了。我最早说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应该想办法制止”是吧？这是进步主义的想法。你们自己喜欢不喜欢什么东西都禁止不了，还有能力禁止战争？我说这话，最早应该是在 2018 年。我那时说，这是 2014 年以来开启的 20 年进程里最好的一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今年是未来 20 年最好的一年”。社会心态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有历史的内在逻辑？虽然听起来非常庸俗。

很多人是不相信人心的。其实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是不是偶然的”。历史也不可测，但你仔细想想人心，其实是最容易测的。过和平的日子，要公平，这都是人性，当然也包括贪便宜。这都是文明进化的后果。

别人也想贪便宜，因此我们就要达成某种平衡。你不能就老想自己贪便宜。

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刘：

总之就是说人心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但是如果人心被民族主义激发，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指向哪里。问题是普世价值也有这个，为自由而战，为信仰而战，一样你死我活。就说为信仰之类，西方打了多少年？更可怕。

所以说最后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谁来决定我们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如果找不到这个答案，人类的纷争就没有完。

7、从《世界历史的教训》的写作到启蒙的另一面

伊：

《世界历史的教训》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读起来很畅快。

刘：

那时候学者写东西还很自由，没有自我审查，说话也放松。现在的学者写东西都很规矩。既有时代的不同，也有精神气质的不同。这个叫什么？激情和动力都不一样。西方现在也反思批评自己，缺少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事情。

表现好的也就是麦克尼尔父子托尼朱特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水准；但小东西写得太多了，临去世前与斯奈德合作的《思虑 20 世纪》有点味道，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有这个气魄。

20 世纪初的大家写法不多了。卡尔顿·海斯不是一流历史学家，没办法跟汤因比比。

伊：

他这本书写在一战二战之间，对民族主义的很多东西看得比较超前。很多事已经发生了，大部分民族主义的弊病还不像今天看到的那么突出，现在回头看，觉得还是挺有一些洞见。大约还能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后来写《想象的共同体》时继承或者借鉴的一些观察。感觉对民族主义的审视和警惕是一脉相承的。

刘：

西方人喜欢讨论自己衰落这件事，而且他们意见还不统一，两种声音都很强大。川普在台上的时候，一半美国人认为天要塌了或者已经塌了，然后等到拜登登上台，另外一半美国人说美国完了。海斯的疑问也是文明出了什么问题。讲西方文明要完了这件事儿，当时唱衰声音最大的是斯宾格勒。

最近这些年的出版业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对于我们这些喜欢看书、还想问题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贡献，丰富了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范围的认识——原来还有反启蒙的这个路数。以前我们都不了解有赫尔德这些人。

伊：

我是从以赛亚·伯林那里才慢慢看出一个脉络。

刘：

伯林就更晚了。赫尔德他们都是 200 多年前的人了。尤其是比如说像最近连续这三年出的一些书，包括拉塞尔·柯克的什么？美国思想是不是？

伊：

《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你说你是保守主义，我还特意看了这本书。

刘：

拉塞尔·柯克。2021 年还有一本《反启蒙》，华师大出的。我们原来仅仅是知道有一股对启蒙运动不满的思潮而已，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思想脉络，哪些人、哪些作品、在什么时期、引发过什么争议、争论……我们都不了解。《反启蒙》开本是小册子，但是非

常厚，有八百多页，去年入选了我们 2021 年 Top 40 书目，再加上《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后面这本书前年一下子出四五个译本，它是偏左的，因为它攻击右，我们就顺带看了右。我们才知道启蒙是正典，其实还有一个“负典”。很粗壮的一条线，一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批评启蒙运动以及它的后果和引发的变化。

杨：

批评启蒙运动，主要批评什么呢？

刘：

主要是批评信仰世界被颠覆掉了，把人抬到了判断是非的天平上。上帝死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以前没意识到这条副线的粗壮，甚至同样是主流。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你说谁是主流？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谁是主流？

伊：

还有辉格和托利。

刘：

就是说对西方文明的担忧，其实从启蒙运动以后就没有中断过。演变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移民问题，公平政治、环境政治、身份政治……另一头就是反移民、减少干预企业、全球到底变暖没，等等。

反垄断和反反垄断也是一组，你不能动不动举着反垄断的大旗搞企业。

伦理上就说要回归家庭，坚持男人是男人。实际上当我们争论到我们很熟悉的话题时，你最终会发现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所以说，这个话题在西方不是个新话题。

启蒙运动这一边换了多次马甲，而反启蒙的这些人好像没有换过。最简单地理解保守主义，可以说就两条。第一，人类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谁是、谁非，因为人的认知能力太有限了。那句话怎么说？当人可以判断人间事物的时候，岂不就是混乱源头？岂不就是自大到以为你跟上帝一样了。事实上，近代以后的纷争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举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当年南非为什么有一个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这件事情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实现民族和解的整个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设计，而且很成功。那些受害者被引到法庭陈述作证，有些人没有办法原谅，那些侵犯人权的罪行太大了，甚至庭都开不下去了。最后委员会主席图图就发明了这么一种方法：我们先不吵了，我们来祈祷，休会祈祷，然后再说。

伊：

叶礼庭讲过这一段关于图图的故事。

（事后翻书，叶礼庭在《战士的荣耀》中提及的要点：

在和解背后已经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识的国家，真相委员会成功的机会最大，比如说南非。这种共识也许与认为需要清理过去余毒的道德一致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种大多数人认可的、审慎的道德计算，即相信司法惩罚有将社会撕裂甚至引发内战或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相似乎是一个比正义更不易引起分裂的目标，图图的真相委员会即使强制揭露痛苦的真相，但也增强了创造出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各方派别多年来对其他派别实施谋杀、折磨、儿女的罪恶常常建立在父亲和祖父的罪恶的基础上；真相、和解和正义的前景黯淡得多。……

和解取决于共享的真相，这一理念假定关于过去的共享真相是可能的。但真相与身份有关，你相信什么是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相信自己是谁，而你相信自己是谁，主要是按照你相信自己不是谁来界定。

如果真相是由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公布的话，它也不大可能被那些反对它的主导者的人们所接受。警察和军队有他们自己的真相，而他们得以实施其控制，正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真相并不全是谎言。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镇压恐怖分子或叛乱威胁，仅仅因为一个真相委员会揭露这种威胁没有根基，就期待他们否认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人们，

尤其是身穿制服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轻易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前提妥协。如果曾经有过忏悔的话，也仅是个别人。真相委员会所能做到的全部只是减少广为流传、未经挑战的谎言的数量。例如，现在在阿根廷，不可能有人断言军方没有将半死不活的受害人从直升机上扔进海里。在智利，不再容许公开宣称皮诺切特政权没有“处置”数以千计完全无辜的人们。真相委员会能够也确实改变了公共议程和公共记忆的框架，但不能因为他们未能改变行为和体制，就断定他们失败了。那不是他们的作用所在。

（最后是审慎的政治计算和共识决定了真相的存在。中国学者秦晖《共同的底线》也是讲这样一个道理。在法国学者跟他表示左右之间很难同意对方见解的时候，他谈及当大家共同面对极右翼的勒庞的时候，就找到那个“共同的底线”了。）

刘：

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州代表们吵到谈不下去，有人说出了“战场见”。人与人口舌相争，能争出是非对错吗？最后就是“让剑说话”。但人类一旦要让剑说话，不是尸横遍野，就是饿殍遍地。打多少年也打不出个名堂来，谁不会轻易放弃。

伊：

咱们现在互联网上也都是用剑说话。

刘：

后来有人说“持剑经商”——我还记得这句话——这些人，历史知识是零。经商是啥？经商是和平，以及，经商导致和平，反正总之它是更和平的。“持剑经商”什么意思？你是先杀人再卖东西，你还是卖完东西杀人？

所以，启蒙最后发展的极致就是列宁党：只有先锋队是聪明的。先锋队必须有一个领导人。



伊：

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总结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征了。

刘：

我跟你讲，列宁主义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晶，理性时代来临了，“我是尺度”。因此我说谁对谁就是对的。这就是罗伯斯比尔和列宁之间的传承，所以反启蒙肯定是正常的，肯定会有。

第二就是说保守这一块不排斥变革。

但是我们要因势利导，要谨慎。任何一个想要改变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其来有目的。我们首先要尊重这个其来有自，再看看它有什么毛病，有一点毛病就替换一点，有两点毛病就替换两点，不是把它先扔了，建个全新的。新的不也是人设计的吗？你怎么就觉得你比祖上更聪明呢？所以，保守主义在方法上偏谨慎，尊重传统，不那么自信。

8、从启蒙说到了中世纪

刘：

22 年中世纪的书太热了，近年这类书出版量一年比一年多。其实也跟启蒙和反启蒙这两条线有关。

中国所谓的先知先觉者，用老词儿说，又一次开眼看世界。他们开始意识到对西方认知的空缺：我们是截了启蒙这一段的历史——就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启蒙运动之后蹦出来的。那些横空出世的哲学家、研究者，科学革命什么的，大家发现很多东西在中世纪就有了。不仅有了，而且健全，为所谓的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候才开始往回倒腾，这一倒腾不要紧，发现一个巨大的宝库——知识宝库或者观念的宝库，包括我认为建制设计的宝库，比如中世纪发展出来的王权，一些城市获得自治、领个出生证，这些合法证明完全是中世纪时期给他们的；那些行会、资产阶级也是从中世纪城市里的一点点长出来的，做生意的或者说是爱财如命的一帮人是在王权和贵族教育过程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近代科学先是从中世纪教会、修道院里学来的。

然后又进一步发现，近代以来的知识的基础，原来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修道院的修士，用阿拉伯文储存的修道院里，就包括经验哲学。我们嘲笑经验哲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说那是瞎扯，后来才发现这其实完成了一个宗教信仰和世俗哲学之间的转换，这是在中世纪完成的，在圣托马斯。

后来还有新柏拉图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哪有什么“新”，都是“重新”。

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然后希腊的理性，他们就跟当年奥古斯丁受到挑战一样，一千年以后他们又被挑战了一次。我们怎么面对希腊的理性？看阿奎纳同学。他做了一次裱糊匠——不叫裱糊匠，用上海话怎么说的？

杨：

捣浆糊。

刘：

那些喊上帝死了，然后呼唤人的解放，然后准备确立理性法庭……那些最早的战士、最早书籍、最早的实践，不都是中世纪大学那帮人捣鼓出来的吗？从博洛尼亚到巴黎大学到牛津剑桥都是这样。西方对自己历史，你说重新反思也好，重新梳理也好，始终有来回鼓捣的传统。到了中国，首先就是知识界要补上巨大的漏穴，知识的漏穴，补课的一个结果就是检讨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的认知……其实都是从今天当下的问题引发的：那就是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9、《毫无意义的工作》，又说回左右

杨：

《毫无意义的工作》，它的上榜一定与年轻人有关。

刘：

对。这本书开始我没看，“占领华尔街”的时候我正好去过美国，也没把大卫·格雷伯与华尔街那位联系起来。开始就是字面理解这几个字，觉得跟“反对 996”之类的差不多。

杨：

我也觉得他们买这本书的动力完全不在于占领华尔街的 1% 和 99%。应该跟国外对大卫·格雷伯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是整体迷茫的一部分。大家试图寻找一种活法：现实中工作占据了你的全部。这是很多年轻人试图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我的生活中心不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虽然它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疫情以来，大家更试图从中走出来。疫情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让工作变得虚无了。以前你都是去一个地方上班，到点儿下班，疫情之后没有事儿，你就是蓬头垢面、披头散发地在家开电话会；这电话会议你还可以关了麦克风，前面坐着一条狗还是你，根本就不重要；然后效率也都很低，做好做坏都没有劲了……就是一切都觉得虚幻，日子每天过得都很假。工作的意义实际上探讨的是生活意义。

刘：

这里涉及一个工作观念的问题。我跟左派有一个完全是相反的看法，我看工作本身实际上是某种限制。几年前我才知道美国结构性失业当中有一块，就是全员都有工作机会、而且还要从外面招劳工这种背景下，还是会百分之三点多的失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失业率不会更低，比如二点几或者一点几。大概往前数应该是四五年前，有位经济学家给我解释说，美国就有一批人就不愿意工作。就有一批人，既有因为生活观念、

工作观念的原因不工作，也有真的就是懒惰、好吃懒做不工作，拿福利活着。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那批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尊重他们。

你别看这书花里胡哨，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一个他们觉得的新角度。他们总结这些狗屁工作带来的种种恶劣后果、对心灵的戕害或者身体的戕害，说到底最后都是要进入到谴责资本主义，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谴责回过来看，它发端于几年前的 metoo。资本家对劳工的所谓剥削。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一例外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后，现代制度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就变成一个哲学问题了。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没这些问题，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你以为其他主义就没问题？我们前面说共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之子，只是它更冷。关于人的解放、男女平权，毛有句名言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他没有接受西方启蒙另外一套价值，比如尊重和宽容。

伊：

宽容是你们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观点。

刘：

对，保守是宽容，就是说人总都会犯错误。启蒙主义，启蒙是多元。

杨：

非常有意思。这两个词看起来很相近。其实都有不一样。

刘：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多元是什么东西？好坏我都有存在的价值。宽容是说，我即使不理解，我也认为因为你的存在本身我应该尊重你。因为我尊重这个存在。

伊：

我们这里既不宽容也不多元。

刘：

你看多元主义就会导致相对主义。

刘：

宽容，其实宽容的基础是绝对。你说的对。宽容意味着还是有相对的核心，否则谁宽容你呢？

杨：宽容是有主体的，对。

刘：

这个绝对就是上帝。

回到《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格雷伯就是最典型的左翼行动派，他既是一个教授、研究者、思想家，同时也是个行动者。他冲到所谓“占领华尔街”第一线，但是你看他的书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及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讲，“资本家也不是傻子，为什么要设置一些毫无意义的职位让你们挣他们的钱”，然后他得出结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个阴谋。

我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他提到的那些岗位效率确实不是太高，可是从长程来看、从系统来看，资本主义效率还是最高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一个主义或者效率最高的时期。

10、《荒野上的大师》与捍卫记忆

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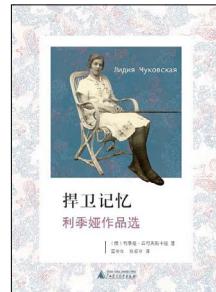
《荒野上的大师》也与焦虑有关吗？

刘：

它可能更与民国热有关。

杨：

20年来一直有民国热，大家试图回溯的东西是什么。



刘：

我们肯定回不到美国建国的时候，不能像美国那样。对，我们只是说回到宋朝、梦回唐朝。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不仅历史上存在过，跟我们是一个接替关系，其后代就睡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正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后代。

不是《往事并不如烟》这种控诉型的。我喜欢被苏联作协开除的那个人的《捍卫记忆》。

伊：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文学纪念碑”系列的一本，她父亲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我们知道的好多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的故事都是她写的。

刘：

就是捍卫记忆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包括像《李济传》、《金岳霖传》还有《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卖得不错。

杨：

还有《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

刘：

还有新出一本，纸质的还没在我们这里卖。一个什么一个故事的……

杨：

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刘：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群人并不是只能过现在这样的日子的，我们也可以过另外的日子。虽然另外的日子也有苦难，但是要活得更像人。

11、《翦商》和“金娃娃”历史叙事

苏里在内里大约还是把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个二元论的区分全球的或者说美国的问题，总是货真价实的冲淡平衡，中国问题就免不了尖锐。后来我们聊到《翦商》这本书的时候，苏里讲起了鲁迅说的翻尽中国古书，尽是“吃人”二字，“鲁迅那段话，我们都会背，他就是那么尖锐，一直到今天，就是吃，这个族群没有变化……”

我试图用另外一本入选的书来说明我对历史的看法：“你看，鲁迅说吃人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到科举制。《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埃尔曼对科举文化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有一种平衡感，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商人这些所谓上流阶层的社会生活是围绕它来展开的。你放在这个角度来看，它对‘废科举’的理解就特别有历史纵深感了，晚清激进改革中动了这个根本，整个大清几年时间就解体了。”

“还是有一点微观的进步，虽然本质上都是吃人。”苏里疑惑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我这解释是不是说得通，是不是能说服这个保守主义者。

我想起《世界历史的教训》中提到一句话，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在狭隘的经济考量和宗教考量之外，现代民族主义者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推动力。民族主义涉及一个没有直说却十分明显的信念：在美德和勇敢上，在文明和“使命”上，自己的民族都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在满腔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本民族实现统一和独立，是人类历史亘古以来的巅峰和极致。”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刘：

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翦商》是小说？

杨：

您也有困惑的时候。很多人对什么是小说都没有概念。看到叙事好、故事性好，就说是小说。

伊：

说他是小说的，可能就觉得像说武王做噩梦、一吃东西就吐、抑郁症什么的过于写实，显得太夸张。

刘：

它是学术的，而且都不能算是轻学术。我觉得它是去年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本书。我个人看，未来很多年也很难再出现超过这部作品的东西。

刘：

以为只吃了零星的。“商人把人剁了吃”什么的我早知道，可哪想到是如此制度化，如此长久，如此花样翻新，如此规模，真是吓着我了。历史后来被化了妆，被周代改头换面重新叙述了，然后在孔子那里又经过删改、进一步优化。

伊：

但是你换个角度，不管孔子还是周公对历史的修饰，本身也是带着提升文明的目的在做这件事。不能苛求周公时代就具备客观对待历史的能力。

刘：

我完全赞成你说的进步或者演化更文明，但是你不能成天想象自己生下来就是个金娃娃，对吧？不是那回事儿。李硕揭示了如此详密的资料。

12、最后我们说到了出版这个人文行业

“这几天图书订货会，全国书业的人都来了，聊天吃饭，私底下交流最多的也是对今天的局面和未来局面的研究。大家都是有话要说，所有人的问题都没解决。你不能以为感染高峰过了事情就过去了，没有。出版业最直接的担忧是，这个行业会不会像教培，民营出版能走到哪儿。”

苏里提醒让人一惊，这担忧一下子迫在眉睫地清晰起来。

“大的像教育，更早的是媒体，小的像论坛、小组之类，都干掉了，豆瓣小组最典型。包括游戏，游戏是什么？游戏是会影响年轻人大脑的东西，打打杀杀啊、装备什么的，沉迷之类只是一方面。大家当然会担忧。出版是最后一块，不乐观，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说到这儿，万圣老板娘进来了，拿着摄像机说要为访问做个记录。三个人都端正起来。

刘：

现在是2023年2月23日下午，从上午十点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万圣每年一次的年终书目。

杨：

我们这个聊聊天的过程，把2022年困惑我们的所有东西差不多点了一遍。感谢苏里老师和万圣书园对小鸟文学的支持。

伊：

万圣在我们看来是个媒体，连接思想界和读者。我们小鸟文学把这些呈现给更多关心思想关心现实的人。

然后我们收拾东西去吃饭。

附：万圣书园2022年度书目

原创·学术

- 1.《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杨华著 中国人民大学 2022.04 版 69元
- 2.《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李硕著 一页·广西师大 2022.10 版 99元
- 3.《文明的两端》何怀宏著 一页·广西师大 2022.07 版 ,98元
- 4.《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 商务 2022.10 版 98元
- 5.《消失的真实》金观涛著 中信 2022.03 版 88元
- 6.《论爱欲》汪民安著 南京大学 2022.07 版 75元
- 7.《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著 理想国·海南 2022.06 版 88元
- 8.《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赵鼎新著 浙江大学 2022.06 版 139元
- 9.《“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杨念群著 上海人民 2022.09 版 128元
- 10.《法概念史：古代末期、中世纪》顾祝轩著 法律 2022.09 版 115元

原创·轻学术

- 1.《感知·理知·自我认知》陈嘉映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 2022.01 版 58元
- 2.《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刘瑜著 理想国·广西师大 2022.04 版 82元
- 3.《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罗新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 2022.07 版 65元
- 4.《学者的术与道》李连江著 上海交大 2022.04 版 69元
- 5.《生命的厚度》江绪林著 上海文艺 2022.06 版 72元
- 6.《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赵汀阳著 商务 2022.09 版 68元
- 7.《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著 南京大学 2022.07 版 108元
- 8.《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张泉著 一页·广西师大 2022.03 版 69元
- 9.《法治的细节》罗翔著 果麦·云南人民 2022.03 版 49.80元
- 10.《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黄克武著 深贝·广西师大 2022.03 版 89元

翻译·学术

- 1.《社会运动：1768～2018》[美]查尔斯·蒂利等著 上海人民 2022.08 版 79元
- 2.《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美]约瑟夫·奈著 金城 2022.04 版 78元
- 3.《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美]卡尔顿·海斯著 中华书局 2022.07 版 65元
- 4.《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沙尔夫斯坦 著 南京大学 2022.02 版 78元
- 5.《战争指挥》[以]范克里韦尔德 著 巴别塔·新华 2022.05 版 68元
- 6.《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英]道格拉斯著 华东师大 2022.06 版 59.80元
- 7.《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瑞典]弗雷著 后浪·民主与建设 2021.11 版 82元
- 8.《文明世界的战争》[以]阿扎·加特著 华东师大 2022.11 版 118元
- 9.《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美]埃尔曼著 社科文献 2022.01 版 158元
- 10.《亚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美]罗纳德·托比 江苏人民 2022.11 版 58元

翻译·轻学术

- 1.《毫无意义的工作》[美]大卫·格雷伯著 中信 2022.07 版 79元
- 2.《自由意志：古典思想中的起源》[德]弗雷德 北京三联 2022.06 版 58元
- 3.《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美]大卫·邓宁著 中国翻译 2022.07 版 69元
- 4.《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日]上野千鹤子 等著 新经典·新星 2022.09 版 59元
- 5.《欧洲的黄昏》[保]克拉斯特耶夫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1.11 版 45元
- 6.《我非我脑：21世纪的精神哲学》[德]加布里尔 著 华章同人·重庆 2022.06 版 65元

- 7.《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美]阿克斯特尔著 北京三联 2022.08 版 69 元
8.《美国四百年：冒险、创新与塑造的历史》[美]斯里尼瓦桑著 理想国·海南 2022.02 版 118 元
9.《现代性及其不满》[美]史蒂文·史密斯著 后浪·九州 2021.11 版 88 元
10.《民族的神话：欧洲中世纪的起源》[美]帕特里克·格里 深贝·广西师大 2022.02 版 64 元

关于年度书目的泛泛而谈，许多问题都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

1、“具体可触摸的不确定性”

这一年里，人们在被动中生活，留下一个巨大的精神隐患，通常来说，我们会说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已经有些年头了，说起来有些矫情。但经历 2022 年，这不确定性似乎才真正让鲁钝的心灵也能感受得到。不知道小区什么时候封掉，不知道第二天是不是能买到菜，夜里会不会紧急转运到某个大巴车上，家里会不会进来消杀，宠物怎么办，出差不知道能不能住进酒店，不知道有一个“弹窗”告诉你不能回来……种种“不确定性”是具体的、可感受的。

这种具体的不确定性，偏偏是最少答案的。书里不会有答案。即使隔了几个月，我们与各种人聊起 2022 年的生活，普遍都会提起健康问题，不仅仅是病毒和对病毒的理解，还有精神状态。从惶恐到抑郁。

2022 年还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因为巨大的惶惑，感觉应该通过更多阅读解决自己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看书的心态都调整不出来，大量的时间用在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带来的情绪波动上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性支持，也就是不为环境变化所动的那部分，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突发信息上，如果有同理心，那就更焦躁。”杨樱说，“而且因为事情变得太快，支持就变得抽象，看起来愈发指望不上。”

“不知所措。对吧？”苏里总结。

刘 = 刘苏里，伊 = 伊险峰，杨 = 杨樱

刘：

初选 2000 种书目里有不少关疾病和健康的书，有几本销售还挺靠前，像后浪的《流行病与社会》，但不是太典型，身心健康方面的，近年历来都有，今年分布得更广一些，但是在我身上投射得不够，你们的问题提醒我了。

关于“未来忧虑”或说“忧虑未来”的新书，无论是本土创作还是翻译作品都很多。当然，同类旧书去年也卖得非常多，比如《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等，都在卖。

2、《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

杨：

《始于极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图书似乎很多。

刘：

女性主义自上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已经讨论四、五十年了。你俩大概看出在初选的 2000 种里它的“存在感”很强，这与出版会略微滞后于社会主流话题有关。一个话题最后成为“出版热”，有个酝酿过程。回头来看，它发端于几年前的 metoo。女性平权、metoo，简体字出版到 2021 年前后才开始反应。另外，我们的出版编辑中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对此感同身受，报选题时驾轻就熟。紧跟着的市场表现又是正向反馈，出版社觉得这类书能卖，也是会尽量放行的。

你们知道，支配国际潮流的往往是西方左派的政治潮流。1960 年代后，西方左派开始改变策略，最近 30 年，特别是最近 20 年非常明显，身份运动、身份政治这件事已经提升到国家的政策层面了。比如开始统计一个部门里的白人员工有多少，有色人种有多少。总之他们要打破秩序——人类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秩序。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破秩序之后想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对这类激进的欲求，我持怀疑态度的。

伊：

您说过您是保守主义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身份政治还是可以促进“平等”或者与

之类似的阶层流动等相关的思考。

刘：

所谓保守秩序并不是认为以往的秩序都是合理的，确实要改变不合理的秩序，而且需要时间，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保守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和左派最大的区别。前几天与一位大教授聊天——他出身落后的乡村，现在很有成就——他说春节回乡时，村村披麻戴孝。我们原来以为农村爆发疫情比城市晚几天，实际情况是农村跟城市是同步的，传染速度相当快。但是农村没有所谓的“医疗挤兑”，因为他们连医疗都没有，哪儿来的医疗挤兑？凭什么北京就有药，农村就没药，有什么道理？凭什么全国保北京。北京是个啥？北京不就是因为是政治中心吗？这不就是身份问题吗？

我问教授怎么解释这事儿。他说一是农村人认命。命里轮着你感染，轮着你重症，甚至轮到你死了，就认这天灾。二是发不出声音，有不满，但发不出声音来。农村的主要群体不是老就是小，有一点眼界、有一点知识的少壮都在外头。都是身份问题。

不过真的不能只挑漂亮话说。农村城市、男性女性、穷人富人，这些都是人类的本来面目；人类也确实有其发展进程，比如西方的选票，有投票权的先是男性，还要有财产，还有年龄限制，然后才给的女性和低收入阶层。整个西方投票制度花了二百年，才落实到 18 岁的全体公民，对吧？

我赞成历史演化过程中不能少了左翼一支，但我不赞成激烈的手段，而且历史发展本身你也撼不动。激进往往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如果加上有组织的力量，尤其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就太可疑了。

3、《文明的两端》：知识分子的急迫

伊：

我读《文明的两端》的时候，觉得何怀宏老师在探讨文明开始的那一端，中规中矩，现状的这一端，感觉有点弱，不是太平衡。像托马斯索维尔、反社会的泰德卡辛斯基这些，是不是代表了文明这一端，我是心存疑问的。

刘：

怀宏这本书的思考确实能看出有些犹疑。不过，主要问题还是靠我们近的这一端，不大好说，国内外都有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但我还是认为这是 2022 年中国学界比较重要的一部原创作品。我看到的不止是不平衡，我希望怀宏再花几年工夫，写出像斯宾格勒那样的作品。

伊：

《西方的没落》？

刘：

他是有这个野心的。

伊：

您的书中金观涛先生《消失的真实》感觉也是一个有更大野心的作品。他是要推翻整个体系的。

刘：

对，这个话题他要写三卷。

伊：

这是不是也有一种很急的、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人类文明，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的心态？

刘：

从年纪上来讲他们是有些紧迫，把思考和忧虑都写出来。

伊：

我其实还有另一个疑惑，虽然这些书出版于 2022 年，应了这一年的“具体而且可触

摸的不确定性，它们被更多地赋予一种自我反思的色彩。但还有一层应该考虑进去的是，以通常理解，作者试图重新审视文明，其思考的准备期和写作周期会更长，他们的初衷十有八九并非肇端于2022年的现实，而是更长远的一种对文明的再思考，这其中可能还包括了发展带来的自信。中国知识分子很难不带有“中西对照”的眼光来思考文明问题，而过去四十年间的发展成果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者的出发点。

刘：

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其实不止他们俩，你再看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就更能看出他对人类文明的忧虑。中国知识分子也到了思考这个问题的阶段。

4、《县乡中国》：各怀心腹事的读者

伊：

我很想听您讲讲《县乡中国》。

刘：

这本书卖成现象级，我很意外。不过，每年都有这类题材，二三十年没断过这种题材。影响力大的，像是《中国农民调查》、《黄河边上的中国》、《山坳上的中国》，最近比较接近的，像去年兰小欢的《置身事内》。去年这两种书感觉受众有共同的出发点：原来有稳定步伐向前走，稳定进展，甚至还有某种稳定预期，当不确定的现象增加，或者发生了大的变化，人就开始重新认识他们生活的地方。要说有多少特别的内容，倒不觉得。

伊：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比我想得要多一些。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本书，特别是语言风格。中国知识分子在做中国现实政治领域的研究时，瞬间就能把学术研究论文写成政府调研报告，满满的国师气和机关味儿。我说的启发是，有些东西是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不大会想到的；还有些东西是以前不知道如何想，看了它会有些启发。



比如说，去年封城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与街道这样的组织打交道，观察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经常会跟你表达同样的喜怒哀乐，网上还有流传甚广的“我也无能为力”的街道基层干部哭腔。跟具体的街道干部聊天，他也会明确告诉你，“我们做的事都是错的”，“我们也理解你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政策”，但他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不会在具体的某件事上对你有什么同情，也没打算给你任何怀柔政策——我很长时间困惑于“同理心”的问题，为什么在他们具体做事的时候完全无视其实算得上街坊邻居的存在……《县乡中国》真的会帮助我解答一些困惑，至少指出思路：比如街道与乡镇同级，没有资源可调配，他们仰仗上级拨款、仰仗上级评估体系来衡量自己的成绩。街道主任和书记的生态与乡长和乡书记的官僚的生态一样，最后只能“唯上”，不巧的是，他们又恰好在与普通民众最近的这个层级上，所以我们就会直接感受到一种残酷。

另一个启发也与“调动资源”能力有关。县这个层级，因为有资源调动能力，所以县长相对于县委书记来说有一定的权力，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衡；而乡里因为没有资源，乡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乡长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在乡镇一级，权力更集中于书记。这里暗藏的一个逻辑其实很让人担忧，如果资源进一步集中，调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向上收，那么一层一层的行政体系的官僚可能都要沦为办事员。其实上海在封

城期间，因为高度控制，整个官僚体系失去控制力，最终所有信息也罢、决策也罢都进入到一言堂状态，而且这一言堂还不相信科学，最后惹出大麻烦。调配资源的权力集中的后果比我们想得要恐怖得多——所有人都只能沦为办事员。

数字化显然提供更强一些的集中权力的可能性。以前说“皇权不下县”，是因为管不下去，半径不够……

刘：

“皇权不下县”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中国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大皇帝，额外有几千个小皇帝或者土皇帝”。几千个小皇帝是谁呢？是县官、县委书记，而不是地委书记、不是省委书记。很大程度上巡抚、总督这些是派出去的官僚，中央的眼睛看得到他，但中央的眼睛未必看到县委书记，这是其一；其二是从“落实”这个意义上，省委能落实什么？不管是处理危机还是地方发展，主要出头的是县委书记。所以，研究县乡治理，在中国是真问题。

伊：

张五常有一本小薄册子，说中国经济发生了奇迹一定是因为做对了什么事——他给出的答案也是“县级管理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事后查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论及县级管理，特别是长三角县级管理部门能量释放的内容颇多，譬如：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刘：

这么直面中国的书比以前少了。中国主题的书，现在转向历史题材，现实不能说。我个人看《县乡中国》时没有什么吃惊的地方，大概和我之前的阅读有关，很多东西以前也有从专业角度做的研究。但是你都吃惊的话，说明它自然有畅销的理由了：在这个意义上，杨华这书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国乡村》，当然，是一个缩写版的。

它不但可能应了“实”，可能还应了你所谓的“知识”。否则它很难像现在这样传播。前面不是说过嘛，这类题材书很多，贺雪峰、徐勇的书一本接一本本地出，销售都没达到这个量级，我找到原因了。

杨：

这本书流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因为流动性变差了，大家收入变低，也可能真的有离开北上广这样的事实，至少他们可能要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更想了解中国的县城乡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

看一本主题属专业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一般观察是销售上十万，读者就一定超出了领域，而且不止是知识人、读书人在看了，就已经深入大众了。

杨：

在我们身边，自由职业，或者说灵活就业的人正在多起来，也有人认为可以波希米亚一些，还有一些人会选择相对压力比较小的低线城市去生活。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另外，如今可能有相当多比例的人来自于县城或以下，但他们通常18岁考上大学，在大城市求学，留在大城市，他们对自己家乡其实了解是接近于无的——实际上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中产阶级概念化城市之外的地方，他有可能通过阅读小说去理解，像《县乡中国》这样一个了解的渠道。

伊：

像了解美国一样了解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县乡中国？

刘：

对。可能真的是这样。

5、《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重新理解知识分子的“嫉妒”

伊：

张维迎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能进书目也挺有意思。没想到它卖得这么好。我是先看了他的《回望》，一个经济学家短短四十年间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我以为会是《回望》卖得更好一些。

刘：

《回望》出书晚几个月，持续性还没看出来。另外，《回望》里的文章以前在网上能看到，当时维迎每写一篇，大家都争相阅读——没有经济学家这么写自己。《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张维迎写的第四本企业家精神的书，我认为相当于是他 40 年以来关注这个话题的系统性总结。40 年，每 10 年写一本。再写都难了。

伊：

对，这本书给人感觉也像是告别。与何怀宏《文明的两端》、金观涛《消失的真实》有相似的地方，是总结之作。

刘：

不是告别此一话题，在这个时候，是告别企业家。以后不再有企业家了。这部作品是一个学者、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唱了最后一曲。

伊：

您注意到没有？这本书中间强行插入了一章有关飞艇和飞机竞争的故事，开始看的时候还感觉莫名其妙，“这是从何说起”。看到最后，讲中美贸易战，又重新回到飞艇与飞机竞争话题，点明飞艇派德国企业家雨果·埃克纳的三个冲突：一是一战后德国人和战胜国之间民族主义的冲突，二是他本人价值观与希特勒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三是美国人价值观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整本书差不多到此也就戛然而止，感觉还有点谋篇布局上的文学心思。

刘：

对，国与国之间竞争，企业家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最后一公里”的功能。前面的学者，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做的是基础设施，最后结果要通过产品和财富表现出来。苹果手机卖那么多钱，围绕它的全发财了，这里面包含的是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书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而指向的企业家群体是“今天干事、明天会有什么结果完全不知道”的一批人。

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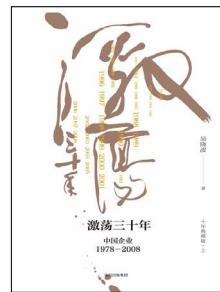
冒险精神。在书里他还回顾了 1984 年在《北京日报》理论版上发布文章“冒险”与“探险”之争。他觉得“冒险精神”这几个字是核心，不能改。

刘：

他的回顾也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培育出来，这个东西是学不来的。当这些基本条件消失，也就再不会有这个“群体”，更不会有“精神”了。民营业主才是企业家，国有银行行长、国有石油老总叫领导，不叫企业家。

杨：

我觉得这本书的告别意义不止在这里，不止是工业化，它背后还有一个商业文明的体系，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它还是职场，上升通道。就在十几年前，大家好像还有共识，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去大公司获得好工作，获得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的，现在这种可能性就弱很多。你想想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当时激励了多少人？大家是把它当成功学来看的，不是当做社会改革开放史来看。



刘：

这个有道理。企业家没有兴致了，不投资，后果不可预期。

伊：

看这本书时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心路历程。中间不断有变化。

开始不喜欢，觉得事已至此，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还在探讨公众嫉妒企业家、知识分子嫉妒有钱人的问题？特别是张维迎总结知识分子嫉妒原因是无知——无非就是引用托马斯·索维尔的观点。但你说在中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对平等和公正持续不断的经年追求，哪里有机会探讨企业家精神？公共知识分子被打下去之后，“大资本”就成过街老鼠了，关键也没有人帮着厘清资本企业市场这些概念，你现在还指责知识分子的偏见，感觉就是放弃“共同的底线”。

他还很认真地提到了如何减少对企业家的偏见，答案是“不嫉妒”。但是真正迫害企业家并让企业家在偏见中被污名化的人——他们的出发点是嫉妒吗？他们似乎也并不嫉妒。后来想，张维迎一生都在强调企业家精神，这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它拼命把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划等号。好像在威胁或者呵斥——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你的市场经济如何是好！但他不会不明白，有些人就是不想要市场经济了，任你苦口婆心最后全无着落。

但是，最后看到雨果·埃克纳三个文明的冲突，就完全被他的悲情所笼罩。然后，他讲起了中美贸易冲突，也没有太多说的余地，一两页结束，全书也就结束了。他讲齐柏林飞艇，无非是讲价值冲突，这事就完蛋了。企业家精神不管是对齐柏林还是对胡安·特里普，都不缺。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其实不是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一定是想说，不要在价值观上起冲突，人类普适价值就是进步本身。但是，我在看的时候也很担忧，因为看了这个结果，一定也有人会进入到那个话题里：老二难，总要被卡脖子，老大老二之间果然必有一战。

如果读出这个结论来，对张维迎和他所倡议的这个时代来，就是悲剧了。

6、《战争指挥》和《世界历史的教训》：另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

刘：

你们注意到没有，今年还有一个题材是以前很难上榜的。就是战争。

伊：

因为俄乌战争嘛。

刘：

也不光是他们，切身担忧也有。更大规模的战争，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

伊：

人类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

刘：

交流。你说人类从婚姻到贸易到技术引进，这些本质上都是交流。什么文化交流，什么整合，人群之间的交流。战争其实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今天跟 1913 年 1914 年很像。有一本讲 1913 的书，写 1914 的更多了，“一页”最近就出了一本，《和平戛然而止》。1914 年，一战之前，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说实际上谁也不想打仗。

杨：

《和平戛然而止》的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寥寥几人就把世界带入战争”。还特意在括号里加上一句，“而且他们都是男人”。

刘：

第一是谁也不想打仗，第二是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可是为什么战争还是爆发了？你把一些条件套用到 1913 年 1914 年，跟今天有相像之处。为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听到的都是想打仗……只是有人说出来了，说备战，要学会打仗，要打胜仗，重复了很多次，说出来的实际上是不想打仗，更想打仗的不会说。你看美国人说的更多的是和平，所谓保持现状、维持原有的国际秩序。但我看现在美国人更想打仗，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忍受不了这种乱搞。

伊：

这不是老大一定不会容忍老二的另一个版本吗？

刘：

但是他要先动手，会陷入被动。

像《战争指挥》，关于战争战略的，还有刚上市的《拜占庭兵法》。既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的实际担忧，但好像也有对打仗的某种期待。

杨：

“谁不来谁是小狗”。

刘：

大家说的那些玩笑话都不是简单的玩笑话。谁不打谁是小狗，不打是孙子。就进入到这种状态。这些玩笑话透露的是社会心理。有些问题什么办法都没治，干脆打一仗。

杨：

不还是“让剑解决问题”吗？

刘：

战争引发革命，战争引发帝国的崩溃。大家对不公平的感受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希望有其他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公平的问题。民众心态越是无力的人，他越是激烈。为什么？他的力量改变不了，那么干脆一了百了。我认为，这才是危险的东西。民意有可能最后会绑架决策。当然反过来，决策也能绑架民意。

伊：

我去年看《黑羊与灰鹰》，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丽贝卡·韦斯特去南斯拉夫旅行。她看到的三十年代的民意，不公平。不管是德国人还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所有各民族的人，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公平。

刘：

全世界都鸡飞狗跳，大萧条，没工作，没饭吃，更喝不着酒。所以憋着对不公平来次清算。

伊：

所以《世界历史的教训》里面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一章，特别强调民族主义者的委屈，我们永远是天选之子，我们现在受欺负的地位一定要改变，不是个人委屈，国家也委屈。

(题外话。海斯对为什么一个地位低下的人特别容易成为激进民族主义者很早就给出答案：

由于大多数公民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理解并留意这些诉求。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信，个人的财富确实是国家的财富；属于特定群体的制造业、农业、商业和劳动力，实际上是国家的制造业，国家的农业，国家的商业，以及国家的劳动力。伦敦东区最穷的爱国者在想到英国的工业和财富时，往往会昂首挺胸——英国的财富，难道不就是他的财富么？由此推断，一个民族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会被期待认可本国同胞经济利益，并这

之工作；不管他自己的职业或专业是什么，他都应当做好准备，把群体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这些群体都诚挚而雄辩地慷慨陈词，说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他因此可以自豪地——不管他是个记账员，还是个砖匠——谈到他的自然资源，他的工厂，他的船舶和铁路，他的农场，他的工业劳动力。可以肯定，“国家利益”的观念是最令人欣慰、最令人兴奋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当中最渺小的人，只要他抱有这个观念，便会立马高看自己三分，在自己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伟大而幸福的大人物。)

杨：

所以这算是您一个担忧。

刘：

我没有担忧。我是说社会心理有这个担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说实话都不是人力可为的，这就是保守主义。明白？另外我也不怕战争，该死死、该活活，人类就是这个德性，你怎么能对人类有那么高的期待？

在几年前我就说这件事。现在慢慢地更多的人开始认同我这个看法了。我最早说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应该想办法制止”是吧？这是进步主义的想法。你们自己喜欢不喜欢什么东西都禁止不了，还有能力禁止战争？我说这话，最早应该是在 2018 年。我那时说，这是 2014 年以来开启的 20 年进程里最好的一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今年是未来 20 年最好的一年”。社会心态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有历史的内在逻辑？虽然听起来非常庸俗。

很多人是不相信人心的。其实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是不是偶然的”。历史也不可测，但你仔细想想人心，其实是最容易测的。过和平的日子，要公平，这都是人性，当然也包括贪便宜。这都是文明进化的后果。

别人也想贪便宜，因此我们就要达成某种平衡。你不能就老想自己贪便宜。

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刘：

总之就是说人心其实还是有迹可循。但是如果人心被民族主义激发，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指向哪里。问题是普世价值也有这个，为自由而战，为信仰而战，一样你死我活。就说为信仰之类，西方打了多少年？更可怕。

所以说最后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谁来决定我们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如果找不到这个答案，人类的纷争就没有完。

在下篇里，我们会谈及“反启蒙”、“毫无意义的工作”、“民国热”和对出版业的担忧。

题图为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8) 剧照

///

与最好的书店聊天：这一年的书、这一年的事（下）

关于年度书目的泛泛而谈，许多问题都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

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已于此前发布。

刘 = 刘苏里，伊 = 伊险峰，杨 = 杨樱

7、从《世界历史的教训》的写作到启蒙的另一面

伊：

《世界历史的教训》是一本很“好看”的书，读起来很畅快。

刘：

那时候学者写东西还很自由，没有自我审查，说话也放松。现在的学者写东西都很规矩。

既有时代的不同，也有精神气质的不同。这个叫什么？激情和动力都不一样。西方现在也反思批评自己，缺少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事情。

表现好的也就是麦克尼尔父子托尼朱特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水准，但小东西写得太多了，临去世前与斯奈德合作的《思虑 20 世纪》有点味道，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有这个气魄。

20 世纪初的大家写法不多了。卡尔顿·海斯不是一流历史学家，没办法跟汤因比比。

伊：

他这本书写在一战二战之间，对民族主义的很多东西看得比较超前。很多事已经发生了，大部分民族主义的弊病还不像今天看到的那么突出，现在回头看，觉得还是挺有一些洞见。大约还能看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后来写《想象的共同体》时继承或者借鉴的一些观察。感觉对民族主义的审视和警惕是一脉相承的。

刘：

西方人喜欢讨论自己衰落这件事，而且他们意见还不统一，两种声音都很强大。川普在台上的时候，一半美国人认为天要塌了或者已经塌了，然后等到拜登上台，另外一半美国人说美国完了。海斯的疑问也是文明出了什么问题。讲西方文明要完了这件事儿，当时唱衰声音最大的是斯宾格勒。

最近这些年的出版业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对于我们这些喜欢看书、还想问题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贡献，丰富了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范围的认识——原来还有反启蒙的这个路数。以前我们都不了解有赫尔德这些人。

伊：

我是从以赛亚·伯林那里才慢慢看出一个脉络。

刘：

伯林就更晚了。赫尔德他们都是 200 多年前的人了。尤其是比如说像最近连续这三年出的一些书，包括拉塞尔·柯克的什么？美国思想是不是？

伊：

《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你说你是保守主义，我还特意看了这本书。

刘：

拉塞尔·柯克。2021 年还有一本《反启蒙》，华师大出的。我们原来仅仅是知道有一股对启蒙运动不满的思潮而已，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思想脉络，哪些人、哪些作品、在什么时期、引发过什么争议、争论……我们都不了解。《反启蒙》开本是小册子，但是非常厚，有八百多页，去年入选了我们 2021 年 Top 40 书目，再加上《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后面这本书前年一下子出四五个译本，它是偏左的，因为它攻击右，我们就顺带看了右。我们才知道启蒙是正典，其实还有一个“负典”。很粗壮的一条线，一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批评启蒙运动，以及它的后果和引发的变化。

杨：

批评启蒙运动，主要批评什么呢？

刘：

主要是批评信仰世界被颠覆掉了，把人抬到了判断是非的天平上。上帝死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以前没意识到这条副线的粗壮，甚至同样是主流。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你说谁是主流？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谁是主流？

伊：

还有辉格和托利。

刘：

就是说对西方文明的担忧，其实从启蒙运动以后就没有中断过。演变到今天，我们

耳熟能详的，比如移民问题，公平政治、环境政治、身份政治……另一头就是反移民、减少干预企业、全球到底变暖没，等等。

反垄断和反反垄断也是一组，你不能动不动举着反垄断的大旗搞企业。

伦理上就说要回归家庭，坚持男人是男人。实际上当我们争论到我们很熟悉的话题时，你最终会发现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所以说，这个话题在西方不是个新话题。

启蒙运动这一边换了很多次马甲，而反启蒙的这些人好像没有换过。最简单地理解保守主义，可以说就两条。第一，人类没有办法自己决定谁是、谁非，因为人的认知能力太有限了。那句话怎么说？当人可以判断人间事物的时候，岂不就是混乱源头？岂不就是自大到以为你跟上帝一样了。事实上，近代以后的纷争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举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当年南非为什么有一个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这件事情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实现民族和解的整个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一个设计，而且很成功。那些受害者被引到法庭陈述作证，有些人没有办法原谅，那些侵犯人权的罪行太大了，甚至庭都开不下去了。最后委员会主席图图就发明了这么一种方法我们先不吵了我们来祈祷，休会祈祷，然后再说。

伊：

叶礼庭讲过这一段关于图图的故事。

(事后翻书，叶礼庭在《战士的荣耀》中提及的要点：

在和解背后已经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识的国家，真相委员会成功的机会最大，比如说南非。这种共识也许与认为需要清理过去余毒的道德一致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种大多数人认可的、审慎的道德计算，即相信司法惩罚有将社会撕裂甚至引发内战或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相似乎是一个比正义更不易引起分裂的目标，图图的真相委员会即使强制揭露痛苦的真相，但也增强了创造出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各方派别多年来对其他派别实施谋杀、折磨、儿女的罪恶常常建立在父亲和祖父的罪恶的基础上；真相、和解和正义的前景黯淡得多。……

和解取决于共享的真相，这一理念假定关于过去的共享真相是可能的。但真相与身份有关，你相信什么是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相信自己是谁，而你相信自己是谁，主要是按照你相信自己不是谁来界定。

如果真相是由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公布的话，它也不大可能被那些反对它的主导者的人们所接受。警察和军队有他们自己的真相，而他们得以实施其控制，正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真相并不全是谎言。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镇压恐怖分子或叛乱威胁，仅仅因为一个真相委员会揭露这种威胁没有根基，就期待他们否认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人们，尤其是身穿制服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轻易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前提妥协。如果曾经有过忏悔的话，也仅是个别人。真相委员会所能做到的全部只是减少广为流传、未经挑拨的谎言的数量。例如，现在在阿根廷，不可能有人断言军方没有将半死不活的受害人从直升机上扔进海里。在智利，不再容许公开宣称皮诺切特政权没有“处置”数以千计完全无辜的人们。真相委员会能够也确实改变了公共议程和公共记忆的框架，但不能因为他们未能改变行为和体制，就断定他们失败了。那不是他们的作用所在。

(最后是审慎的政治计算和共识决定了真相的存在。中国学者秦晖《共同的底线》也是讲这样一个道理。在法国学者跟他表示左右之间很难同意对方见解的时候，他谈及当大家共同面对极右翼的勒庞的时候，就找到那个“共同的底线”了。)

刘：

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州代表们吵到谈不下去，有人说出了“战场见”。人与人口舌相争，能争出是非对错吗？最后就是“让剑说话”。但人类一旦要让剑说话，不是尸横遍野，就是饿殍遍地。打多少年也打不出个名堂来，谁不会轻易放弃。

伊：

咱们现在互联网上也都是用剑说话。

刘:

后来有人说“持剑经商”——我还记得这句话——这些人，历史知识是零。经商是啥？经商是和平，以及，经商导致和平，反正总之它是更和平的。“持剑经商”什么意思？你是先杀人再卖东西，你还是卖完东西杀人？

所以，启蒙最后发展的极致就是列宁党：只有先锋队是聪明的。先锋队必须有一个领导人。



伊:

这就是霍布斯鲍姆总结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征了。

刘:

我跟你讲，列宁主义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晶，理性时代来临了，“我是尺度”。因此我说谁对谁就是对的。这就是罗伯斯比尔和列宁之间的传承，所以反启蒙肯定是正常的，肯定会有。

第二就是说保守这一块不排斥变革。

但是我们要因势利导，要谨慎。任何一个想要改变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其来有自的。我们首先要尊重这个其来有自，再看看它有什么毛病，有一点毛病就替换一点，有两点毛病就替换两点，不是把它先扔了，建个全新的。新的不也是人设计的吗？你怎么就觉得你比祖上更聪明呢？所以，保守主义在方法上偏谨慎，尊重传统，不那么自信。

8、从启蒙说到了中世纪

刘:

22 年中世纪的书太热了，近年这类书出版量一年比一年多。其实也跟启蒙和反启蒙这两条线有关。

中国所谓的先知先觉者，用老词儿说，又一次开眼看世界。他们开始意识到对西方认知的空缺：我们是截了启蒙这一段的历史——就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启蒙运动之后蹦出来的。那些横空出世的哲学家、研究者，科学革命什么的，大家发现很多东西在中世纪就有了。不仅有了，而且健全，为所谓的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候才开始往回倒腾，这一倒腾不要紧，发现一个巨大的宝库——知识宝库或者观念的宝库，包括我认为建制设计的宝库。比如中世纪发展出来的王权，一些城市获得自治、领个出生证，这些合法证明完全是中世纪时期给他们的；那些行会、资产阶级也是从中世纪城市里的一点点长出来的，做生意的或者说是爱财如命的一帮人是在王权和贵族教育过程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近代科学先是从中世纪教会、修道院里学来的。

然后又进一步发现，近代以来的知识的基础，原来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修道院的修士，用阿拉伯文储存的修道院里，就包括经验哲学。我们嘲笑经验哲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说那是瞎扯，后来才发现这其实完成了一个宗教信仰和世俗哲学之间的转换，这是在中世纪完成的，在圣托马斯。

后来还有新柏拉图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哪有什么“新”，都是“重新”。

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然后希腊的理性，他们就跟当年奥古斯丁受到挑战一样，一千年以后他们又被挑战了一次。我们怎么面对希腊的理性？看阿奎纳同学。他做了一次裱糊匠——不叫裱糊匠，用上海话怎么说的？

杨:

捣浆糊。

刘:

那些喊上帝死了，然后呼唤人的解放，然后准备确立理性法庭……那些最早的战士、最早书籍、最早的实践，不都是中世纪大学那帮人捣鼓出来的吗？从博洛尼亚到巴黎大学到牛津剑桥都是这样。西方对自己历史，你说重新反思也好，重新梳理也好，始终有来回鼓捣的传统。到了中国，首先就是知识界要补上巨大的漏穴，知识的漏穴，补课的一个结果就是检讨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的认知……其实都是从今天当下的问题引发的：那就是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9、《毫无意义的工作》，又说回左右

杨:

《毫无意义的工作》，它的上榜一定与年轻人有关。

刘:

对。这本书开始我没看，“占领华尔街”的时候我正好去过美国，也没把大卫·格雷伯与华尔街那位联系起来。开始就是字面理解这几个字，觉得跟“反对 996”之类的差不多。

杨:

我也觉得他们买这本书的动力完全不在于占领华尔街的 1% 和 99%。应该跟国外对大卫·格雷伯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是整体迷茫的一部分。大家试图寻找一种活法：现实中工作占据了你的全部。这是很多年轻人试图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我的生活重心不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虽然它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疫情以来，大家更试图从中走出来。疫情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让工作变得虚无了。以前你都是去一个地方上班，到点儿下班，疫情之后没有事儿，你就是蓬头垢面、披头散发地在家开电话会；这电话会议你还可以关了麦克风，前面坐着一条狗还是你，根本就不重要；然后效率也都很低，做好做坏都没有劲了……就是一切都觉得虚幻，日子每天过得都很假。工作的意义实际上探讨的是生活意义。

刘:

这里涉及一个工作观念的问题。我跟左派有一个完全是相反的看法，我看工作本身实际上是某种限制。几年前我才知道美国结构性失业当中有一块，就是全员都有工作机会、而且还要从外面招劳工这种背景下，还是会百分之三点多的失业。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失业率不会更低，比如二点几或者一点几。大概往前数应该是四五年前，有位经济学家给我解释说，美国就有一批人就不愿意工作。就有一批人，既有因为生活观念、工作观念的原因不工作，也有真的就是懒惰、好吃懒做不工作，拿福利活着。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那批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尊重他们。

你别看这书花里胡哨，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一个他们觉得的新角度。他们总结这些狗屁工作带来的种种恶劣后果、对心灵的戕害或者身体的戕害，说到底最后都是要进入到谴责资本主义，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谴责回过来看它发端于几年前的 metoo。资本家对劳工的所谓剥削。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一例外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后，现代制度对人的自由的“戕害”，就变成一个哲学问题了。

但问题是，资本主义没这些问题，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你以为其他主义就没问题？我们前面说共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之子，只是它更冷。关于人的解放、男女平权，毛有句名言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可他没有接受西方启蒙另外一套价值，比如尊重和宽容。

伊:

宽容是你们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观点。

刘:

对，保守是宽容，就是说人总都会犯错误。启蒙主义，启蒙是多元。

杨:

非常有意思。这两个词看起来很相近。其实都有不一样。

刘: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多元是什么东西?好坏我都有存在的价值。宽容是说,我即使不理解,我也认为因为你的存在本身我应该尊重你。因为我尊重这个存在。

伊:

我们这里既不宽容也不多元。

刘:

你看多元主义就会导致相对主义。

刘:

宽容,其实宽容的基础是绝对。你说的对。宽容意味着还是有相对的核心,否则谁宽容你呢?

杨: 宽容是有主体的,对。

刘:

这个绝对就是上帝。

回到《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格雷伯就是最典型的左翼行动派,他既是一个教授、研究者、思想家,同时也是个行动者。他冲到所谓“占领华尔街”第一线,但是你看他的书展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及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讲,“资本家也不是傻子,为什么要设置一些毫无意义的职位让你们挣他们的钱”,然后他得出结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个阴谋。

我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他提到的那些岗位效率确实不是太高,可是从长程来看、从系统来看,资本主义效率还是最高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一个主义或者效率最高的时期。

10、《荒野上的大师》与捍卫记忆

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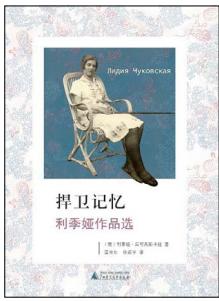
《荒野上的大师》也与焦虑有关吗?

刘:

它可能更与民国热有关。

杨:

20年来一直有民国热,大家试图回溯的东西是什么。



刘:

我们肯定回不到美国建国的时候,不能像美国那样。对,我们只是说回到宋朝、梦回唐朝。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不仅历史上存在过,跟我们是一个接替关系,其后代就睡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人,正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后代。

不是《往事并不如烟》这种控诉型的。我喜欢被苏联作协开除的那个人的《捍卫记忆》。

伊: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文学纪念碑”系列的一本,她父亲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我们知道的好多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的故事都是她写的。

刘:

就是捍卫记忆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包括像《李济传》、《金岳霖传》还有《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都卖得不错。

杨:

还有《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

刘:

还有新出一本,纸质的还没在我们这里卖。一个什么一个故事的.....

杨:

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刘: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群人并不是只能过现在这样的日子的,我们也可以过另外的日子。虽然另外的日子也有苦难,但是要活得更像人。

11、《翦商》和“金娃娃”历史叙事

苏里在内里大约还是把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个二元论的区分全球的或者说美国的问题,总是货真价实的冲淡平衡,中国问题就免不了尖锐。后来我们聊到《翦商》这本书的时候,苏里讲起了鲁迅说的翻尽中国古书,尽是“吃人”二字,“鲁迅那段话,我们都会背,他就是那么尖锐,一直到今天,就是吃,这个族群没有变化.....”

我试图用另外一本入选的书来说明我对历史的看法:“你看,鲁迅说吃人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到科举制。《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埃尔曼对科举文化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有一种平衡感,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知识阶层、官僚阶层、商人这些所谓上流阶层的社会生活是围绕它来展开的。你放在这个角度来看,它对‘废科举’的理解就特别有历史纵深感了,晚清激进改革中动了这个根本,整个大清几年时间就解体了。”

“还是有一点微观的进步,虽然本质上都是吃人。”苏里疑惑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我这解释是不是说得通,是不是能说服这个保守主义者。

我想起《世界历史的教训》中提到一句话,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在狭隘的经济考量和宗教考量之外,现代民族主义者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推动力。民族主义涉及一个没有直说却十分明显的信念:在美德和勇敢上,在文明和‘使命’上,自己的民族都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在满腔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本民族实现统一和独立,是人类历史亘古以来的巅峰和极致。”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刘:

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翦商》是小说?

杨:

您也有困惑的时候。很多人对什么是小说都没有概念。看到叙事好、故事性好,就说它是小说。

伊:

说他是小说的,可能就觉得像说武王做噩梦、一吃东西就吐、抑郁症什么的过于写实,显得太夸张。

刘:

它是学术的,而且都不能算是轻学术。我觉得它是去年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本书。我个人看,未来很多年也很难再出现超过这部作品的东西。

刘:

以为只吃了零星的。“商人把人剁了吃”什么的我早知道,可哪想到是如此制度化,如此长久,如此花样翻新,如此规模,真是吓着我了。历史后来被化了妆,被周代改头换面重新叙述了,然后在孔子那里又经过删改、进一步优化。

伊:

但是你换个角度,不管孔子还是周公对历史的修饰,本身也是带着提升文明的目的在做这件事。不能苛求周公时代就具备客观对待历史的能力。

刘:

我完全赞成你说的进步或者演化更文明,但是你不能成天想象自己生下来就是个金娃娃,对吧?不是那回事儿。李硕揭示了如此详密的资料。

12、最后我们说到了出版这个人文行业

“这几天图书订货会,全国书业的人都来了,聊天吃饭,私底下交流最多的也是对今天的局面和未来局面的研究。大家都是有话要说,所有人的问题都没解决。你不能以为感染高峰过了事情就过去了,没有。出版业最直接的担忧是,这个行业会不会像教培,民营出版能走到哪儿。”

苏里提醒让人一惊,这担忧一下子迫在眉睫地清晰起来。

“大的像教育,更早的是媒体,小的像论坛、小组之类,都干掉了,豆瓣小组最典型。包括游戏,游戏是什么?游戏是会影响年轻人大脑的东西,打打杀杀啊、装备什么的,沉迷之类只是一方面。大家当然会担忧。出版是最后一块,不乐观,不能确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说到这儿,万圣老板娘进来了,拿着摄像机说要为访问做个记录。三个人都端正起来。

刘:

现在是2023年2月23日下午,从上午十点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万圣每年一次的年终书目。

杨:

我们这个聊闲天的过程,把2022年困惑我们的所有东西差不多点了一遍。感谢苏里老师和万圣书园对小鸟文学的支持。

伊:

万圣在我们看来是个媒体,连接思想界和读者。我们小鸟文学把这些呈现给更多关心思想关心现实的人。

然后我们收拾东西去吃饭。



刘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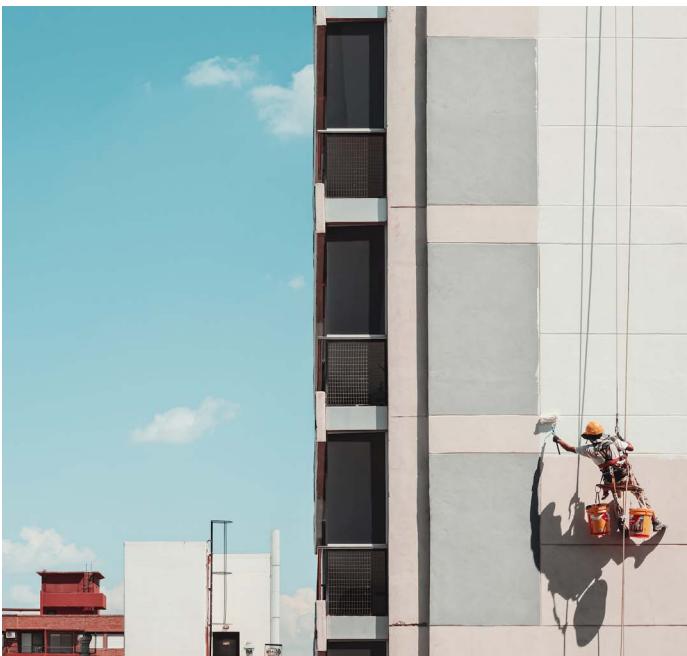
万圣书园创办人和总经理。经营书园之余,亦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书评。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小鸟年度专辑

关于过去的一年,我们写下我们知道的和记住的。按照文学、文化思想、社会思考等系列发布。



图片来自 [Mariano Baraldi](#) on Unsplash

档案

又一个新学年开启了，阿富汗女性还是无法回到学校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1 条新闻。

这一周，阿富汗的寒假结束，又一个新学年刚刚开始，但中学及大学校园里仍然没有女性。

自 2021 年夏天收回政权以来，塔利班有条不紊地剥夺了女性的众多基本权利。她们被挤出公共生活，被剥夺了职位，或者只能拿以前工资的一小部分呆在家里。她们还被禁止进入公园、集市、健身房和公共浴室，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好头巾。就像妇女权利活动家 Minisa Mubarak 所说的，“2000 万阿富汗妇女被关在了塔利班的大监狱里”。

在国际妇女节当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联合国驻阿富汗使团称阿富汗是世界上对妇女权利最专制的国家，并抨击塔利班政权“只专注于实施让大多数妇女和女孩实际上困在家中的规定”——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女性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国家。

去年，迫于国际压力，塔利班曾在 BBC 的采访中承诺，所有女孩将在三月底阿富汗新年伊始时返校。但很快人们就察觉到，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九月初，四所位于阿富汗东部的女子学校曾尝试开学，但它们都没有得到塔利班教育部的正式批准，[最终又重新关闭](#)。

一些官员说，这些情况只是暂时的。他们的说辞各种各样。比如政府目前缺乏资金，或是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教学大纲还未修订完毕。外交部长 Amir Khan Muttaqi 认为，“世界应该对此有耐心”。

示威活动只会被驱散，也有一些女性活动家直接被逮捕。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部分女性转向了伊斯兰学校——只有这里是尚未被禁止的。[法新社](#)访问了首都喀布尔和南部城市坎大哈的三所伊斯兰学校，那里的学者表示，自去年以来，女学生的数量翻了一番。

伊斯兰学校不提供现代教育，在这里，女学生们将一遍一遍地学习《古兰经》。就像其中一所伊斯兰学校的女性教师 Hosna 所说的，“在大学学习有助于建设未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权利。但在伊斯兰学校是没有未来的。她们在这里学习是因为她们无助。”

尽管如此，几名女孩[告诉法新社](#)，至少上伊斯兰学校还有和朋友在一起的机会。其中一名叫 Sara 的女生还提到，“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学校并不是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她仍保留着些许乐观的情绪。

也有一部分有能力的女性做出了更彻底的选择，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现在作为难民生活在邻国巴基斯坦。这也意味着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开始，因为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甚至有很多人表示感觉阿富汗女性已经被世界抛弃和忽略。

Muzdalifa Kakar 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曾是前阿富汗政府议会电视台的记者和主持人，在大约四个月前被迫出走。[在 CBS 的采访中](#)，她说：“我厌倦了国际社会那些无效的口号。”她呼吁世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停止“忽视对阿富汗妇女的责任”。

ALSO IN THE NEWS

国际妇女节当天，伊朗女孩因跳舞被捕

就像伊朗裔比利时议员 Darya Safai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所分享的：“伴随头巾而来的束缚还有很多。作为女人，你不能大声笑。你不能跳舞。你不能在街上骑自行车、游泳或和朋友玩。你是不同的。”

尽管民众的抗议活动自去年九月起持续到了现在，伊朗束缚女性的“头巾法”仍没有任何松动迹象。相反，与之相关的逮捕和惩罚几乎每个月都在上演。三月，五名伊朗女孩被安全部队逮捕拘留，并被迫公开道歉，原因是她们在 TikTok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她们于妇女节当天在公众场合不戴头巾地跳舞——这被视为一种公开反抗政权的行为。[《耶路撒冷邮报》](#)今年一月就曾报道，一对伊朗夫妇 Astiyaz Haghghi 和 Amir Mohammed Ahmadi 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起在公共场合跳舞的视频而面临 10.5 年监禁。

这次，在五位女孩被捕后，伊朗许多女性发布了同样的跳舞视频来声援她们。Selena Gomez 和音乐人 Rema 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因为女孩们跳舞时选择的配乐是他们的合作曲目 Calm Down。

而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发生在今年的跳火节——3 月 14 日，在这个当地人点起并跳过篝火以驱逐疾病和不幸的日子，抗议者们继续高呼“斗争仍在继续”和“独裁者去死”。

巴厘岛希望游客别再骑摩托了

显然，巴厘岛已经感受过游客们回归后的“热情”。本月，在发生一系列外国人违反交通规则的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计划禁止游客租用摩托车。巴厘省省长 Wayan Koster 表示，根据今年实施的改革，外国人只允许驾驶从旅行社租来的汽车。他说：“作为游客，(你应该) 像游客一样，使用旅行社准备的车辆，而不是骑着摩托车到处闲逛，不穿 T 恤不穿衣服，不戴头盔，违反交通规则，甚至没有执照。”随着旅游业渐渐恢复到 2019 年的样子，省长认为现在正是处理混乱问题的好时机。最近几个月，媒体报道了多起巴厘岛的交通事故。这个三月，就有一名俄罗斯男子因涉嫌骑摩托车酒后驾驶而被捕，他与一名当地司机相撞，两人都被送进了医院。

但一直以来，众多外国游客都更喜欢租摩托车在岛上游览，因为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并不发达。有人担心禁令可能将对旅游业造成影响，一些租赁运营商的生意显然也将受到打击。当局没有直接回应这些质疑，不过他们提到计划的细节尚未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省长还要求政府取消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公民的落地签证政策，理由是他们行为不端。他说，战争期间，来自两国的许多人“涌向巴厘岛”，但不遵守当地规定，甚至用旅游签创办企业。

22 人在缅甸修道院被害，军政府否认指控

暴力活动一直困扰着缅甸人民。自 2021 年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 (Min Aung Hlaing) 在政变中夺权，这个东南亚国家一直深陷于各种叛乱活动。有关暴行的最新指控出现在掸邦。掸邦位于缅甸东部，地处偏远山区，与中国、老挝和泰国接壤。上周六，包括三名僧侣在内的至少 22 人在掸邦的一座修道院被杀。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克伦尼民族国防军 (KNDF) 和军政府相互指责对方实施了屠杀：

KNDF 发言人 Philip Soe Aung 告诉 CNN：“缅甸军方在 3 月 11 日杀害了 3 名僧侣和 19 名平民。我们的部队于 3 月 12 日抵达修道院，看到了尸体。”

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少将 (Zaw Min Tun) 则驳斥了这一指控。在缅甸官方报纸《缅甸环球新光报》周二发表的评论中，他将修道院的暴力事件归咎于“恐怖组织”，“当恐怖组织猛烈开火时，一些村民被打死或受伤。(其他人) 跑开了。”

双方各执一词，事件细节难以核实。缅甸民族团结政府发言人昂妙敏称，缅甸目前处于“最糟糕的情况”：“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平民被杀。军方大规模屠杀的数量增加了，军方对人民使用了更多形式的暴力。”根据政治犯援助协会 (AAPP) 的数据，政变以来，缅甸至少有 2900 人被军政府军队杀害，超过 17500 人被捕，其中大多数人仍被拘留。

向孕妇提供堕胎药的波兰女性被判有罪

波兰有着全欧洲最严格的堕胎法——女性只有在乱伦、强奸或危及生命健康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堕胎。帮助妇女堕胎也属于非法行为。但近年来，机敏的活动人士们还是找到了一条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线路。ADT 是一个帮助波兰女性利用药物堕胎的活动组织。因为法律通常只将直接提供堕胎药物 / 手术视为犯罪，他们会就如何从荷兰等国家订购堕胎药物提供建议，但是不处理任何包裹。

尽管已经如此小心翼翼，本月，ADT 成员之一、名为 Justyna Wydrzynska 的女性还是被判处了 8 个月的社区服务，因为法院判定她帮助了一名孕妇获得堕胎药物。Wydrzynska 说这次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她帮助的那名女子 Ania 正面临着家庭暴力，处于极度绝望的处境，于是 Wydrzynska 把自留的药物直接提供给了对方。然而，装有堕胎药物的包裹最终被 Ania 的丈夫发现，他通知了警方。在法庭上，Wydrzynska 说“我不觉得内疚。在这个法庭上听到 Ania 的详细情况只会让我更加相信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一直以来，世界范围内种种相似的事件都表明，堕胎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将堕胎视为非法行为只会让更多女性选择铤而走险。

东京的美术馆欢迎年轻人

为了不将不富裕的年轻人拒之门外，不少城市的文化机构都会有相关的倡导计划，比如我们在二月的 newsletter 曾经提到过，柏林政府总正在向 18–23 岁的当地年轻人发放一张 50 欧元的“青年文化卡”(Jungendkulturfalte)，让他们用来支付市内各大俱乐部、博物馆等场所的入场费。

而现在，东京的青年也可以免费进入该市一些最好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本月，东京都历史文化财团发起了“欢迎青年”活动，鼓励年轻一代探索东京的艺术和文化场景，而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因此，在 3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期间，18 岁及以下 (2004 年 4 月 2 日以后出生) 的青少年可在五家艺术机构免费欣赏展览，它们分别是东京都庭院美术馆、江户东京建筑园、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东京都美术馆。

从数字上看，更多外籍劳工在新加坡找到工作

在全球经济逆风和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新加坡的外籍劳动力反而出现了飞速增长。本月中旬，新加坡发布了一份《劳动力市场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的外国劳动力出现了至少 5 年来最强劲的增长。根据人力部网站上的数据，2022 年外籍劳动力总数增长 19%，至 142.42 万人，持有工作许可证的人数超过 100 万人——过去一年，随着边境放松管制，更多外国劳动力得以返回新加坡，另外，建筑和制造业雇佣了众多工作许可证持有者（非居民）。

还有一些数字也表明，新加坡的劳动市场正在逐渐恢复到 2019 年以前的样子。比如，总就业人数前所未有地增加了 22.78 万人，比新冠之前高出 2.9%。2022 年的总裁员人数为 6,440 人，低于此前的数字。还有，居民长期失业率也从 0.7% 的平均水平小幅降至 0.6%。尽管如此，人力部认为，考虑到近几个月科技公司大量裁员，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新加坡仍然应该对就业市场保持“警惕”。

泰国王室被一只黄色橡皮鸭冒犯了

泰国的法律罪名中有一项为冒犯君主罪，任何人诽谤、侮辱或威胁国王、王后、王储或摄政王，最高可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依据这条法律，泰国自 2020 年以来已经抓捕了约 200 人。最新一起发生于本月，26 岁的泰国男子 Narathorn Chotmankongsin

被判入狱两年。因为他此前出售了一款印有黄色橡皮鸭插图的日历，且在图中这些橡皮鸭身上戴着皇家徽章，检察官称这些插画嘲笑和诽谤了君主制。

关于这只橡皮鸭的故事要追溯至 2020 年 7 月，当时，泰国爆发了青年抗议活动。年轻的活动人士第一次要求对该国强大的君主制进行改革，并在街头的反政府集会上公开嘲笑王室成员。示威者用充气橡皮鸭来躲避警察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这一形象意外成为了泰国亲民主抗议者的象征。活动人士自此在示威中广泛使用这一标志。

人权组织指责泰国政府近年来利用冒犯君主罪来压制政治异见。但总理巴育否认了这一批评。官方认为，维持君主制对泰国的国家身份至关重要。

乌干达新颁布的反同性恋法禁止将自己认定为 LGBTQ

非洲已经有超过 30 个国家禁止同性关系，但本周刚通过反同性恋立法的乌干达或许将成为其中最严厉的一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称，这似乎是第一部将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酷儿均认定为非法的法案。该法规定，所谓的严重同性恋者将被判处死刑，同性性行为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支持者说，有必要惩罚更广泛的 LGBTQ 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威胁到这个乌干达的传统价值观。政客们还将儿童性侵与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行为混为一谈——议员 David Bahati 在辩论中说：“我支持这项法案，以保护我们孩子的未来。”

该法案将送交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签署成为法律。穆塞韦尼没有对目前的提议发表评论，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 LGBTQ 的权利。乌干达著名的 LGBTQ 活动家 Frank Mugisha 谴责这项立法过于严厉，“他们也试图抹杀所有 LGBTQ 乌干达人的存在”，他说。

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发生大火

火灾是难民营中经常发生的问题，人们通常居住在极其狭窄的环境中，用竹子和薄塑料布搭成简易避难所。

三月初，一场大火发生在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 (Cox's Bazar) 的 11 号营地，烧毁了医疗中心、学习中心和清真寺，估计有 1.2 万名罗兴亚人无家可归。而就在两年前的三月，也是一场大火吞噬了同样位于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巴鲁卡里难民营，最终造成约 5 万人流离失所。孟加拉国国防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称，在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罗兴亚难民营发生了 222 起火灾事件，其中包括 60 起纵火事件。

BBC 报道称，本次火灾的调查人员认为，这次大火是一次“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破坏行为”，后续的调查将确定事件背后的团队。而国际救援委员会亚洲地区主任 Adnan bin Junaid 则提到，世界应该重新关注罗兴亚危机。几十年来，已有一百多万罗兴亚难民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寻求庇护，其中约 74 万人是从 2017 年 8 月开始越境的，当时缅甸军方发动了残酷镇压。该行动现在是国际法院关于种族灭绝案的讨论主题。

韩国政府建议每周工作 69 小时，年轻人说不

当一些国家正在尝试每周四天工作制时，也有人选择了相反的方向。本月，韩国劳工部建议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 52 小时提高至 69 小时。政府声称，提高每周加班的时间实际上让人们可以更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以提高生活质量。他们的理由是，人们应该以月或年为单位来规划自己的工作，在方便工作的时间段加更多班，就可以在其他时间段获得更多的休息。

但这一政策刚一提出就收到了大量公众抗议，包括工会和社交媒体上。尤其是千禧一代及 Z 世代，他们对工作狂文化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而这部分人群占韩国 5100 多万人口的约三分之一左右。

据经合组织 (OECD) 统计，2021 年韩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1915 小时，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工作时间 1716 小时。CNN 的采访中，来自首尔的 25 岁大学生 Jung Junsik 说：“这项提议没有任何意义……与工人们的实际需求相去甚远。”他补充道，即使政府的政策出现 180 度大转变，许多工人仍将被迫工作超过法定上限。目前，韩国政府表示将会收回这项提议，同时会更仔细地倾听该国年轻人的声音。



Snufk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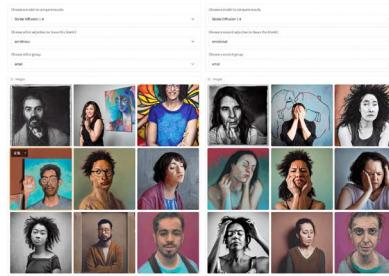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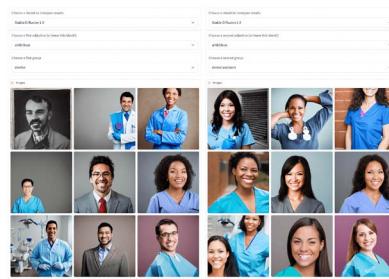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题图为电影《银翼杀手 2049》(2017) 剧照



档案

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的世界 是由 AI 生成的?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3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01

科学 / 技术

你是否也正处于 AI FOMO (错失恐惧)？人工智能行业目前的发展速度该怎么形容呢？不论你围绕它写了什么内容，在发出来的时候就都已经落伍了。距离[上一篇 newsletter](#)不过一个月多时间，期间，OpenAI 发布了 GPT4，New Bing 融合了 GPT4，Google 推出了 Bard，百度的文心一言面世……

技术前沿通常离普通人的生活比较远，我们很少会像这样，实时地感受到它带来的改变。感叹 AI 无所不能的同时，一些团队也开始研究它的现实影响：

AI 认为牙医是男性，牙医助手则是女性。越来越多人理解算法并非中立，训练集与算法的设计都可能带来具有偏差的效果，很多时候它被称为算法偏见。如今，你能够更直观地了解这种偏见。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和莱比锡大学的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帮助对比几种主流图像生成模型对性格 / 职业的理解。

若把职业当作变量，比如输入“有野心的”+“牙医”/“牙医助手”，前者的形象绝大多数为男性，后者则清一色为女性；若输入“有野心的”/“情绪化的”+“艺术家”，前者有男有女，后者则清一色为女性。

总结下来，这个团队发现，这些模型倾向于生成白人和男性的图像，尤其是当被要求描绘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时。而相比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偏见，这些诞生于硅谷企业的模型，也突出反映了“美国网络文化的指纹”，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工智能系统偏见的助理教授 [Aylin Caliskan 表示](#)。

当然，算法有偏见是因为现实中存在，但当它这样直观地出现在眼前时还是十分震撼。这些公司无不表示自己在努力解决偏见和刻板印象的问题，这个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它有多么难以被修正。作为普通用户，我们可能不会愿意跟一位充满歧视性价值观的同事共事，面对 AI 工具，我们能否经得起便利性的诱惑，对它存在的问题也谨记在心呢？

AI 最先取代的工作：信息处理行业。近期发布的[一篇论文](#)中，OpenAI、OpenResearch 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调查了像 GPT 这样的 LLM（大语言模型）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该团队的分析预测，大约 19% 的员工可以通过应用 GPT 提高 50% 以上的任务效率——换言之，原本需要三个人的活，现在可能只需要两个人。

如果将其他生成模型和补充技术纳入其中，这个比例预计将达到 49%。其中，信息处理行业的暴露程度最高，制造业、农业和采矿业的暴露程度较低。[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由于 LLM 性质的缘故，这轮技术进步下，高收入群体和高门槛的工作受到的影响反而更加明显，尤其是编程和写作类型的工作。区块链工程师或界面设计师等职业可能会“完全暴露”，快餐厨师、石匠和机械师则完全没有暴露。

Adobe 推出了一个“没有盗取任何艺术家作品”的图像生成器。名为 Adobe Firefly。经过去年一整年的版权风波，Adobe 的做法显得十分难得，也让它成为数不多愿意大方讨论其模型训练集的公司之一。根据 Adobe 的说法，用于训练模型的所有内容要么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经许可用于训练，要么在 Adobe Stock 库中，他们有权使用。

Adobe 提出的一系列计划体现出他们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比如，未来他们可能会向艺术家支付报酬，让有意愿的人贡献训练数据；它还在开发一个“禁止训练”系统，允许艺术家将请求嵌入到图像的元数据中，以阻止训练系统查看和使用它。未来，Adobe 计划将这些生成工具集成到 Creative Cloud 上，运用在包括 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 等程序中。

除此之外，浏览近期的资讯时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跳入我的脑海：

AI 生成内容的充斥会不会加速互联网的腐败？疑问来自于广泛流传的一张截图，图中在炫耀一种新的创收方式：用 AI 批量生成自媒体文章，发到不同平台赚取流量补贴，虽然微薄但积少成多。垃圾内容的生产成本低得前所未有。你能接受的互联网上有多大比例的内容为 AI 生成？

AI 生成艺术会不会不是一种工具，而只是一种风格？我常看的 newsletter Garbage Day 聊到这个话题，论据是“我们只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将‘NFT 艺术’识别为一种特定的外观和感觉”（我同意）。如果你经常看 AI 绘画的帖子，会发现不论是 DALL-E 还是 Midjourney 都显示出对某种风格的倾向性，“蓬松的光晕”，“暖大地色或蓝绿色

属色搭配”,“对称构图或强迫透视”。这种微妙的 AI 感在人为介入较少时尤其明显。那么反之,跳脱出这种风格的艺术会不会因其稀缺性变得更受欢迎?

数据中心还撑得住么?对于去年的流行,加密行业,碳排放曾是一个核心的争议点。那么如今上亿人每天不断输入、生成,会不会给人工智能行业带来同样的问题?女性如何对 AI 生成色情制品进行维权?GPT 模型取代或者受其威胁的工种里人群比例是怎样的?它是否会造特定人群的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

IN THE NEWS

[TikTok 国会听证会:夹在紧张的两国关系之间。](#)3月23日,TikTok CEO 周受资在数十名美国立法者面前,接受了长达五小时的质询——虽然现场看来更像是单方面劈头盖脸的抨击。

听证会的进展十分混乱,多数议员将此作为一场政治作秀,没有真正的问题可问,只是大声疾呼,痛心疾首,“TikTok 毁了我们的孩子”,或是拿出绝对不会出错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QUARTZ 评价,如果说这场听证会有什么突出之点,“它融合了对社交媒体以及对中国的恐惧”。数据收集、隐私保护、儿童心理健康等话题无序地穿插于其中。

经历过 Amazon, Google, Facebook 等诸多场听证会美国公务员们,本应对科技企业不再陌生,但他们还是显得摸不着头脑,闹出不少笑话。不过,此次也出现了一些针对算法和平台责任的技术性讨论,比如,TikTok 频频提及的第三方监管,多大程度上能理解算法并提出改进意见?还有围绕《通信规范法案》第 230 条款的经典争议:当一个平台不仅仅是承载内容,也通过算法决定每个人会收到怎样的内容时,它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出版机构,应当对其内容负责?

而尽管 TikTok 一直在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周受资也是一名新加坡人,这场听证会仍激发起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情绪。不少网友赞叹周受资的“帅气”,“冷静”,[也有人评价](#),“我们可以禁止 iPhone 作为报复吗?”但 TikTok 的前景如今晦暗不明。听证会前夕,TikTok 表示[拜登政府希望其中国所有者将其出售](#),否则可能面临封禁;中国商务部则在新闻发布会上[应声回应](#),表示对此“坚决反对”。这场听证会愈发加深了美国政界对它的不信任。

[美得不真实,TikToker 抵制过于先进的滤镜。](#)不同于一些国会议员的认知,人们对社交媒体上可疑的趋势并非全盘接受。Bold Glamour 是 TikTok 上最新的一款美颜滤镜。它的效果十分符合欧美的流行审美,窄鼻梁、尖下巴、高颧骨,以及完美的皮肤和性感的嘴唇。更突出的一点是,当人的脸在视频中移动,用力拉脸颊甚至捂住眼睛时,该滤镜都不会出现任何变形。

真实性带来了一丝奇特的幻肢效应,人们对着镜头摆弄着自己的脸,明确知道这不是自己的样貌,却找不到穿帮的证据。随着 Bold Glamour 在平台上蔓延开来,一些人开始公开反对它,“太吓人了”,“这不健康”。

社交媒体滤镜已经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常将它视为一种“低科技”,但滤镜的进步也归功于 AI 的最新发展。TikTok 没有对外公开其背后的技术原理,[AR 分析师 Luke Hurd 表示](#),Bold Glamour 很可能利用了机器学习技术,尤其是生成对抗网络(GAN),来实现美化。它不只是覆盖了一层效果,而是利用你提供的面部图像,生成了另一个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仅仅是增强现实,而是正在取代现实。这让我有点害怕。”[AR 创作者 Spencer Burnham 说道](#)。

[硅谷银行\(SVB\)暴雷,引发美国金融行业的持续震荡。](#)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总裁 Garry Tan 如此评价 SVB 失败的影响,“这将使创业公司和创新倒退 10 年或更长时间。”这点出了这家银行的不同之处,1983 年成立的硅谷银行在倒闭前是美国的第 16 大商业银行,主要为初创企业进行融资,尤其是疫情几年,SVB 吸纳了数千亿存款,并将大部分投资于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

尽管这类债券被视为相对保险的稳定投资,它也减弱了银行资金的灵活性。随着美联储展开激进加息,SVB 的投资遭遇亏损,闻风而动的取款挤兑则直接导致了其破产。好消息是,美国政府接手后,[承诺储户将不会蒙受任何损失](#)。但观察者担忧,事件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贷款和投资标准收紧,对新技术、初创团队而言,未来的融资将愈发艰难。

[新一轮机构改革,成立国家数据局。](#)具体而言,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将由发改委管理,“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此前这在地方已有先例,比如最早 2017 年贵州省成立的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大众的理解更接近于疫情期间的健康码管理,从一开始的各行其是,到后来打通的全国联网系统。而期待则是,集中管理能进一步规范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然而,[《南方周末》报道](#),“与此前的传闻不太一样。”竟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数据法律专家袁立志在朋友圈写道,国家数据局的职责只有数据开发利用,并未提及数据安全保护。而是更着重于数据的利用和开发。

[贺建奎“高端人才”风波之后,香港宣告其签注无效。](#)2018 年贺建奎宣布一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于中国诞生,登时引起全球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引发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的广泛质疑和伦理争议。2019 年底贺建奎被判非法行医罪,并于 2022 年四月出狱。根据界面新闻的梳理,目前贺建奎成立了新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 dmd(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基因编辑治疗药物研发。

然而,针对这些新的动向,一些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表示,贺建奎一直未能提供详细的研究计划,并给患者带来了错误的希望。[3月5日的一封联合声明中](#),他们强烈谴责他“在缺乏科学依据和道德保障的情况下,对其罕见病研究计划进行的误导性营销炒作”。

与此同时,3月7日,第三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举行。五年前,贺建奎在于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上用自己的实验震惊四座;五年后,对于这个话题的态度展现出更鲜明的立场。[委员会总结](#),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编辑胚胎,然后将其植入以建立妊娠,这可以传递经过编辑的 DNA——“目前仍然不可接受”。

这不仅仅是因为贺建奎事件引发的舆论震动,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研究展现出更多让人值得担忧的证据,比如一项研究发现,大约五分之二的胚胎在经过编辑后 DNA 无法修复,这可能导致婴儿出现健康问题。总而言之, WIRED 写道:很显然,科学家们还不知道如何安全地编辑胚胎。

[男男生子,不再只是同人文情节。](#)这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另一个新的研究也颇为引人瞩目。日本九州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从雄性细胞中产生卵子,培育出了拥有两个亲生父亲的小鼠。这些小鼠正常长大,看起来很健康,且成年后具备生育能力。

领导这项研究的科学家 Katsuhiko Hayashi 预测,十年内可能将能从男性皮肤细胞中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人类卵子。这项技术被视为拥有诱人的应用前景,比如治疗严重的不孕症铺平道路,并给同性伴侣共同生育孩子提供了选择。实验室里,X 染色体被复制,替代男性的 Y 染色体,变成一个 XX 的卵子细胞;但当走到实验室外时,这必然将成为一个会经受更多讨论的社会问题。

02

气候 / 环境

[IPCC 发布第六次综合报告预估全球气温将在 2030 年代上半叶达到 1.5 度升温。](#)这是一份每七年才会发布一次的报告,因此下一份出现之时,很可能我们已经对此有了答案。不仅是人工智能,对于气候问题我们也正置身其中,受其影响。

报告指出,在此之前,如果能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一半,且到 2050 年初期完全停止排放——世界大概能有 50% 的几率能控制住这个升温。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时刻。对于后面这个条件,[有一些更详细的描述](#),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占全球总量的 60%;富裕国家需要停止运行没有碳捕获的燃煤电厂;电动汽车需要占汽车销量的 60%。

相对积极的一点是,在近年来全球各国的减碳投资下,最可怕的情况估计不会发生——一些科学家甚至曾认为升温会达到 4 度。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也在下降,更多电动汽车在道路上行驶。

[环保组织对拜登政府的石油钻探项目提起诉讼。](#)大规模淘汰化石燃料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近期批准的,位于阿拉斯加的石油钻探项目就饱受争议。尤其是拜登于 2020 年竞选期间曾发誓不会批准任何新的公共土地石油和天然气租约。

提起诉讼的团体指责该项目违反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和其他法律。

据计算，该项目将在未来 30 年内，向大气中增加 2.39 亿公吨的碳排放量，相当于 64 座燃煤电厂的年排放量。与此同时，TikTok 上出现了针对该项目激烈的反对之声，100 万封信件被寄送至拜登政府，[Change.org 的组织请愿已经超过 400 万个签名](#)。

陆地上野生哺乳动物总重量不到人类的 10%。这样看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之为“共生”，实在太美化的当前的状况。实际的情况是，人类已经将别的物种生存空间挤压得十分之小，同时把荒野改造成了自己的种植园。

这项研究来自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科学家得出数据，当今活着的野生陆地哺乳动物总质量为 2200 万吨。仅仅是人类为了吃而驯化养殖的猪，生物量就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与此同时，家养狗的总质量约为 2000 万吨，家养猫则约为 200 万吨。

这颗在想象中物种丰富、生机勃勃的星球，实则跟这个印象相去甚远。研究的作者之一 Ron Milo 告诉媒体，“当你在电视上观看角马迁徙的纪录片时，很容易认为野生动物正活得很好。这种直觉是错误的。”

塞尔维亚新版护照的黑猩猩图案引发争议。中外对话报道，2019 年，西非黑猩猩被命名为塞拉利昂的国兽，并在一月的新版护照内页中采用了这个物种的形象。然而，发布后，塞拉利昂的网友却对此表现出不满，表示这个国家并没有保护好这个濒危物种，只是想借由它来推动旅游业发展。

塞拉利昂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黑猩猩种群之一。2010 年的数据为大约 5500 只。但大规模毁林、盗猎，以及极低的违法成本，都让这个群体面临很大威胁，极其过时的数据也显出动物保护意识和能力的不足。

减少空气污染也是缩减阶级差距和种族歧视的方法之一。哈佛的一项研究发现，对细颗粒物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可以将 65 岁以上的黑人和低收入美国人的死亡率降低 7%。这些社群不成比例地被暴露在有害的空气污染中，来源可能是工地、卡车、发电厂等。

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在考虑制定新的细颗粒物最大含量标准。今年一月的一份草案中，将细颗粒物的限值从每立方米 12 微克收紧到 9 至 10 微克。预计这种缩紧每年可防止达 4200 人过早死亡。

陶氏化学回收的旧运动鞋，在印尼小岛的旧物市场上被发现。它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去年七月，路透社参与了由新加坡政府和石化巨头陶氏化学牵头的回收计划。宣传中表示，这些被回收的鞋子将被磨碎，用于建造新加坡新的游乐场和跑道。

显然，路透社的记者不是特别相信这个话。捐赠时，他们在 11 双鞋的鞋底中藏入了蓝牙跟踪设备，并用鞋垫盖住。当鞋子开始被运输时，设备就会实时显示鞋子的位置——结果，几乎所有鞋子都落到了新加坡一名二手商品出口商的手里。紧接着，它们被运输到印尼，四散到这个国家不同的岛屿上。其中三双在旧物集市上被找到。

作为备受争议的高排放企业，越来越多的化工、石油企业开始投身于这样的环保计划，试图抵消自身生产所带来的排放和污染。然而，这个调查再次显示出这些计划的脆弱，真正实施时往往大打折扣，甚至只是一场单纯的“洗绿”骗局。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题图为电影《火山挚恋》(2022)剧照

档案

安远路的火山学家

沈非 | 驾驶我的车

这是关于许多个名字的故事。

我开始认识死神；它握有其他秘密，比我们的人世现状古怪得多。然而，不在现场及片段遗忘之谜如此错综复杂、高深莫测，令我们觉得仿佛置身某个白河与暗流交会之所在。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

01

飞越死亡的幽谷

“护士长提前告知我，老爸的电解质指标也正常的。就是有点蛋白低等涉及营养的指标较差，但这也是急不得的，需要在家慢慢调理。她建议如吃不下东西，就用蛋白粉上。如此看来，应该是出院无碍了，在等医生最后来定。”

“是我写了这篇文章逆天改命。我是好消息。”

“[赞][赞]爷爷明天上午出院。”

这段我和爸爸的聊天发生在兔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2023年1月20日，和死神赛跑的残酷竞争有了结果：一个家最终被那里的每一个人守住了，一棒接一棒，以他们各自独有的技能和逐渐培养出的默契步调，将一个不过是想回到爱妻身边的老爷爷从高热的痛苦里捞起来，用不止息的爱给他送去清凉的风，助他长命百岁——他的名字是沈寿祺，很好看，也很好听。

是的，哪怕在冬天，也有人需要降温而不是升温，而假如缺乏冷静与尊重，不同的需求是难以被看见，更不用说重视，只会被严格的规范之手硬生生塞进某个看似适合所有人的模版里。我是在看望爷爷、拿报纸当“铁扇灭火”那天，更清晰地感受到每个人在身体感知层面的差异。因为高烧，他委托我给他带竹席床垫。而或许是因为我久坐、动得

少，冬天于我总是很难熬，光是应对手脚冰冷，就要比认识的大部分同龄人更早地铺上电热毯、开到最高一档，等被窝够暖才愿意钻进去休息。

我不知道与我体质相似、与爷爷同龄的老人们又是如何挨过冰火两重天的煎熬，那段时间我身边罕有没得新冠的人。他们的家人陪在他们身边吗？还是因为种种无可奈何的原因，选择把“补给”放在门外的援助方式。

这方式是我后来从奶奶张平的大学同学那儿听说的，也是我从奶奶的日记里看到的——放补给是我爸习惯的方式，同时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更合情合理的“安全模式”。在艰难的时刻，安全成了唯一要把握住的东西，其他种种，比如具体的人的差异、最深的渴望都是可以牺牲的。或者说，在“有资格”为受苦受难的人“控制安全”的人眼里，承受着成千上万种悲剧的个体应该理解这种“为你好”的远离。安全大于所有的连接。

1月19日，也就是我鼓起勇气去看奶奶那天，我打开她很久没用的微信，屏幕上一排红点提醒我，不仅我们这些离她最近的家人，还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她的学生们惦记着她，又因为她无法回应而留下一行行“已取消”，它们就像是退信信封上的戳。还有些惦记则呈现为克制、礼貌的祝福，往往暗示已辗转从我爹那里得知了二老的情况。因为不愿显得太过亲近，只能远远地一起祈祷她思念的那个老爷爷能早日出院。

我依次念出那些人的微信名和留言。为了不让她未来彻底忘记他们究竟是谁，点开各式各样的头像，增加包含真名和关系的备注。这是只有文字才能做到的解释，因为仅通过口述叮嘱，已经迷失在记忆森林里的奶奶无法收到，哪怕收到了，她记得的东西也很有限。

即便如此，有的注释却跨越了重重阻碍。比如我能在念出某些人名后，发现奶奶平静的脸突然生动起来，像是大脑里有一条通路被点亮了，有人拉了另一头的电灯开关线，灯泡发出的光照亮了那个人的脸。伊对着奶奶和我笑，带着很想走近我们，又不太好意思步子迈太快的惊喜和害羞，而我和奶奶也因为看见了那份喜悦，情不自禁地用张大双眼来回应。

当两头的光交汇，语言的河、共识的摇篮也因此诞生。我在日记本里替奶奶记下的点灯者之一，是她的大学同学周采霞——

“她一个人住，也得了新冠。她来问候你，说很羡慕你，因为她只能一个人过春节。她希望你等寿祺回家了，再给她打电话。她说兔年大吉，祝你新年快乐，好好休息。”

日记最开始停在这里，我没有详细记录她们之后的语音通话，因为我总觉得那种用声音陪伴彼此的体验，无法用文字再现，如果真的有，那也属于创作而不是记录的领域。奶奶或许不会记住，但周采霞会记住一部分。若是她俩再聚，我相信她们能从彼此的眼睛里读到那个忐忑不安的下午，还有因为听到彼此的声音而体会到的安全感。

是这种由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组成的安全感，把爷爷和奶奶从痛苦的光谱两端，往不冷也不热的中间地带推过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部分工作不仅由我们家人承担，也由那些把它当工作的人在“一线”执行，我还记得那个去看望爷爷的下午，在我作为孙女都不知如何安慰老人的时候，有护士机灵地对他说：“明年不是兔年嘛，可爱的小兔子跃过凶猛大老虎，蹦蹦跳跳地来到我们身旁”。

1月21日除夕日早上，家族群里出现了一张姨娘拍下的客厅一角。原本是沙发的地方摆着由姑父组装的床（后来我发现，奶奶甚至在日记里写下了姑父组装过程中找螺丝的细节），虽然凯旋而归但依旧衰弱的爷爷躺在床上，手举在空中，奶奶则搬了把椅子坐在床头旁边，双手轻握着爷爷的手腕。此时离送爷爷入院，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所有人都拼尽全力，才拥有了一个能称得上是正常生活的平静时刻。

原来，我们要的那么少，我们要的那么多。

我忍不住在群里回复姨娘：“是要多拍照「哭」”

在做出院最后收尾工作的爸爸接道：“包拿到了。在返回安远路的途中。”

据说，爷爷出院的时候大声告诉医护人员：“你们要人性化！”

02

火山学家的眼泪

对于不少咬紧牙关战斗并最终幸存下来的人，能够在亲近的人面前大大方方掉眼泪并非易事。当我以为1月19日晚，那顿明明吃着爸爸为我所做（也是奶奶拿手菜）的炸田鸡，一家三口却泣不成声的晚餐已经足够五味杂陈，除夕夜的家庭聚餐却像一个巨浪把我精心构建的防线统统冲走了。

但巨浪并不是因为一件具体的大事而起的，它由好几个小浪以极隐蔽的方式组合而成，

最终刺激着泪腺让它举起白旗投降。假如已经到了可以庆祝阶段性成果的时刻，而且被家人环绕着都无法放声大哭，我们这几代人是有多逞强？是有多像哭不出来的机器人？是什么让我们拒绝展示脆弱？是谁或什么东西在暗示眼泪是多么不好的东西？

小浪先是从走进餐厅开始酝酿的：三年过去，我都已经忘记开开心心吃年夜饭、见到留守上海的服务员们，本是怎样的心情。其实三年前，我也是那个只知道跟在服务员后面走去包房，礼貌道谢的“客人”，但除夕夜走在餐厅走廊里，我忍不住对每一个迎面走来而且向我们拜年的服务员回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陌生人最热烈的回应。而且我惊讶于，自己和不少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彼此是可以这样热情相待的，哪怕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夜晚。我们的生活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留在这里也因此成了我们的“家人”。这个容纳了许多个“家”的餐厅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家族。

但也不是所有家族成员都在。等候娘娘和姑父的时间里，爸爸告诉我一个消息：原来，我的表弟可能会留在新加坡——他是除了爷爷奶奶以外，当晚唯一没有到场的家人。我坐在那里听完，看着圆桌对面的空椅和无人经过的走廊，流泪不止。这个一月我也没有为不在自己身边的、很想念的人掉过眼泪，但在那个瞬间击溃我的大浪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他此刻不在”，而是我意识到，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压根不知道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哪怕这种“最后一次”显得悲观和不切实际，毕竟我们怎么可能真的不能再见呢，想见的人总是能再见的吧。

这种压根都不知道的心情，在奶奶和爷爷虽然平安团聚在家的时刻，又和我许多年前未意识到的一种巨大的悲伤重叠在了一起。我在落泪后惊讶于即便人和人的感受可以如此不同，当有些更深的情感之音发出共振，它们可以直抵内心深处最脆弱的沙堡。那是2009年夏季的一天，当时爷爷奶奶还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我已经准备出国留学，只是爷爷奶奶都闷在鼓里。我已经想不起他们最后知道真相那天，家里弥漫着怎样的气氛，但我依稀记得那里有一种因为压抑、隐瞒反而更加剧烈的愤怒和不甘：凭什么，我不能知道关于你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凭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就因为“爱”所以说谎吗？所以我允许和你说再见的时间就这么短吗？

这些或许是我想象的当时奶奶的心理活动，我不能代替她说话和思考，但我可以替我自己说，用大哭的方式。

这顿年夜饭可以用纵情快乐来形容。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各自都还处于长新冠的康复初期，再加上因为四处奔波“救火”成功，肉体和精神上都值得一顿大餐犒劳。可犒劳到五个人吃一桌菜是一回事，解决各自的创伤是另一回事。

除了我为表弟的不在场伤心之外，爸爸也突然掉过眼泪。或许是因为我们仍然不习惯在年夜饭时哭，妈妈对他的亢奋和悲伤总归是有点不太开心的，但我也很能理解她的初衷：大过年，没必要讲这些伤心的事，是时候开心了。人都救下来了，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但不开心的事情太多了，无法原谅的也是。爸爸忍不住讲起发现爷爷奶奶那晚的细节，为一种“毫无准备与告知”感到愤怒，我们都知道会走到这一步，但没想到会是以这么一个结果落到每个人头顶。走错一步就是好几条命，以及可能会延续非常长的创伤后遗症。除此之外，还有他小时候在常德路上见到的因为动荡，尊严被磨损殆尽的故事，那家人曾经饱含尊严地活着，能从谈吐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独有的文雅。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是自由的，也为了安全捐出过家中的藏品，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一位文雅的男子被游街示众，而他的儿子被迫目睹这种羞辱。我无法想象那对一个青少年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创伤。

娘娘则回忆起她的外公，也就是我太外公（上海话里，我们喊他“大大”）张遵时最后一次拿起笔的样子，颤颤巍巍留下“步调一致”——他对家族的忠告：大家要目标一致地“在一起”做事。我可以想象，柔软有力的手已经无法承受一只笔的重量了。

那个亲眼见到父亲被羞辱的少年长大后做了警察，认识了我的爸爸。爸爸告诉我，那个人在解释自己的职业选择时坦言：看到那些人欺负爸爸，让他跪在地上批斗，我想当警察去欺负他们，为爸爸报仇。

愤怒的回击当然是一种方式，作为一种维系“安全模式”的手段也会继续下去，但这些都是防御而不是真正的改变。比长新冠更可怕的东西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像个幽灵。当不断有一群人的存在提醒你平静时光是如此来之不易，那些从战场回到家中的人又要如何从精神的战争中全身而退呢？

“步调一致”。这样的事需要所有人参与进来才能做到。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帮助自己更清楚地看这个世界。就好像妈妈之于爸爸，姑父之于娘娘——在一

方咄咄逼人地爆发时，另一方可以做那个“扇铁扇”的人，那个目睹火山并掌握爆发规律的人。

我隐约觉得自己成了电影《一一》里那个爱举着相机的孩子。我想见证更多的人是如何成为此刻的自己，以及他们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我要和他们一起把只是被埋起来的故事从遗迹里挖出来，趁生命还在，记忆还在。

那顿饭的最后，包括从餐厅开到爷爷奶奶家的路上，我都没有停住自己不断发问的嘴。有太多名字涌入脑海，不少还需要更具体的字去和音对上号。我用手机备忘录记下爸爸和娘娘回忆起的往事，感觉自己更像是一百年前的记者，想要知道给自己取了笔名，念起来是“Hui An”的遵时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在有选择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这个决定因此改写了所有后人的命运。

一个有笔名的人。

听说他不仅毛笔字写得很好看，文章也写得很好。听说他和妻子、即我的太太（这是“奶奶的妈妈”的上海话念法，发音是tata）邹蕙卿有一张在杭州西湖旁的合影，身材高大，一旁的蕙卿则比较矮小。一百年过去，依然有人、有恋人们不断前往杭州，但似乎没有人会说起一百年前的人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一百年间他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以什么代价试图交换称得上是尊严的东西，最后又承受了怎样的命运。

来到爷爷奶奶家，团聚在一起的快乐冲击着我的心，特别是那份对于遵时和蕙卿的好奇心：到底是哪个Hui，哪个An？爸爸回忆说，常德路的院子里原来有四棵树，除了我记得的那两棵，还有哪两棵？蕙卿是为了自己留在上海的四个孩子种的吗？刚好四棵呢！

问题太多，答案太少，因为奶奶忙着做爷爷的“见证人”，重逢后的大脑显然无法调用更多资源回答我的问题，最终我确认的只有Hui和树的品种。

Hui，“晦”，“明”的反义词。原来光明的对立面并不是黑暗，而是阴暗不明。

我没见到的另外两棵是杨树和枇杷树。奶奶想起了一个细节：那是白沙枇杷，隔年才结果，很甜很甜。

临走前，我在奶奶的日记里为她写下今天，写下今年：

1/21 周六

今天我们（全家人）来看你啦！

你的寿祺也回家了，听说你老摸他脸。

今天我知道了太外公和太太的名字：

张遵时。他遵守时间。

邹蕙卿。她为我们种下四棵树。

明天开始就是你的本命年和（我的表弟）恺恺的本命年了，你们都属兔子。我家有两只兔子，你们于我而言都是小鸟一样珍贵的存在。新世界里，我也会和我爱的人种很多树。

03

“晦安”

年初五，看护老人的接力棒交到我手上。因为护工夫妇家中临时有事，来回奔波的情况再次发生，也因为爷爷奶奶总是吵吵闹闹——一个想早点睡回自己的卧室，一个半夜里总要爬起来“招惹”（爸爸原话）——看护的重任已经让主要负责夜晚时段的爸爸疲惫不堪，他一边还担心，护工夫妇是否隐瞒了真相，其实他们因为实在受不了二老脾气，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离职，春节后不会像约定的那样回来照顾老人了。那爸爸之前规划的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可能性，一种对自己是否过于天真单纯的怀疑浮上来，像是一只小水妖在观望着陆地上奇怪的景色。我不曾预期过真正的生活。跨越死亡是好事，可我从未料到那之后还有如此多的琐碎需要去面对。

还是说，我们只是忘记了，曾经生活就是在整理琐碎中被扶正的，它不是没有混乱，不会过度整洁，只不过每一个人、每一样物甚至每个字存在、摆放的位置都有自己的来由。

那天下午，我在奶奶的日记里写药物和血氧仪使用说明。

“是一个黄色小瓶，爷爷不舒服的时候，给他吃两粒。”

不舒服下方有个箭头，又指向测血氧步骤：

“点一下开关（小点），把手指夹进去测出数字即可，反正当夹子用就行了。前面的数字是血氧——血里含氧量，后面的是心率。”

书写而不是讲述，让我想起曾经我也愿意以这样的耐心在虚拟世界去教人如何照顾自己，而很多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当时我们还用准确的中文写准确的指引，没有人用缩写。如今越来越普遍的缩写抹去了共识，那是只有一部分人能懂的东西——这些人可能都知道这药的名字、服用频率——只是需要一些代号，而更多人会被这些代号挡在认知的门外。

我用完整的中文写下这些，意味着如果有一天奶奶忘记如何操作、爷爷突然情况危急，家里总有人可以看到一份明确的备忘，药丸是在茶几上的，每次服两小颗。

写下这些的时候，奶奶的学生张建初来看望他们了。我从爸爸口中得知，张建初之前就想来看二老，被爸爸拒绝后，还站在楼下张望着爷爷奶奶家的窗户很久很久，似乎这样他的凝视就能抵达自己老师的身边。最终，他是亲自抵达了，还带了樱桃。

接着药物指引后，我在日记里写更具体的事：

“我让他不要久留，免得被爸爸看到，他会觉得麻烦别人是坏事——其实未必，别人做事也是出于爱。爱是可以表达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帮你在微信上和薛玉凤说上话了，我捧着 iPad（还记得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吗？）帮你发语音给她。张建初来看望你们，你说他是本分老实的好学生。他是代表学生来的，你们教过的学生都很爱你们。

……我爸是下午三点半左右来的，他睡了午觉才来的，我们一家人又像之前那样凑齐了：他会陪你们吃完饭，等护工夫妇他们回来，他交接完再离开。爸爸还为爷爷买了爆鱼，是你喂爷爷吃的。”

可能是因为我和学生来了，奶奶和爷爷比之前还要开心。依然很脆弱的爷爷兴致勃勃，问我要了一支笔，即兴写下对联：

“彤门书香浓，李家花香艳。”

爷爷因为耳朵背，我和他说话得提高嗓门，但这次我发现爷爷说话大声是因为大家离彼此远，还以为彼此发火了，其实不是。

日记里的话像是我要说给全家人（尤其是爸爸）听的：

“要认真听，认真理解，走近了听和说，大家声音都轻了，不就都温柔了吗！”

这天的日记，其实是想学习如何照顾好爷爷的奶奶起的头。她写，“麝香保心丸……”

除了药名，她还为我竭力想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写下了正解。我问她，她的爸爸张遵时的笔名，到底是不是“晦安”？自从大年夜听到那个名字，我就一厢情愿地以为 An 是“安”。“晦安”，希望爱妻蕙（卿）和爱女平，每日都平平安安。

于是她在日记本的下沿先写了“晦安”，然后划掉。这是我第一次在笔记本里看到她主动划去一个名字。想象是错的。

1月19日那天，我和奶奶肩并肩坐在床尾。她低头观察我的手，接着拿起来，在她自己手里感受：“你的手嫩嫩的，是文化人的手。”当时我只能苦涩地笑，后来才觉得，她也许是想起了她爸爸，遵时的手也是文化人的手罢。我为此笃信自己接收到了那个受了太多太多苦，没能与我见面的男人发来的信号，他要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帮助他的女儿，共渡难关。

一个星期后，1月26日这天，我依然坐在她旁边，而她关注的已不是我为她记了什么，以及物究竟如何使用，始终是一旁的爷爷。这次是我低头，用双眼感受她终于记起的名字。

希腊语里说，爱是长久的凝视。

我们家的第一个伊卡洛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太阳，在上海扎根，再也没有飞去其他地方。

张遵时的笔名是“晦庵”，不是“晦安”。



沈非

小鸟的家人。她“飞”过许多地方，
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驾驶我的车

她接收到了来自昨日世界的信号，
轻轻踩下油门，去往她爱的人身边。



电影《神奇队长》(2016)剧照

专栏

020 唐冠华 那个著名的生活计划 进行了 15 年之后， 它的倡导者怎么样了？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 18 岁的时候，
就提出“自给自足，共创社群”。

总的来说，唐冠华是一个制造议题的人。论头衔，他可以是音乐人、多媒体设计师、公益人、影像制作者……如此等等。头衔的变化取决于他出现在怎样的议题里，而这些议题又怎样被媒体定义。多年以来，他和媒体无形之中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媒体需要他的议题，他也需要借助媒体的话语权。

在聊天之前，唐冠华发了我一份 T Magazine 中文版在 2022 年 10 月对他的报道。这是媒体对唐冠华和他的“家园计划”的最新一次系统梳理，之前类似的还有 2020 年的《青岛日报》、2019 年的“界面”、2018 年的《中国青年报》以及 2015 年的《纽约时报》。这当然不是报道的全部，维基百科“唐冠华”词条下，罗列着多达 31 份引用来源和 6 份资料来源，其中绝大多数是各种中英文媒体报道。早一些的是 2014 年，大部分发布于 2020 年。所有这些报道里，唐冠华的生活都扮演了类似于“奇观”的角色，换句话说，比一般的“生活方式”行为走得更远。就好像好莱坞电影，“奇观”需要被讲述，被分析，被感受，而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构成了“魅力”。唐冠华了解这些，有一份报道说，“媒体工作者为他拍摄影片时，唐冠华使用自己的录像机记录了采访过程多年”。

唐冠华 1989 年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个中产之家的小孩，父亲曾经是个诗人，后来经商，挣的钱“至少晚年不需要别人养活他”。2008 年，也就是唐冠华 18 岁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份“家园计划”，这份计划用 2 万字表述了当时他对人类文明和危机的认知，包括环境变迁、能源供给、财富分配和地球演化，还有一份行动纲领。大意是用 25 年的

时间，先自给自足，再吸引理念认同者形成社群，之后“探讨家园和城市间的张力，让家园与城市形成健康的交流，至有生之年”。

要追溯唐冠华以上认知的形成源头，远没有描述他后续做了什么来得容易。T Magazine 的说法是他最初想得不多，只是为了逃离被金钱和消费牵扯的生活；在“界面”的报道里，唐冠华在提出这些之前已经是一个艺术家——做过观念摄影、拍过纪录片、做过行为艺术表演，并在此过程中认识了很多朋友，和他们探讨了自己的“家园计划”。然后在 2010 年，唐冠华上了崂山，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这件事也有名字，叫“自给自足实验室”，从手工搭建房屋、挖厕所和种菜开始。

我们聊天的时候彼此都没有提这些。从他说了“小学三年级之后就不怎么正经上课”，谈话就往唐冠华的原生家庭方向行进了下去。他的父亲是他故事的起点——后来在其他媒体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说法——唐冠华说，他的父亲经常把他放在新华书店，他因此看了很多书，“五六年级就觉得世界辽阔，自己知道的事情比别人多，还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肯定要做点什么。”

但父亲对“做点什么”的理解，是如果不能进入顶尖学府，那不如早日赚钱，创业获得第一桶金。唐冠华说，他初一开始在外面给别人修电脑，“小时候接触（电脑）比较早，所以就给人组装机器，坏了什么的就给人搞一下，去一趟至少 50 块钱起步。”到了高一，唐冠华已经可以开出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收入稳定，自己在外面租房住。但是父亲依然不满意。

“早期我应对我父亲的期待就花了好多精力，因为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向或者其他的生活，就是在一个证明自己的过程中。这样的过程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感，而且得到的全是否定。我觉得已经比同龄人能够生存了，还是没有得到认可。再加上当时有一些资金，我可以出国或者到处转一转什么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我，他们自己都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为什么要去证明自己？”

“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我的人生要怎么去弄。难道就这么一直证明，然后挣更多钱，然后他就高兴了？我就被认可了？这就是目的？这肯定不是我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唐冠华思考这些的时间大约是 2006 至 2007 年。在这之后，他父亲托朋友给他办了一个高中学历，他就彻底告别了校园。

“我后来一旦想通了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畅快，回来之后我把东西全扔了。以前的那些挣钱买的什么手表什么包什么玩意的，就当他（指父亲）的面，从楼上全部扔下去了，都不要了。”唐冠华说，“我回去就是要宣布一下。宣布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去琢磨自己到底要干嘛。”

唐冠华在到处寻摸的过程中发现了公益。他发现的不仅是公益的目的，而且是公益的模式。“看到很多学者，或者是这种非学院里的，都有研究某个小东西，或者保护某个动物，有一些基金会什么的支持。对，就是通过赞助或者各种自助来做这件事，所以我对这样的事情就产生了一种关注。”

到了我们聊天的 2023 年初，家园计划已经进入第 15 个年头。唐冠华已经把自己一个人的自给自足推进到了他的行动纲领的第二步，社群。社群也有自己的名字：“共识社区”。唐冠华说，这是他在各国考察之后加之对古今中外各种共同体的详细研究之后，结合他所理解的中文语义“发明的词”。

“共识社群”有更具体的硬件要求。“当我想做共识社区时，崂山的地就不够用了。我需要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开始可以很小，但是它必须得有至少三百亩的扩展空间，社区必须有壮大的可能性。这样的土地最好是能免费提供，因为我们前期没有经费。”唐冠华对“界面”的采访者说。

福州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正荣公益基金会有 500 亩地，原本计划经营有机农业，未成功。2015 年，唐冠华和该基金会达成合作，后者授权唐冠华以“实验”的名义使用。福州这个项目，被唐冠华叫做“南部生活社区”。他的模式依然是吸引志同道合者，在这 500 亩土地上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如建筑、农业、手工、养殖。如果说这些事情有什么共性，那就是除了生存，大家都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唐冠华对于“志同道合者”基本没有审核，你要进入社区，必须先了解一些共识（微信、网站或者其他渠道，你总有一个能了解到详细的要求），而硬件设施之有限，本身就形成了天然的筛选机制。很多人因此来了又走。不过到 2020 年，有数百人参加了该实验，十几个长期居民已经住在那里。

唐冠华说，要进行这样的社区实验，他至少需要 10 年的时间——福州没有做到，正荣公益基金会后来面临资金压力，南部生活社区实验终止。随后唐冠华就进入了寻找新实验点的过程，至于他自己，暂时在云南昆明的大墨雨村落脚。

一直以来，唐冠华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都不是他脱离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日常生活，把自己逼入某种苦哈哈的实验里，而是他的社会想象。一个人做事和希望大家一起来做事，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唐冠华致力于先实践出某种模版——不仅是生活模式，也包括他自己作为这种模式的实践者，以及和“正常”世界的沟通者，你可以理解为他倡导的生活模式的形象大使。相比具体的生活技能，他用“独立思考”来形容这其中的意义。

“它强调人的独立，或者自由。没有这种思维，只能是别人给你一套框架，你从这种框架中再找到其他东西的时候，其实被这个框架一直框着。”

他提出，“共识社区”是根据兴趣爱好、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理念类聚的无国籍人类社群，“例如艺术家社区、基督教社区、禅修社区、素食社区等”。这些主张有某种微妙的风险——倒不是生活意义上，而是政治意义上。包括福州遭遇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现实造成的选择。眼下，为了让“共识社区”得以继续，他也会主动了解某些基层政策，以此获得支持。

当我问起这些的时候，唐冠华的回答坦诚但又矛盾。最矛盾的地方在于，他这个试图脱离固定社会框架的计划，恰恰是需要依赖体制才能实现的。唐冠华说，他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是对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机会，他也会保持审慎。

“其实在之前的实践中，包括在这十几年……还是有一些互动出现，比方说后来乡村振兴都提出来了是吧？还有一个生态文明。很多官方媒体在2010年、2012年以前就找到我来整……我们是有一些交流和互动的。”

“假如说现在有人肯资助这个，不管是谁，国内外，个人官方，你都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会评估这个事是不是真的可持续的。假设一个海外基金会过来了之后，马上被政府关注了，这就是持续不下去。这些问题都要权衡。”

“那如果当地政府支持你，它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明白……因为我们说的政府，其实它是各级政府。每一级政府里又有一层一层的官员，每一层的官员，当然你可以说他们的利益诉求差不多……但是也有不同的侧重。村、乡、县、市、省，都不太一样，但是能够做出这样的表态的话，肯定是想要去做点什么。”

他还是寄望于某种精神感染力。“我现在可能要换一些方式，传达出一些精神力量。我也能看到一些人可能明知不行还要去做，所以说明现在已经传达出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物理空间的东西了，它更多可能是形而上的，甚至可能埋下一些种子……我因为本身就是做生活实验，这个实验会不停的失败，但失败也会传达出很多信息。”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做一些考察和调研。之前我在福州的时候我都不出门，很多人来，我就每天接待，所以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到各个地方。现在我一路从福州已经去了好多地方，我就看看各个县都在干嘛吗，整个乡村什么的面貌是什么样的。

Q: 要考察什么？

A: 谈到“共识社区”或者是生活方式，我们会看到很多信息。包括别人会告诉我们在哪儿有个类似的村，或者政府在哪搞了一个什么乡村振兴的大项目，以前可能听过，现在有机会去见一见这些地方的运营人。福建那边的另外有一个县可能还是想沟通看看，做一些建造方面的事，政府有这样的一种支持力度。

Q: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 如果是建造实验的话，我们可能在推导一种设计方式，甚至是设计语言。按照我的建筑师朋友吉富遥树形容的，“我们在城里边相当前于大树上的树叶一样，所有的东西赖以生存都是来自大树主干，如果大树主干一停，枝叶马上就崩溃了”，这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去中心化的这种建筑。比如没有集中的供电、供水，它自己如何保持运转？

Q: 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A: 这件事如果能够实践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空间。至少拿出个三五年来。一个建筑一年才能是一个四季，才是一个周期。不经历时间，很多数据是出不来的。

Q: 想推荐什么有意思的人来接力？

A: 一个朋友，原来在绿色和平，很硬核。你可以考虑这个人。



杨 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kevin_z](#) on Unsplash

专栏

021 灵子 成都之后，我整个人 都变得更乐观了一些

杨樱 | 接力访问

不管大环境怎样，你还是能做点什么，

不管是表达，还是倾听。

成都有个酒吧，用 580 天的时间做了一场公共对话的实验——其实不是一场，是好几百场，包括沙龙、音乐会、观影、十日谈等等各种形式，甚至还有辩论；准确来说也不是实验，之所以用这个词，可能还是创办人们一开始除了院子里的火塘和聊天的意愿就没有别的特别确认的东西。总之酒吧有 580 天的租期，一开始，大家就是想让这里变得有趣一点。

灵子是在 2021 年 6 月来到成都的，她的身份是“人类学博士生”，在成都进行田野调查课题。在此之前，她在北京做文化记者和编辑，在政治抑郁到了自己难以忍受的时候，出国去读了人类学的硕士，而后是博士。她很快来到这个叫做“敦壘”的地方参与各种活动的组织，并以自己的方式创办了一些活动。她在 2022 年 12 月离开，又在 2023 年 2 月回来，因为这是“敦壘”580 天到期的时间。灵子的朋友圈里满是怀念和朋友，你能感受到那种热切的氛围，不仅是因为冬天大家喝过酒之后红扑扑的脸。

提名她做接力的安猪说，他很好奇灵子在成都的整个过程和经历。我们的聊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在搜索“敦壘”活动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为什么成都会有这样一种氛围，让彼此不相识的人可以围绕公共话题坦诚交流。坦诚是一个重点，因为很难。不管是议题的提出，还是交流的进行，每个环节都可能会有防范和审查，当然也会有冲突。但这个过程到底坚持到了最后一天，并且因为其丰富性，成为了被怀念和复制的存在。

灵子既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也是这一切的观察者。在聊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也是这一切的受益者。

以下是灵子的口述，为了理解方便，上下文略有改动：

最初的想法是看看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是怎么自处的，他们怎么做选择怎么做平衡，怎么还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我之前在媒体工作，一直做文化版，跟（这个）人群打交道比较多。所以等到我后面去读人类学硕士的时候，就很自然的想到了（这个课题）。硕士做了（这个题目的）一小部分，觉得它可以做一个更大的题目，做更深的探讨，就拿同样的题目去申了博士。总体来说，我觉得成都的经历让我觉得极其幸运、奢侈、丰富，然后其实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我现在甚至会安慰自己说，博士论文只是一个副产品，万一写不好的话，田野经历本身对我来说已经相当重要。

我之前一直在北京。北京好像是文化中心，但其实时间久了以后觉得也挺受限的，看到、感受到的东西都在一个圈层内。当大环境变差，媒体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之后，就觉得挺无力的，经常很悲观、很愤怒，但又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

其实做这个题目本身无非就是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找到一个自己能够自处的方式，看看还有哪些空间、哪些渠道、哪些可能性，但在北京我没有看到过。

去成都是一个好朋友提醒我的……他说成都有很多“野生知识分子”，不在体制内的，或者曾经在体制但是自己选择出来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真正掌握人类学的视角或者方法……以前作为媒体，也是跟同一群人打交道，可能我做的比较像你现在做的事情，听他们是怎么讲的，去理解，然后去传播。但是田野让我有机会参与进去，做了一些更主动的事情。

这有点像我自己主动创造出来了一个场域——当然不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所以它跟那种传统的、经典的人类学的田野不是特别一样。我的题目一开始比较松散，定义含糊，也没有围绕一个机构、一个地域或者一个中心的议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我认识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较散。后来慢慢就变成围绕敦壘进行，我参与得越来越多，就好像我非常积极地、又无心插柳地，最终把它变成了我的田野。

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之前的那种无力感。以前就是觉得做的事情没有太多意义，跟社会的现实联系越来越少。比如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你感觉明明线上线下的讨论都很热烈，但是真正在媒体能发表的尺度非常有限，甚至提及都很困难，（这个时候）再做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价值感就会大大被削弱。

但是在成都，在各个文化空间，你都会觉得大家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虽然范围很小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持续看到这些活动给人带来的改变。

没有去想到底会有哪些意义或者使命，最初是我们自己想做，不管是一起看一个电影，还是做一些辩论，还是说请人来分享。首先它是我们自己觉得很感兴趣的事情，不论有没有观众来我们自己都愿意做。大环境都已经这么糟了，可以努力把自己的小环境建设得更好一点。

成都一直是被大家提起来就会说“巴适、安逸”的地方，好像大家更在意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不去关心那种比较宏大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说，政治政策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干扰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可能因为是移民城市，你就必须要变得彼此更包容更体谅一点。另外成都相对来说生活成本比较低，相对独立一点的文化空间、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人，就有生存空间……它公共性的那一面，因为在其他地方相对来说比较萎缩，就显出来了。

我刚离开不久，可能还有一种带着美好滤镜……成都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这种流动性也好，丰富性也好，到底是不是长久的、脆弱的，有的时候也会担心……但是目前至少我自己一年半的体验非常丰富，会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在北京待了 16 年……有时候聊起成都生活，尤其是跟一些外地回来的，北京上海来的朋友们，大家都会说好像 10 年、15 年前的北京。有趣、丰富，有各种小剧场、独立的纪录片展、有趣的人……但是北京那些有趣的部分在城市治理方向改变之后变得越来越萎缩，有趣的事情越来越少，公共讲座能谈的话题也越来越少，频次越来越低，好玩的人都在离开……大家交换的信息全都是这些不能讲出来的事件，好像人人都挺无力的。

所以一开始出去读书，就是想换个环境……我即便现在读博士，也没有打算之后转向学术，无非就是换一种生活方式，换一个角度去解决自己的困惑……可能对我自己更有意义。

从务虚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在成都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更乐观了一些。虽然大环境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显然是变得更差了，但是你会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垮的，大家还是能找到一些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成都，都是因为在这你能找到可以聊天的人。有很多经常来敦

壩的观众会说，“我在以前的圈子里找不到可以真正聊天的对象”。在北京，我当然也能聊天的朋友，但是大家都挺忙的，好像见一次也不那么容易，而且其实观点都差不多。但成都的这种公共生活是不断有新人加入进来的，大家有开放的心态，真正关心和愿意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是一个不断扩展、加深、丰富的过程，而不是陷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所谓“跟真实世界、跟更多真实的人连接”，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在北京，你如果在饭馆吃饭，聊到一个公共话题，大家都会自觉地压低声音，怕你的观点跟邻座不一致，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成都，大家就比较自然地聊起来。我一开始印象很深的是，居然还会有人因为参加一场公共活动，观众之间迅速聊得火热，加了微信约了一起再去干嘛。这种事情在北京有好些年没有见过了，通常大家去参加一个活动，看完、听完就走了，没有交流的欲望。可能也是因为成都圈子比较小，城市也小……很容易就看到相熟的面孔，然后就聊起来，变得更熟。

敦壩的活动会让你有更多的参与性和表达的机会……比如“十日谈”的设置，没有时长、主题形式的限制，来的嘉宾想谈什么话题都可以想谈多久都可以，观众很容易加入进来，在分享提问阶段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追问，换做其他更正式一点的活动，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

哪怕是最简单的，就是形式上，大家围成一个圈，感觉就很平等。观众彼此之间可以有眼神、肢体、面部表情的交流，不像常见的活动，就是所有人面向嘉宾，单向的。再比如观影会，大家一起看一部电影然后一起讨论，也没有那种中心的感觉。

其实（这些活动）能吸引更多人来，我觉得是大家找到了一个可以表达，以及倾听、沟通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一开始更愿意强调自己的观点，慢慢地你会觉得他好像更能听进去不同的意见，然后条分缕析地去沟通，这就特别好，也很有利于大家彼此认识。

我们老说社会没有这个空间、自组织的东西比较少，但是通过这种公共活动，在这种小环境里，它就是自我建设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某种抵抗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活动的一部分意义就在于它展示了这种可能，没有那么难的，你想做的时候就做起来。不需要一开始就去设想它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影响、意义，或者能不能持续。你做起来再说。我们以前都很习惯于先做一堆计划，发现实现不了就很沮丧。但其实做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很多东西真的就会自然生长出来，一旦开始了，就会激发越来越多的想法。

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做这种公共性的东西，要主动建设个什么。其实这些活动对这些参与的人本身也有影响。有人因此换了工作，有人从别的城市搬到成都来，有人结识了很多好朋友，还有在这里找到伴侣的……你能看到这些持续的讨论，持续的交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我自己的影响，就觉得还挺好的。

Q: 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可能就是探索剑桥。很奇怪，理论上我是博士三年级了，但是我第一年在国内线上读，第二年在做田野，所以我既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又像新生一样。所以最近两周都在大街小巷地逛。

Q: 有趣在哪里？

A: 我记得一开始我想查一下图书馆的开门的时间，，打开页面第一句话就被惊到了，说学校有 100 多个图书馆。然后你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极其聪明，恨不得酒吧里面打酒的人都是博士，只是在打工而已。我有朋友还说某天在酒吧里喝酒，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讲拉丁文，可能是某种小社团练习什么的。你觉得身边所有人好像都有过人的地方，都很聪明，有自己有趣的研究在做，还挺新鲜的。

Q: 那最近的隐忧就是写论文了吧？

A: 哈哈每个人的论文写作都是一个血泪史，有时候觉得不忍心问对方的论文题目和进度，但是你不问好像也不太对，因为这基本上就是博士生的全部生活了。

Q: 有什么有趣的人推荐吗？

A: 张颖吧，她像多爪鱼一样能做好多事情，精力无限，我很佩服她。她做律师，又积极参与公众活动，还在律所做了一个文化空间。



杨 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无名女孩》(2016)剧照



参加《囡囡出逃记》试镜

专栏

022 程意 17岁，“在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路上努力着” 杨樱 | 接力访问

她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
是为了更好地表达。

注意到程意是在一个“插画头像交换卫生巾公益义卖活动”里。她负责画插画，id 叫“毛领芦笋”，自我描述是这样的：“奋勇争先高中生，喜欢阅读和画画，在成为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的路上努力着。”

程意刚刚满 17 岁，在一个被称为“藤校霸主”的北京某高中国际部读高二。她是一个强烈好奇心的人，之所以会去画插画，因为参与公益短片《囡囡出逃记》的演员招聘。她其实知道自己可能比需要的角色成熟，但出于好奇还是去了，还因为选角需要，当场让剧组修剪了头发。

听她说起各种各样的经历，你会发现好奇心为她打开了很多可能性。除了自身的求知欲之外，让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她申请的国际学校看重申请者身上的社会属性，包括对公民身份和自己所在社会的了解。程意参与女性主义活动，去云南做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还有一份严肃且不断增加的阅读清单——这一切会变成某种学历筹码，还是会转换成某种价值观的底色，眼下还远不到判断的时候。程意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她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进入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有意识地在进行自我训练。在她看到社会的复杂性的时候，她展现出的是兴趣，而不是畏惧。

我们的聊天就从她如何了解女性主义开始。以下是她的口述，出于阅读需要，上下文有所调整。

我其实初中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要参加高考的，但是初三的时候我被（现在的学校）提前录取，就踏上了国际路线。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因为申请国外学校并不要求很死的成绩，更看重个人整体发展，也需要你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去了解社会、去读书，这也

是自我提升的过程。

我小学是寄宿学校，一直没有手机，小学毕业妈妈第一次给我买手机，第一次登录微博，一下子就看到各种很多女性议题。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比如生活中的歧视、刻板印象。当时我就有关注，还有一些人会介绍书或者开讲座，我就很崇拜她们，经常跟她们聊天之后，这样才有更深入的了解。

微博上各种社会事件，热搜里的杀人案等等，最让我感兴趣的、能让我共情的，都是我身为一个女性，在看到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种事件）。然后从来没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中会有比较大的风险、歧视和伤害。

当意识到可能我也会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状态，所以这也激发了我的兴趣。想去学习它，也许这就是契机，其实到底是哪一个社会事件，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高一我才开始看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关注一些博主。这个话题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我同学。因为身边的同学都要走国际路线，他们对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已经了解得比较深刻了，我经常去听学校里他们的讲座。因为我是人文班，班里有两位女同学上学期每天下课都在我们旁边一个小教室办“酷儿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的讲座。我每天都去听，觉得收获非常大。

高一上学期我读了一本书，叫《第二性》，波伏娃写的。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有公众号，在上面写了两期书评，因为它带给我很多全新概念。这些都是积淀。女性主义公众号推荐了很多活动，一开始我是被文章吸引，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能参与到活动里。

上高中之前，我就像普通初中生一样看看小说。我很喜欢科幻文学，但上高中之后就收获到了很多的信息，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拐点。周边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我跟他们讲谈收获非常大，对我造成非常大的改变。

其中我就发现我喜欢读哲学、社会学这种非常像教科书，或者反正是在阐释一个东西的那种。比如黑格尔，一页纸你可能会读半个小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深度阅读中，其实你能理解一个故事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也很喜欢逻辑。波伏娃说女性主义、第二性，它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对社会的控诉，而是在非常理性地分析社会结构，女性是如何被社会塑造的。我很希望通过这种逻辑去思考。

我初中没有特别多的朋友，因为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去交流，当时喜欢的科幻片、音乐、明星或者偶像其实都偏欧美那边。（上这个高中）可能是一个契机。也是我妈妈帮我去了解一下学校，让我填的申请。

我觉得我妈妈是希望我去体验那些新的东西，因为她从小就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基本没有出过北京这个城市，所以她希望我获得一个见识世界的机会，然后选择我应该留在哪里……我妈妈是很感性的人……我爸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是工程师。我妈妈非常喜欢宗教这些类型的书，我会给他推荐我们学校推荐的书，因为我们学校有人去学宗教，然后我就会问问他们，你们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拿到书单分享给妈妈。比如说你知道一本书叫《金枝》吗？对，人类学的书。我推荐我妈妈看，她就喜欢。

其实我觉得我就相当于我妈妈的（另一个）高中。我通过进入高中，然后去学习到这些新的东西，然后回来再跟她讲。按照她的原话说，她重新活了一遍。

我初中很普通，北京有一个政策是派位，就是随机被分到一个学校。我的初中西城区倒数第二。但是因为大家都是随机派的，里面也很有趣的人。因为我在接触国外教育，同时之前也接触国内教育，所以我能清楚看到这两种教育的区别。

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中性的选择。但是像美国这种申请，它鼓励你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比如说我现在干的所有事情，最后要落实到我的申请文书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高中暑假做了什么。这个问题中就是让你表达你做了哪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认识到了哪些人，或者你帮助到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一种理念，我认为我

是比较适配这种理念的人。

去年暑假，我跟着一个人类学教授，和十几个和我差不多的同学，去云南景迈山针对少数民族调查他们的文化。我去这个活动的目的，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我对人类学非常感兴趣，但之前没有任何渠道接触，它对我来说是非常空的概念，所以我急需实际、快速地体验它，快速吸收，就去了两周。在这两周中疯狂沟通，了解到底什么是人类学。它的目的、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我们主要研究布朗族。很小的一个民族，从傣族分过来。因为他们被山隔开，就分成了傣族和布朗。在云南普洱市，卖普洱茶的普洱。



田野

我能去这个活动是因为和老师交流，老师推荐我去柳荫书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小书院，里面会讲各种小众的，比如说像拉丁文这样的课。我就去柳荫书院去找那里的老师，对一个校外的机构。基本上国际部好多人文学生都会被推荐到这个学校。

它很有意思，但基本上不做宣传，就靠人推荐进去。我觉得它哪点都好，就是非常贵。我经常能感觉到身边的人非常贵，各种出国相关的事情都很贵。它其实是针对中产阶级上层的子女，想去国外学习类似的东西，就先去这里了解。所以我们这次田野的时候，里面也跟着一些家长。就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富婆的样子。对，但是看起来就没有很俗气，是比较有修养的那种。

我每天进一个寨子去采访一整天，晚上回来和大家一起聊稿，再写稿写到凌晨。有一周，五个个工作日我一共就睡了10个小时，特别累，但回来才能补觉，因为那是一个实地活动，得抓紧这个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去采访一个人。我很喜欢不同的人，也很喜欢聊天，所以这对我应该不算特别大的挑战。我并不是很喜欢像同学们一样去聊当地很有名的大祭祀或者之类的人，我更偏向于小孩、普通人家的老人，他们甚至都不太会汉语，但是我觉得在艰难的沟通过程中，能收获挺多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对自己的认知，非常诚恳，没有被雕琢。

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几个同学就讨论了好久。就大家讨论说，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他者视角去记录文化，但是心态上我们其实是高高在上的外族人，然后去审视他们这些文化。比如我们说“文化在消亡”，但其实并没有任何文化是真正消亡的，它只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只不过在他者的视角上看，这个文化是在消亡的。

是的，所以我们有经常有这种疑惑，再加上他们在跟我们演——其实我能察觉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和大祭司去聊，因为他们当地是卖茶叶为生的，他们需要依赖文化为茶叶增加底蕴，这样卖的价钱会更贵一点……所以这就造成了错觉，就是他们只有茶文化。但是我在跟其他人去聊的时候发现并不是这样。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地很多文化被摧毁，所以他们可以复兴的主要还是茶。

我申请方向是纯艺术。它并不是画画，或者什么动画制作，而是一个非常广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过程。其他学科解决问题，纯艺术提出问题。它通过作品向大家反映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文化沉淀，以及你要有想表达的东西。所以之前我探索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其实都是为我这些艺术创作去提供思维方式，我觉得学了之后我创作的东西可能就和之前不一样了。

人类学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学科，你需要把所有东西都投入进去，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很久。其实我们申请学校的文书就是非虚构写作，它并不要求你把东西列出来，而是让你讲一个故事。像今年寒假我其实又回到山里，前期我做了很多准备，我想用一周时间拍一个人类学微电影，非常小，是和同学合作的。我们相当于每人拍一分钟，最后合成一个十几分钟的小电影。

之前说当地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摧毁了，布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他们的文字

语言都是傣语。所以他们缺少对文化的记录。所以我这次过去是给他们新建一个文化传承馆，在他们寺庙中设计一个壁画，那壁画其实讲的就是他们的历史。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有开门节和关门节。开门节那天的舞蹈非常有趣……然后有一幅画就讲整个队伍跳舞的场景……其实壁画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传承馆还没有开始建，我只是去交流沟通。传承馆的负责人是当地的头人，他给我介绍大概要画哪几张壁画，然后他说要画什么，然后我就画什么，然后画出来给他看，看他满不满意，然后最后协调沟通出一个结果。

我们有一个群，都是想画壁画的同学，目前人还很少。然后大多数人比我年龄还小，他们其实还有时间去等壁画馆去建好，做前期的调查，然后再投入到绘画。我也许要上完大学之后才可以回来参与。我目前负责的是前期信息收集，打一个基础。你说这些布朗族的人？他们对我其实并不太感兴趣。哈哈。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一个小讲座，主题是动物伦理学。是两个同学合作。我是申请艺术，然后他是申请生物，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伦理学其实是哲学的一个范畴，里面有很多逻辑思维，我都很感兴趣。

Q: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A: 做这个的初衷，是最近美国环境运动，那个往画上扔臭鸡蛋或者颜料的。在中国大家都在骂这个事件……我希望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思考他们为何去做这样行为，为什么他们即使遭到逮捕也要去做。他们肯定会有个更底层的逻辑在里面。

为什么那些素食主义者即使想吃肉也不去吃，他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我们应不应该也像他们那样去做？我现在不了解。如果我了解了，是不是我也要做素食主义者？其实我是想让同学们对这种社会议题有最基础的了解，以客观的态度去看，而不是直接骂。

Q: 那你现在觉得苦恼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觉得棘手的？

A: 苦恼的事情……其实我爸经常问我提这个问题，因为他总想帮我解决，但是我每次都得想一想。

其实是有……我觉得真正让我苦恼是去国外去学艺术，首先就非常费钱，而且感觉没有什么前途。学个计算机好像还有点竞争力，学个艺术没有竞争力的，国外的人从小就学艺术。但父母非常支持我，我压力其实挺大的，因为我想去回应他们的支持。一开始我父母其实有很大争论，他们并不是不支持我去学艺术，而是担心，你如果把一个东西当成行业的话，其实会对折损你的爱好，因为你其实并不能去干你真的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也会担心。

Q: 那你会推荐什么人来接力？

A: 《囧囧出逃记》的导演姐姐，她也想知道我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因为他们想做一期播客。她说自己年纪很大，其实也只是90后而已，只是开个玩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在社会上生活的一个状态，很有意思。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Sofia Rotaru](#) on Unsplash

专栏

023 苏东威 “我来中国是想改变这里一点点，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杨樱 | 接力访问

这个愿望还未消失，
但也很少有人能理解。

2023 年是苏东威在上海的第 5 个自然年。不过其实中间得刨去 2020 年，那一年他待在荷兰，不知道何时可以返回。出于“很快就会结束的吧”和“那个房子真的很不错”的双重考虑，他一直留着五原路租的房子，也是在这个房子里，他完整地经历了封控。他说前两周的肃杀气氛之后，街上就开始出现零零星星的人，于是他常常晚上翻墙出去，和其他“越狱”的朋友相聚，有时候还会带食物回去分给家里物资紧张的邻居。

我翻苏东威朋友圈，他在 2022 年春天的时候躺在床上，头发和胡子都变得很长，对着镜头做怪相，就好像从戏台上刚刚下场的长发卓别林。

苏东威的身份和他的生活一样，可以说得很简单，也可以说得很复杂。他是荷兰人，1984 年出生在浙江丽水，父母分别是福建人和丽水人，80 年代就去荷兰打工开餐馆，先是在荷兰生了他的大哥，等到有东威的时候，生活已经非常忙碌，于是母亲回到家乡待产，生下他之后又交给东威的外婆抚养至 2 岁，再重新接回荷兰。到东威妹妹出生，家里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所以妹妹和大哥一样，只有东威体验过两地人生。不过单论长相，他有几分混血模样，加之留着黑黑长发，穿一件衣襟和袖子有点起球的蓝色丝棉袄，看起来可以空降纽约格林威治扮演那种波西米亚兮兮的艺术家。

相比哥哥和妹妹，他看起来是最“纠缠”自己中国身份的那个人，包括在做社会学硕士论文的时候，以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切入点；也包括为自己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中文而后悔，以至于只会说发音平平的普通话，阅读完全不行。苏东威在第二代移民里也都算个异类，因为大家都用温州话交流，而他的父母笃信以后即便回中国，也是普通话最有用，所以在家只说普通话，在外则说温州话和闽南语，因为同行大多来自温州，

或者广东和福建。等苏东威到了上海，他也能听得出别人大致在讲以上哪种方言，作为一个有中国背景的外国人，他的优势就只能发挥到这里。

苏东威在上海待这么久，是他家里人完全想不到的。家里人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兄妹。如果不谈苏东威，这就是一个成功实现阶层跃迁的移民家庭范本。父母在荷兰小镇上做马来口味改良中餐，经营有方开连锁，长子研读法律变成专业人士，幼女学医变成医生（另一种专业人士），体面、稳定、富足，移民前的人生已经淡化成遥远的背景。唯有这个次子，虽然念书不少，不过从未正经工作，东混西混，到了人生 35 岁上的时候，不仅不知道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还跑到了上海；不仅跑到了上海，还一待数年，并且一如既往没有工作，既不稳定，也不富足。

这些都是每一次苏东威和父母通话时必然会谈到的话题。父母的口吻已经从询问变成命令，而他也确实为此困扰（最不困扰的是买车，因为确实不需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整个聊天的过程，他时不时就会像自我提醒一样，说自己得去找份工作。但是谈及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整个人又为之一振，解释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机缘。他似乎就热爱这种随机和跳跃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因为如果他想要稳定，他在毕业的时候就有机会拥有自己的餐馆——那时候他表哥在阿姆斯特丹盘下新门面，他去开出当地第一家亚洲小吃，做那种从红烧肉到培根“万物皆可夹”的开口包子，从店铺到菜单都一手设计。不过做了一年他就放弃，因为可做的已做完，而守店并非他的愿望。于是继续在阿姆斯特丹的各种兼职。

说到苏东威的兼职，最主要的一份他做了七八年，就是参与阿姆斯特丹当地一个媒体实验室性质的 NGO。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新的数字概念，以及提供普通人应该了解的社会批判视角，通常都站在政府和大型资本的对立面。比如在社交媒体强势介入每个人生活的时候，做一个关于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展览，让大家在选择时有应有的知情权。“这些项目其实并没有特殊目的，就好像你为什么去看电影，为什么去看展览，就因为它是一个故事，然后里面蕴含了知识。”苏东威说：“如果说非要有什么目的，那就是传播知识。”

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苏东威最先搜索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小众音像店或者黑胶唱片店，然后问店员他们在当地喜欢去的地方，或者周末去哪里消磨时间，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在他自己生活的地方那就更是这样。不过全球文化也越来越“平”，导致他在自认为很小众的地方旅游，也能在街上遇到荷兰本地的朋友。喜好相同的人做出的消费选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一点想来固然无聊，不过倒也给苏东威提供不少机缘，比如总会有朋友的朋友，出于某种认同邀请他去巴黎时装周做男模，或者主持拍个影片——他的人生至今似乎都是这样，走马灯似的被放进各种各样的事情里，只要他觉得好玩，就都会说“哦好啊，为什么不行呢？”

他在上海认识 Jiro，就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咖啡文化节上摆摊卖黑胶，彼此聊天发现很多重合的喜好，尤其两者本身都有中西结合的身份。他因此获得机会，借助食物、音乐等等自己的喜好，表达他自己对于特定文化的看法。Jiro 在此前的接力访问里提及的那个热爱摆摊卖 Taco 的机构“东西”，还有上海新开业的小酒馆 Bastard，都有苏东威的参与。

其实身份认同之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他来上海的目的。“去年夏天全世界都放开了，中国还没有。我看到很多国外的朋友去音乐节，去旅行。说真的，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是想让中国也这么好玩的。真的，就像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好玩。”这个说法很有可能具有冒犯性，因为好玩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度取决于听到这句话的人本身有多好玩。

这些“好玩”都是生活化的，同时又不能用单一的类别归纳进去。他只知道它必须是有挑战的、不常规的，就好像他参与 Bastard，是因为觉得“一个外国人想做中餐给中国人吃”这件事很酷。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但凡涉及文化表达，在这里都需要额外想想，从政治意义上尤其如此。因此他在说起自己的目的的时候，带着“我也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的表情——不止如此，他说他的家人，可能完全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

“荷兰是个特别稳定的地方，我朋友就会看新闻，我爸妈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来中国，更不理解为什么都这样了还不走。他们就会说，你可以了吧？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够了吧？走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悲伤、愤怒、困惑。我知道不会只有五天。对，我没有走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走。我是个幸运儿，所以我不能经常说这个，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混蛋。我知道（改变这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试一试，做一点点事情，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但至少我试过了，我乐在其中。是的，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安全的，如果我拿中国护照，我可能现在在

荷兰吧。”

“就像有人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搬去上海，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但是是个很有趣的城市……对，我的人生是有点像实验，但是没有目标——实验都是有目标的。我可能就是为了住在这里而住在这里，不是我要获得什么，赚钱啊什么的，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背景。”

“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走。我在荷兰的好朋友都没有来过中国，对我在中国的生活也不太了解，我觉得他们是想来的，但是比起日本、泰国，中国看起来太有挑战性了，他们完全不熟悉这里的文化，这里很不一样。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就会觉得去中国很奇怪。去泰国很好啊，海滩坐坐，蛮舒服的，身边全是游客。对中国，他们了解的渠道就很有限。无非就是新闻，而且是政治新闻。所以我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让我的朋友们觉得来中国也没什么太难的。”

所以苏东威在过去几年就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里：筹划一个市集啦，帮忙开一个店铺啦，客串做个 DJ 啦。他不觉得自己已经了解上海，更别说其他地方。他还有很多困惑：“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说，‘哦，我很喜欢骑车哦’。在荷兰我们不会说‘我喜欢骑车’，因为每个人都骑啊。但是在上海骑车，一个人需要穿特定的衣服，去特定的地方。我就只能说，好吧。嗯，我是想买个车的，但我还没买，共享单车还蛮方便的。”

“有时我去一个音乐会，结束了每个人就起身离开，打车走了。我说，啥！难道不是应该大家都在这里聊聊天，晃一晃，就着音乐喝喝酒？从商业的角度你卖卖酒水也行啊。难道大家不都是出于对同一个东西的爱好来的吗，没道理不聊一聊啊。但就没有，很快这个地方就清场了，大家都走了。我还去过一些论坛，都很商业，就好像那些人职业在做论坛，找一些人在那边讨论创造力，商业创造力，赚钱创造力。好像创造力是个商品，买来卖去。”

说完他也觉得自己很没重点，还有点像在抱怨，尤其是还没有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身份来作为抱怨的阵地。不过不久之前，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份可以算是工作的事情，就是替朋友照管上海闹市区一间小酒吧。作为一个完全不爱喝酒的人，他把这地方看作一个试验场，不同酒的配方，放点外面很难看到的电影，或者做点某种文化气息混杂的活动。

“有趣……嗯你也可以说这种生活是有趣的。但是……”他看上去是真的希望可以脱口而出介绍自己。如果说这在荷兰不算太大的问题的话，在上海就很是个问题。“这里每一个人见面都会先问，你是做什么的？很难回答啊！你懂吗？”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想用这个酒吧来干什么。不过现在没有人，我天天都必须去看店。周末到半夜2点，星期一到四也是很晚。然后骑车回家。

Q: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 虽然开酒吧不是我在中国的计划，但是我有开餐饮的经验……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交流和分享，而不是捏着手机喝酒。

Q: 困难呢？

A: 就是得天天看店！我是说，我觉得开酒吧还蛮好玩的，但是每天都去就有点太那个啥了。我还没精力去思考那个有趣的部分。

Q: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来接力？

A: 文楚，在上海她是少数几个会和我聊社会、政治还有生活意义的人。她很有趣！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2022)剧照

专栏

024 Aaron 计划过 20 年的生活， 4 年之后就得换场

杨樱 | 接力访问

逃离一次，

逃离第二次。

Aaron 是 2019 年初搬进村里住的。即便在村里他也算离群索居。另一个[刚刚住进村里的唐冠华推荐他做接力访谈](#)。他们其实并不熟悉，但 Aaron 在脱离工业化的环境里独立生活的技能让唐冠华印象深刻，即便他认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硬核选手。不过眼下 Aaron 又回到了城市里。2023 农历新年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了澳大利亚。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算以 43 岁的高龄去国外再读个书。

故事也许应该从他之前的城市生活说起。Aaron 出生于 1980 年，2006 年大学毕业，学的是高分子材料，去上海一家外企做产品研发，“一个特别标准的打工人”，就这样生活了六七年。在 Aaron 讲述自己的离经叛道之前，大致就用了这样寥寥几句概括了自己的人生。但是我觉得应该扩充一下，即：当年无论从学历、收入、进入上海工作的时机以及作为一个公司人面临的职业发展机遇等等来看，Aaron 都站在一个相当有前景的位置上。他完全可以做一个野心勃勃的奋斗者，把自己的收入和职位推向一层层更高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他不曾觉得厌倦。

他的厌倦或许是觉得自己如此迅速地就解决了生存问题，但生活意义却没有着落。于是他开始玩户外和极限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一些环保志愿者，先开始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后来收拾收拾简单的行李，开车去环保组织所在的北京工作，在此之前，因为意识到和妻子的人生轨迹将会迥然不同，办妥了离婚手续。

到这里为止，Aaron 看上去已经把自己放入了冒险的轨道——从一般社会意义上来说，不过其实他在环保组织工作的经历，也有点像另一种上班，只不过不那么朝九晚五，工作内容也不会一成不变，而且因为需要对很多企业和机构进行调研，还需要调动很

多应急能力、专业背景和组织能力。你可以理解为，Aaron 成为了一个领工资的行动者。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工作方式都认为和自己相当契合，唯一的问题，就是机构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干预，或者就算没有被干预，机构内部为了未来继续存续下去，也会把计划自我阉割，渐渐从监督者变成政府的合作者。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Aaron 每天只是在假装上班，比真上班更加疲惫。终于在整个部门被取消之后，他被调到了负责农业项目的部门，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了解工业化农业生产之外的模式，比如生态农业、朴门农业，他发现这一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会和统一管理的计划型农业形成某种对立，因此获得也许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从本质上是和现有的社会机器脱钩的某种方式。

“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特别、特别温和的事情——就是我只是一人独居——但是其实这背后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想与控制割裂开来，然后我就开始特别着迷。”于是在 2019 年初，Aaron 搬去了云南大墨雨村，成为了一个长居村民。

他为搬迁做出的解释，你会觉得特别熟悉，就是对城市高能耗生活方式的质疑。但是在整个听完 Aaron 的讲述之后，你会发现相比一种实验心态（“尽量不依靠社会这个大机器，你究竟需要从自然里边取得多少资源才可以维持你的生存”），他其实也试图通过远离自己原来的生活模式去对冲此前环保组织工作瓦解带来的政治创伤。

在 Aaron 搬去大墨雨村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各种各样避世者的青睐之地。从 2015 年起，这个地方就陆续有希望过上不一样生活的城里人到来，有的长居，有的只在周末出现。如今在网上搜索这个地名，你会看到大量的民宿信息、旅游攻略和官方宣传。还有建筑师改造网红住宅的热门帖子，标题提到“邻居 90% 都是硕士”。在官方叙事里，这里被当作“离开北上广也能（以中产姿态）过好这一生”的样板。不过因为越来越多想脱离主流社会的人加入，这里也有很多性少数群体、艺术家或者像 Aaron 一样失意的社会工作者。

这些在 Aaron 搬去住的时候有一点苗头，但还没有那么剧烈，最多就是有人教授生态农业的课程，或者在这里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课程 Aaron 自己也去学了，但比一般人走得更远。“他们有的人会通过做木工来养活自己，有的人就想自己种菜，自己种田，有的人靠画画”。Aaron 想测试的是一个极限居住条件——或许和他此前的户外爱好有关——他不工作，也不和村民住在一起，而是在离村子几百米外的水库边上，找了一间很破的房子，周围有几十棵果树。这样一块地方，Aaron 和村民签了 20 年的租约。

然后他开始修整房子。“我想尽量降低居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所以我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兴土木、挖地基、运大量的水泥到山上。水泥是不可降解的。所以我尽量用山上原有的，比如原来剩的木头、剩的土砖，村里的建筑垃圾，总之尽量用不花钱的资源来维持我的生存、我的房子。”

房子修整了好几年。“一开始山上没有电，然后我就去捡别人不要的太阳能板，买了电池，然后自己发电。最开始生活条件其实不太好，但因为我以前一直玩户外，我倒不觉得生理上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后来有电了，但是水没有通。我边上是水库，也是当地的水源地，我就用太阳能发电，自己把水泵到山上，然后自己再做过滤装置。”

虽然 Aaron 不工作，但他会教村里的孩子一些文化课，这也是他一部分收入来源。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每年我的花销可能只是在北京一个月的花销，就算一分钱不挣，之前工作挣的钱也足够让我活到七八十岁——我觉得应该够。”

“我曾经跟人这么解释，当你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其实只有一种：挣钱。一旦有了钱，你可以拿去换各种东西，换你的手机、上网的费用，出行的费用，租房子的费用，吃饭的费用。你只需要考虑钱就可以。但是当你到了村里边以后，靠挣钱来换取的东西都变成了你的日常，你只要想该做的事。”

“所以别人问我在村里干啥？我就活着。你需要干什么的事情，你就去做什么事情就好。你除了不用考虑挣钱，其他什么都要考虑。”

但他没有预期到的东西还是发生了。倒也不是疫情。2020 年那一波，村里因为远离城市，自给自足，所受影响有限。2021 年底到整个 2022 年要更紧张一些，但村里的防疫政策也没有那么彻底，大家也心照不宣地彼此配合。“我们新村民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有一些人会从外地回来，村里边就会象征性地来贴个封条……然后大家架个梯子从墙头上翻出去，继续吃吃喝喝。但为了尊重领导干部，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晚上再从墙上翻回去……有时候风大不小心把封条吹掉了，我们还开门跑出去追封条，追回来再给自己贴上，然后再翻进去。”

商业化也有点烦人。“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些人觉得这里有商机，这个村将来一定会变成特别网红的点；政府觉得有政绩可以宣传；然后有一些投带资进村的人……

当地人的心思也会有一些变化。”

这些都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让 Aaron 决定提前结束他的生活实验的是护照。2022 年，他发现自己护照过期了，再去申请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他觉得恐慌，原本离群索居带来的避世感消散了。“我是一个对自由度追求度特别高的人，但我发现我不能再自由地行走了。他开始破例寻求之前认识的人的帮助，全力以赴地解决护照问题——解决的时候，也是他决定离开的时候。

“我可能内心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总觉着一个事可以干得更长一点，但总是不得不逃离……我租了 20 年的地，万万没有想到第四年的时候就要走。”

一如他之前的行动力，决定之后他就迅速寻找离开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他在 43 岁的时候决定出国读书的原因。Aaron 说，他或许还会继续尝试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继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但从可持续性上来看，不放在国内似乎更为保险。他把云南的这四年看成一场排练，尽管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把它变成真正的生活。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

A: 我从 2022 年三四月份就一直在弄护照弄签证。在网上看一些编程相关的之类。

最近看了一本比较有意思的书，就是告诉你如何在虚拟世界维持一个匿名身份，不被任何人追踪。有点黑客那种趋向，我还挺感兴趣。

Q: 这书叫啥？

A: The Art of Invisibility

Q: 有什么会担忧的事情吗？比如出国会担心在国内的家人吗？

A: 我高中读书离开家之后就没有长时间跟家人住在一起。家庭联系就很松散。当然我也会考虑，但这几年我自己瞎搞，手里也没有特别丰厚的资本。我其实只能想，我在国内的话，如果家人生病什么的，我肯定会拿出所有钱去治病。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对资源并没有那么丰富的情况下，以我现在的社会地位来说，真有事，我还不一定能找到符合需求的医疗资源。尤其是疫情这一次，简直太不靠谱了。要指望社会系统来维护我的医疗需求或者说养老，我觉得比较困难。如果我换一个地方能站住脚的话，也许还有点机会。

Q: 你会推荐谁来接力？

A: 北大法学院面包烘焙专业的 P 橙，她好像平行世界的我，但又不太一样。都不愿意过主流的生活，还挺愿意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付出的。但是她一直阳春白雪，我就比较喜欢土鳖的路子。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惠允，题图为无声合唱团绘本中的一幅



李博早期作品

他觉得自己进入创作滑行期，其实距离毕业不过两三年。虽然还在画画，但是觉得不爽。商业规则让他疲惫，自己投入在作品里的真诚越来越少。当他试图改变的时候，阻力同时来自市场和他自己，前者出于商业利益更希望他持续复制，后者则是迷惘。“我从一个学生进入社会以后，所有的关系都改变了，学生的时候你还相对弱势，但是被抛到社会上以后，所有人际关系全都改变了。”

他没有说人际关系具体是什么，但他对当时生活的描述是这样的：“反正每天早上起来和助手一起工作，完了晚上就出去应酬吃喝，喝到一两点回来再工作。工作完了睡会下午起来再工作。一天的生活就这样。看着还是挺好的，但是我自己挺不那什么的。”

李博 1982 年出生在北京，父母是普通上班族。他换过 4 个高中，不断被开除。最初是因为鼓励全班旷课，因为“觉得学校是一所监狱，历史讲得也不对，一切都不对”；然后是因为鼓励大家都去搞对象，“因为觉得特别美好，应该让大家都好起来”；再加上他还搞摇滚，演得多好也不至于，关键是那种叛逆的感觉，“尽情撒欢，想骂什么骂什么”。这些自述让李博看着很是具有煽动性，他自己归因为“无知者无畏”，而且“自由是最重要的”。无论他看的书还是他内心的感受，都告诉他，“身为一个人，如果连表达的权利都没有，那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畜生”。

这个感受在他进入社会之后略有修正，变成了“在我们这儿尽量让自己活得体面，不是吃喝不愁那种体面，就是尽量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他可以去科班学画画，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并不快捷。“以前学过画画，但都没正经学，后来有一天早晨我突然特别想画，我觉得应该考中央美院。然后要考中央美院，得先考中央美院附中。附中没考上。就正经学了四五年再去考。”美院考上了，因为并不难。“这种画画它跟解题一样……你每张画去解决一个问题，当你把这问题解决了就没问题了。”

到街道上的那个戏剧化的瞬间出现之前，李博的人生大抵就是这样。当时他为了扭转创作滑行状态，试图去做“倒霉”的当代艺术。他有去国外的机会，但他的直觉是他必须留在国内，因为还想继续用艺术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说实话，真正要想做艺术，要想去改变点什么，还是要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并且其实不管做艺术、做文学，目前在中国是最好的，因为几乎（所有）你碰到的问题都是触及生活或者灵魂的问题。”



李博早期作品

在他不断折腾的过程中，他到了广西百色凌云县。之所以是凌云县，是因为自从他在街道上听到了那声“啊——”之后，就希望和搭档采集听障孩子的声音，而找来找去，愿意让他们做这事的只有凌云县的那所特殊学校。当时的李博心里想的还是当代艺术，孩子们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他的素材。但是在相处两周之后，他和搭档都觉得自己动

专栏

025 李博 “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样的”

杨樱 | 接力访问

做特殊合唱团之后，

是他“救了”孩子们，还是孩子们“救了”他？

很多媒体报道李博和他的无声合唱团的时候，都会从他 2013 年在某个街边听到的那声声音说起：一个听障的人发出的“啊——”，让李博和做音乐的朋友张咏“深深震撼”。然后故事就会快进到他们抵达广西百色凌云县的特殊学校，进而组织十几个听障孩子克服困难持续排练，把当初让他们俩震撼的声音以合唱的形式带入了北京音乐厅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观者拭泪，掌声雷动，李博发我的抖音小视频里，这样的镜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这样正统的讲述让人警惕，一切都过于“感动中国”了。李博对此回答得很爽快：“我那阵接受好些主流媒体采访，因为你就在这个环境下。如果你希望这个特殊群体能够更有尊严，有更多选择地活下去，在这个国家只有这些主流媒体才能做到。”

他总结陈词：“现在我做这个事儿，只不过是用一个艺术的方式，适应这个环境，能尽量帮助到更多的人。”

回头看我们的聊天，的确都在聊他说的这三件事：艺术、环境和需要帮助的人。但他最后还说，“其实是这些孩子救了我你知道么？”

李博是个画家。这是他第一个职业身份。他 2006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刚毕业就签了画廊，随后获得商业成功，国内外个展、拍卖、名声和收益接踵而来。后来他在微信上发我早期作品的图片。这些作品有各种介质，比如画或者巨型的象棋又或者是橱柜，它们无一例外都非常精致。如果你放大画作图片，你会看到绳索编织一般的纹理，就好像无数细细的麻花绳排布出一幅年轻女性胴体。极耗精力的大尺寸，还有作品背后隐藏的欲望，看上去的确如李博自己的评价，“都是荷尔蒙在那儿托着”。

机有问题——不管他们想表达的隐喻是什么，利用听障孩子的缺陷作为素材，“都挺操蛋的”。

一方面他发现的是歧视。不仅仅是对缺陷本身，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歧视。“在山里，家里有个残疾孩子，村民都会说你这人是不是干什么了，要不然怎么会摊上这事。”另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最终让他愿意花费 10 年的时间去做一件自己也没设想过的事。

“特殊群体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没有错，对吧？只不过这个世界是以大多数人的习惯或者是规律来建造……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看无声合唱团被触动的应该也是这种感觉。他们应该能感受到这群人在进入别人的世界，游戏规则他们自己说了不算，得跟着别人的来。”李博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因此李博认为无声合唱团真正改变的是普通观众，让他们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会让特殊群体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也会让观众们变得更好。

观众是否真的有这样哲学意义上的触动我不得而知。但是李博的确得到了孩子们的信任。这些孩子前后一共有二十多个如今最大的已经可以出去打工（半年可以挣 4 万元），最小的九年义务教育还没有完成，另外有三个上了大学——这也许是无声合唱团对他们命运的改变，如果没有合唱团的介入，教育在这些孩子生活里不会被认为是必须的。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既是李博和孩子们相处的一个结果（关于他和张咏如何训练合唱，有大量的报道可查），也是他寄予希望的一块敲门砖。他希望让孩子们借此获得话语权，可以去北京读书。那是 2019 年。演出很成功，北京学校的校长也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但这个计划和北京外地人口政策发生了冲突，“这个政策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就和它是冲着的，就没法弄”。

李博一度希望就近让孩子们在河北上学，但学校不靠谱。来回腾挪的时候，新冠疫情发生的。孩子们只能回到凌云县，李博也去不了学校，项目被迫中断。在这三年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制作了一份无声合唱团的绘本，由几个著名的机构牵头，李博来画。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画画，但都是接商业项目用来维持合唱团的运转。他从未接触过绘本，必须从大量阅读开始，但也画得不同寻常：最大的一张是 6 米乘以 4.5 米的尺寸，每一张风格都不一样，有油画，也有综合材料和装置，还有的是照片。最后绘本需要把这些创作都统一起来，还得对家长和孩子具有吸引力。他有一个小设计，在每张画上都加了一只红嘴蓝雀，作为一个信息传递员串联整个故事，也加入了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但是最后你会知道这只鸟就是孩子自己，有点《搏击俱乐部》那意思。”

第二件事是思考自己如何退出这个项目。“我在思考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如果说它是一个公益项目，那公益项目都是要有退出机制的。要不就是完完全全的结束，要不就是进入更大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我们个人就可以退出了。”

李博目前对此还没有答案。在那些采访他的媒体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公益项目，也起到了公益的作用；但是李博的内心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艺术项目，只不过和他最初的计划已经有所不同。当初被视为素材提供者的孩子们，已经成为艺术创作者本身。而这个项目持续的时间之长，也让当初试图摆脱创作瓶颈、觉得社会和自我关系怎么都很别扭的年轻人走到了一个对社会有更深理解的位置。

我问李博，最初那个希望表达的隐喻，是不是和言论自由有关。

他说：“对，其实这是社会表面的东西，更深层次的是每个人内心的孤独。这个孤独是无法表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划了一口子，然后我说太疼了，别人又帮你包扎又那什么的，但是最后疼还是你自己。感官你都无法表达，通过语言、听、看，很多东西都是不准确的。人和人之间是无法真正沟通的。”

除了被信任，这是他最后选择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原因。“作为个体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样。”

Q: 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我们要跟着孩子们去新的学校，到市里边儿去。桂林市聋哑学校。然后我们要开始新的训练了，以前的团员，还有新的团员，这次有 22 个人。

Q: 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A: 其实你看之前的表演，还是孩子在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是吧，虽然都是他们在发声，但是合起来是我们能理解的音乐。我们下一步就打算用他们真正的自己的语言做一场音乐会。

因为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和他们相处当中，我们知道音乐的另一种形式是什么？他们的确感受声音，像那些报道里是通过震动气息，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

大部分做音乐的人和听音乐的人都忘了的一件事，就是时间的流动。

这些孩子在流动的时间里把时间分割了，他们对这些被分割的时间，还有时间流动的准确性非常敏感。

Q: 那我们是可以听懂的吗？

A: 您不需要听懂。您只需要感受就行了。您看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需要任何歌词，我们只需要他们真实的表达就可以了，然后剩下音乐就是我们的事了。因为你看我们其实也不明白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每个世界里大家各自安好，之后能互相理解就可以了，互相理解，但是无法达到感同身受，这其实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Q: 会遇到什么困难？

A: 能跟当地学校都对接好了就行，现在没什么困难，钱的困难是一直在的。

Q: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来接力？

A: 杜曦云，这人特有意思。这么多年艺术圈只有三个人理解我在干什么，他是一个。



杨櫻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风骚律师 第五季》(Better Call Saul) 剧照

专栏

026 张颖 40岁以后， 我变成了一个“非典型律师”

杨樱 | 接力访问

一个人在获得“公共性”之后，
她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张颖是一个律师，如果不是她的客户或者同行，很多人和她的接触都是在“敦壩”——成都那个只能开 580 天的小酒馆里。她一开始是[邀请她做接力访问的灵子](#)的首位返场嘉宾，然后开始主持一个叫做“明亮的对话”的公开辩论。从“威尔·史密斯该不该扇耳光”，到“崔健变了吗”，还有“编剧六六遇到一粒砂”，这个活动让很多有争议的话题变成了公共讨论。这个活动只有一个辩论的框架，比如正方、反方和评委席，如果张颖愿意，她可以让这些讨论非常正规、非常仪式化，毕竟这就是她日常工作的场景。但她以“司仪”自居，“想方设法让大家玩起来就好了”。

在敦壩，张颖被叫作“非典型律师”。“有一个律师奇奇怪怪地会跟你说一些不像律师说的一些东西，听上去也没什么大错，大家又觉得好玩。”

她可能会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引导大家使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提醒哪怕是同一方的组内讨论本身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话，如果有必要，还会建议大家先扮演一下事件当事人，比如在“威尔·史密斯扇耳光”那场辩论开始前，有人扮演威尔·史密斯，有人扮演挨揍的克里斯·洛克，还有人扮演台下的贾达·史密斯，即威尔的太太。

“明亮的对话”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大家有勇气在公共场所表达观点也学会倾听别人，建立真正的交流。张颖认同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敦壩也是她接触过的最广泛的公共交流。在出现在“敦壩”的时候，她已经是律所合伙人、有经验的刑辩律师、有经验的企业管理者……这些身份其实可以让她待在一个高度提纯的专业人士社交圈内，但她却喜欢来自各种背景的人的交流，并在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开办文化空间“有同有异”的时候，沿用了“非典型律师”这个自我介绍。有同行觉得这对她的专业和业务是一种干扰，

但张颖觉得公共场域这么叫无所谓，这本来就是她的一种身份认同。

1970 年生的张颖成为律师是在 40 岁那一年，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在此之前，她是一个成熟的企业管理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踏入不相干的领域，以及这个领域会如何塑造她的世界观。

张颖成为律师是因为她的好奇心，其次是因为她的考试能力。这是一个听上去很“学霸”的说法，而事实上也好像的确如此。通过司法考试对张颖来说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工具就是花 320 元在网上买的盗版参考书和音频资料。她很幸运，丈夫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唯一的问题是记忆力不如以前，噢，还有因为法律、规章和政策常常冲突的《行政法》，无法靠逻辑和理解力解决。即便如此，这也是一项考试而已。

她一次通过了，原本合作的律所负责人听说这个消息，邀请张颖加入。到这个时候，张颖还是没有转行的心理准备。对方对她的“引诱”，是去负责探索律所的公司化管理，也就是让律师从个体户的角色转向不再身兼数职，而是在生产作业、市场营销等各领域分工合作。2010 年，这些刚起步，张颖难以以一人之力推动庞大的体系，又因为半道入行，也没有人会真的把她当新手来带。捏着律师资格证的她决定做案子，也不得不去做，从日常工作到所谓律所公司化管理的目标都必须如此。

最终扮演“师傅”角色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律师团。她受惠于微博，看到伍雷发布的当时在石家庄的一个聂树斌案件研讨会信息，信息很简约，没有提到参与者都是行业内的大人物，比如贺卫方、何兵，尤其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海律师团的周泽、杨金柱、朱明勇等都要去。后者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是为了维护律师执业权益组成的一个临时性公益团体。它始于广西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全国各地律师组成的 20 人律师团接替被抓的四位律师，前往北海办案。在此之前，这些律师还接手过著名的“李庄案”，之后还有“小河案”。在石家庄，张颖加入了会议。

“去了之后发现他们非常自由平等，不是重量级嘉宾在上面开会那种，而是摆成一圈的会议桌，大概三四十人，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互相了解。我就介绍自己说，我没做过什么案子，我就看到你们北海律师团发过一张照片，只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面都是男的？”

当时张颖以为北海案已经结束，没想到这个提问让她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北海律师团”。刑辩律师里，女律师不多见。看到张颖拖着行李箱应约去到北海，周泽律师高兴地欢迎了她，然后就请张颖帮忙阅卷。“我当时嘴上马上说好的，然后心里在想，什么叫做阅卷？”

张颖的世界就此打开在这帮律师出现之前，律师其实在刑案里面更像个附庸知道吧？不是我们理解的公诉人和律师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没有。很多律师根本就不敢说话，或者根本没有实实在在去做到那种对抗的辩护，而是成了一个附庸……这种情况在以前才是常见的……所以说这帮律师被命名为“死磕律师”，但真正地让大家意识到刑辩律师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有人格魅力的，是坚守了自己职业的。”

张颖说自己的公共生活开始得很晚。在做律师之前，她的身边只有家人、朋友和同学。她对社会议题的关心止步于一个人最基础的良知。2008 年汶川地震，丈夫参加了救援队，不少家人也在成都，张颖形容自己对当时的诸般问题“没有探索”，“只能说我会想问题，比如为什么不能追究豆腐渣工程？为什么不能去清理那些孩子到底有多少名？为什么不能关心到他们的每个家庭，以至于点对点地帮助到他们的心理的安慰和抚慰？”

2011 年温州动车事件对张颖是“分水岭”，她感知到了真相的缺失、公共机构的不作为甚至对事实的掩盖。此时她已经进入律师行业，对公共事件有了不一样的看待。“我意识到原来律师这个职业还需要有公共价值……有很多律师是排斥公共性的，就是做一个案子而已……你看到那些伤害和侮辱背后有些共性的东西，我进入这一行才有的视角。”

因为加入“北海律师团”，被贴上了死磕律师的标签，张颖有时候会拿不到代理函，也会被列入另册。不过她也因此结识了原本圈层之外的人，更多的刑辩律师、公共媒体人。与此同时，她依然在进行律所公司化管理。多重身份让她的社交网络发生变化，公共话题的探讨比以往更频繁。“但就是在饭桌上聊，它有个问题：话题随时被打断，随时在迁移，你刚刚想深入又飘走了，弄了半天全是碎片。”

“敦壩”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些新东西。首先是谈话的深入，因为去中心化和不加时间限制，敦壩的活动往往可以把一个议题推得很深，即便是“那种美国宪法的经典议题”，比如同性婚姻、堕胎和持枪。其次是因为每次都有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大家聊天的知识背景因此都有不同。最后一点是张颖此前没有想到的：同样的议题，放在“敦壩”和同行更多的饭桌上，谈话效果会有不小的差异，尽管大家都是真诚的。

比如“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敦壩我们探讨的是，唐山公安在公布这个案情的时

候有没有关注到女性视角，或者说罪名里面是否有涉嫌强制猥亵，对吧？或者是有没有性骚扰，会不会被其他的罪名所吸收。”隔天的饭局恰好也谈起了这个话题。“那天有律师在，他就认为完全不应该有性别视角，因为法律不分男女。因此我就发现这个议题是最难去融合的，至今仍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开放式的讨论为张颖建立了更多公众交流的信心。我们聊天的时候她刚刚完成转所，而她加入新律所的原因之一，是律所主任注意到了“明亮的对话”，也希望她把相似的探讨交流带入律所，律所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业务宣传。“基于律师行业的无用之用，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和外部不同职业、身份间的连接。”这既可以看作是和此前张颖做的事情的某种呼应，也可能到了一个时间点，更多人意识到基于公共层面的探讨是必要的、可行的。

我问张颖为何在经历这么多事之后依然能做到轻松乐观，毕竟政治抑郁是很多人迈不过去的一关。她提起杨学林，北海律师团里著名的一位。在经历复杂庭上交锋之后，张颖说，杨老师和大家坐在一起，“就要喝点小酒，他说庭上的事情全部扔掉，我们现在就只剩下喝酒，我们就只剩下吃饭，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很多律师被压垮、需要心理干预或者干脆转行的时候，杨学林的态度让张颖感受到某种特殊的释然。因此后来有一次她请贺卫方老师为她的生日题字，要求写下的是“咏而归”。

“我就认为我这个工作，只要我认真、诚实，我的工作就是有价值的。我能够体会到它的价值。”张颖说：“第一，要放下很重的一个自我，放下很宏大的目标。你认识到自己是渺小的，就会觉得我不承担所谓的天将降大任的重任，同时我还在这里，哪怕我小，但是我是一个完整的点，我还是在蹦跶。”

“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是战胜了那种困惑和虚无。你自己膨胀得很大的时候，你其实是虚空的，一公斤的棉花和一公斤的铁，至少你看到铁比较扎实……你把自己压小了以后，多多少少跟地面的接触可能就更紧一点。不要去诉诸于太宏大的东西。就像灵子说的，我们要发出微光。”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在看看能不能把一个辩护词弄到 ChatGPT 上去，看看它能不能生成图表，我正要折腾这个事情。

Q: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有意思？

A: 我觉得它对人类来说就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变革，真的会深远地影响到我们。我对它的兴趣是一个哲学的点，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有一天会有独立的意识和人格，现在很多人是在恐惧自己的职业被取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恐惧。机器人操控人类，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眼下它是工具，它让一部分人有更好的手段去控制另一部分人，其实要高度警惕。就好像我们在移动互联的时候有微博、微信，觉得有言论自由，不，你会发现它们后来的控制也是很厉害的，因为技术是中立的，所以我们要警惕的就是这一点。

Q: 所以你对 ChatGPT 的兴趣表现为？

A: 它让我思考怎么更好地去保护弱者。还是那句话，普世价值永远在，真正的公平在哪里，自由在哪里，弱势的一方如何被保护，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这就是当下的问题。其实你警惕的不是机器或者人，你是要面对人性幽暗的那一面，如何去约束它？所以我关心这个问题。

Q: 你推荐谁来做接力访问？

A: 郭睿，之前是记者，现在做刑辩律师。她关心女刑辩律师，最近也在写相关的东西。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为电影《弗兰西丝·哈》(2012)剧照

专栏

027 李颖怡 为了降低精神内耗，她“拆解” 了第一部电影

杨樱 | 接力访问

从某种意义上，
这样做的确是唯一出路。

《这众所周知的事》是李颖怡拍摄的第一部长片，故事从一名高三男生从班主任家阳台坠楼身亡开始说起。李颖怡想用它来探讨爱与暴力。当时她在中戏导演专业临近毕业创作，和其他人一样面临职业选择。除了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她把一个“野心”也放到了这部片子里：如果自己能在大四的时候把它拍出来，以后就真的去做一个导演。

“做一个导演”按照李颖怡的说法，是当时很多人会想但是很少去做的事，尤其是女生。“可能心里都有信念，但是因为社会。现在是越来越对女性友好，我那时候是2017年，整个市场还是倾向于男性。”

因为这个念头，李颖怡做了件不同寻常的事：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往长片的方向制作。中戏本科毕业生通常交出的都是短片，学校额外协商了一个方案，让她继续推进长片，从中剪出一个短片来作为毕业作品。为了让这部影片顺利进行，她和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憨人文化。因为保研，李颖怡在读研的那几年里继续推进《这众所周知的事》的后期，并开始送审和申请放映许可。在做这些事之前，她更多是对一部影片仅有艺术和内容视角的理解，它将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和审查制度里面临什么，她并无经验。

四年过去了，这部电影还在继续送审。

我们一开始没有聊她在审查这件事上经历了什么。我更关心在这四年多里她是如何保持身心健康的。因为在聊天之前，我知道李颖怡从来没有闲着，她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用某个短片赢得一些奖项，做过LGBTQ戏剧，最近则进入了一部女性题材的长片制作。而那个和《这众所周知的事》同名的公众号，除了一直在更新这些消息，还组织线上影像交流，探讨的话题都很直达心灵：“青春期、生育和性话题的讨论”，“和母亲

的关系”，PUA和歧视。它多少扮演了一点媒体角色。

“我可能把公众号当一个输出口，可以侧面去拆解（议题）。做一些线上的活动，不去放这个片子——因为我们不能放——但可以去跟大家讲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些过程。以前拍摄找了很多高中生去演这个戏，他们也可以参与进来分享。短片可以放映，也会有人希望继续露出，这些都可能让我觉得这件事还有做的意义。”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事情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你在意的是表达，而不是所谓的电影呈现，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被拆解的。拆解的过程中，一是似乎让这个东西一直活着，二是它可能会帮助你在这件事情上有更深的思考，未来再以其他形式继续让它存在……慢慢减少对这件事情的精神消耗。”

在考进中戏之前，李颖怡其实做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那个时候她做的更像是“以防万一”。她因为初中排练莫泊桑的《项链》而迷恋上了和戏剧影像相关的一切。她当时在学习画画，无论是画室老师、家长还是她自己，都认为考美院这个人生目标更为清晰——这句话其实不准确，因为前两者根本不知道李颖怡默默给自己增加了另一个选择：导演。这个路线上有什么学校、专业，都是在艺考的圈子里她自己打听到的。

她在高三的时候才暴露自己的第二选择，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她觉得画画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托底选项。但同时备考两种截然不同的专业还是让她精力不济，不得不作出选择。暴露的结果，是画室老师失望，而父亲找来编剧出身的远方亲戚劝说她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些“阻力”反倒把李颖怡推向了中戏。她当时想，就算复读也要考。

你可以看成这是一个执着追求自我的故事，不过我觉得，李颖怡在审视自我和所在环境这一点上似乎的确有过人之处。她看到的不仅仅是手头在做的事情，而是整个处境。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会跳出来看怎么样能够进入自己更适合的路径、如何去调配、获取某些机会，我可能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主动在受阻之后寻找精神的出路，让李颖怡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形式。比如策展和工作坊。她通过借着和一个舞剧导演朋友联合策划戏剧影像展的机会，组织独立影像放映，又从这次合作里重新发现了戏剧的能量，把这一块纳入了公司的业务。

李颖怡说在审查这件事上自己还被认为是幸运的，因为收到的意见里有非常具体的问题被指出，甚至“艺术层面是被赞扬和认可的”，不像有些送审作品，只拿到模糊的意见和坚定的否决。也因为这样，她反复修改，“觉得有希望、觉得没有希望、觉得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是要等的”。最尖锐的情感时刻，还是在写修改报告的时候电脑崩溃了，写好的报告回到了一切刚刚开头的样子，她崩溃大哭，周围人同情又无奈，以至于看着她哭都笑了。“当时真的很搞笑”。

我问她为什么要做电影，她说的答案倒是没啥稀奇的，她迷恋这种造梦的方式，“我观察到的事情，通过我的方式或者我造的梦境，只要能够涟漪到观众那一下，就是我想做的事。如果还可以对社会有一些影响或者帮助，那就是更好了。”

她和团队平均一年做1-2个有意义的短片。而女性题材的长片《陈文媛》，其实是和《这众所周知的事》同时完成的初稿剧本。当时本科的李颖怡认为自己拍得了学生，但是拍不了40岁的女人，因此把前者暂时搁置了。如今她已婚，又对家庭、社会和女性有了更多观察，就决定启动这个项目。

《陈文媛》的简介很简单：一个40岁的女人和一个意外怀孕的少女在医院里因为一粒扣子相遇了。它有一张有趣的海报，一个女生以夸张的弯腰姿势去捡一粒扣子。也是因为这张带海报的组讯吸引了梅婷和邱天。这是影片开头第一个画面。

如果把海报倒过来，你会发现它接近性爱姿势。



“这个动作是少女进入女人世界的开始，也是一个视角……我们去做妇科检查，会被各种摆弄，做一些比较扭曲的动作，所以我当时写（剧本）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动作。”

李颖怡生于1995年，迄今为止，职业道路不仅仅属于“顺利”，还被很多人视为“幸运”，尽管她说自己只不过才刚刚开始拍第二部长片。这幸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思维方式的灵活——很多时候这个说法都不算友好，但对李颖怡不是——包括她在处理商业和艺术的冲突时，提到的是“掌握和资方的对话能力”。“会总结出很多市场经验，在把自己宝贝的东西拿出去跟人交涉的时候，会提前考虑到如何能够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她还说起之所以没放下第一部长片，其实也有为未来做打算的意思：“它当初是一份比较贵的简历。选校园题材能看到很多商业的点，还能让人看到我如何做调度。短片就是两三个人，如果能在二十一岁搞得定一个班级，一个学校，别人会觉得你年纪轻轻或许能驾驭更成熟的项目。我当时这么想。”

Q: 你最近在做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A: 虚拟人。去年开始接触到现在，可能是公司的一个方向，同时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作品。

Q: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 不太厚道地说，你会觉得自己有点像造物主。我带着几个比较核心的编剧，一起去创造这个人。比如他为什么长这张脸，是什么性格等等，跟写故事很像，但又不一样，更细。还需要去了解游戏角色的设定方式，然后要交给技术员做出来。就所有人的表达都是文字化的，但是要出来一个画面。比如“年轻点，20多岁”，程序员就说，“你能不能跟我讲更具体的意见”，你就会说把眼睛怎么样修一下……后来我为了能够对话，找了一个整容医生……有时候我们自己会互相问对方说，我们是不是在物化男性（保持自省自审）……

然后这个项目也会让他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学习，让他越来越自动化。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它的创作可能性是另外一个东西。

Q: 有点恐怖。

A: 你说恐怖那也是。但我面对恐怖的方式，就是我要在恐怖到来之前先了解。我会觉得我了解了，当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如何继续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像苹果手机出来之后，其实淘汰了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现在的虚拟人技术根本没有达到打败演员的地步，但这是一个远大目标，会让我想象未来如果技术允许，演员和虚拟人是不是可以同等演出，我们作为导演，既要导演员也要导虚拟人的表演，虽然这可能要很久以后了。

Q: 做这件事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A: 耗资很大，它会越织越庞大，不像我们做一个电影项目，做完了就是完了。他会越铺越大，你会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在不断探索和发现。

Q: 推荐一个有趣的接力对象？

A: 津津，一个纪录片导演，现在在云南，同时做一些关于疗愈的事。我俩是因为反PUA认识的。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海街日记》(2015)剧照

专栏

028 胖丁 你需要跨出自己的 生存模式，与整个世界相连

杨樱 | 接力访问

对抗虚无的唯一方式。

胖丁锁骨下方有个文身，乍看像逻辑思维导图，仔细看的确是一个循环，左中右的圆形里，分别写着“宇宙”、“我”和“人类”。这三个圆上下都用带箭头的弧线串联起来，弧线中间写着“产生”，如果反方向读，那就是“生产”。胖丁说，正反都成立：宇宙产生我，我产生人类，人类产生我，我产生宇宙……

这文身是她在一次濒死体验之后的终极感受，她称之为“爱”。这种爱建立在和万物的联结之上，许多形而上学和宗教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她把那次体验的经过和感受写成文章，[发布在“BIE 别的”](#)，那是 2021 年 2 月，因为疫情，她没能回到美国参加毕业仪式，一直在上海待到现在。

如果愿意，胖丁可以始终以学术口吻说话，但她更愿意神叨叨地开自己玩笑，让朋友叫她“神婆”。

她是个创作者。艺术、社会学和神秘主义都是她的表达出口。她还在线上机构开设过《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实验影像：艺术与神秘主义》这样的在线课程——某种意义上，你可以看作申请美国本科的学生拓展人文方向可选的服务之一。其中会谈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民俗学和精神分析。

胖丁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她以某种相对轻松的方式接纳了自己，当然或许她只是没提艰难的部分。她把个人体验转化成某种创造力，并且并没有试图把自己镶嵌到普通人的社会框架之中。而她在做的事情，也给寻求不一样体验、不一样感受方式的人提供了选择，或许接受这样的事物，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思想上的松动。

为了更好地说明她的想法，我们的聊天以口述方式整理如下。

女性主义的自主性就是一种灵性的觉醒。我想起小李（注：男友）表姐的力量。和她相比我 obviously 是受着特权长大的，各种教育资源，包括很小出国，让我很早接触到女性主义，或者说平时可以高谈阔论哲学政治。但是她是真的非常受限制的环境里，要突破这种结构、突破各种困难。她还有个弟弟，爸妈对她不管不顾，只管弟弟。她在农村的中专毕业一个人来上海打拼，爸妈是完全不给钱的，还找她吸血。她很勇敢地划出边界，不与那些亲戚往来。封控的时候一个人被封在工作的美容院里。过节的时候还哭着给小李妈妈打电话，因为没有任何亲人。现在她已经有了自己真正的落脚点，通过疯狂工作后买下的第一套房，一个从小到大真正意义上的家。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去划出边界，建立自己的世界，活出自己的自主性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即使她不会去谈论这些观点。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爸妈和我一直都在成长。他们不是封闭型的父母。我爸原来做医疗，开一家小制药公司，但是疫情的时候好像因为某个政策，这种小的厂就办不下去了。我爸就去做保险，也很屌，50 岁的人了从实习生开始做起。真的，刚开始和一群大学生一起应聘，那些大学生都淘汰掉了，他做得很好，还去考了什么金融证。我妈则和我在修行上有很多可以聊的。即使过去我们家也有过很多痛苦的回忆，但是很开心大家都慢慢从中超越了。

我有过一次濒死体验，那次体验之后，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怎么说，用神秘主义的叙事也可以，用非神秘主义叙事也可以，就是一种意识到“你除了改变自己，别无他法”的意识，就是，“你拥有所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但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改变你内在”。它并不是一种非常具象的方向。有点像创造力。

比如说，女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非神秘的叙述方式你的命运带给你被限制的身份。如果你意识到，你唯一可以改变的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自主性，这个时候就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为以及各方面改变你自己，甚至改变社会的走向——当然不是通过你一个人。只是说，你这一个人的改变就对社会非常重要。你创造你的世界。

最早和神叨叨事情接触是我小时候，当时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用科学解释可能就是精神分裂症，或者小朋友的幻想。比如住校的晚上会看到两张人脸在我上面，而且是外国人，一躲进被子里面他们就笑。每次就会哭，然后跟我妈和老师说，老师就觉得我是想家。

濒死体验之后，我开始重新以另外一种态度接纳这些叙事。之前可能会有很多怀疑，或者用理性去解释。甚至我濒死体验之后，即使是一次那么神圣宏大不可描述的经历，我还在用理性去理解，把它定义为一场幻觉。但是你同时又会被理性的思维给局限住，就探索了很长一段时间，看各种各样的报告，各种各样的那种 research，为了理解这场经历是什么。结合理性和感性后，我终于开始接纳它。

那次体验无法用语言总结，非要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听起来会很鸡汤，即：所有一切最终的真相，就是爱。那种把所有万物连接在一起的生命力。宗教里用到神啊佛啊道啊，如果用日常的语言翻译，可能只能用“爱”这个词。它不是个人的爱情、友情或对某个事物的迷恋，而是一种庞大的规律本身，是无条件的、自然运作的本质。

不过落实到具体事情上面还是需要非常多的个人觉察。比如去年我很想走，是出于一种恐惧，连说句话都会觉得自己要面临那种恐惧，非常愤怒，而且怎么说，还有不甘心，想念那种可以自由说话的感觉。但是现在我觉得愤怒往上走是一股力量。恐惧消散了，还是想在这边先做着。

我从小到大都很清楚自己要走艺术创作这条路，一直有各种探索。高中毕业觉得想要先更了解这个世界，当时很反感假大空的东西，就先学了社会学和艺术史。2021 年毕业之后做自由职业。去年一年真空，应该所有人都会觉得被抽掉了一年吧？前年一年是我最享受的生活状态，就是每时每刻都非常忙，忙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时和朋友梅子办了一个行为剧场工作坊，叫“沉洞泉工作坊”。引导参与者们在深度连接下去探索意识的不同维度，去感受艺术的通灵性，以及去创造一个无评判、无恐惧的创作和疗愈空间。每周一到两次，要怎么做每次都不一样。

有一次我们的主题是通灵出发的创作，每个人会被分到一个别人的物件，但不知道具体属于谁。在引导下让大家打开觉知，用感受和直觉去感受物件里面的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写下来，再现场改编成一个即兴的剧场行为表演。这些物件其实都可能带着沉痛的记忆、悲伤的记忆或者是美好的记忆。如果被解读出来了，这些记忆就被一种表演形式重新呈现；如果没有被解读出来，也是一种新创作，记忆被附加了一种新的叙事。

其中就有一个女生，她带了一件白 T 恤，是她之前一段非常 toxic，就是非常不好的

恋情里的 T 恤。当时抽到这件 T 恤的是一个男生。他就感受到非常具体的画面，说，当时有兔子玩偶，一只脚穿着袜子一只脚没穿，然后感受到夏天那种炎热，门背后一直有人在敲门……就全对上了。当他表演的时候，女生直接在现场哭了。

这种直觉性的能力，就需要你放弃大脑习惯性的思想和逻辑，去感受一些画面，真的每个人都有。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做测试，就做工作坊的时候，我会给每个人一张塔罗牌，背面朝上，请大家“看”塔洛牌的另一面是什么：颜色、图案、事件等等。通常觉得自己很能或者很想要看到的人都看不到，通常只是觉得自己在随便玩玩的人都可以看到很准确的画面，因为没有大脑的执念。

也和精神病院合作过。当时有一个参与者，妈妈刚好是精神病院院长。武汉那个时候不是疫情吗？之前会有志愿者陪患者画画什么的，当时都没了，他妈妈觉得我们工作坊也是艺术疗愈，当时就去武汉待了一段时间。

医院比较特殊，都是社会边缘性人物，有的人是被家庭遗弃了。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被害妄想症的男孩，一直觉得疫情是他弄的，只要你跟他说话，他每时每刻说的都是：你是不是来抓我的，我家人都有没有死……好不容易有了信任，他说了几句就会说，你不会是记者吧，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

我之前有体验过，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药物产生了类似的状态，就是被害妄想症的状态，但那次对我来说就只是一次体验，但对他来说，是禁锢一生的状态，真的非常痛苦。所以当时完全可以理解并共情到他。其实和他们对话都会形成难度，所以肯定不是以语言的交流方式。我们是先和他们玩，慢慢了解，让他们信任我们，然后再可能是画画的方式，让他们先打开一下，再开始叙事类的创作。

我觉得（神秘主义或者理性等等）每个人的叙事都不同，然后找到自己合适的就可以了。关键是这种叙事可以跟你的心灵发生共鸣，或者说，它可以让你对生活本身保持鲜活的态度。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同时意识到有些事情比你的自我更大。

佛教中的 dharma，可以折衷解释为由宇宙的规律产生的你的道路。去除尘垢后，将内心的声音落地至自己最好的能力范畴，同时自然而然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通过行动去成为更觉察，更有爱，更有力量的自己。如果你始终在自己的生存模式里打转的话，终有一天会虚无的。是的，你需要跨出自己的生存模式，与整个世界相连。

Q: 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 我恢复了日常的创作状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各种项目。最近在准备的行为剧场和食物有关。因为疫情的时候会饿，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吃的，当时也没有团购，也饿过，只是没有饿到死。但是有很多人真的饿到过。我做了一个建模影像，关于一个女孩即将饿死所以把自己给吃了，进入了身体的内部，在生与死，我与“非我”，“结构”和“自主性”中徘徊。饥饿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关于消化，和进食有关。我觉得疫情开放之后，（整个社会）有点像是疯狂进食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疗愈性的过程，这种把不同个体融合成一个混合经验的过程，非常矛盾。第三步则是 energize，还在和朋友策划中。然后平时依旧在搞神婆的东西哈哈哈哈，占卜咨询什么的，以及最近喜欢做首饰。

Q: 有什么和以前不一样的发现吗？

A: 就会发现学过的所有东西，只要你足够在乎，就都会连到一起。发现共联性是最让我觉得激动的点。我无法只做一个事情……从小到大，我怀疑过自己，兴趣爱好那么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想做，那是不是就成不了什么事。后来发现这是社会对你的 PUA。你完全可以什么都做了，在彼此之间找到相连性。但也有人想把一个事情钻研到底，成为专家，也很好。

Q: 有什么觉得困难或者你试图解决的问题吗？

A: 希望家里空调可以更凉快一点。夏天快来了，我们住在阁楼上，空调吹不到。

Q: 想邀请什么人来继续接力？

A: EVA，实验剧团老妖精的创始人之一，会手语。最近通过她接触到一些聋人朋友，和他们有了深入交流，感触到了很多。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七, 2023.03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